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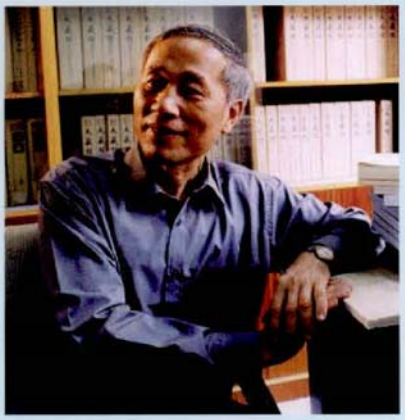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6

2008

当代学林



◇ 姜伯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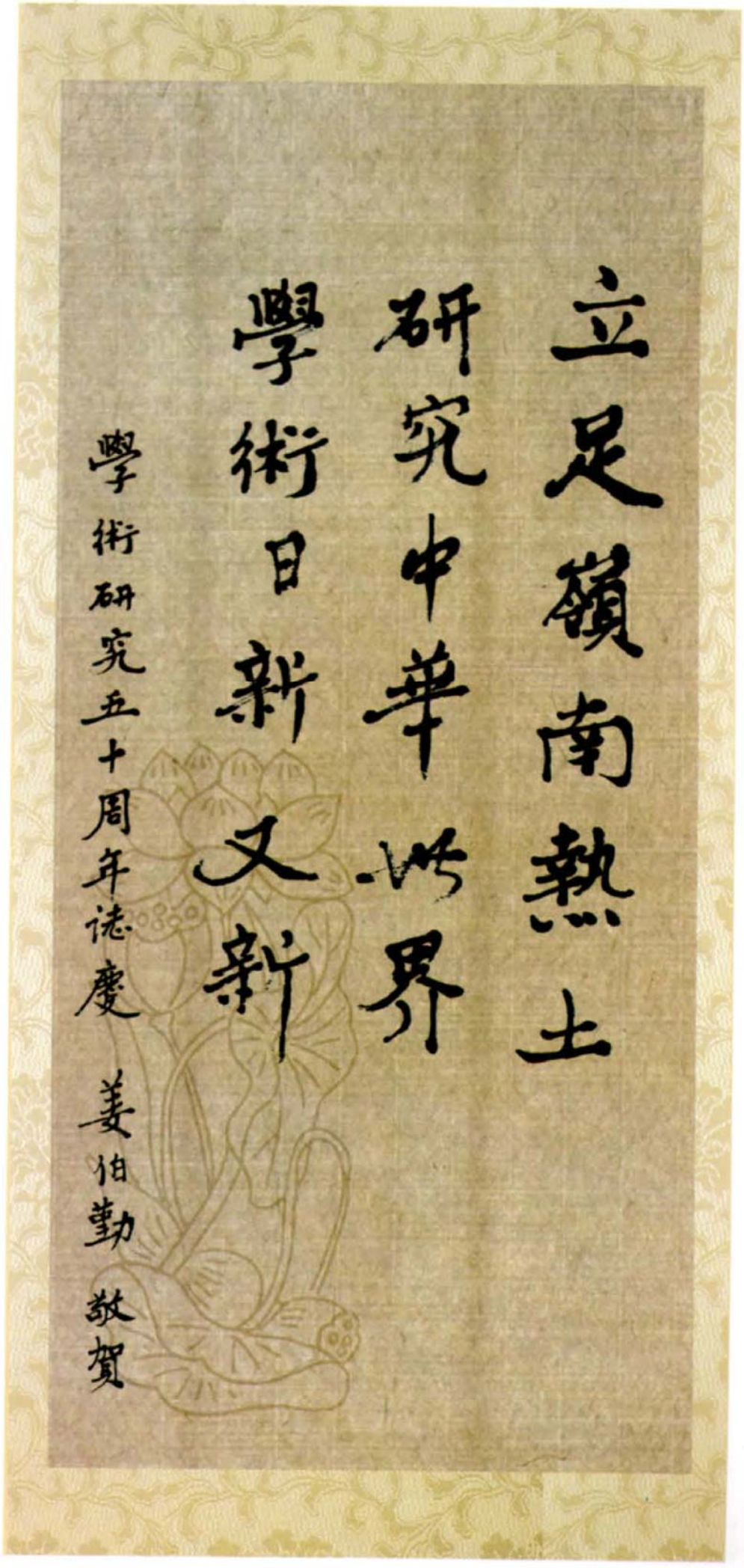
姜伯勤教授（1938年12月—）现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时期曾师从隋唐史、西北史地大家岑仲勉师，研习清代西北史地及劳格治史的传统；又师从社会史、婚姻史专家董家遵师，培养社会史视界。在学术上有缘受到著名史学大家唐长孺先生、周一良先生的栽培，又受到本系陈寅恪先生、刘节先生、梁方仲先生、金应熙先生、周连宽先生等硕学的长年影响，在敦煌学研究方面造诣专深。现主要从事隋唐史、敦煌学、丝绸之路史研究，也涉猎艺术史研究和中外封建社会比较研究。

专著有《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敦煌社会文书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92年）、《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学林出版社，1999年，该书2005年获澳门第一届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参与撰写《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朱寰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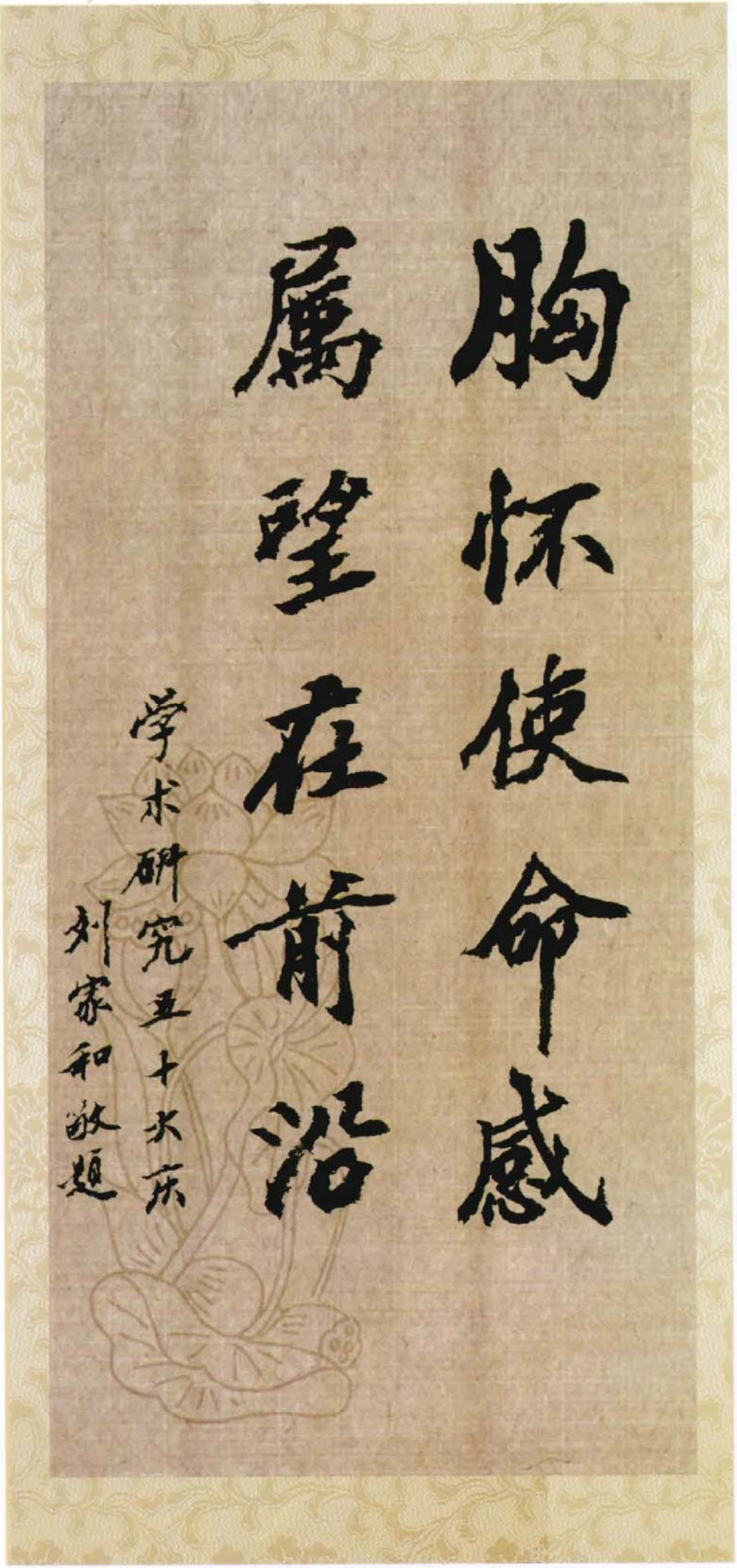
重要论文又有《隋末奴军起义试探》（《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中国田客制、部曲制与英国维兰制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从学术源流论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特色》（原载《学术研究》1992年第4期，后收入《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介休祆神楼与宋元明时期山西祆教》（《东洋学报》80卷4号，1999年3月，日本东京）、《岑仲勉学记》（岑仲勉《岑仲勉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论敦煌“守庄农作”型外庄与“合种”制经营》（《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新世纪著作的先声——读选堂先生<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见香港《明报月刊》2007年第1期）。2007年在兰州、敦煌作《线的艺术：中华文化之光——论段文杰先生对敦煌文化史中线的艺术的继承和创新》学术报告，现为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主办《艺术史研究》的常年撰稿人。

姜伯勤教授学风朴实，学涉中外，上溯汉晋之交，下及明清之际禁书。由于学术上的不断进取与开拓创新，在港澳台同行及国外同行中是一位有影响的学者。

姜伯勤教授是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组第三届、第四届成员，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为本刊题词



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为本刊题词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Academic Research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社　长：张国仪
主　编：叶金宝
副主编：陶原珂　雷比璐

学术研究

(1958 年创刊)

2008 年第 6 期　　总第 283 期　　出版日期：6 月 20 日

融会与超越

文学他化论 【两篇】

文学他化论
——关于文学的三悖论考察　栾　栋　5

文学的自化生成与他化遁逸
——以中国史传文学为例　陈桐生　14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发展观的发展与 30 年中国改革主题的转换　叶汝贤　王晓升　18

哲　学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三篇】

论实践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霍桂桓　25

《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什么　段忠桥　32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两个来源及其两重含义　周民锋　36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消费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左派的教训
理查德 D. 沃尔夫 [著]　吴昕炜 [译]　42

消费主义背景下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历史透视　孙玉霞　张筱薏　50

政　法　社会学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
——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任　一　周立群　55

马基雅维里喜剧《曼陀罗》的政治意蕴　谢惠媛　61

和谐社会视域中效率与公平的制度伦理分析　曾秀兰　65

转型期我国社会多元利益冲突与政府的角色定位
——以广州、珠海市城中村改造的实践为例　郭　臻　69

经济学　管理学

先进制造业的三维理论模型及其特征　龚唯平　查伟伟　薛　白　74

(月 刊)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政法 gzphilaw@yahoo.com.cn
哲学 gzphl@yahoo.com.cn　　历史 gzhist@yahoo.com.cn
经济 gzronger88@yahoo.com.cn　　文学 gzliter@yahoo.com.cn

中国产业集群成长的根植性研究 【四篇】

地缘关系与我国产业集群企业合作行为研究　李胜兰　80
我国传统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孙洛平　85
集群企业的效率来源及其文化寓意　朱富强　88
主导产业激励：区域产业集群形成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以广州汽车产业集群为例　方建国　谢小平　93

历史学

共入临川梦中梦
——试论陈寅恪先生的《牡丹亭》之杜丽娘“至情”说　姜伯勤　97
论中晚唐国家礼书编撰的新动向对宋代的影响
——以《元和曲台新礼》、《中兴礼书》为中心　吴　羽　102
环境史 【四篇】

能源帝国：化石燃料与1580年以来的地缘政治　约翰·R·麦克尼尔 [著] 格　非 [译]　108
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开拓　包茂红　115
岛屿太平洋环境史研究概述　王　玉　125
瑙鲁资源环境危机成因再探讨　费　晟　132

文　学　语言学

戏说与仿真：百年史剧观念之反省　邓齐平　宋剑华　138
论香港社会剧的艺术探索与创造　胡星亮　142
刘长卿事迹新证　胡可先　148
黄节集外佚诗七首考略　程中山　152
汉语二语习得与一语习得的共性表现探析　陈凡凡　155

·学海酌蠡·

《老子》“事善能”辨误　孙雍长　17

英文摘要　159

Academic Research

CONTENTS

No.6, 2008

On Otherwise-minded Literature: an Investigation on Three Paradoxes about Literature ····· Luan Dong (5)
The Self Generation and Escape of Literature to Be Other Thing, with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Taken as a Case ····· Chen Tongsheng (14)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mental View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heme of China's Reform in the Last 30 Years ····· Ye Ruxian and Wang Xiaosheng (18)
Three Essays about the Contemporary Comprehension of Marx's Philosophy
About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Studies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 Huo Guihuan (25)
What's the Question Vexing Marx in the Period of Rheinische Zeitung' Duan Zhongqiao (32)
Different Origins of Marx's Concepts of Ideologie and Bewu β tseinsformen and Their Different Implications ····· Zhou Minfeng (36)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Consumerism, and U.S. Capitalism: Lessons for the Left ····· Written by Richard D. Wolff and (translated by) Wu Xinwei (42)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Consumerism ····· Sun Yuxia and Zhang Xiaoyi (50)
Pluralism and Cooperationism: an Approach to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s System of Trade Society ····· Ren Yi and Zhou Liqun (55)
The Political Content of Machiavelli's Comedy Mandala' ····· Xie Huiyuan (61)
On the Institutional Ethics of Efficiency and Fair in the View of Harmonious Society ····· Zeng Xiulan (65)
The Conflicts for Social Multiple Profits in China and the Role Position of Government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 Guo Zhen (69)
A Triple-dimension Theoretical Mode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Gong Weiping, Cha Weiwei and Xue Bai (74)
Four Essays on the Problems in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A Study of Geo-relation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Cooperation ····· Li Shenglan (80)
The Influence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clustering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 Sun Loping (85)
On the Source of Efficiency in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 ····· Zhu Fuqiang (88)
Incentive for Leading Industry: the Local Governmental Behavior in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luste ····· Fang Jianguo and Xie Xiaoping (93)
Chen Yinque's View on the Most Feeling Figure Du Lilian of the Opera Mudanting'r ····· Jiang Boqin (97)
The Influence from the Compilation of National Ceremony Book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upon the Song Dynasty ····· Wu Yu (102)
Four Essays 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ource Empire: Fossil Fuel and Geopolitics since 1580 ····· (writ.) John R. Mcneill, (trans) Ge Fei (108)
Ocean Asia: a New Aspect in the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 Bao Maohong (115)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Island Environment of the Pacific Ocean ····· Wang Yu (125)
The Causes Brought Nauru Island into an Environmental Crisis of Resources ····· Fei Sheng (132)
A Reflection on the Opera Conceptions of China in the Last Century ····· Deng Qiping and Song Jianhua (138)
On the Artistic Probe and Achievement of Hong Kong's Social Operas ····· Hu Xingliang (142)
Some New Proofs about Mr. Liu Changqing ····· Hu Kexian (148)
A Textual Study on Mr. Huang Jie's Poems Lost for a Time ····· Cheng Zhongshan (152)
Common Phenomena in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s a 1st Language and That as 2nd One ····· Chen Fanfan (155)
English Main Abstracts ····· (159)

融会与超越

文学他化论

——关于文学的三悖论考察*

栾 栋

[摘 要] 文学他化，是文学非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文学是己非己的复杂原因。这样一个命题包含着文学非文学、文学反文学和文学化文学的悖论推理。这三个悖论揭示出一串危机重重的话题：文学蘖生，文学蜕变，文学消亡。当然，其中也孕育着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诸如文学潜移，文学辟合，文学默化。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解析处于三悖论征候群中的文学他化问题，它们是文学思想的悖论式推理，文学自身的悖论性生发，文学跨界的悖论化去留。

[关键词] 文学他化 文学非文学 文学反文学 文学化文学

〔中图分类号〕 I01；B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05-09

文学他化，是文学非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文学是己非己的复杂原因。这样一个命题，说起来简单，但是展开来看，立即会进入悖论推理——文学非文学，文学反文学，文学化文学。这三个悖论揭示出一串危机重重的话题：文学蘖生，文学蜕变，文学消亡。当然，这三个悖论中也包含着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诸如文学潜移，文学辟合，文学默化。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解析处于三悖论征候群中的文学他化问题，它们是文学思想的悖论式推理，文学自身的悖论性生发，文学跨界的悖论化去留。

一、文学非文学：文学思想的悖论式推理

文学非文学是文学他化的前提和基础。这个命题揭示了一个比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审美才情、文学是一定上层建筑之上的特殊意识形态等定义远要深邃的思想。

文学非文学是不言而喻的悖论，但也是颇为实在的常情。神话对于创造神话的族群而言，那是对神性神秘的崇拜，对万物有灵的敬畏，但是后人特别是今人，却把它当作最美的文学，甚至称之为“文学的母胎”。《诗经》自然是先民的歌唱，无疑是文学，但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学文本，在其收集、删改、编纂的大手笔——孔丘那里，整改的目的却在于“兴观群怨”，在于“思无邪”，在于外交辞令的需求，所谓“不学诗，无以言”。《离骚》、《天问》当然是文学之瑰宝，而且是有诗人姓名的骚体诗歌，但是作者并没有从今天我们理解的文学意义上看待文学和创作文学，而是质疑自古以来的不解，抒发饱受各种压抑的幽愤。司马迁的《太史公书》有“无韵之《离骚》”的美称，而作者本意则是“史家之绝

* 本文系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外文学他化现象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06JDXM75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栾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420）。

唱”，即师法周孔，究天人通古今成一家之言。魏文帝的《典论·论文》是推崇文学的“皇上”御笔，然而“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本质上却在于政治考量。《文心雕龙》一向被视为文学自觉的鸿篇巨制，倘若透彻地解析刘勰的深衷，则明了其原道前提的预设和文体丛林的擘画，即原本是文学神思的还原，是诗性智慧的别裁，换言之，作者真正表达的是文学悖论：文学是文学，同时还有文学非文学。

文学非文学，不仅中国古代的文学如此，外国古代文学亦然。古埃及的《亡灵书》，古印度的《原人歌》、《奥义书》，犹太先祖的《圣经·旧约》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它们都是以别的原因问世，今人理解的文学不是创作者和传唱者的本意。当今文学之所“是”，出自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变迁。西方语言中的文学（Littérature）一词，本意是指把隐蔽的东西显出来。发轫于文艺复兴的西方文教运动，本质上也是要把各种潜在能量挖掘出来的开显过程。近600多年来西方的学科越分越细，西方的文学越来越露：显露自然，显露性情，显露基础，显露阶级，显露“三我”，显露结构，显露肉体……。这样的文学观，比起古人所谓才不可尽露，势不可尽使的思想真是一种现代性的背道而驰。尽管如此，显露性和科别性强烈的文学并不就是其自身所鼓吹的那样独其所是，它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虽然所有现代文学的辩护士给文学下定义时，无不把内容和形式统一，将文学与本体整合，举例来讲，文学是人学、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是审美活动门类……，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本身已经暴露文学很难就是这样的文学。因为作为谓语和表语的后半句并不能与前面的主语完全同一，更何况举不胜举的定义相互冲突，都有与非己者大相径庭的论据。

近几十年来，文学是文学——文学自性——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文学的“是”字流派竭力申述文学的纯洁，维护文学的种性，倡导文学性的理论家们为之不懈奋斗。另一方面，文学的“非”字群体历数文学的“不是”，揭示着文学的去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家们大都是非字号的杀手。需要肯定的是两大流派的历史贡献。开发文学之是文学者，其实践活动和理论事业殊堪珍贵，因为这种努力为人类提供了那么一个审美的品种。问题在于所有文学自足和自立的论证都是顾此失彼的言说，尤其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文学是文学的定义，都没有将文学的否定性命题涵括进来，因而，所谓自圆其说实际上并未在逻辑的自反悖论中得到圆赅。解构文学之非文学者，不仅有首食螃蟹的勇气，而且有解析文学弊端的敏锐和另辟蹊径的胆略，但是砸锅卖铁绝非理论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在文学研究问题上更需要披沙拣金的吸纳。文学是文学的思想亟待改造，文学并非文学的意蕴也亟待开发。

笔者提出的文学非文学主张，不是提出一个与是—非两派调和性的命题，而是对文学及其生存韵律的深层次概括，目的是为了统筹兼顾文学研究的基本环节，给面临自然、人文、科技全球化和太空开放的文学寻找安身立命的基石。笔者近10多年发表的《文学根器解》、《文学隐秀论》、《文学归藏论》、《文学归潜论》、《文学归化论》、《辟文学刍议》、《论人文学术还家——兼释文史哲互根》等文章，都是以文学非文学的命题作为纲领，在更宏大的学术境域中逐一展开论述。本文讨论的文学他化论，就是文学非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向度。质言之，阐发文学非文学的悖论命题，不仅是为了捕捉有史以来文学的是非两面，而且力求吻合文学及其理论变革的大势所趋，对于身处地球村文明和面对太空化生存的文学来说，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文学非文学好比一个人的是己非己。从生物学的范畴来讲，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细胞体系，每时每刻是自己又不是自己。其成长过程披露出了个体的自立自足自强，他就是他，而在生物获得性遗传之种属禀性方面他又不是他，他是获得性遗传。他不断吸收的营养成分当然不是自己，充其量慢慢成为自己。他的生老病死展示了一个生命的他化过程。文学亦然。祖上的基因经过了若干次阴错阳差的耦合，在“这个”时段方才成了一个自己。在成己之时，它有了排异的自我感觉，于是它真以为“我是独我”。作为人文现象的文学，从其进入社会和历史之时，它是在成为它之自我，然而这个它之我，是许许多多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以及历史机遇促成的我，任何一个必要的还原，都意味着我不是我，我是其他事物的合成型共在。在心理学和精神现象学方面，混乱的天光云影时刻都在文学的思想意识中聚合分散，潜

意识、下意识、无意识、有意识，共同组成了一个我的集合体，即自我非我。非我成全了自我，自我超越着非我，自我与非我一起演奏着我是我与我非我。因而，文学之我首先就不是我——这许许多多的非我原本不是我，只是经历了一次次的分流与偶缘，让文学之我有了那么一个出头之日，让作为自我出现的潜在的非我之我在此刻之我中获得一次绚丽多彩的绽放。

文学非文学的命题也包含着对文学主体和本体的变位思考。说文学非文学，等于说文学之主体非主体，本体非本体。一个文本，一种文体，一种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在积聚生发成分和酝酿潜在力量的过程中，呈显为非本体或前本体状态。当它们崭露头角乃至自成一体之时，便有了人们习惯上所讲的文学的本体。当它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保护思想诉诸文字并形成体制之时，就有了本体的主体及其意识。文学的有些类型相对早熟，如诗歌、散文、悲喜剧，文学作为文化整体中的一个独立的门类，则是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统绪和教育体制的产物。在文学方面追求本体和主体及其意识的文化现象，是启蒙运动思想文化的一种产品。文学主体，不论是作家一己，还是其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阶层和兴趣群体，是人文与自然的合力在一定历史时段的绽放。这种特定的绽放也是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其绽放面遮蔽了促使绽放的合力，压抑和疏离着不合时宜的反合力。绽放面无论怎样灿烂辉煌也不能抹杀或消除非绽放方面和反合力的真实存在，更不能永远否定和阻止后者的待机而起。而且文学主体的形成和绽放，决不意味着这种主体性可以逃脱自身向非文学异在的转渡和向非文学母体的回归。

从西方近代哲学的意义上讲，文学非文学是一个二律背反问题。康德关于客体围绕主体转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实际上为主体张目，而他的物自体之不可知论，又为主体鞭长莫及的事物留白。这样的思想与其无功利而愉悦的审美理论，都对文学的是己非己留下了拓展思路的可能。黑格尔将文学理念看作精神现象上升运动中的一个环节，他抓住了文学与精神长河的总体性关系，为理解文学非文学现象揭示了一条博大精深的精神之川。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思想以及“按美的规律创造”的观点，为文学的本体起源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又为文学的异体起源论找到了有力的根据。1979 年笔者曾详细阐发过马克思关于文艺的本体—异体起源思想和自律—他律张力体式的理论价值，这个思想对今天开发文学非文学仍然很有启发意义。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领域的开启，为文学非文学的理论发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卢卡奇通过整合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哲学及文艺理论思想，提出了对审美主体和本体问题的新的解读，遗憾的是文学非文学、主体非主体、本体非本体的辩证关系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雅各布森、托多洛夫、热奈特等人深入探讨了形式主义的文学特征，他们对文学性偏取偏断的研究，对我们全面地把握文学现象有正反两方面的启迪。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将尼采反文明包括反文学的思想推到了极端，构成了关于文学研究的新的挑战。笔者关于文学非文学的钻研，既是对古今中外文学基本原理的反思，也是对后现代主义反文学倾向的一种积极的回应和突破性的尝试。

古今中外的理论家，关于文学的思想不外乎两个大端，一是从文学的所谓内在的必然联系方面为文学寻找存在的理由，一是从文学与某种外在事物的关系方面说明文学的寄生或受制原因。前者大都阐发的是文学的文学性，后者主要论证的是文学的他律问题。就理论上的完整性和逻辑上的统一性而言，上述两大趋势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历史性贡献。可是当我们一旦从任何一方的对立面审视，各方的优点和缺点又呈现出矛盾的甚至是敌对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自体系症状，该症状的特点集中表现在自封闭和排他性两个方面。治疗自封闭和排他性都需要开放性的心态和开放性的眼光。过去我们经常强调，一个理论家或一个学者应该兼容并包，现在看来兼容并包还是有局限性的。兼与包的唯一出发点就是我主体立场。在学术上我主体式的兼包已经难能可贵，但是绝非上乘，最高的境界应该是我非我的通化。我非我，是说我既是我，同时我又不是我——我是我，我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我非我，我虚己他化，生能舍己。文学非文学就是我非我的思想的具体运用，文学他化论则是文学非文学的他向思考。换言之，文学他化论是文学非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阐发文学非文学他化向度的关键步骤，也是疏通上述两个文学思想大端的能动环节。

文学他化，他的出现举足轻重。他是谁？他是你我之外的第三者。他和你我一样，都有可能是平衡性或否定性的一极，非常关键的是后者。即便是一个坏的因素，他的参照性、牵制性和调节性作用不可或缺。因他的出现，我与你或我与对象，或你与对象的关系在格局上发生了变化。人类天性排他，这既是人的动物性遗传使然，也是人的前人性或曰非人性作祟。由于他者的投光和在场（哪怕不在场），你我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有了新的调整。真实的味道在“品”字三口中形成，公平的关系在“众”相多人中建立，“恊”和的氛围在戮力齐心中酝酿。真正的公正和相对的公正，只有在打破二人结构时才有可能形成。文学中最强大的作用力是我的活动，在许多情况下，你是我作用磁场的附件，他是我叙事方式的道具，但是当他作为叙事中心，作为我和你都必须参考、敬畏和成全的一个重要存在之时，作为我主体从事文学活动的制约性尺度之时，不仅我和你因之无法一厢情愿地独占鳌头，而且我与你之间锱铢必较的争斗和心照不宣的默契也随之打破。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考虑到他者的作品比你我之间的二人转更接近真理和正义，更具有文学所要求的艺术性和复合性。他是源头的活水，是你我的见证，是真理性的一个活性因子，是文学“是文学”而又“非文学”的可自由可公度的新生面。而文学也正是因为能够他化，才不致陷入自我封闭的象牙塔或死胡同。

西方的辩证法认为，一个事物每时每刻是自己但又不是自己，文学非文学的现象与这一条生成非生成的原理一脉相承。古印度的佛学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文学非文学的悖论与释教色空观的变位洞察相互印证。中国古老的智慧很重视有无相化的圆通思想，文学非文学揭橥的正是这一化感通变的要诀。过去我们讲中外思想方法都是为了高扬某种特定的主体或本体学说，于是举凡讲为是之道便备受赞扬，一旦涉及非是之处，立刻有犯忌之嫌。实际上是与非是，原本都是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彼此与非彼此，各方与非各方，互为资质，互为现象。人们强调某一方面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忽略其他方面必然破坏了道理。文学非文学，这个命题正是为了纠正过去一边倒的文学观，开放的是文学的门户，阐发的是一个完整的文学命题：文学是—非的相互涵养。

二、文学反文学：文学自身的悖论性生发

文学反文学是文学他化的对抗形态。这种对抗不是文学生发的唯一规律，但却是文学司空见惯的现象，是文学必然经历的宿命。文学自反，其不可思议的背后，有着文学悖论生发的奥秘。

文学反文学，表现在文学体式间的对举和替换。这是人们熟视无睹的秘密。文学样态从来就是在递相抵消中代谢，抵消式代谢既是吸纳，也是排除，既是对举，也是替换。《周易》与《山海经》都有神话，但脉络不同，前者传自黄帝周孔，后者源于炎帝蚩尤。华夏远古神话之间的抗衡和分流于此见出端倪。我们还可以对诗歌体式做一个更为“原诗”的追溯。原始部落单音节的重复性呼叫，是单韵语的破天荒，或可称“一言诗”的滥觞，于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无言诗”遂成过去。二言诗萌发，“一言诗”逐渐隐匿。三言诗产生，二言诗随之潜转。四言诗发祥，三言诗走向式微。五言诗走俏，四言诗落架过气。七言诗辉煌，五言诗一度低靡。宋词元曲迥异于唐诗。近代以来的新诗歌，又掀起了与古旧诗词激烈的抗争运动。时至今日，各类诗歌此消彼涨，不时有上述某个体裁的诗作冒尖。从总体上看，潮起潮落，无非是把诗歌反诗歌的内在矛盾演绎到了微妙的程度。散文亦然。早期的散文以原典和史传见长，而原典和史传大都从审美传情得益，但同样因为情美性征招嫌。情美最终让散文成为文学散文，情美也使散文成为破坏自身质朴气质的精神鸦片。形式华贵莫过于骈文，诗体文综的考究在骈文中登峰造极。此类文学固然很美，但是文思和诗情也由之带上了非同一般的镣铐。变文、传奇、话本、小说、戏曲……，所有这些个文学样式，不但递相掏腾，后来居上，而且貌似发扬性的传承，实则牺牲式的兴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继承与创新其实是遮蔽与别裁，移植与改造包含着抵消与取代。文学性从非文学的文史典籍逸出，文学性给文史典籍点上了美人痣；文学性在不同的题材中招降纳叛，文学性也给文学自身以俄底浦斯式的戕害。

文学反文学，表现为后发文学对前在文学的逆转。逆转是后起文学对前此文学的回流性反拨和逆向

性平衡，这一现象常常从突破典制方面披露出来。出土殷商甲骨文古歌神性浓郁，《四方风》[①]和《今日雨》[②]将读者引入一个天人沟通的世界，而《周易》中保留的歌谣则人性味凸显，人神地位的明显变化，透露出商周相反的文化价值取向。后者对前者的逆转，是人性诗对神性诗的反弹，也是禀命造化的本原诗与人性诉求的才情诗相互之间的切磋和逆向性平衡。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学反文学。《诗经》也是一个范例。这部经典扼杀了什么？沿着孔子单行道，远古大量的前文学、亚文学、准文学遗产为之深埋大葬，甚至永远泯灭，而符合克己复礼尺度的仁义诗则被保留下来。这是另一种特点的逆转——狭隘的诗学取舍。将《诗经》与《周易》古歌相比，在孔子筛选和删改后的诗集中，看不到大气磅礴的诗作，也看不到感情奔放的歌谣，而《周易》留给我们的68首古歌，则气势博大，意境深远，思想相当解放。将《荷马史诗》与《诗经》相比，前者那种人鬼天龙兼收并蓄的恢弘，留给后人的信息远比后者丰富。如果让孔子删改《周易》，或者让古希腊也出一个孔子去整编《荷马史诗》，有多少上古的精神资源能够保留下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圣人出而文学残，《诗经》成而古歌湮。毋庸讳言，在《诗经》是诗经的方面来讲，孔子做了一件有典制意义的工作，他为中国开拓了兴观群怨的节情伦理诗论，但是从文学反文学的他化思想而言，其中庸式的礼化诗学既窒息了远古诗声，也扼杀了春秋的诗歌种苗。孟子所谓“王者之迹息而诗亡”只是找出了春秋诗歌式微的一个原因，他没有意识到也不愿接受另一个事实，即孔子式《诗经》典制化的片面取舍，由之造成的缺憾深远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诗学创造精神。

在先秦就有过对孔子诗教非典制化抗争的逆转。群体化的逆转有庄子一脉，非群体化的逆转有屈子个案。庄子和屈原都不属北方文化范围，尤其不是儒家系统，南方文化让儒教的蔓延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庄周风歌笑孔丘，屈平楚辞震《诗经》。文学庄子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最懂得文学非文学，而且在于他很擅长文学反文学，特别在于他极其通晓文学化文学。庄子谈哲理于方外，荒诞谬悠一任自然，文学非文学于斯为盛；庄子寓庄重于诙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文学反文学臻于上乘；庄子崇大道而积虚，去己丧吾直逼天倪，就文学化文学而言，庄子是千古一人，庄子的门生及庄派后学在文学他化方面贡献卓著。屈原是另一位楚文化的代表，他敢爱敢恨，善死善生，融政治于骚体，冶学术于抒情，声调均异于风雅，是非颇谬于圣人，自铸伟词，别具神韵，这是让儒家以《诗经》为典制的文学说教瞠目结舌的创造。孔子儒教非常重视文化体制建设，几至无孔不入；庄子文学格外看好精神的自由舒展，可谓似庄却谐；屈原楚辞尤其凸显个性的充分张扬，堪称诗界绝唱。孔子是华夏儒家一派的诗学之王，诗学之王出而歌声歇；庄骚是中国先秦文学的翘楚，翘楚之风起而诗韵长。应该庆幸中国文学有逆转性的巨擘，舍此华夏诗学真成了孔府家酒。庄子和屈原对儒家诗教的逆转，都逐渐由个体性的抗争变为群体化的逆转。庄学和屈学对后世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庄子与屈原不啻华夏一族的两个异类，他们的逆转，使中国文学他化为之增色；庄子与屈原已经成为人类文学的瑰宝，他们的逆转，也让世界文学他化之星空日月闪亮。“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这样的评价不仅是文学人龚自珍一己之体会，而应该看作是整个人类文学史的共鸣。

经过秦始皇的文化专制和汉武帝的思想钳害，文学反文学难乎为继。但是逆转典制的活动并未绝迹。所谓山高无碍白云飞，竹密何妨溪水流。逆转活动在隐姓埋名式地进行，《古诗十九首》和《孔雀东南飞》就是这样的文本，是非典制化的开放性篇章。它们是《诗经》的逆转，于诗思有反，于诗体有变，于主笔有隐，与贵贱有平，遮蔽了文本成为经典的痕迹，避开了诗作定格典范的强制，绽放了众语

---

①参见《甲骨文合集》第14294号（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东方曰析，风曰劦。（引者按：风即风）南方曰因，风曰微。（引者按：微，有作愍，今从）西方曰彝，风曰夷。北方曰伏，风曰役。”此甲骨文本收集有两片，编号14295写的是同样的内容，只是方位次序和个别刻符略有差异。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看，完全符合当今文学原理所谓诗歌。我称之为《四方风》或曰《四方风神》。

②参见《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第5册)：“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完全具备了今天所谓诗歌的形态和神韵。我称之为《今日雨》。

匿名喧哗的场面。正是由于它们的慷慨承担，才让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从中汲取到一种与诗学传统不同的意蕴。在那里，诗歌继屈原之后再次成了逆转主流文学的压轴之作，甚至再次凸显为文学反文学的攻玉之石。变态了的诗学风云在这里净化，逆转中的文学急流在这里缓冲。《古诗十九首》和《孔雀东南飞》没有留下作者、编者、润色者、甚至演唱者的姓名，这正好见出如是两种文本对儒家正统诗学典制的自觉不自觉的逆转。它们不像《诗经》，仅仅由一个大圣人一手定乾坤，也不像楚辞，靠一个落难的贵族诗人大笔成楷模，而是许多文人介入的创作，是许多艺人参与的演绎，许多编者经手的加工，许多读者转抄的传扬。它们不像《诗经》、楚辞那样被主流话语奉为圭臬，而是广大的读者群体共同成就了的千古不朽的传唱。《古诗十九首》和《孔雀东南飞》是无名的诗界奇葩，是实际在传的文运关捩，向前比较，它们是对华夏高古文学伦常化的矫正，向后推移，它们是对中国中古诗歌的风情化的洗练。在含蓄、空灵、亲切、自然、写意、恻隐等情趣和意蕴方面，我们可以说它们也是对此前文学反文学过激现象的平衡，是对隋唐两宋诗歌再次辉煌的预演。这两个文本是划时代的瑰宝，但也是中华民族悲辛的纪录。经过残酷而漫长的封建专制压迫，类似庄子和楚辞那样的宏构伟制已成为历史，在巨型叙述方面的文学他化式的创造有待来者。

在世界文化范围看，有一种极端性的文学他化现象，我们称之为文学逆反。文学逆反是比逆转远为激烈的文化剧变。这个话题将文学他化研究引入了断裂性他在的向度。文学逆反性的他化带有普遍的可探讨性，它不是一般所说的批判与继承或传承与创新，而是根本性的逆反，是彻底的改弦更张，用形象的语言概括，那是川谷陵替式的更换，是沧海桑田式的取代，是流沙浪丘式的覆压，是天塌地陷式的崩裂。古巴比伦文学、古埃及文学和古印度文学的中断，就是这种伴随文化断裂出现的文学断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前者颓败以至灭绝，后来者对前者采取了毁而代之的措施。古希腊文学和古罗马文学也曾经遭此厄运，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同样做了毫不留情的逆反性清洗。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文学是对中世纪文学的逆反，有趣的是文艺复兴运动在逆反中世纪文学的同时，还表现出对古希腊文学的回溯性逆转。印度的佛教文学逆反性地覆压了古印度文学，而它后来又被非佛教文学所取代。类似的逆反也发生在不改朝换代、不种族消亡的文化变革之际，后现代文学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后现代文学思潮是对近现代文学的逆反——传统的文学乃至文化被消解，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后性文学已不再是花样翻新的陌生化，而是把文学彻底地变成非文学。这种现象就是非常典型的文学反文学，也是文学他化的极端表现。

逆反是与逆转完全不同的他化现象。逆转是对前此文学的反拨、矫正、纠偏和更新，而逆反则是另起炉灶，改道易辙，不仅文学道路转折，而且文化性质改变，甚至人类审美及文化公理均遇到考验，或被践踏（如上古时代两河流域的文化更替），或被覆盖（如西方基督教典制对希腊文化的遮蔽），或被取代（如西方近代文化对中世纪宗教文化的变革），或被消解（如西方近几十年来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崛起）。逆反是对主流思想的抗争，是对传统文学的挑战，是审美趣味的改变，是不同文学潜能的释放，换言之，逆反将种族和人性押上了命运的审判台，把文学和文化逼进了精神的断裂带，把思想和理论推向了智慧的绝对点。从思想赓续和体式兴替背后的哲理来讲，逆转是一种反常近道，是一种典制更新，说到底仍然是一种严峻的“窝里争执”，充其量产生一种“导向转变”；逆反是两种命运的较量，是两个板块的对决，是两个天体的碰撞，一句话，是文学他化的一个极端问题：当不能或无法他化的他在袭来时，如何把握民族和文学的命运？这样的思考已经濒临善恶伦理与天命理念无法沟通的鸿沟天堑，那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话题。

在阐发文学反文学的体制大端之后，我们也不应忽略另一种形式的他化性逆动：文人相残。这是人们蓄意淡忘的事实。文学人士在相互比对中逞才，在争夺资源中较劲，这也是人之常情，文之常态。文学是个性之花，是文人们负才使气的舞台。相轻相争，有时适可相反相成，所谓磨合即此义。老子尚无，孔子履仁，虽然共美于春秋，毕竟心远而道反；孟子刚强，庄子自然，尽管同生于战国，终究志乖

如参商。这可以称作文人相轻的磨合互补。但是一旦相轻过了头，那就是相诋、相谤、相倾、相轧，这就是我所说的相残。韩非遇李斯，同门且遭害。班固论屈原，异代犹排斥。司马迁被宫刑，不仅仅是一个汉武帝的暴虐，在本质上是满朝文武的合谋。三曹一家，乞命至于七步。三李异秉，受制有过六合。“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何止是孟浩然个人的感喟。“总为浮云能蔽日”，“不知何处是他乡”，应该看作是李白为所有落魄文人的悲歌。卢梭与伏尔泰都属于启蒙大师，前者独立特行，生悲死哀，后者城府深沉，尊崇享及后世，倾轧的天平何其失衡。乔治•桑好客名闻遐迩，仍然免不了波德莱尔等人的肆意攻击。索尔仁尼琴才华出众，决不向强权低头，然而他自己却不能容忍肖洛霍夫的天才英纵，曾诬陷后者“剽窃”。几十年后《静静的顿河》手稿重见天日，终于使后者所受之污辱得以昭雪。文人相轻的度不好把握，而且负才使气的文人们在日常磨合中往往失之偏颇。杜甫惜李白，称：“世人皆欲杀，我独怜其才。”诗圣一往情深，而诗仙则有“饭颗山头逢杜甫”的嘲弄。诗才如仙，尚且如此，凡夫俗子，谁能脱俗？

文学领域固然有惺惺相惜的美谈，也有肝胆相照的佳话，但居多的却是文人相轻的陋习，更可怕的则是尔虞我诈的倾轧。文人相轻往往出于趣味偏见或思想局限，虽然不利于乡愿式的交友，但是有助于学术上的争鸣；而尔虞我诈则属于人性恶欲，是盘踞在文学领域的毒蛇。数千年来，谋诗害命见于甥舅者不是孤立的事件，窃稿自美欺师灭祖者大有人在。中外文学史编纂者大都披沙拣金，串联的尽是佳话美谈，文人们比草莽匹夫远为卑鄙无耻的一面则被淡化，被遮蔽。文人相残，文学自戕，这个话题绝非文学史的美玉微疵。韩非被害，屈平沉江，班固狱死，杨修遭戮，刘勰潦倒，李贺夭折，章学诚早逝，龚自珍暴毙，柔石惨遭杀害，鲁迅毕命英年，冯雪峰罹于文祸，老舍沉湖自尽，沈从文盛年辍笔……，与其说天妒其才，不如说人忌其能。百花丛中的污浊并不因姹紫嫣红漂白，学术史上的屠戮却由于刀尖笔利改写。真善美与假恶丑往往需要颠倒来看。历史如此，文学何尝不是如此？

文学反文学，这是对文学人根性的考验。根性即本根。本根在界，在界意味着有物混成，其功在酝酿，德在缘起。缘起是诸般因素成就一个事物。根性非童心，童心并不像李贽说的那样纯真。小儿尚有杀人者，儿童犯罪并非罕见现象。此处讲根性，旨在说明文学人在根本上是复杂的统一体，需要化感通变地自我改造。是物三分害，非己一段清。文学和文学人一样，也是复杂的矛盾体。文学是文学，有其是文学的局限和自蔽性的问题；文学反文学，也有其反文学的理由与漂移性的偏颇；而他化，则是突破是文学与反文学的连环扣，是防范文学腐败文学的净化池。当然，他化如果进入他制式的他在，则会陷入另一种独断。你我他的任何一种独制均非福音。你我难免偏至，但是他化，尤其是你我他相互的他化则是成人之美，是文学和反文学的矫正性辟合。文学的同流合体，是庸才。文学的与众不同，是创新。创新活动大都会离经叛道，至少是逆反行为。这里就涉及到文学伦理问题，同时涉及到文学宗派和流派的合理性问题。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文学自由问题，即不论内在还是外在，能容得他者和他在才是无为而有为的文学，能成全他者和吸纳他在才是出神入化的文学。提倡文学他化，其意义相当深远。

上述逆转性创新、逆反性取代和逞才性较劲，发生在文学自身，表现于文学的自覆自反，而其本质或深层则是文学内部和外部的他化。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了文学是文学，即文学中的审美和谐、神思超迈与怡然可乐的一面，但却很少有人从理论上剖析文学反文学的内在机制。如果说文学是文学捍卫了文学的面子与尊严，那么文学反文学揭示的则是文学的尴尬和荒诞，即审丑矫枉，解放才情和被压制的创新。审美神思，张扬的是文学协调性道德的必要；审丑矫枉，凸显的是文学进取性伦理的艰险。进取与协调，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共同构成了文学的刚柔奇正，一起刷新着文学的隐秀去留。

三、文学化文学：文学跨界的悖论化去留

文学是跨界性生存的事物。因而关于文学的本体起源与异体起源的争论，从一开始就陷于偏执。本体起源说将文学的理据集中于文学性的成分，异体起源论把文学的根源归之于非文学的母胎。其实文学的悖论性命运与生俱来，文学的悖论化去留到底未改。（悖论化去留，不是指悖论的去留，而是指去留

成为一种悖论。）跨界性生存，牵扯出文学的痛苦情感——文学不文学；悖论化去留，触及到文学的最大难题——文学化文学。文学是文学，而又同时化解文学。这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此处只阐发几个大的环节，它们是文学悖论化之出没、变耕和转渡。

文学化文学，是文学去留的一语双关。文学跨界去留包含着悖论化的出没。其出没的锁钥是辟合。笔者在《文心雕龙辟文学思想刍议》中指出，“辟”是一个多种义项对立分歧而又通转互补的字眼，辟文学或曰文学辟合，就是文学非文学最好的表达。有些文学离我们远去，但又时时让我们倾心萦怀。有些文学已经枯萎，却又在另一个时间韶华重现。有些文学销声匿迹，数千年之后突然莅临人间。有些文学曾经如过街老鼠，时过境迁又成为抢手的读物。有些文本长时间不算文学，换个角度分明又是经典文学。许多历史文本和当下作品，本身就在文学非文学之间辟合，时刻等待会心人慧眼识珠，等待有缘人打开封闭的关锁。悖论化出没的门户是圆通。打开关锁，还要登堂入室，开放门户，有待圆通曲致。圆通，才能在文学处看到非文学，在非文学中看到文学。《周易》、《圣经》绝非文学，然而衣被文学，胜似文学。老庄孔孟，均非文学，但是其耕播文学，又相当文学。二十四史，岂是文学，可是其渗入文学，且披露文学。为什么这些文本能与文学合，因为它们本身有圆通之道，因为阅读者有圆通之德，因为作者、文本、读者的去留变化中有圆通之数。悖论化出没的智慧是融会。融会是文学去留难题的真切的化解，因为辟合开其关卡，圆通入其门户，融会才能打成一片。融会之于文学非文学，是熔为一体的智慧。以融会的心智读文本，文学气脉油然而生；以融会的手法写春秋，春华秋实诗意盎然；以融会的气度解疆域，森严的壁垒实在可以消弭。融会本质上是超越美学的感性学通衢，感觉与理解的整合在其中酝酿；融会在精神上是突破诗学的文艺学缘构，文学与艺术的沟通从他在聚焦。辟合为文学的去留而守望，圆通为文学的去留而解蔽，融会为文学的去留而开化。在辟合、圆通、融会的理论方法中，文学的跨界已跨未跨，在疆非疆，有界无界；文学的来去浑然一体，来就是去，去就是来，悖论化的出没因之而获致升华性的化裁。

文学化文学，是文学去留的一体两面。文学跨界去留呈现为悖论化的变耕。变耕的间隔是语言，这是一个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的命题。人们通常把文学的变耕理解为社会环境和历史时代使然，具体讲，是政治主导和经济制约的结果。这样的理解当然有道理，文学变迁与此类原因息息相关。但是有没有某种因素是贯穿而又超越了这些牵制性的事物呢？有，那就是文学语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学的去留，原本是语言的起承转合。各种社会历史的东西固然牵制语言，但是也要看到另一面，文学语言往往可以超越社会历史条件轰动世界。汲冢书和上博简，藏经洞古卷的出世和敦煌学在东西方的崛起，虽说是由偶然的机遇而出入尘世，但是作为语言的艺术却可以入地千年而出世万里，行藏诡异，跨越地域，将语言的艺术尽情地舒卷。文学是语言气脉的涵养。从无到有的创制是语言花朵的开显，从有到无的隐匿是语言根须的潜藏，语言文本间的移译是语言品种的杂交，文体间的消涨是语言艺术的轮作，文学人的盛衰是语言境遇的顺逆，文学上的休耕是语言气脉的养生。这些层面，一向为许多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忽略。

如果说变耕的间隔是语言，那么变耕的牵挂则是他者。文学的精耕细作逐渐使文学人士陷入自我封闭的处境，文学的持续单植最终让文学园地变成萎靡不振的花坛。文学的套耕间作必然为各类品种留下与邻为善的余地，文学的轮耕休耕自然使文学生态成为郁郁葱葱的植被。这样的间隔不难理解，因为物一无文，和实生物，民胞物与，文学亦然。前人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全面的说法应该是“一代集百代之大成”。一文有多文的涵养，一生有千秋的关爱。文学间隔是对同类质朴的温情，文学变耕是对他者深沉的挚爱。在这种意义上，让过气的文艺品种潜伏蛰眠未必不是好事，刻意花大代价挽救濒危文化似应适可而止。一个文化或文艺种类寿终正寝，正如一家人的祖先与世长辞，有句话叫“入土为安”。不要因为后人们今天有钱有势了，一定要起先人于不封不树的坟茔，为他们重修祖祠，再造金棺。真正的孝子贤孙应该是继承前辈的优良精神，努力创新，再造辉煌。这才是不愧先人爱后人的光宗耀祖。变

耕的间隔要讲的便是文学艺术上的一个朴素的道理：对他者实在的亲，真正的爱，愈是真爱大爱，愈是自然无痕。变耕的间隔，就是这样一种对他者由近及远，乃至无远弗届的爱。这就是文学非文学悖论的大爱境界。变耕的尺度是博大，“各领风骚数百年”，是小年；“麻姑一去海生桑”，是中年；“碧海青天夜夜心”，是大年。摆弄文学也好，钻仰学术也罢，都要有甘于寂寞的心境，放得下自命不凡的身段，才有心事脚踏实地地耕播，展得开万古千秋的气概，或许能够勘破苦寂死灭的大关。如果一个人以大年的计算争朝夕而惜分秒，以永恒的追求继往古而开未来，即便出不了精品，也决不会生产文化垃圾。

文学化文学，是文学去留的一举两得。文学跨界去留披露出悖论化的转渡。其本能性的转渡是潜移。“断竹续竹”之歌，“举重劝力”之说，虽然有功利之嫌，总归是天性之吼。“诗亡而春秋作”，史盛而韵文伏，当然为理性驱使，也不乏松散本能。民谣之雅化，骈文之美致，律诗之严整，戏曲之程式，小说之跌宕，影视之遮诠，不惟社会历史变迁使然，也是文学资质的性之所至。野生动物的转场属于物种生存的自然选择，文学样态的兴递在于意识有无的合力推移。有意识开发是功利要求，无机心运作是潜移默化，文学的跨界去留正是在悖论化的演绎中转渡。其艺术性的转渡是隐秀。《文心雕龙》对隐秀下过这样的定义：“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刘勰此论，将隐秀的修辞学含义发挥到淋漓尽致，但是对隐秀论的辩证关系语焉不详。应该说隐至超脱，秀在其中；秀于化境，隐亦希声。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隐就是秀，秀就是隐。隐秀的微妙就在于它是一种文学的艺术，需要相当的修养去完成。其终极的关怀是归化，有此关怀，才能使跨界去留的转渡臻于化境。归化是反朴归真，反其朴则生生不已；归化是泯隐化秀，隐秀合则母子同堂；归化是克己复道，返其本则与道俱化。从归隐（隐秀）、归藏、归化逐层修为而言，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不会潜移默化和隐退消亡，那才是真正的可畏。

总之，文学是跨界生长的精神树，只有在非文学的滋养下才能枝繁叶茂；文学是象牙塔里的自由花，只有在反文学的突破中才能绚丽多彩；文学是藏风聚气的隐喻体，只有在化文学的归潜后才能淋漓尽致。在文学非文学的视野中，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文学边界线的狭小；在文学非文学的聚焦处，我们才能充分地领略文学去中心的可贵；在文学非文学的命题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史哲互根的重要。在文学非文学的钻仰上，我们才能细致地感受到传统文学理论的局限；在文学非文学的圆赅后，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文学及其理论变革的必要；在文学非文学的辐射圈，我们才能有效地因应寰宇时代的召唤。

责任编辑：王法敏

文学的自化生成与他化遁逸

——以中国史传文学为例 *

陈桐生

[摘 要] 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天生的文学。文学之称文学，文学之有领域，都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之后而形成的一块园地。文学就其来路而言，历史上就是根在文外，源于他处。而文学越成其自身，就越强烈地感觉自身的弱小，就越想僭越自身，走向神话化、政治化、哲学化、历史化、宗教化等途径，由此造成文学遁入他者的他化现象。中国史传文学的自化生成与他化遁逸，为文学他化论作了一个生动的诠释。

[关键词] 文学 自化 他化 中国史传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6-0014-04

19 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关于感性的抒情的文学观念传入中国，此后我国文学研究便迅速进入了西方式的疆域化轨道。文学有了自己的理论疆域以后，研究者手中有了利器，文学研究事业因此得到长足的迅猛的发展，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学研究的崭新局面。一百多年来，各种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著作和文章如同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大凡一种事物在走向鼎盛之后，便开始向着自己对立面转化。在西方文学观念带来中国文学研究繁荣的背后，另一种学术危机已经在潜滋暗长，这就是文学研究的格局越来越小，越来越封疆自固。“文学失去了本根的化境，从此不再是行云流水无所不在；从此也脱却无为有为而转向急功近利的量化生存。我们把中国古代文学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原生态转变成自我‘领域’的‘独语’，将其超越人类自身局限的化解性禀性改造成了‘只此一家’的古代文学专业主义。”[1] 有感于此，近几年来文学理论界有识之士提出一种新的补弊纠偏的文学理论——文学他化论。所谓文学他化，是指文学由其他事物生成而又向其他事物遁去的整个过程。在文学发展史及文学研究中，文学自觉的张扬，文学自律的强化，往往遮蔽了文学源于文化潜入他者的非文学、反文学乃至去文学的他觉、他化、他律。文学他化现象研究，就是针对文学封疆自固、日趋器化的一种纠偏。

其实，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天生的文学。文学之称文学，文学之有领域，文学之划分出疆界，都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之后而形成的一块园地。文学就其来路而言，历史上就是根在文外，源于他处。换句话说，文学是由本来并非文学的事物孕育、演化而来。一方面是文学的自化生成，另一方面是文学的他化遁逸。文学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越来越趋向于自觉、自化、自律的线性进化；事实上，文学越成其自身，就越强烈地感觉自身的弱小，就越想僭越自身，向着神话化、政治化、哲学化、历史化、宗教化、科技化等其他方向发展演变，由此造成了文学遁入他者的他化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说是文学的他觉或他律，这是一种非线性的逆向蜕变。

* 本文系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外文学他化现象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06JDXM75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桐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420）。

让我们以中国史传文学为例，来说明文学由其他事物生成并向其他事物遁逸的原理。

中国早期文献是一个大全，一个综合，一个浑沌，它蕴含着宗教、政治、哲学、历史、艺术等多种内容，当然也孕育着文学的原始胚胎。殷商甲骨卜辞、《周易》卦爻辞、殷周铜器铭文等早期文献之中，间或有一些历史纪事的感性因素，这被后代文学史家看作是中国文学（包括史传文学）的萌芽。记载帝王政令文诰的《尚书》开始出现若干写人因素。《商书·盘庚》上中下三篇记载盘庚为迁都而发表的训辞，文中虽然没有正面描写人物的文字，但透过盘庚软硬兼施的历史性讲话，人们仍能从中感受到作为政治铁腕人物盘庚目光深邃、手段老辣的性格特点。《商书·西伯戡黎》记载殷末大臣祖伊与殷纣王的简短对话，从中可以感受到祖伊的政治良知和殷纣王的愚顽。《周书·无逸》通过周公之口，讲述周文王的生平业绩："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这一节文字有历史人物生平概述，有细节描写，虽然距离典型的历史人物传记还很远，但已经初具史传文学的若干因素。从西周中期到战国时代，出现了三本对史传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国语》、《左传》、《战国策》。《国语》中的西周文章全是记言之作，偶尔有极简略的叙述，用以介绍人物言论的前因后果。读者可以从人物言论及其行为中把握到人物的某些个性，如《国语·周语上》中"邵公谏弭谤"一文，邵公作为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主要是通过他的"为民者宣之使言"等开明言论体现出来，而"虐"、"怒"、"喜"、"不听"这些高度简洁的叙述文字，则点出周厉王暴虐、昏庸而又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昏君个性。《国语》中的春秋战国文章侧重记载宫闱密谋。如《晋语一》、《晋语二》、《晋语三》、《晋语四》记载了从晋献公、奚齐、晋惠公夷吾、晋怀公子圉到晋文公重耳的五世之乱，晋国各派势力围绕着晋侯继承人问题展开生死大角逐，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帐中密谋、设计陷害、篡弑屠杀、骨肉相残的人间惨剧。这四个部分的《晋语》纪事互相衔接，完整地记载了历史事件的发生与演变，其中对晋献公、骊姬、夷吾、重耳等人生平都有相对完整的记述，如果将记载他们事迹的片断联缀起来，就会隐约看到历史人物传记的影子。《吴语》和《越语》写吴越兴亡，各条材料既独立成篇又可以衔接，合起来看颇具传记文学的规模，文中夫差、伍子胥、伯嚭、勾践、范蠡等人物的性格特点都很鲜明。《左传》本按照编年体记史，但由于作者长于叙事，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描摹人物声情口吻，捕捉历史细节，因此书中许多历史人物被写活了。作者不仅将主要历史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郑子产、楚灵王、齐晏婴等写得非常传神，即使是一些次要人物如公叔段、武姜、颖考叔等也给人印象深刻。唐人刘知己在《史通·二体》中，以"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作为《左传》之短，其实从史传文学角度来看，"纤芥无遗"正是它的长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打破编年体例，将晋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的生涯放在一起记载，这样不仅写出了人物的生平历史，而且能够从中见出人物性格的变化与发展，可以看作是一篇人物传记的雏型。成书于战国纵横家之手的《战国策》有时将人物事迹放到一篇之中去写，如《齐策四》写冯谖客孟尝君，《赵策一》写豫让刺智伯，《燕策三》写荆轲刺秦王等等，这些文章独立出来，就是一篇比较完整的历史人物传记。在艺术手段上，《战国策》在人物形象刻画以及心理、细节、语言等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的成就，而夸张、虚构、渲染、铺张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则有助于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

经过千百年的酝酿发展，中国史传文学到公元前一世纪走向成熟，出现了《史记》这部划时代的传记巨著。《史记》是上继《春秋》而作，太史公学习《春秋》而有重大创新，他将《春秋》的编年体改为纪传体，正式确立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体例形式。按照今人关于感性的情感的文学标准，《史记》中的许多传记无疑是典范的中国史传文学作品，其史传文学价值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司马迁本来只是为历史人物作传，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的历史人物传记成为不朽的史传文学作品呢？这里面有时代原因、个人气质以及写作手法等多种因素。从时代条件来看，司马迁生活在中华民族文化第一次高潮阶段，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诞生了一批巨人的时代，风云际会造就了英雄辈出，赋予太史

公以无比的激情和想象力。就气质而言，司马迁当然有着史官的理性，但他更多地具备诗人的才情与天赋。他是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无论是考察古英雄旧址还是阅读古籍，都会使他激情澎湃，他在孔子故乡因景仰圣人而低回，他在长沙因同情诗人而垂涕。他在写作时从来不是不动声色的冷隽的叙述，而是尽情地表露自己的爱憎好恶之情，沉潜到传主的历史情境之中，达到与传主同喜同悲的境地。特别是在蒙受宫刑之后，他的精神苦痛更促使他在历史人物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借助于历史人物来写自己的感情。从写作方法来说，“想见其为人”，是司马迁取得史传文学重大艺术成就的重要原因。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和《屈原贾生列传》中两次提到“想见其为人”，这种“想见其为人”的写作方法，本质上是文学创作的感性方法，而不是历史著述的科学方法。“想见其为人”，需要作者在史料基础上，展开充分的想象与联想，在自己脑海中还原历史人物本来面目，让这个历史人物活起来，呈现在作者脑海中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感性形象，一个鲜活的艺术整体。《史记》中许多人物既性格丰满又主体突出，像孔子的博大深沉，楚霸王的喑噁叱咤，陈胜的鸿鹄之志，张良的大智大勇，李广的飞将军神威，乃至滑稽人物的谈笑微中，刺客的亡命报恩……无一不写得神采飞扬。“想见其为人”，不是历史科学所需要的理性分析和推理，而是充分发挥作者的艺术感受，去感知写作对象，去深入到历史人物内心，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交流。他所感知的是历史人物的个性、气质、情感、品格，特别是感知传主的人生追求。他最善于把握历史人物的神髓，然后以传神之笔写之。他永远只写那些令他感知最为深刻的东西。“想见其为人”，使太史公在为历史人物作传时注入充沛的感情。例如，他在为屈原作传之前，阅读了《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楚辞篇章，这些楚辞作品把他带进一个缠绵悱恻、忠愤哀怨的情境之中，他是以楚辞的情调、楚辞的文体感为屈原作传。楚辞的内在旋律是一种被君王遗弃而又不改忠心的缠绵哀怨的情感。这种文体特点都被太史公带入《屈原贾生列传》之中，传记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浓郁的抒情色彩，写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其他如《项羽本纪》、《孔子世家》、《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刺客列传》等篇章，也都倾注了太史公浓烈的情感。“想见其为人”，促使司马迁选择与传主相符的语言风格。司马迁具有随人赋形的语言艺术才能：他太了解自己的写作对象，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类人，于是他就采用与这一类人性格行事相符的文字。例如，《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写刺客、壮士等激烈的英雄，他就采用激烈的文字；《万石君列传》是写忠孝的人，他用的是温顺平和的文字；《屈原贾生列传》是诗人的传记，他是运用缠绵悱恻的文字；《苏秦列传》、《张仪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写雄辩家，他便运用雄辩滔滔的文字；《魏其武安侯列传》传主之间的矛盾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他便采用平静的叙述文字。不同的语言风格，使传主个性特色更为鲜明。“想见其为人”，强化了司马迁爱奇的审美情趣。爱奇，本是司马迁天生的审美个性，司马迁带着这种爱奇的情趣为历史人物作传，这促使他特别钟爱搜罗中国历史上的奇人奇事，欣赏历史人物超轶平庸的奇瑰言行，并用传奇的笔法展现中华志士的奇风异采，他的许多历史人物传记堪称是中华民族上古时代的英雄传奇。

从中国早期文献的大全、浑沌形态，到《国语》、《左传》、《战国策》的记言记事，再到《史记》典型的史传文学作品，中国史传文学自化生成的轨迹表明，文学并非天然生成，它脱胎于非文学的母体，它是在文史哲不分、政经法混合的母体中一步步地生成，一点点地成长壮大，一层层蜕变，最终蔚为史传文学的壮观。

中国史传文学似乎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越来越趋向于史传文学自觉的线性进化，永无止境地攀登一个又一个史传文学艺术高峰。事实上，以《史记》为标志，中国史传文学在不自觉地成其自身、走向高峰之后，就迅速地僭越史传文学自身，向着历史科学方向遁逸。《史记》以后，虽然有《汉书》、《吴越春秋》等史传著作努力继踵太史公风轨，续写中华志士的壮丽篇章，而这些书确实也不乏酣畅淋漓的精彩传记，特别是《汉书》以笔法精密、章法谨严见长，书中许多汉代人物传记都写得非常成功，像《苏武传》读之令人荡气回肠。但从总体上看，班固经由儒家经学陶铸出来的四平八稳的个性，无法与太史公惆傥慷慨相比肩，班固的才情与气质，也不能和擅长感性的太史公相提并论。在中国学术史

上，班马优劣，历来是一个热点论题。如果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班或可胜马；而从史传文学视点来看，则马远胜于班。在中国史传文学的艺术画廊中，《史记》的光芒是最为耀眼的，它的豪情跌宕的历史人物传记成为史传文学的绝响。《汉书》以下，从《后汉书》到《三国志》再到中国历代封建正史，作为史传文学基本特征的感性因素日益减少，人物功勋业绩的罗列替代了丰富生动的情节叙述，冷静的历史事件记载取代了热情洋溢的描绘，慷慨淋漓的抒情议论让位于折中平稳的史评，历史传记由文学迅速地向历史科学方向遁逸。如果要在《史记》、《汉书》以后的史传散文中寻找富于感性和激情的篇章，那么就只有去翻阅唐宋以及明清时代古文家的文集，他们间或会写出一些精彩的文学传记，不过，无论从质还是从量上来看，后代古文家的文学传记都不能与太史公书相比，他们无法重铸太史公的辉煌。

中国史传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历程，为文学他化论原理作了一个形象的诠释。我们在研究古今中外文学现象时，一方面可以继续应用感性的情感的文学批评尺度；另一方面应该以辩证的态度正确看待文学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文学哲学化、宗教化、世俗化、神圣化、政治化、历史化等非文学去文学的文学他化现象，破解单一的文学审美向心主义、情感偏执主义及艺术形式主义的牢笼，跳脱文学独立自尊的天然合理思维，从开放的视角多元地考察文学现象。

[参考文献]

[1] 栾栋. 文学的疆域——有感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块垒化 [N] . 光明日报，2003-01-15.

责任编辑：王法敏

·学海酌蠡·

《老子》“事善能”辨误

孙雍长（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广东 潮州，521041）

〔中图分类号〕H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6-0017-01

《老子》八章（王弼注本）：“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事善能”句，帛书甲、乙本均同。古今解《老》者，皆以此“能”字为能力、才能之能。如：“能方能圆，曲直随形”（河上公注）、“善于使自己作事有能力”（秦维聪《李耳道德经补正》12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处事要像水那样有力”（黄瑞云《老子本原》11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做事善于发挥能力”（戴维《帛书老子校释》98页，岳麓书社. 1998.），等等。

本章以水为喻，主张处恶不争，乃无为思想之阐发。“做事善于发挥能力”云云，则与老子“无为”思想、本章“不争”之主旨大相背逆。今按，“事善能”者，事善耐也。此“能”字当读为“耐”，谓处事善于忍耐也。

古书“能”读为“耐”不乏其例：《诗·卫风·芄兰》“能不我知”，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能字古读若耐。”《荀子·劝学》“假舟楫者非能水也”，俞樾《平议》：“能，当读为耐。”《大戴礼记·易本命》“食水者善游能寒”、《汉书·食货志》“能风与寒”、又《赵充国传》“汉马不能冬”，凡此“能”字，皆当读为“耐”。

以韵例求之，亦可证“事善能”之“能”当读为“耐”：此章“治”、“能”（读为“耐”）、“时”、“尤”四字为韵，皆之部字。若读“能”为才能之能，则为蒸部字，虽然也可以用“通韵”说之，但终究不如本韵为直接。“事善能”即“事善耐”，正是“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主要精神所在。

责任编辑：陶原珂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发展观的发展与 30 年中国改革主题的转换*

叶汝贤　王晓升

[摘　要]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的发展理论经历了生产力提高型发展观、制度创新型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三种不同的形态。这三种发展观就是要解决社会发展中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生产力的发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制度的变革）以及人和他自身的关系问题（人自身的发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社会发展过程又必须循序渐进地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用发展着的发展观来逐步地解决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关键词] 发展观　中国改革　发展观的理论形态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18-07

一、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从思想上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人们把这场大讨论比喻为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不为过的。但在破除了思想迷信和个人迷信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中国应向何处去？更具体地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果断地选择了发展生产力，把其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顺利实现了从实践标准向生产力标准的过渡。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以生产效率的提高为标准来衡量各项工作，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观的第一种形式。

马克思在 1858-1859 年的《资本论》手稿中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 (P107-108) 对于马克思的这段文字，我们曾经这样解释，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而且也说明了社会发展中必须处理的几个内在联系着的相互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发展。[2] 如果我们仅仅狭义地理解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话，那么可以说，解决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就是要通过改造自然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解决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就是要进行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即制度的创新，从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毫无疑问，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制度的创新以及人自身的发展是三个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孤立地考虑其中的某一个问题，而忽视其他问题，社会发展进程必然受挫。但是，在推进社会变革的时候，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一个突破口，都必须首先从社会整体的某个方面入手。历史经验表明，如果采取一种“休克疗法”，采取一种整体的、一步到位的极端变革，那么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乃至社会分裂，使社会止步不前。反过来，如果局限于经济层面的变革，而不触动经济和政治体制，不进行人自身的变革，那么这种经济变革最终也会失败。邓小平同志用他那“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非常平凡而又富有智慧的改革方略，循序渐进地把中

* 本文系教育部委托研究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观的历史演变研究”（2008JYJW04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叶汝贤、王晓升，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而在这一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过程中，他果断地选择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变革的突破口，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联中有序地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并从重点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中不断地解决现实发展中的问题。

在中外历史上，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胜枚举。康有为、梁启超、戈尔巴乔夫都鼓吹从政治制度的变革入手的社会变革，按照这种路径进行的社会变革，其后果或者是人头落地，或者是执政党失去了领导权。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采纳这样改革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决定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明确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中来，这就是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党工作的中心，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这标志着以经济增长为标志、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本任务的发展观的确立。而这个新的发展观的形成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年在知识界、在党内也有人怀疑选择发展生产力这个突破口的正确性。一些人颂扬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优越性，似乎只有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中国才有希望；一些人把“海洋文明”和“黄河文明”对立起来，把文化的变革看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一些人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对“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兴趣盎然，奢谈人的自由和解放。于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突破口的问题上，存在着四种不同的选择：以经济建设为突破口，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以文化变革为前奏，还是以人的自由解放为出发点？在这些理论争论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核心的问题：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以什么为突破口？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多年里，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应该承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自身的发展总是相互关联的。经济的发展必须有一系列配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没有经济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的变革，经济建设就必然会困难重重。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又必须面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约束。没有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变革，那么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也是不可能的。而文化传统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变革最终又依赖于人自身的变革。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如果我们拘泥于这种内在关联性，如果我们忽视它们的相对独立性，那么这就会走向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所谓“总体性”理论，即以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总体性”否认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出发，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经济发展作为全部社会改革的突破口。这个抉择也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的。当时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建设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和突破口。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只能提出它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3](P33)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最大限度地保证商品供给、保证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是当务之急；提高生产力、增加社会供给无疑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事情。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承包制度的建立、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市场上个体户的出现都是在微观领域。加强企业管理和农村经济的管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做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们的经济收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经济上的高效率证明了改革的正当性，为进一步的、更深层次的改革提供了合法性的根据。据小平同志后来的回忆，在当时设立四个经济特区时，在党内、在社会上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只有当经济特区高效率的发展证明了这种政策的正确性的时候，后来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有可能。这表明，把提高物质生产力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没有最初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没有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改革的这个伟大抉择还与党对于时代特性的正确判断联系在一起。当时，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在国际上致力于构造友好的国际关系，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使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得以顺利进行。

中国的改革是循序渐进式的、尝试性的改革。这种小步骤的微观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就是要在改革中逐步扫除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因此，即使经济建设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其他方面也没有被忽视。当时，邓小平提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就是针对人们狠抓经济发展而放松思

想教育这个问题而提出的。当然，这从一个侧面也表明，经济工作始终是中心，而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工作，服务于经济工作。在这个时期，生产力是衡量人们各项工作的标准。应该说，在当时提出生产力的标准，是正确的、必要的。

在回忆这个时期的工作时，人们常常认为，这个时期改革的一个重要失误是放松了思想教育。但是这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就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农民通过农村承包制而使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工人通过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得到了实惠；其他个体工商业者也从商业流通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经济利益；但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出现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的分配格局。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知识分子和公务员的不满。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约束的问题。于是调整生产关系结构，改革宏观的经济体制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

二、从生产力标准到制度创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市场经济的阶段。如果说，在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局限在微观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话，那么当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管理方式，并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就进入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对经济体制进行的实质性变革。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把中国的改革推进到上层建筑领域变革的新阶段。这个改革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创新。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设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发展理论是一种以制度创新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型发展观，是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发展观。这个发展观对于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改革的攻坚战，这场改革将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在这里市场虽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国家控制的手段仍然延伸到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主要领域，留给市场自发调节的领域仍然非常有限，它们不过是附属于国家调节的边缘领域。如果用马克思在 1844 年《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对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可以说，这个时期国家和市民社会仍然没有分离开来，市民社会仍然是国家的一个部分。我们这里所理解的市民社会是指独立于国家的自主经营、自主流通、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领域。企业和个人的独立的法权人主体地位没有确立起来。而建立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这种分裂将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要实现这种变革：国家从市场行为的主体彻底转变为市场行为的调控者，从市场的参与者转变为市场的观察者、管理者。这就意味着，政府从市场调节的私人领域中彻底摆脱出来，并实现私人领域和政治权力领域的分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市场体制的建立在中国社会第一次确立了一种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以《物权法》为标志的一系列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使个人和企业的法权人的地位确立起来，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得到了法律上的保证。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通过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正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使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旦政府从市场中抽离出去，那么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局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说，政府这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是培育市场，协助社会建立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自由配置市场，为建立完善市场体系而努力，即“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格局。政府逐步转化为服务型政府。企业和个人自主权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经济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就是要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主性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而从政治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政府削减自己的权力，改变自己的职能为特征的自我革命。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确立企业的独立法人主体地位，使企业摆脱政府的附属部门的地位，成为自由竞争、自负盈亏的法人主体，即股份制改造。二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无论

哪一方面的工作都涉及到巨大的利益调整，国有企业的许多职工下岗，许多国家公务员成为企业管理人员。无怪乎人们把这场改革比喻为“刀山火海”、“万丈深渊”。虽然人们对于这次改革出现的问题可以有这种和那种指责，如国有资产的流失、政府职能转变不够等，但它所取得的成就却是不容小觑的。因为一大批长期依赖于政府的企业和个人从此获得了自我发展的独立地位。应该说，多少年来，中国人一直期待着独立自主的发展机会，这个机会终于出现了，但是它却伴随着巨大的代价。这就是人们被切断了与政府的“脐带”，他们要靠自己来生存。人们渴望自由，而又害怕自由所带来的生活不确定性。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政府通过经济补偿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来确保人们的基本生活。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最为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借助于日益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把企业和个人培育成为独立的、自我发展的法人主体和社会行动的主体。这些独立的经济主体和社会行动的主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对政府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而且使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个变革给上层建筑领域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一，从思想理论上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根本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但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保护私有财产，而且要明确产权，保证私有财产的发展。在这里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的实践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同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劳动力的买卖中存在着剥削，而市场经济就是借助于市场来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使生产要素的效率得到提高。在配置生产要素的过程中，劳动力是最核心的要素，在市场中必然存在劳动力的买卖。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劳动力买卖的问题，如何看待资本家的劳动和剥削的问题，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理论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人们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或者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或者依据中国的现实来强调市场经济的正当性。从表面上来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马克思的基本思想过时了，或者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走错了。实际上，承认私有财产存在的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就是搞私有制，承认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并不意味着劳动价值论过时，问题在于在劳动力的市场配置中，政府究竟如何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新《劳动法》的颁布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调节。这些表面上的矛盾可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解释。

第二，在政府和市场分离之后，政府从市场中摆脱出来。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自我约束自己的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律来监督和管理市场。这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于计划管理的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政府如何有效地约束自己的权力范围，如何真正地从参与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明确，权钱交易等问题极大地妨碍了市场体制的有效运行。这涉及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格局，有效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重大变革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党的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能再依靠行政权力在市场中进行组织活动。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的权力基础提出了挑战。从理论上说，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以工人和农民为社会基础的党。传统上，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执政地位，而把党的组织建立在各个企业和农村集体之中。但是，当市场经济要求把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的时候，政府就不能干预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于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企业、在劳动者组织中得到继续发展就成为新的课题。“三个代表”的建党思想就是为了解答这个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它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为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开辟了新的途径。

社会基本结构的重大变革，社会权力结构的重组的核心就是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巨大变化。尽管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碰到了许多困难，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成功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架。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们能不能够接受这种新的利益格局。在改革中，政府通过经济手段，使人们在经济条件不断改善的基础上接受新的利益格局。我们正是巧妙地运用了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来保证改革的成功进行。这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行改革。没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就很难给人们提供实质上的福利，从而使人们接受改革。反过来，没有经济体制的

进一步改革，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政府始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进行上层建筑的变革。这种调整更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接受。中国改革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首先要依靠改革的效率，也就是改革对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程度来保证。只有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所有人的生活条件都有所改善的基础上，进行利益的调整才有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接受，而决不能在损害某些人的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利益的调整。正是依赖于这一点，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才能顺利进行。这是我们的改革赖以成功的经济基础。

三、从制度创新到人的发展

当历史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完成社会结构的变革，初步建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但是，这只是社会宏观结构的变革，而不是社会微观领域的变革——每个人自身的变革。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再强调，现实的个人(die wirklishen Individuen)和他们的活动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和出发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在每个人的活动的基础上发生的，如果没有每个人自身的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也会无果而终。只有当现实生产力的活的要素——现实的个人接受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并积极参与其中的变革的时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才真正地发挥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的改革必须进一步发展到人自身的变革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标。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适时地把握了这个关键的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样，制度创新型发展观就进一步发展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观的第三次变革。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的自主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里的自主性主要是指人在私人的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可称之为私人自主。与这种私人自主联系在一起的是道德自主，即个人自主地就道德行为做出抉择。从这次汶川地震中人们自发的捐款、献血和其他自愿者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道德自主性的极大提升。在刚刚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们曾经就道德“滑坡”和“爬坡”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今天的现实状况来看，无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持什么观点，有一点是肯定的：借助于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自主有了很大的发展，而这种道德自主是伴随着私人自主产生的。个人的私人自主和道德自主性的提升也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自主。“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们群众的这种自主性的要求。人是不是被看作是“本”，决不依赖于其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否则任何人都可能被剥夺“本”的地位，而成为“末”，或出现“本”“末”倒置。只有当一个人自主抉择的时候，他才可能真正成为“本”。而人要自主发展就必须有自主发展的环境，其中包括个人发展所必须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包括个人自主选择的社会氛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为人的发展提供这样的环境。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促使每个人自身的变革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这里，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科学发展的中心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理性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这就是要为人的发展提供合适的自然环境，把一部分人的发展和另一部分人的发展协调起来，把自己一代人的发展和后一代人的发展协调起来。科学发展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关注社会发展中人的发展、制度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相互协调。只有真正地尊重发展规律，促进人和人之间的协调发展，人的各种能力才有可能得到发展，人的理性抉择的能力才能得到提高。没有人自身的发展，人的道德自主和公民自主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导致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分离，并把一个独立的私人活动领域确立起来，那么这种个人领域的确立实际上只是对人的自主活动领域的消极承认，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则是要达到对人的自主活动的积极支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政府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促进所有的经济主体的自由竞争。市场体制虽然承认了人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和机会，但是某些人却由于自身的原因无法平等地参与竞争。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城市的弱势群体身上，而且也发生在广大农村地区。按照科学发展观，政府要通过各种措施，如社会保障措施和扶持农业的措施，以保证每个人参与

能力的提高。这些措施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扶贫解困，而是要为他们创造自我发展的机会，提高他们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使他们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享有者。

改革开放的一开始，我们党就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作为提高生产力的主要手段。这就是通过经济管理方式的调整、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注重调动他们在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方面的能力。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社会制订政策的标准。如果说过去更多地重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GDP 的增长，并把 GDP 的增长作为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的外在标准；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重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强调要“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要使人民群众不仅成为政策的接受者而且成为政策的制订者。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党对于人民群众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财富的享有者；人民群众不仅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受者，而且也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参与者。同时，任何人要成为社会发展过程的参与者，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接受者，成为社会体制改革的参与者和接受者，就必须有参与社会发展活动和有理性地思考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能力。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要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参与能力上下工夫。可以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核心命题的实践性注解。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是不要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要发展得更好；不是不要制度上的创新改革，而是说，这种改革和开放应更加注重人自身的发展，既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条件，又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为此，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应该说，这个思想清楚地表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制度创新与人自身发展的关系。

四、建立文化公共领域，发挥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出现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形式：生产力提高型发展观、制度创新型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三者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发展是基础，制度创新是手段，人的发展是目的。制度创新为人的发展创造制度环境，经济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基础。而社会制度的变迁不仅需要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支撑，而且又需要得到发展起来的人们的接受和支持。最后，没有人自身的发展，没有制度创新，生产力的发展又不可能持续。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但是，任何社会发展又不可能同时解决这些矛盾，都必须抓住其中的主要问题，并借助于其他两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主要问题。这就是要根据不断发展着的新情况，发展我们的发展观，通过发展观自身的变革来不断变换社会改革中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观的演变表现为从以生产力为标准的增长型发展观，发展到以制度创新为中心的制度创新型发展观，最后发展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社会的发展依赖于发展着的发展观。发展观的变革推动我们不断地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统筹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长、制度创新和人的发展的关系。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既要关注生产力、制度创新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又要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不断更新发展观，着力解决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这是 30 年改革开放的第一条经验。

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30 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依靠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能力。无论是生产力（管理方式）上的改革，还是制度上的创新，抑或为了人的发展所进行的社会体制的改革，其核心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这种改革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那么这种改革就是失败的。另一方面，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就必须把人民群众的福祉作为改革的目的。只有当改革真正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给人民群众的自我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条件和机会，人民群众才会积极地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事业中。那些不顾群众福祉，盲目要

GDP，搞花架子的工程，最终必然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抵制。以人民群众的福祉为目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事业，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条重要经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多少风雨，发生了多少变化，但是无论怎么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变，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没有变。这是中国30年发展中的第三条基本经验。可以说，这三条基本经验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

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中国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还有许多异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马克思指出，社会的发展应该是自由个性的人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了，但是人的独立性的真正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市场经济是一种自我决策、自负盈亏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赋予人们在经济领域中极大的自由选择的空间。但是许多人却不能理解自由行动中所蕴涵着的责任。在经济活动中许多人只是期待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利益，而不顾社会后果，不能自觉地承担伴随着自由所包含的责任。在村民自主管理中，人们获得了自主管理的权利，但是却没有自觉意识到自主管理的责任。人们有了选举权，但是却不能自觉地意识到权利背后所隐藏着的责任。或许只有当选出了一个贪婪的村主任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自己承担责任。康德强调，人是自由的，而具有实践理性的个人懂得如何自主立法，这种自主立法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但是，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不少人获得了自由之后却不知道“自我立法”、自我约束。因此，把人作为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全面提高人的理性自主能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是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艰巨任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它使政治权力和私人的经济活动领域区分开来。但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何有效地制约政治权力和私人领域中的社会权力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国家。而我们的民主法治国家的建设不是要走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道路，那么这就必然面临着政治权力如何得到有效监督的问题。传统上，我们主要是采取党内监督和政治权力构架内部的监督。资本主义制度通过三权分立用权力制衡权力，从而提高内部监督的效率，而我们没有这种三权分立的社会机制，内部监督的效率就比较低。强化社会舆论的监督就成为未来民主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关键要素之一。社会舆论不仅要监督政府，而且更有责任监督私人经济活动的领域。在现代社会，某些人会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和社会优势来获得不正当的利益，他们甚至会用经济优势和社会优势来干扰国家的民主法治秩序。随着自主的市场体系日益完善，随着个人的经济力量的日益积累，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会如同权力的腐败现象一样成为一个严峻问题。因此培植一个相对独立于经济体系和政治权力体系的文化公共领域，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政治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30年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但是，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我们的前面，路还很长，困难还很多，风险也会更大。坚持正确处理生产力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坚持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目的，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这些基本经验，是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发展中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在未来的发展应该倍加珍惜。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应该始终不逾地坚持这些基本经验。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叶汝贤，王晓升. 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主题 [J]．现代哲学，2007，(4).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罗 苹

哲 学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论实践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霍桂桓

[摘 要] 进行实践哲学研究并得出恰当的结论，究竟是否必须对所使用的方法论进行彻底的批判反思和创新？这种必要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事关这种研究的成败。这是因为研究方法的选择是由被研究对象的本性决定的，而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实践与相对静止的自然物质对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只有通过彻底批判反思西方唯理智主义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探索并确立把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有机统一起来、社会个体生成论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才能对实践进行恰当的研究并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关键词] 实践 实践哲学 唯理智主义 共时性和历时性 社会个体生成论

〔中图分类号〕 B0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25-07

无论从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角度来看，还是就 20 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界已经出现的“社会哲学转向”而言，对实践进行恰当的哲学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关键性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实践观点既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代表了其与所有其他哲学观点不同的崭新本质特征，是其与时俱进的旺盛生命力的根源之所在；同时也因为无论马克思本人还是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没有建立严格学术意义上的、以实践为研究对象的系统完善的哲学理论体系，因而即使在今天看来，“究竟应当如何对实践进行恰当的哲学研究”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根本性方法论问题。另一方面，西方哲学界自 20 世纪初以来出现的“走向生活世界、实施社会转向”的基本态势，实际上既从研究对象角度表明了研究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实践活动必然是“走向生活世界”的进一步具体化和根本出路，也因此对其所有研究者提出了进行方法论反思和创新的关键性任务，即如果实践本身不同于西方哲学研究迄今为止的研究对象，那么研究者显然就必须进行必要的反思，探索真正适合于研究实践的崭新的方法论模式。

这样一来，“究竟应当如何对实践进行恰当的哲学研究”这样一个实践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显然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枝节问题或者伪问题，而是一个既事关实践哲学研究成败，也事关当今哲学研究究竟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实际上，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者本身究竟是如何看待作为其研究对象而实际存在的“实践”的。是在继续沿用西方传统的唯理智主义哲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把它看作是与相对静止、不涉及任何社会维度和个体维度的自然物质对象一般无二的；还是实事求是地承认它与自然物质对象有本质的不同，是既包含有机结合的社会维度和个体维度，又同时对客观

作者简介 霍桂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研究员、《世界哲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北京，100732）。

世界和主观世界不断进行改造的动态性过程。如果承认后者，那么，我们显然就绝不能继续沿用这种唯理智主义方法论和研究模式，而是必须通过实事求是的探讨和研究，找到扬弃了这种唯理智主义方法论和研究模式的崭新的、真正适合于研究社会实践过程的方法论和研究模式。

一、实践怎么可能是本体

探讨和论述以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首先必须确定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实践的本质特征。如上所述，假如研究者能够完全把动态的社会实践活动与静态的自然物质对象等量齐观，那么，进行这样的探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完全可以继续沿用——事实已经证明能够非常有效地研究中观范围的自然物质对象的——西方唯理智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而不用对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进行任何批判改造。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实践与自然物质对象的本质区别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下列关键性问题，即究竟是被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存在状态和本质特征决定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还是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决定被研究对象。如果承认前者，我们的探讨就显然是必要的；假如承认后者，则不仅会最终导致“削足适履”的不良结果，使迄今为止的实践哲学研究举步维艰，同时也显然违背了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坚持的客观立场。因此，探讨和研究实践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是当今进行实践哲学研究的关键性问题，而这种探讨和研究的起点则必然是首先清晰地确定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实践本身的本质特征。

概览一下10余年来国内外、特别是国内学者有关实践的界定性观点可见，许多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不再坚持“物质本体论”，开始通过把实践看作是本体而尝试建立各种各样的“实践本体论”。举凡所谓“实践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实践生成本体论”、“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实践—价值本体论”等等，实际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把实践看作是本体、把马克思实践哲学看作是某种“实践本体论”。[①] 客观地说，这些举措虽然体现了这些研究者面对新的现实问题，通过研究和吸收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研究成果而进行的种种新的努力探索和研究进展，不过，在对这些富有创新色彩的观点的钦佩、研究和反思之余，人们却不禁会提出“实践是本体吗”这样的问题。如果实践不是本体，那么它与西方哲学以往所说的“本体”又有哪些不同？我认为，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实践”根本不可能是西方哲学传统意义上的“本体”。

第一，就基本内容而言：西方哲学传统意义上的、表示“存在”或者“有”、“是”之义的“本体”(on，sein，to be，being等等)，所指的主要是作为整个世界的原始起点、终极基础、最抽象依据和最一般本源的“本原”、“始基”、“唯一者”等等，同时也兼及各种具体事物(即所谓“存在者”)的、抽象的共同属性，因而无论它们的具体表达方式是什么、相应的具体译名[②]是什么，“本体”都主要是指作为“第一推动者”和“不动的推动者”而存在的“本原”、“始基”。所以，“本体”只能是极其抽象的、静态的，既不涉及社会也不涉及现实个体的最一般范畴。相形之下，“实践”则具有与此截然不同的含义。尽管西方哲学史上论述这个概念的一流哲学家不少，但从学术的现实针对性及其意义的角度来看，只有马克思的实践观最符合实际，亦即只有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P55)的观点，才是最恰当的观点。因此，“实践”不仅是现实的人进行的、有直接目的的、具体的和动态的现实活动抑或现实行动，而且它同时涉及并导致对环境的改造和对作为现实社会个体的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因此，实践不仅改造具体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同时也改造生存于这两者之中并构成特定的人类社会的现实社会个体。

---

① 毋庸赘言，即使没有直接自称为“××本体论”的各种“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实际上也同样隐含着把“实践”看作是其探讨和研究的“本体”的意向，因而我们这里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这些观点。

② 诸如国内学术界近年来一直在热烈讨论的究竟应当把on，sein，to be，being翻译为“本体”、“有”、“是”、还是“存在”等等，便已经为我们这种观点提供了充分证据。(参见宋继杰主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第二，就存在状态而言，虽然研究者可以认为具有上述含义的“本体”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实际上却只可能存在于某种特定的观念之中，而根本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之中。也就是说，就像人们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之中找到并指认“上帝”的实际存在那样，无论就自然环境来说还是就社会环境而言，人们都不可能在其中真正找到并指认“本体”实际上就是什么；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环境之中的研究者，所形成的“本体”观也截然不同。这显然意味着，“本体”实际上只存在于某种特定的观念之中，抑或说只能是在一定的理论层次上对某种特定的观念或者信念的表达。相形之下，“实践”则显然是具体存在于人们对现实生活之中并且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意味着它不仅涉及对特定自然界、对具体社会环境进行的不断改造过程，同时还涉及对包括哲学研究者在内的所有现实社会个体的不断改造过程。

第三，就特定功能而言，通过简要概览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本体论观点可见，以往哲学家们之所以设定“本体”，基本上是力图使之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这些哲学家所认定的终极性原因、本原而发挥整个世界的始因、起源、基础和前提的作用，二是为这些哲学家通过逻辑推理构建其理论体系提供特定的基本前提、出发点和依据。① 相形之下，“实践”的功能则丰富得多。它不仅发挥对各种认识结论的检验和评判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特别是涉及到使作为社会个体而实际存在的现实的人真正成为人，使其精神境界不断生成和提高的过程。[2] 一言以蔽之，只有借助于活生生的具体社会实践过程，通过同时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过程，各种观念的力量才能真正实际发挥出来，人才能从抽象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具体生成为现实的社会意义上的人，并且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过程（social interactions）使其人生境界不断得到提高。因此，如果说作为“观念的王国”之最坚固的基石和最根本的内容，“本体”存在于既抽象又富丽堂皇的“天国”之中，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原点”；那么，“实践”则是存在于尘世之中、弥漫着人间烟火并充满了利益博弈的动态性现实改造过程之中。

最后，就其理论表现形式而言，概略说来，研究“本体”的理论即作为传统的“第一哲学”和“形而上学”之核心的“本体论”，是以所谓“始基”、“第一因”为基本前提，通过运用抽象的、似乎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演绎逻辑推理过程逐步构建起来的；而且，尽管这种研究在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多次对象的变化和方法的翻新，但它总的说来已经达到了成熟稳定状态，使其研究对象、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乃至研究结论，共同构成了“本体论研究”这样一个富有西方哲学特色、作为形而上学的一个最重要部分而存在的学统。相形之下，尽管当今国内外都有不少研究者认为，以“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实践哲学”已经取代“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而成为当代“第一哲学”，但是，由于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哲学的一个边缘性部门或者分支而存在，特别是因为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对究竟什么是“实践”众说纷纭，对究竟应当运用何种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对它加以研究莫衷一是，所以，即使到今天，“实践哲学”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研究对象不明、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五花八门、研究结论不清的“年轻”学科。

这样一来，我们自然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许多研究者究竟为什么认为实践是本体？这种做法对实践哲学研究究竟有什么利弊？”回答这个问题要比回答上述第一个问题简单得多。

第一，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楚“本体”的确切含义，因而把本来具有上述截然不同的“实践”等同于“本体”并加以研究了。从一定程度上说，这表明，这些实践哲学的研究者既因为特定的知识积累差异，

---

①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即使在今天的许多哲学研究者那里，“本体”也仍然在发挥着这里的第二方面作用；这样一来，这种作用实质上往往具体表现为使研究者不再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各种现实问题上，而是专注于构建其特定的“观念的王国”（the kingdom of ideas）。有关对“观念的王国”的界定和批判，参见霍桂桓：《文化哲学论要》，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6年，第53-59页。

没有真正搞清楚“本体”在西方哲学传统之中的具体含义和用法，也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西方哲学研究之间存在的门户壁垒，没有真正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所实现的、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彻底变革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彻底变革对于今天的实践哲学研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二，未加彻底批判地反思就直接搬用现代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少现代西方学者对“本体”这个概念的运用同样没有严格遵循它的传统含义，而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随意性，如所谓“社会存在本体论”[3]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本体”与实质上的某一种“被研究对象”等同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不仅表面上混淆了这两者各自的本质特征，因而显得具体含义不明；实质上也为我们今天重新探讨实践哲学的方法论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即使就卢卡奇的相应观点而言，“社会存在”也和“实践”一样根本不可能是“本体”，因为后者根本不具有任何“社会”的维度和成分。

第三，最重要的是，国内许多实践哲学研究者采用这样的观点，是为了论述自己的实践哲学观，进而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他们实际上试图通过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搬用上述西方学者构建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来展开自己的实践哲学研究，建立自己需要的理论体系。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建立其哲学理论体系的方式，并没有真正清楚地意识到“本体”与“实践”的上述本质区别，更没有立足于这些区别、通过进一步展开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而构建真正符合实际的理论体系。而这样一来，其研究结论究竟是不是实事求是，在何种程度上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相应的解释力，显然就大有问题了。

综上所述，只要承认被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存在状态和本质特征决定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只要承认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实践”根本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本体”，那么，我们显然就不应当继续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搬用西方哲学家们用于研究“本体”的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来进行实践哲学研究，而必须在彻底批判反思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基础上，探讨和研究崭新的、真正适合于研究实践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

二、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为什么不适合于研究实践

实际上，虽然对实践进行研究的确必须同样坚持严格的学术探究精神；作为西方学术主流的唯理智主义哲学传统所一贯坚持的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也确实一直被认为是严格的学术研究的典型代表，但是，人们并没有任何充分理由因此而得出它完全适合于研究实践的结论。因为这种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完全是以数学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为典范的，而后者在其研究者那里则是为了追求并获得具有尽可能完全的客观性、静态性和形式普遍性的知识，其通过一系列日益系统化和越来越严格的研究程序所探讨和研究的，也基本上都是处于中观领域之中的、相对静止的、没有生命和情感的客观物质性对象，而不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有作为现实社会个体而存在的人参与其中的、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的、活生生的现实社会活动。因此，总的说来，这种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并不适合于探讨和研究实践。具体说来，主要是由其下列基本特征决定的。

第一，这种研究的根本取向是，研究者立足于抽象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分裂对立，力图以富有机械色彩的直线性客观因果性为依据而获得绝对客观、绝对普遍有效的真理。这种取向就其本身而言虽然无可非议，但其中却隐含着对所有各种具有社会性和个体主观性的现实成分，特别是对各种主观活动、主观体验和感受的忽视、贬低，甚至彻底抹煞。这样一来，它是不可能恰当地看待和研究既改造包括社会世界在内的客观世界，又改造包括所有各种主观成分的主观世界所进行的社会实践过程的。

第二，这种研究的基本方式是，研究者只集中着眼于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亦即主要只关注被研究对象的客观现状，力图通过“透过现象看本质”而得出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的研究结论，因而基本上忽视了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维度，没有充分重视这种对象的生成脉络。尽管这样做有可能使研究者保持“充分的客观性”，但要想因此而使其研究结论具有“普遍有效性”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即使这种有效性实际存在，它并不仅仅涉及该对象的共时性的空间范围维度，同时还必然会涉及该

对象的历时性的时间绵延维度，而对象由于后者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则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作为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的现实社会活动过程的实践，其不同于相对静态的中观自然物质对象的根本特征之一，恰恰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历时性维度体现出来的、不断变化生成的活动过程。因此，这种忽视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维度的哲学研究方式不可能适合于研究实践。

第三，这种研究的基本步骤是，研究者往往试图最大限度地舍弃包括被研究对象的实质内容在内的，所有各种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成分和因素，通过不断采用越来越纯粹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的研究手段和研究程序，力图因此而保证其研究结论的绝对普遍有效性。这样一来，被研究对象的各种无法量化的成分，包括不断变化生成的社会成分和主观体验成分，便都被排斥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了。其结果是，尽管从纯粹形式推理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因此而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严格的、严密的和必然有效的，但一旦具体运用于活生生的、不断流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之中，这种结论的严格性和有效性就会因为各种已经被“忽略不计”的现实因素而大打折扣。而在涉及到以社会成分和主观精神成分为本质特征的社会实践过程的时候，这样的严格性和有效性究竟还能存在几何，就更是难以说清楚了。

最后，就这种研究的具体结论而言，由于研究者采取的上述根本取向、基本方式和基本步骤所产生的支配性影响，其研究结论显然只可能涉及没有生命、情感和欲望的自然物质对象；而对于主体参与其中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来说，则显然会出现两种结果：亦即要么由于研究者的无能为力而对这样的被研究对象、特别是对其表现为活生生的改造过程的本质特征存而不论，甚至置之不理；要么把这种被研究对象与不包含任何社会成分、相对静止的物质对象等量齐观，运用同样的研究模式加以探讨和研究，从而得出削足适履的结果。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是像某些走极端的研究者那样，要从根本上完全彻底地否定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在研究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由于现实存在的社会实践过程本身并不纯粹是“一切皆流、无物常驻”，而是既具有历时性维度又具有共时性维度，既具有不断变化生成的特征又具有相对静止的特征；所以，这种能够相对有效地探讨和研究中观领域自然物质对象的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并不是根本不能被用于探讨和研究社会实践过程的相对静止的维度，而是恰恰相反——包括诸如社会统计学在内的、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各种“社会科学”已经有效发挥的种种作用，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要想在今天的实践哲学研究中真正做到恰当地对待和运用这种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研究者必须坚持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既唯物又辩证的科学指导方针，从严格彻底的批判反思精神出发，通过对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批判性考察，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地、清晰地确定它的有效性限度，从而真正实现对它进行的严格学术定位（academic location）。实际上，只有通过实现了对它的这种严格学术定位，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有具体针对性地、实事求是地全面探讨和研究它的学术地位、作用和意义，从而清晰准确地确定它在我们探讨和研究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究竟能够发挥哪些有意义的作用，以及如何才能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只有在完成了这样的彻底批判反思和严格学术定位任务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通过彻底扬弃这种为西方哲学传统所特有的，从总体上来看并不适合于探讨和研究社会实践过程的唯理智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逐步走上探索并找到真正适合于探讨和研究社会实践过程的、崭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正确道路。而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显然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究竟它的关键性缺陷是什么。在我看来，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根本缺陷，一方面表现为就研究内容而言的既忽视现实存在的社会，又忽视现实存在的社会个体；另一方面，就研究模式而言，也表现为忽视以生成、变化和发展为本质特征的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维度。正因为如此，我自己经过长期摸索而在数年前提出并一直不断加以完善的“社会个体生成论”（the social individual growing- up theory）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有可能为我们进行这样的探索提供一条富有启发性的基本思路。

三、社会个体生成论为什么可能成为富有启发意义的基本思路

所谓“社会个体生成论”，是我在以往长期进行西方哲学研究，特别是结合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社会哲学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基本思路和一系列相应的基本观点。[4](P2-5) 概而言之，它力图通过既批判扬弃迄今为止一直存在于西方社会哲学和社会理论之中的，使社会和个体处于分裂对立状态的种种做法；同时也实事求是地继承并发展以马克思为杰出代表的，充分强调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发展过程维度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模式，突出强调这种社会和个体的分裂对立状态完全是观念性的，主要是由作为西方哲学传统主流的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造成的，因而只有创立把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有机统一起来的、社会和个体相互生成的“生成视角”(growing-up perspective)，才能真正恰当和有效地探讨和研究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在内的所有各种被研究对象，特别是才能真正恰当和有效地探讨和研究与中观自然物质对象截然不同的，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的社会实践过程。第一，包括学术研究者在内的任何一个现实社会个体，都生存于某种以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社会现实为实际背景和现实环境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过程进行的实际生成过程之中；而这种现实存在和不断生成变化的社会实践过程，则既是这种生成过程的现实母体和基本前提，同时也是其最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以各种方式不断发挥着直接或者间接地决定其他所有方面的作用。第二，这种以实践为基本内容和主体部分的生成过程包含着两个有机统一的方面。其一是现实社会个体通过各种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既有冲突又有协作的社会互动过程，不断承担、变换内容日益丰富和形式日益多样的社会角色。其二则是个体的主观世界由于这些社会互动过程而不断得到生成和提升，达到越来越高的精神境界。① 第三，包括学术研究活动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都是由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的现实社会个体，通过这种以实践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社会互动过程和生成过程而造成的结果，因而都是这样的社会个体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进行各种各样的建构和解构过程所造成的结果。最后，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在内的所有各种被研究对象，尤其是特定社会个体针对所有这些对象的研究方式、研究过程和具体研究结果，都必须从这种关于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和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加以系统全面的理解。

概略说来，“社会个体生成论”具有的以下三个方面的关键性优势或者根本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真正能够适合于看待、探讨和研究社会实践过程。

第一，社会个体生成论具有融被研究对象的静态与动态、既定现状与生成过程于一体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在这里，所谓“成”(up) 涉及的是被研究对象之静态的、共时性的现状维度，而这种维度正是上述西方传统哲学的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所集中关注的对象。因此，社会个体生成论不仅坚持了所有研究者都必须坚持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实际上也通过批判扬弃而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吸收了西方唯理智主义立场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社会个体生成论的方法论视角所谓的“生”(growing) 则通过充分强调研究者只有进一步集中关注被研究对象之动态的、历时性的生成维度，亦即只有充分关注和认识被研究对象之“所以然”，才能更加系统和全面地认识其“然”，才能将被研究对象实事求是地置于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整体性生成发展脉络之中，加以系统全面的探讨和研究。因而破除了这种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仅仅以孤立、静止、片面的方式，对待和研究所有各种被研究对象，特别是对待和研究社会现象所出现的种种弊端。

第二，正因为具有上述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社会个体生成论根本不像上述唯理智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那样对包括实践活动在内的几乎所有各种社会现象都无能为力，而是完全有能力把既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现实社会实践过程，当作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构成人类社会其他所有生

①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所谓“越来越高”并不包含任何价值评价维度——向善者成圣、向恶者成魔，实际上都完全可以说是其精神境界“越来越高”，只不过最终达到结果及其社会评价截然不同而已。

成过程之根本前提和现实母体的，具有来龙去脉的现实生成过程而加以探讨和研究。简而言之，无论是主要改造客观世界，还是主要改造主观世界，特定的社会实践过程实质上都是既作为现实个体而实际存在，又作为具有特定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社会人”，出于特定的欲求、目的和动机而进行的具体改造某种对象，从而通过生成（“创造”）某种新事物而实现自己愿望的现实活动过程。而这种既包含由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构成的历时性维度，更进一步拥有极其鲜明的“改造—创造”特征的现实社会实践活动，显然是上述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所无法加以研究的。

第三，综观西方哲学史上自觉不自觉地以上述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为依据的各种实践哲学观，它们基本上都没有真正涉及现实存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和个体的互动过程和相互关系，更不要说把这些内容当作社会实践本身的主要内容来加以系统详细的探讨和研究了。在它们那里，“个体”是既没有血肉和七情六欲，更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远离人间烟火的抽象符号，“社会”则是和自然物质对象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纯粹“事实”。而这样一来，尽管它们有可能抽象出各种各样似乎能够作为“金科玉律”(golden rules) 而存在的“绝对命令”，但在现实生活之中，特别是在活生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这些戒律充其量只能发挥类似“底线伦理”(base line ethic) 的作用，实质上是完全与现实存在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脱节的，[①] 因而难以发挥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规范引导作用。

相形之下，社会个体生成论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根本不是照搬这种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把现实的社会个体参与其中的社会实践过程当作自然物质对象，以“一刀切”的方式来加以探讨和研究；而是在彻底批判扬弃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基础上，把现实的“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当作以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基础和前提，既由“社会”通过各种社会互动过程不断培育和塑造个体，又由个体通过富有创造性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不断构成并推动“社会”前进的有机动态过程来加以探讨和研究。因此，它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这样一来，真正既具有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又具有充分的现实针对性的当代实践哲学研究，就不会具有这些秉持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研究者所憧憬追求的、永远凝固不变的、绝对的普遍有效性了。从社会个体生成论的角度出发来看，真正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实践哲学研究结论，根本不可能是以脱离客观现实为代价换取“绝对的普遍有效性”的“实践哲学”理论，而只能是与时俱进的、活生生的、对现实存在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过程提供有效的指导意义的实践哲学理论。

最后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我们这里对“实践”与“本体”的严格区分，对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分析批判，以及对有可能成为今后实践哲学研究之现实发展出路的社会个体生成论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论述，本身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探索色彩，而不是“一锤定音”式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霍桂桓. 论实践的主体超越性——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实践哲学观概要 [J]．哲学研究，2005，(1).

[3] 卢卡奇.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4] 霍桂桓. 文化哲学论稿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何蔚荣

①比如说，只要我们充分重视和认真批判反思现实的社会实践过程所必然包含的社会维度，特别是其中以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社会个体维度，那么，即使对于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句话，我们也显然会看到下列非常重要、必须进行具体研究的学术问题：“谁进行的‘实践’具有这样的效力”，“由谁来进行这样的‘检验’”，“进行这样的‘检验’所依据的标准是由谁以及如何确定的”，“谁有资格来判定这种‘检验’的结果和如何判定”等等。

《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什么

段忠桥

[摘 要] 《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来自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仅指“他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使他对其当时信奉的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学说产生了怀疑”。这一“疑问”的解决不是在他得出第一个研究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之后，而是在他得到“总的结果”——“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之后。

[关键词] 疑问 难事 第一个研究结果 总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 A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32-04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前曾有这样一段回顾：“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1](P32) 马克思这里说的使他苦恼的“疑问”指的是什么？国内学者通常认为，它指的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使他对其当时信奉的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学说产生了怀疑。① 在我看来，这种理解很大程度上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故此，我提出以下理解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使他苦恼的“疑问”之前，先讲了他在《莱茵报》做编辑时遇到了要他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由于“疑问”与“难事”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让我们先来看看他所说的“难事”指的是什么：

>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辩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的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

作者简介 段忠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① 例如，复旦大学的吴晓明教授认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遇到了令人困惑的物质利益问题”，但“并不是物质利益问题本身使马克思感到困惑和为难，因为马克思当时并未真正进入这样的问题；使马克思痛感苦恼的是：物质利益问题向他单纯理性的世界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以说是给予了重重的一击），而这种理性世界观却很少能够直接对‘物质利益’问题作出有内容的判断，在问题的解决方面甚至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0、429页）

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消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1](P31-32)

马克思的叙述表明，他是在1842-1843年间作为《莱茵报》的编辑时，第一次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在此期间他遇到了三次都要他对所谓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辩论和争论：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辩论，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和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从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他第一次遇到的辩论要他对莱茵省贫苦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表态。① 他第二次遇到的争论要他对摩泽尔地区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表态。[2](P357-390) 他第三次遇到的辩论要他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所涉及某些社会集团的物质利益问题表态。② 马克思为什么把这三次辩论和争论要他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视为"难事"？对此，他本人没有直接讲明。不过，从上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难"就难在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要基于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他当时还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因为他在讲完这三场辩论和争论后紧接着说，它们是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此外，在谈到第一次遇到要他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之前，他还告诉人们，"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③ 他讲这些话显然是要表明他当时还缺少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即缺少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基础。

在讲完第一次遇到要他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之后，马克思接着又说，"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的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马克思为什么要讲这段话？从相关材料来看，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指的是他在1842年10月1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今天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即使没有斯特拉斯堡的演说，尽管奥格斯堡保持沉默，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他接下来说道，"《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面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2](P293-295) 如果把马克思的这些话同他在前边那段话所说的"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联系起来理解，那他前边那段话的意思是说，他还遇到了另一类与缺少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相关而难以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也是他转向经济问题研究的动因。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所说的他遇到的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指的是他因缺少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难以对涉及物质利益的争论和讨论发表意见。我的这种理解还可从恩格斯的一段话得

---

① 参见《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0-290页）这篇论文只涉及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关于"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的辩论，马克思没留下相关的材料。

②关于这次辩论，马克思本人没留下相关的材料，但它无疑同样也要求马克思对涉及某些社会集团的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

③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35年10月进入波恩大学时选择的是法律专业。一年之后转到柏林大学，其专业还是法律。然而，马克思当时虽然是法律系的学生，但他更感兴趣的却是哲学，并且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尤其是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著作。此外，他对历史也很感兴趣。相比之下，法律倒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

到佐证：“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3](P446)

二

如果“难事”指的是他因缺少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难以对涉及物质利益的争论和讨论发表意见，那他所说的使他苦恼的“疑问”指的又是什么？让我们也来看看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论述。在讲完前边引用过的那段话之后，马克思又接着做了下述回顾：

>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1](P32)

马克思在回顾中不是先讲使他苦恼的“疑问”是什么，再讲如何解决它，而是径直就讲“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而且在后面的内容中也没有明确告诉人们使他苦恼的“疑问”是什么。这样一来，要弄清他所说的使他苦恼的“疑问”是什么，就只能通过对他的上述两段回顾做逻辑推论。

第一，马克思后面讲的使他苦恼的“疑问”指的不是他前边讲的他所遇到的“难事”。因为“疑问”与“难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难事”的含义是使人为难之事，“疑问”的含义是使人疑惑的问题，它们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同义词。此外，马克思是在讲完“难事”是什么之后再讲“疑问”的，因而“疑问”指的就不是已讲过的“难事”，而是与“难事”不同的另一个问题。

第二，“疑问”来自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前边表明，马克思第一次遇到的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这就意味着，他是在遇到“难事”之后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的。马克思是在讲完他遇到的“难事”那段话之后紧接着讲使他苦恼的“疑问”的。他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对这段话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论：由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是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因而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出现在前，“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出现在后，这样，“疑问”就不是来自“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如果“疑问”不是来自“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而且马克思又没再讲“疑问”来自哪里，那“疑问”就只能是来自他在遇到“难事”后开始的对经济问题的研究。

第三，“疑问”不是只与黑格尔法哲学相关。马克思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表明，他对黑格尔法哲学所做的批判性分析，即他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是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的第一部著作。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他至少还写了第二部（或更多的）著作。马克思在这里虽然没接着讲它（它们）是什么，但我认为至少还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为马克思接着说，“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他在巴黎期间写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如果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是马克思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而写的第一部著作，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他还写了第二部（或更多的）著作，那马克思的“疑问”涉及的就是一个包括黑格尔法哲学在内的更大的问题。

第四，“疑问”的解决是在获得“总的结果”之后。从马克思的回顾可以看到，他在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的过程中相继获得两个研究结果。第一个研究结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

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第二个研究结果是他先在巴黎，后在布鲁塞尔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P32-33) 由于马克思把第二个研究结果称为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因而我们可以推论，他的第一个研究结果只是他的第二个研究结果的一部分，前者至多只是部分地解决了他的“疑问”，后者才完全解决了他的“疑问”。这种推论也可从恩格斯那里得到佐证：“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迫使马克思着手研究有关物质利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获得了一些无论法学或哲学都不曾提供的新观点。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但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而当时要切实地研究这门科学，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英国或法国才有可能。”[4](P409)

第五，“疑问”指的是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结果是对“疑问”的解决，因而从研究结果是什么也可以推论出“疑问”是什么。马克思的第一个研究结果是“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他的第二个研究结果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疑问”指的是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推论不但与马克思的两个研究结果相符，而且与前边的那些推论相吻合。对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疑问”不同于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因为后者指的是因缺少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难以对涉及物质利益的争论和讨论发表意见；对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疑问”来自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它是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对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疑问”不是只与黑格尔法哲学相关，它还关系到政治经济学；对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疑问”的完全解决，是马克思获得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其做了经典阐述的“总的结果”之后。

我认为，《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值得弄清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的认识。如果我的上述理解能够成立，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发端于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完成的，因此，研究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不能只限于哲学领域。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责任编辑：何蔚荣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两个来源及其两重含义*

周民锋

[摘 要]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有三种用法：Ideologie、Bewußtseinsformen 和 Ideologischen Formen。在他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正式表述中，采用的是后两种。本文从分析意识形态概念的词源入手，梳理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两个来源和两重含义，并阐述了重新界定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意识形态 Ideologie Bewußtseinsformen Ideologischen Formen

〔中图分类号〕 B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36-06

麦克利兰说：“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以把握的概念”。[1](P1) 在马克思之前，这一概念便已存在。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初，马克思、恩格斯用以指当时德国流行的各种思潮，它们通常是对社会物质生活的虚假反映；在正式阐述社会形态理论时，马克思则用以指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普列汉诺夫关注过意识形态问题，并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唯物史观发展的重大理论课题；葛兰西和阿尔都塞则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场景中，试图赋予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以更为丰富的含义。显然，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概念，意识形态应当有它确定的含义。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两个来源

为了廓清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需要梳理它的来源。从《哲学大辞典》[2](P1817) 到《外国哲学大辞典》，[3](P893) 从《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4](P469) 到《英汉哲学术语词典》，[5](P125) 凡是提到意识形态概念时，都称其为或源自于特拉西的 Ideology。

然而，贺麟在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写的“译者导言”中指出，“德文‘Ideologie’一字一般译作‘意识形态’，也常译作‘思想体系’或‘观念体系’。这个字不见于黑格尔的著作中。但是精神现象学中所最常见的一个术语，就是‘意识形态’（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形态二字常以复数出现，直译应作‘意识诸形态’）这一名词。每一个精神的现象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可说是‘精神现象’的同义语。”[6](P20-21)

由此看来，译成中文的意识形态概念有着两个不同的词源：其一是“Ideology”，其二是“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前者是人们所熟知的，后者却极少有人提起。

先从语文的角度讨论它们在词义上的区别。第一，关于 Ideology。正如《哲学大辞典》所说，它由两个部分组成，“Ideo（思想或观念）和 logos（理论或理性）”。[2](P1817) 直译的话，应当是“观念论”或“观念学”。我们知道，有许多表示“××学”的术语，如 meteorology（气象学）、geomorphology（地貌学）等，都遵循着同样的组词原则，即以 logos 或 logy 为词尾。而特拉西在《意识形态概论》中正是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和平发展的意识形态观研究”（06BX016）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 周民锋，华东理工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教授（上海，200237）。

这一概念来表达“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2](P1817)的。显然，“观念论”或“观念学”指的是某一学科名称，而“思想体系”却是指一般的学说、思想，两者差距甚远。那么，作为观念论的 Ideology 何以又成了“思想体系”呢？一种理解是：先要是能够自圆其说的“思想体系”，才可能成为“××学”。特拉西的“观念论”未被承认为是一种学科，Ideology 便只能是“思想体系”了。

第二，关于 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在《德汉词典》中，Gestalten 有形成、构成、使成形的意思，Bewuβtseins 指的则是“意识”。应该说，这一概念才是原本的、不会有歧义的“意识形态”，即人类精神或意识的表现形态。

人类的精神或意识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所以，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 应该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指“意识形态”的全部，即“意识诸形态”；而 Ideology 转义为“思想体系”后，可以成为“意识诸形态”之一。所以，以为 Ideology 就是“意识形态”，是以部分代替全体了。

二、马克思的三种用法

在马克思论及意识形态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中，① 使用的却不是同一个德文词。在它们的背后，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概念的上述两个不同的来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的是 Ideologie，它源自特拉西的 Ideology。该书的全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由此可知，“Ideologie”的直接意思是指当时德国的一些思想或思潮，即以“思想体系”为表现形式的社会“意识形态”。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那段关于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经典论述中，马克思却未使用 Ideologie，而是分别用了 Bewuβtseinsformen② 和 Ideologischen Formen。[7](P8-9)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中文本中，将前者译为“意识形式”，后者译为“意识形态的形式”。[8](P83) 我们来分析这两个词。

第一，先看 Bewuβtseinsformen（意识形式）。显然，它跟特拉西的 Ideology 毫无关系，而跟黑格尔的 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意识诸形态）是同义词。因为，两者中都用到了 Bewusstseins（意识），而 formen 则与 Gestalten 同义，都是指“形态”、“形式”。至于它们在构词方式或词形上的差别，则可以理解为它们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学说，可以有不同的学术内涵。

第二，再看 Ideologischen Formen（“意识形态的形式”）。将它与 Bewuβtseinsformen 作比较，两者都有 formen，即都强调“形式（或形态）”，不过，一个是 Ideology（思想体系）的“形态”，一个是 Bewusstseins（意识）的“形态”；再将它与 Ideologie 作比较，Ideologischen 是形容词，再加上 formen，直译应是“思想体系的形式（或形态）”，即强调了它的“形式（或形态）”，而 Ideologie 未作此种强调。所以，我们的结论是：Ideologischen Formen 和 Bewuβtseinsformen 与黑格尔的 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 有渊源关系，因为它们都有 Formen 或 Gestalten；Ideologie 则属于另一类，因为，它不特别强调“形式（或形态）”。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及历史作为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有关的概念均强调其“形式（或形态）”，用来突出对象的客观性，使之成为不带褒贬意思的科学用语。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那段经典论述中，除了有 gesellschaftliche Bewuβtseinsformen（中文本译作“社会意识形式”），还有 Gesellschaftsformation（中文本译作“社会形态”）和 Der 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中文本译作“社会经济形态”），后两者用到的 formation 是更加正式的表述形式，其中同样含有词根 Form（形

---

①哈贝马斯说：“马克思只有两次有联系地和原则性地谈到唯物史观。”指的正是本文所引证的这两部著作。（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138 页）

②俞吾金注意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用的是 Bewuβtseinsformen。（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93 页）

式)。由此看来，Ideologie 不可能是马克思的专用术语。所以，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Ideologie”，显然是错了。

那么，马克思为何又要分别使用 Ideologischen Formen 与 Bewußtseinsformen？它们的区别何在？不妨读一下它们所处的上下文。

第一段是：“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gesellschaftliche Bewußtseinsformen）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8](P82)

第二段是：“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Ideologischen Formen）。”[8](P83)

显然，前一段是在阐述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属根本原理的表述，应该用抽象的、总体性的概念 Bewußtseinsformen；后一段是运用此原理作社会分析时阐述所面对的现实的、具体的 Ideologischen Formen，即上述所谓的“由思想体系表现的那种社会意识的形态”。从文字的逻辑讲，将 Ideologischen Formen 译成“意识形态的形式”似有同义语反复之嫌，因为“形态”就已经是“形式”了。但是从学理的逻辑讲，既然 Ideologie 的意思是“那种以思想体系表现的意识形态”，译成“意识形态的形式”似乎还是比直译为“思想体系的形态”要好一些，因为它强调的是“意识形态”，而非一般的“思想体系”。当然，面对中文版马克思著作中出现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形式”、“社会意识形式”等各种术语，它们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相互关系是什么？如何翻译得更精确、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这显然还是一项值得研究的工作。

总之，Bewußtseinsformen 与 Ideologischen Formen 都有 formen，可以准确定义，都是中性的，即不带褒贬之意的科学用语；而 Ideologie 无法准确定义，是多义的，① 甚至常常被用作贬义词，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理论的专用术语。

三、意识形态概念来源的背景分析

我们稍稍扩大分析的范围，以便进一步探讨特拉西的 Ideology 和黑格尔的 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 之间的区别。

国内外许多论者在追溯特拉西 Ideology 之含义的来源时，都从弗•培根开始。[9](P15) [1](P5-6) 培根反对四假相论，旨在确立真观念或真知识的标准。其实，“观念”相当于“知识”(在柏拉图那里就是这样)，故“观念学”相当于“知识学”或“知识论”。于是，Ideology 与近代知识论同源。再说，特拉西认为 Ideology 是一门堪为各种学科之基础的科学，它在功能上应该就是“知识学”或“知识论”。但是，在近代知识论生成和发展的逻辑进程中，一路从弗•培根、霍布斯、洛克的经验论走来，一路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的唯理论走来，再加上贝克莱、休谟的后期经验论，最后归拢到康德那里，似乎并没有 Ideology 的位置。这如何解释？

法国启蒙主义者的主要历史功绩，是高扬理性主义大旗，反对教会神学与君主专制。他们更加关注的是社会运动或社会实践的方面。特拉西属于这个时代。他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出发而提出创立 Ideology，目的是使理性主义精神渗透到各个领域。然而，在他提出 Ideology（1797 年）[1](P7) 之前，康德便以《纯粹理性批判》(1781 年) 成功地建构起近代的知识论，为各种学科提供了认识论基础。而 Ideology 却落到被拿破仑讽为于实践无益的空论，大概也会被康德视为于知识论无助的空谈。之后，黑格尔研究意识形态时另创新词；马克思虽然在初创唯物史观的原理时用到过它，而在正式阐述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时则弃之不用，宁可继承黑格尔的用语习惯。

---

① 《英汉哲学术语词典》列出了它的四个义项：观念学，思想体系、思想意识，意识形态，空理、空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125 页）

再看黑格尔的 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贺麟在介绍 《精神现象学》时说："从意识发展阶段来说，意识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说是一个意识形态。因此精神现象学也就是意识形态学，它以意识发展的各个形态、各个阶段为研究的具体对象。用辩证方法从发展观点来研究意识形态，这样就把意识形态学与意识发展史结合起来了。"[6](P21)

两相比较，黑格尔的 "意识形态"是指客观存在着的现象，而特拉西的 "意识形态"则是指主观建构的一种观念学、知识学、知识论。前者是人类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是人类学术演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 "思想体系"。

17、18 世纪的科学揭示出无机自然的奥秘（牛顿、伽利略等），19 世纪的科学渴望揭开有机生命及心理（或精神）的发展规律（达尔文、冯特等）。早在进化论问世（1859 年）之前的半个世纪，《精神现象学》（1806 年完稿）便已领悟到人类意识自有其演化的规律。恩格斯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10](P215) 恩格斯以生物重演律为根据，相信表现在个体身上的意识演化规律与表现在种族历史中的精神演化规律实质上是同一的，因此，精神现象学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人或人类。然而，19 世纪初甚至还是骨相学的时代，科学的实验心理学的诞生要在该世纪的 70 年代以后。所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可以成为他的 《逻辑学》的发源地，却还不可能成为关于意识形态发展的科学。不过，他的关于人类意识形态（精神现象）有一个辩证发展过程的哲学观念却是于现代的精神科学有益的。

事实上，人类的精神或意识形态不仅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它们的生成和演化是和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化的学说，是对黑格尔意识形态演化理论的扬弃，必会为唯物史观对人类精神演化的科学研究奠定基础。

四、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两重含义及其意义

（一）可以将以上的辨析归结为以下要点

1. Ideology 最初指观念论，旨在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成果，可以归入近代认识论的范畴。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 则属存在论或本体论，旨在描述人类精神的各种形态及其演化。前者是一种学科名称，后者指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现象，两者不可并列。

2. 转义的 Ideology 泛指各种社会思潮，属社会诸意识形态之一，并被多种人文学科广泛地使用着。而 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 是一个哲学概念，专指人类意识的各种形态及其演化。

3. 马克思用了三种术语来表达意识形态的概念，它们分别与上述两个方面的来源相对应。Bewuβtseinsformen 源于黑格尔的用语，它是唯物史观意识形态概念的正式表达，这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Ideologischen Formen 既源于特拉西又源于黑格尔，指以思想体系为表现形式的那种意识形态，其从属于总体性的 Bewuβtseinsformen；源于特拉西的 Ideologie，则无论从词义上还是从词性上讲，都不是唯物史观的标准术语，但可以在一般意义上作为 Ideologischen Formen 的替代词或简略语。总之，我们不能误以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只是 Ideologie，不能只是从 Ideologie 出发，而应从 Bewuβtseinsformen 出发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

4. 所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两重含义，一是 Bewuβtseinsformen，不妨指其为 "意识形态之全体"；二是 Ideologischen Formen，或 Ideologie，不妨指其为 "意识形态之部分"。在形式逻辑的层面上，前者包含后者。

（二）马克思的两种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是什么

1. 意识形态之全体（Bewuβtseinsformen）。

在每一种社会形态中，都有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Bewuβtseinsformen）。就其内涵而言，它涵盖人类的全部精神生活，反映并反作用于以社会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并参与现实的社

会运动。就其外延而言，它指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人类意识的各种形态，包括以思想体系的形式出现的那种意识形态（Ideologischen Formen 或 Ideologie），还包括如普列汉诺夫曾提出过的“社会心理”形态，以及其他形态，等等。

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基本构架为：其一，作为社会存在方面的社会经济形态（Der 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其二，作为社会意识方面的社会意识形态（gesellschaftliche Bewuβtseinsformen）；两者的统一构成整体的人类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formation）。[8](P82-83)[7](P8-9) 前者以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据，中者以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据，后者则是一个全体的概念。在这一描述中，只能用 Bewuβtseinsformen，而不能用 Ideologie。

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运动着的整体，社会形态的演化构成了人类的全部历史。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8](P83) 处于不同时代的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演化逻辑将它们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历时性的整体。既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化，作为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gesellschaftliche Bewuβtseinsformen）必定也会有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必定也会呈现出一种历时性的人类精神或意识的整体。

由此可知，作为全体的社会意识形态（gesellschaftliche Bewuβtseinsformen）可以在两种维度下加以研究，一是历时的，即在人类历史中，社会意识形态如何随着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发生变化，从而显现人类意识或精神的演化历程；二是共时的，即在同时代的某个社会形态中，社会意识形态如何与社会经济形态相互作用，以显示整体的社会形态的运作机理。

2. 意识形态之部分（Ideologischen Formen，或 Ideologie）。

如前所述，这一概念表达的是以思想体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人类的远古时代，只有巫术和神话形式的意识形态（Bewuβtseinsformen），而没有以思想体系形式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尽管现代的研究者可以从中发现蕴含着的逻辑结构，但是它们本身肯定还不是“思想体系”。严格意义上的“思想体系”，只是在人类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可能出现，因为它们需要自恰的概念系统，需要严格的逻辑规则。所以，Ideology 这一概念出现在 18 世纪，并被广泛地使用，并非偶然。

诚然，思想体系能够更准确、更集中地表达人类的意识形态的状况。近代以来，各种理论、思潮、主义迭出，既是人类意识发展的重要标志，又极大地丰富着人类的认识，有益于社会的发展。然而，如果以为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即思想体系，此外无他，便有可能限制我们的视野。当代中国社会及世界正处于深刻变化的时期，尤其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因为，一方面，看不见或无视存活在现实生活中支撑着、补充着、修正着、否定着由种种思想体系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Ideologie）大厦的大量思想资料，就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gesellschaftliche Bewuβtseinsformen）的全部内容及其深层结构，也不可能认识一种思想体系得以形成、得以修正的客观机制；另一方面，看不见或无视最终决定意识形态（Ideologie）命运的只能是现实的物质生活而不是思想家的意志，不仅有可能迷惑于种种时髦的思想体系中，还会失去把握历史演化脉络的真正根据。

所以，在意识形态的研究中，应当区分意识形态之全体和意识形态之部分，应当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区分马克思的 Bewuβtseinsformen 和 Ideologie 的实践意义何在

显然，如果只是以 Ideologie 而不是以 Bewuβtseinsformen 解释意识形态概念，那么，意识形态就仅仅是思想体系，而不是指全部丰富的社会精神生活，我们就会片面地看待和理解社会精神生活。也许，我们会关注各种思想、主义之争，而疏于关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及其影响到的社会精神生活的改变；也许，我们会以为对各种思想体系作出是和非、褒和贬的裁断就能解决所有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不去探寻社会经济形态（Der 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与社会意识形态（gesellschaftliche Bewuβt-

seinsformen）的互动互补关系，不去研究意识形态生成、改变及作用机制等诸问题。

相反，如果以 Bewuβtseinsformen 而不是以 Ideologie 解释意识形态概念，那么，意识形态不仅是社会中的思想体系，还包括充盈在社会生活中的情感、意欲、理智，以及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即民族的全部观念形态的文化。它们不仅反映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还记录着一个民族精神成长的历程。显然，这正是当代唯物史观应当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当然，应该看到，离开 Ideologie，便不可能把握 Bewuβtseinsformen 的全貌。一方面，Ideologie 本身是 Bewuβtseinsformen 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人类几乎唯有在 Ideologie 的层面上才能进行交流和沟通，唯有Ideologie 才能作为认识的工具，包括用它作为认识 Bewuβtseinsformen 的工具。就此而言，Ideologie 具有双重的功能：作为直接隶属于 Bewuβtseinsformen 的主体展示 Bewuβtseinsformen，作为工具性的客体用来观照 Bewuβtseinsformen。

当代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将中华民族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同时，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将世界带入了须以诸多文明间的文化交流、融合、互动来推进整体人类文明进步的局面。所以，研究 Bewuβtseinsformen 及其内在逻辑和机制，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软实力，以谋求均衡、和谐的发展；还有助于提升我们对观念文化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以便在全球化时代以更高的视界谋求自身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感谢中央编译局的鲁路先生向本文提供了有关的德文资料）

[参考文献]

[1] 大卫•麦克里兰. 意识形态 [M]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 冯契主编. 哲学大辞典（下册）[Z]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3] 冯契，徐孝通主编. 外国哲学大辞典 [Z]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4] 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 [Z]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哲学译丛》编辑部. 英汉哲学术语词典 [Z]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M] . 贺麟. 译者导言.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德文版）[M] . 迪茨出版社，1990.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罗 苹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消费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左派的教训

理查德 D. 沃尔夫 [著] 吴昕炜 [译]

[摘 要] 阿尔都塞倡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已经扩展到肯定和支持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这一独特角色上。事实证明，工人消费水平的提升所起的有效作用只不过是补偿（从而承认）了他们所受的不断加深的剥削及其负面社会影响。而这种补偿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工人信奉一种强调消费重要性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美国左派（在工会、党和运动中）的缺点就在于认可了这种消费主义，而不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结构下破坏它。

[关键词] 消费主义 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 美国左派

〔中图分类号〕 B089.1；D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42-08

1969 年，路易·阿尔都塞在反思前一年法国“五月风暴”中，发表了《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一文。[①] 就像马克思和列宁早先对巴黎公社进行评价一样，阿尔都塞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总结并吸取历史上反资本主义起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然而，由于这些教训十分重要而未被广泛注意，所以，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回顾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这些教训可以为研究美国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提供新的观察视角。第二部分考察（1）消费主义这一特殊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维系美国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关键的；（2）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如何宣传这种意识形态的；（3）美国左派忽视认识和干涉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理解这一方面有利于我们认清美国左派的弱点。

一、阿尔都塞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一样，阿尔都塞试图说明并由此帮助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把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转变成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同样和葛兰西一样，阿尔都塞转向了意识形态领域，去发展马克思才刚刚开始的研究。[1](P20)② 因为《资本论》只是开始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怎样再生产出来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这一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尤为突出。在构建意识形态理论方面，阿尔都塞的目标就在于阐明工人和其他人如何构想他们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他以此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讲，是共存于任何社会矛盾中的多元意识形态）能够操作并从而阻止资

作者简介 理查德 D·沃尔夫，美国麻省大学教授，《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的主编之一。

译者简介 吴昕炜，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获教育部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现在美国普渡大学做访问学者（湖北 武汉，430072）。

①此文最初于 1970 年发表在法国《思想》杂志上，随后被本·布鲁斯特翻译为英文收录于阿尔都塞作品选集中并于 1971 年以《列宁与哲学》为书名在伦敦新左派书屋出版，此后被数次重印。阿尔都塞后来回应了对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批评：Note sur les AIE。（1971 年，第 253-267 页）

②阿尔都塞明确地把葛兰西的工作作为自己的基础。（《论再生产》，第 142 页）

本主义危机成为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阿尔都塞在1969年的文章中分析了这种意识形态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运作的，是什么样的机构（“机器”）使这种运作成为可能。正如他后来回应对他的批评中所强调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决定了他的研究。[1](P253-267) 揭示出某些意识形态及其组织是如何支持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能够使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更成功地把资本主义危机转变成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2](P130) [3](P81-108)

马克思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其社会条件被再生产出来时才能存在。阿尔都塞的论证就是从援引马克思的主张开始的。“生产方式”一词的基本定义源自马克思，并以不同的方式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文献中，而阿尔都塞对生产方式的定义比之那些宽泛的生产方式的定义更为狭义、精确和具体。他反复提到资本主义的“剥削”或“压榨”，指的是资本家对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① 此文将主要从狭义上论述带有剥削性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经济概念，而不是宽泛地谈论“生产方式”，因为这样更加符合阿尔都塞的论述。

对阿尔都塞而言，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其他的、非阶级方面构成了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结构得以存在的条件。没有那些非阶级方面（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意识形态条件）的再生产，资本主义阶级生产结构将会崩溃。阿尔都塞还强调，没有什么能确保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存在条件的再生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不是自动地或者必然地再生产出它的非阶级存在条件。这里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生存的关键弱点。资本主义阶级生产结构的意识形态（还有政治的）条件对于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来说，或多或少总是个问题。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寻求塑造和控制能够给他们提供必要支持的意识形态条件。然而，当他们去反对与之对立的社会活动（例如反抗被剥削阶级的斗争）时，其结果往往不是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支持，而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破坏。[1](P254)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最主要著作（尤其是列宁的著作），论述了“国家机器”是如何再生产出为资本主义剥削服务的法律和政治条件的。阿尔都塞继续使用了这个词，但已经把它转换为论述意识形态条件是如何再生产的了。他由此区分了两套不同的机器：第一个是政治的和包括了国家及其众多活动、分支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机器（RSA）。强制性国家机器维持和行使资本主义社会暴力工具的垄断权，并且以此支持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国家分支机构，国家活动和官员通过压制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产生的威胁而建立起强制性国家机器。然而，在阿尔都塞看来，还有一套另外的国家机器（没有被传统马克思主义所重视和理解）在维持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起着平行的作用。阿尔都塞把这套机器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以强调它与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平行作用而忽略它们之间的区别。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学校、家庭、宗教和宗教组织以及大众传媒。这些机构主要是依靠意识形态，而不是像强制性国家机器那样依靠权利和政治发挥作用。它们用想像（思考然后理解）的方式向儿童和成年人反复灌输他们在所处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与这个社会的关系。② 资产阶级在运用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同时，还努力发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以对抗通常向不同方向努力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同时行使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职能，然而却是在明确它们的对立中分别行使这两种职能。[4](P146) 阿尔都塞发现强制性国家机器在确定资本主义所需的目标和行使履行功能方面具有更

---

①阿尔都塞反复使用这些术语指明他认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切核心：获取和使用（社会性地分配）由他人创造的剩余产品的经济关系。1979年，在与这位作者的私人通信中，阿尔都塞声称：“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把剥削这一精确概念从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方式’的模糊用法中解救出来。”与之相对照，在像共产主义那样的非剥削阶级结构里，生产剩余产品的工人同样是剩余产品的集体所有者。（雷斯尼克和沃尔夫：《阶级理论和历史：资本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第一部分）

②阿尔都塞在这里的论证是相当精细的。他强调强制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区别是一个重点和程度的问题。他认为，强制性国家机器主要靠暴力来运作，其次才是靠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与之相反。阿尔都塞承认福柯所强调的权利和镇压结构的社会性扩散，但与福柯不同的是，他主张把权利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作为他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中心。

大的统一性和控制力，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更加变化多端和难以捉摸，并且在资产阶级通常感到较为棘手的排斥他人而维护自身利益的领域更有说服力。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质询”起作用。也就是说，像家庭、教堂、学校以及大众传媒这类组织都用特殊的方式“召唤”个体。这就是规定和强迫他们（a）用特殊方式思考他们的身份、他们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社会组织的联系；（b）做出相应的行动。阿尔都塞在他的精细公式里，集中考察了这些被质询个体的“主体性”。他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原原本本地强加给个体以特殊的主体性。要是他后来再写这篇文章的话，他应该在与“特殊主体性”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身份”。不管怎样，他都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仅仅只在它们所质询的个体身上产生了主体性／身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期望使主体想象他们的主体性／身份是由内部自己产生的。

现代资本主义用为资产阶级剥削提供其存在的意识形态条件的特殊方式推动它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去质询个体并赋予个体主体性／身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为资本主义服务，就在于他们有效地利用意义系统（包括对他们自己和他人身份的定义）质询个体，使他们至少接受资产阶级的剥削，甚至最好能歌颂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加给个体的主体意识形态，肯定了他们的主体性包含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就是说，个体被质询为自由的主体，他们能够产生出或引起他们的信念体系、他们的行动以及他们的社会组织。“主体”的多义性（包括某物／某人“被征服”和某物／某人引起）使阿尔都塞注意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今日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意识形态对立。个体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塑造得确信：让他们遵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需要是相当不同的事情，这是一条由独立自主的主体自由选择的人生道路。用阿尔都塞的话讲就是，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被质询为“自由人”，因此他或她“自由地接受了……征服”。[4] (P182)

阿尔都塞用认识论的自我意识来详细论述了这个观点。他不是从意识形态领域之外来想象和推论自己。他承认并且坚持主张：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切思维主体都“总是、已经”被质询了。[4] (P176) 他既肯定他自身的主体性，又肯定他对他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定的屈从。虽然阿尔都塞明确地区分了主体性与主要通过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灌输出来的主体性的不同概念，但是，所有的主体性都是社会的产物。对阿尔都塞而言，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起作用的社会矛盾导致了不同的和对立的主体性概念的形成，使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何实际地发生作用变得更加复杂化。阿尔都塞强调主体性产生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矛盾，这是他平生理论创造中最重要的思想。[5] 这些思想促使阿尔都塞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反资本主义传统。他以这种主体性批判了在他的社会中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加给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那种不同的霸权的主体性。阿尔都塞指责了“自由主体”的霸权意识形态，认为它忽视和否认了其中的社会结构，尤其是支持了资本主义剥削。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反复灌输意识形态的复杂矛盾的形式，正是阿尔都塞希望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当作与国家形式在支持资本主义方面具有平行重要性来对待的东西。实际上，他希望促使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他们过去对国家的过分关注和重视，并且希望他们能用与考察国家一样严肃认真的态度考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他的目标是确定一个马克思主义纲要，包括所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化研究和斗争。

在文化研究中，把阿尔都塞的研究与其他研究倾向区分开来的标志在于，阿尔都塞的理论把文化价值、文化组织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矛盾联系起来，其中的每一方面又同时是另一方面的原因和结果。任何决定论或者还原论都不可接受；已经过时的马克思主义反映理论不可接受；本质主义不可接受。阿尔都塞已经确立了“多元决定”的强烈偏好，即任何原因同时也是结果。① 文化既是阶级的原因也是阶级的结果。不仅仅是一个构成了另一个，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都与阶级和文化存在着多元决定的

①参见他的重要文章《矛盾与多元决定》。雷斯尼克和沃尔夫深入讨论了多元决定及其作为一种新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因果概念构成的关系的重要性。（《知识与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81-106 页）

关系。这些复杂的多元决定因素反映出隐藏在阶级结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之中的矛盾。这些正是阿尔都塞为了革命的目的希望马克思主义者们揭露出的矛盾。实际上，阿尔都塞最终的工作就是力图集中研究有意识的、无意识的和强烈矛盾的质询。他自己的家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用这种质询征服他的。①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能够而且应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论文最初提到了一个复数概念，即“融入社会形态中的生产方式”，[4](P158) 但是他却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个重要观点。既然社会（或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社会形态”）包括多元的相互作用的阶级结构，绝不是单一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那么阿尔都塞仅仅关注资本主义是不够的。把他的逻辑推而广之，一个社会里每一个阶级结构会形成各自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同阶级结构内部及其之间的矛盾冲突都会进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而使对个体的矛盾的质询更为复杂化。例如，在一个自由职业者（马克思的“古代阶级结构”）、包含资产阶级结构在内的企业和包含封建阶级结构在内的家庭三者共存的社会里，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会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施加特殊的影响。②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又会给这些阶级结构带来复杂的矛盾的影响。这样一种更为发达而又有细微差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能加深马克思主义者对个体被质询的主体性的矛盾的认识：它们的多元化、不稳定性和偏离中心的特性。这种认识反过来可以更成功地干预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

阿尔都塞总是关注那些他认为别人忽略了的东西——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依赖性，他有时候又接近于决定论者，虽然他从1963年写作《矛盾与多元决定》就开始大胆地对其进行过批判。[6] 这样，阿尔都塞，尤其是那些与他相联系的人，有时候被解读为结构主义者，似乎他们都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再生产功能。例如，尼科斯·普兰查斯，[7](P314-318) 鲍勃·杰索普[8](P154-156、167-169、181-186) 和约阿希姆·希尔施 [9] 似乎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仅仅是由阶级结构决定的。这样的解读复兴了对“阿尔都塞主义的结构主义”（尽管阿尔都塞反复否认这种提法）的批判，因为它否定了人的作用的一切可能性而支持一种完全决定性的结构。保罗·希斯特批判了阿尔都塞有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点的经济决定论和功能主义。[10](P68-73) 同样，欧内斯托·拉克劳责备阿尔都塞是把意识形态变成了反映和功能性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理论。[11](P99) [12](P97-105) 来自对立面的批评者认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已经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最终依赖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唯物主义基础的基本认识。[13](P129-130) 汤普森把阿尔都塞看作是一个已经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失去任何联系的唯心主义者，[14](P1-210) 而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则谴责阿尔都塞“不悔改的”理论主义。[15] 佩里·安德森把阿尔都塞归入他所批评的那种由经济转向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在安德森看来，这种转向割断（并且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与物质现实和革命政治的天然联系。[16](P49-54、69-74)

就像已经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在阿尔都塞之前和之后，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之间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讨论复兴了关于“意识形态”和区分“真理”与“谬误”的关系的辩论。马克思已经批判了他那个时代作为意识形态盛行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既体现在流行的“常识”概念中，也体现在那些提炼为形式的概念化体系之中——都没有把握和改变资本主义的阶级维度。马克思的说法常常被理解为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那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本身的“虚假性”以及证实他自身称之为“真理”和“科学”的观点基础上的。由于阿尔都塞没有认真思考真理（科学）与错误（意识形态）之间的二分化，因此他招致了这样的批评：他不过是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那些被厌烦和被诋毁的绝对真理。[13](P4-11) [11](P101)

阿尔都塞的自我辩护（在他的《自我批判》和“Note sur les AIE”中）对功能主义、理论主义指责

---

①部分自传，部分自白，以及部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分析。（《来日方长》）

②参见弗雷德、雷斯尼克和沃尔夫对封建阶级结构的家庭的分析。（《把它全部带回家：美国家庭的阶级、性别和权力》）

的反击，还有对意识形态（错误）与科学（真理）之间二分化粗糙的赞同，都减弱了他的理论的批判力度和应用性。斯图亚特•霍尔[17](P25-46)和约翰•汤普森[18](P90-98)强调了阿尔都塞精细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结合的公式。同样的，对阿尔都塞非还原论相似的理解也逐渐出现，这尤其表现在雷斯尼克和沃尔夫[3](P81-108)还有格雷厄姆•洛克[19](P69-90)有关特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中。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探讨受到进一步的批判（正如他的其他作品所受到的批判一样），即忽视资本主义阶级剥削的不同现代形式。这些批判可能会用不同途径来塑造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例如，资本主义的剥削可以在私人和国家领域同时存在。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剥削者——占有他人创造的剩余产品——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国家公务员。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里，资本家要么是包括由股东选举产生的理事会在内的个人，要么是被安排到那个职位的国家公务员。阿尔都塞对苏联的深刻批评原本应该让他产生疑问：国家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私人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区别何在，阿尔都塞始终没有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一点是很遗憾的。尤其令人惋惜的是，他本来应该研究而最终没有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国家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促成1989年苏联解体的。[20](第10章)

总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使一个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考察方式成为可能，那就是对文化及其与阶级分析、阶级政治的关系进行考察。它深化和丰富了葛兰西从一种阶级革命的观点研究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工作。阿尔都塞原本应该嘲笑那种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需要而且应该应用于文化研究的观点，因为他确信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只不过仅仅才开了个头。我们可以把他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扩展到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来看看阿尔都塞的巨大贡献。

二、美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的基本统计数据自内战以来是严酷的、赤裸裸的。由于实际工资的上升水平远远低于劳动生产力的上升水平，美国资产阶级最近150年来对工人的剥削一直保持上升趋势。[21]简单来说，与实际付给工人工资的价值相比，剩余价值要生产得更多一些。剩余价值的平稳上升给美国带来了浮华的财富以及全球性的国家军事优势。用马克思主义的确切术语说，相对于工资而言的剩余价值上升意味着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加深了。美国资本家把从工人身上剥削而来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用来在全球范围寻求和控制便宜的原料，另一部分则用来培养大批管理者，而这些管理者的任务就是监督和管理工人去承担更繁重的工作。还有一部分剩余价值被用于投资技术更新，以便在同等劳动时间里生产更多产品。所有这些增长的剩余价值的分配不仅加速了这种增长，同时还减少了卖给工人的消费品的生产成本。资本家能够使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远慢于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增长速度，其原因在于工人赚的每一分钱都能买到更多的消费品，因为消费品的价格在不断下跌。

美国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在于把剩余价值的增加与工人消费水平的上升结合了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讨论就已经预见了这一可能性。美国从1860年到2000年间独特的环境使得这一可能性在我们的地球上独一无二。通过使被剥削日益深重的工人乐于接受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美国经济不仅造就了全世界受剥削最深的工人阶级，而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较少遭到工人的反抗。提高工人的消费使工会丧失了战斗力，使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反对减少，使反资本主义的美国知识分子缄口不言。这里变成了全球最安全可靠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横跨全球的财富吸铁石。然而，美国资本主义的极度剥削也带来了相应的令人关注的社会代价。身体劳累、心理压力、药物依赖和滥用、交往暴力、家庭破裂、心理消沉、寂寞和孤独的程度同样都相当高。

当然，美国资本主义成功——它的安全、发展和财富——的原因只能部分地归于其独特的经济表现。由于美国资产阶级非常成功地用提高消费水平来补偿对工人的极度剥削，工人必须接受消费作为给他们的相应的补偿。他们不得不重视积极的不断上升的消费水平，而不是消极的不断加重的剥削。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后，美国工人满怀亚当•斯密早先就提出的希望。斯密指出，当资本主义扩大了

获利的少数人与拿工资的多数人之间的差距时，随之而来的妒忌和怨气将会造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战争。斯密希望通过提高消费来补偿工薪大众巨大的收入差距，从而克服这个威胁。而这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成功之处。然而，如果美国工人能够厘清他们现有的生活品质和他们所要追求的生活品质完全不同的话，那么他们将不会仅仅满足于涨工资。设想一下，工人更加重视平等以及工作中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关系，更加重视工人集体决策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更加重视个人用于审美、运动和文化活动的时间。如果这种价值观——超越了个人消费水平——成为衡量优质生活的标准，美国工人将会拒绝承认提高消费可以作为对不断加重的剥削的足够补偿。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这里显示出了重要性。在家庭、学校、教堂、市民社会劳工组织、大众传媒等等中间，美国工人被系统地质询为消费的发起者和受动者。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和其他人看作(定义为）是自由市场的参与者，尽可能地使他们从工作中获得的消费达到最大化。他们必须把自己定义为上面说到的自愿用劳动的“无效用”换取现在消费中的“有效用”的“消费者”。完全控制了学术界的媒体以及政治的新古典主义在理论上把质询形式化。弥漫在生活各个方面的广告坚持不懈地把质询通俗化。美国工人已经有系统地服从了这样一个首先毫无疑问地把自己定义和欣赏为消费者（其次才是工人）的意识形态。对他们自己和其他人而言，个体价值完全靠其所获的消费水平来进行衡量，并且这种消费水平被看作是对个体对生产的贡献（他们受的剥削）的奖励。这样一种消费主义是能够操纵大众的，因为它“抓住”了在工人生活中真正充足的东西：即对极度剥削带来的异化及疲劳进行补偿、推理和论证的需要。[22]

只有当美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用上面的方式有效地定义了绝大多数个体的主体性的时候，实际增长的工资才能作为对不断加重被剥削的工人的补偿。只有当工人主要渴望从他们异化了的和疲倦了的劳动中得到消费时（而不是有组织的工人去分配他们自己的剩余价值），工资的增长才能让人满意。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美国运作得很好，或许这里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适合资本主义。

阿尔都塞关于对困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矛盾加以留意的警告同样适用于美国。美国繁荣的“消费主义”也总是招致批评，例如左派的索尔斯坦•凡布伦对“炫耀性消费”的批评，还有右派的神职人员对“宗教虔诚”丧失的哀叹。少数工人受到这些批判的启发而认识到：积累消费品并不能克服剥削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生活造成的有害后果。这些人或多或少以不同方式进行着反抗：一些人归隐田园，一些人逃离社会（追求艺术性、酗酒、信仰宗教还有犯罪等等），一些人转而迷恋家庭，还有一些人甘愿承受自己经营的冒险的不稳定性。上述形式以及其他形式的反抗向意识形态和美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出了限制它们的形式并且牵制它们向不破坏资本主义结构方向发展的问题。他们力图以塑造（质询）主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一来，如果他们反抗消费社会，那么反抗将是个别的，而不是集体的，并且也不能够将目标定为用共产主义阶级结构代替资本主义。

最后，问题在于像阿尔都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会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来构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的目标在于进行社会干预，包括把资本主义（剥削的）转变为共产主义（消除剥削的）阶级结构。在美国，这就意味着要精确地深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矛盾中，削弱把个体沦为消费主体的质询，并且由此揭露把消费当作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补偿的深刻不合理性。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应该强调剥削的代价，同时揭露出对工人的消费主义征服是对这种剥削的关键的意识形态支持。这些力量将把共产主义阶级结构的利益对应起来，同时，由于剥削的消除，也会降低社会和个人的成本。

长久以来，美国反资本主义政治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没有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中获得启示。美国左派没有对这种把个体看作消费主体的质询进行有效的批判。事实上，左派还加强和重复了这种质询。它逐渐把它自己和社会主义表现为一种能为所有个体达到最高消费水平的更好的工具。它特别关注那些遭受各种歧视而不能达到平均消费水平的人。它无休止地重复着种种以“更高的工资”、“家庭工资”、“生活工资”、“最低工资”、“可比较工资”、“保证工资”等等为目标的口号和计划。美国

左派强调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计划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提高消费——一个资本主义能够从容应付，从而使得左派不具有说服力和必要性的领域。

当然，为争取加薪而进行的斗争如果能够成功，的确能减少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然而工资的不断增加最终会使充足的剩余价值不复存在，从而使资本主义企业无法生存。但是，这个极限很难在现实的工人斗争（尽管雇主对这种结果心怀不满）中达到。美国工人既不了解也不推动争取工资的斗争成为削弱资本主义阶级结构而实现向共产主义和其他阶级结构转变的手段。工人很少提出自己（而不是管理者或者老板）占有企业利润和决定如何使用企业利润的要求。相反，工人要求得到更高的工资以便获得更多的消费品。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被质询为消费的主体了。同样，他们特别敏感于雇主所谓工资的增长会使企业不利甚至破产的威胁，因为这样就会切断工人消费的途径。与之相对照的是，在大多数工人的脑海里，重新组织向非剥削的阶级结构发展的想法依然是茫然的、乌托邦的和"不现实的"，而且基本不可能发生。

让我们以对工会运动的匆匆一瞥来对美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它们与消费主义的层次关系作简要考察。消费主义者的方法——把工人的斗争局限于获得更高消费标准的目标——经常会受到另一种观念的挑战。这就是工人能够而且应该为工作的"尊严"和"敬意"而斗争。[①] 消费并不是对剥削的充分补偿——这一觉醒的闪光并没有成功地融入反消费主义的工会策略中。工资的增长一次又一次地胜过（没有简单取代）工会与雇主斗争的其他目标。那种工会应当适当地与资本主义剥削作斗争的主张已经把工会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推向了危险和邪恶的地位。实际上，"尊严"和"敬意"作为工会重要的奋斗目标，它们并不是定义为对生产的阶级组织进行基础的变革，而是定义为使弱势的工人群体（少数民族、妇女、移民等等）融入享受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的工人群体之中。

当然，以上我们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有它们各自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反映了塑造它们结构和运作的各方面的影响。尽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加强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提供了支持，但它们也以其他方式破坏了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如由美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推动的消费主义对所谓的"工人减税政策"做出了贡献。联邦、州和当地政府变成了不相容的遭人憎恨的机构：因为他们的税收要求被简单地视为对工人消费水平的威胁。工人支持那些许诺减税的政客，即使政府的减税计划最后会不断地损害工人的生活水准。这样，一个片面的政策就产生了。如当实施减税计划的美国大城市削减垃圾处理服务和公立学校计划的时候，工人掏钱去买私人商品（私立学校、继续教育、个人垃圾处理服务等）所付出的要比他们从减税计划里获得的要多得多。然而，对减税的极度关注揭示出一种强烈的消费主义政治。但是，入不敷出的政府只能削减扶持资本主义企业的各种计划——这就是消费主义的矛盾结局。

消费主义与促成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矛盾还体现在美国工人那种令人惊奇的承担个人债务和债务服务的自觉意愿。这种自觉意愿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和维持传统家庭关系以及提高消费的意识形态（包括由此产生的代价）作斗争的美国家庭已经宣告失败。家庭功能障碍、离婚、压力等等都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各种消极方面（降低的工人生产力、旷工、酒精中毒等等）一同呈现上升趋势。家庭所推动的主张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往往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即破坏了这种意识形态以及它们对美国资本主义提供的支持。[23]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原本应该推出一个涉及通过消费主义把家庭矛盾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矛盾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联系起来的左派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消费主义原本应该被揭示为对剥削的不适当的补偿以及在许多方面对工人的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取代消费主义的另外一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回应——也就是变剥削的阶级结构为非剥削的阶级结构——原本应该成为工人可

①美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会主义者经常反复批评"猪排工会主义"，并且主张扩展工会的社会目标，包括生产本身的再组织。有时候这种扩展通常以有限的方式向生产组织提出挑战，由此在工作的问题上给工人更大的权力和权威。然而，要求把剥削的阶级结构转变为非剥削阶级结构的计划却几乎没有产生。无论如何，这种扩展上的无能为力证明它们已经沉浸在由美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大多数工会——所推动的消费主义之中了。

理解并支持的一种政治前景。工人政治策略转变的一个模式来源于美国19世纪的批判奴隶制运动。他们最终把提高奴隶消费水平的要求转化成了把奴隶作为生产组织解放出来的要求。如今，批判资本主义的运动同样需要把要求从提高工资转向消灭资产阶级剥削。

或许，美国左派只是在口头上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剥削性阶级结构的要求。它所强调的要提高消费水平的（经常辩解为"现实的"）策略屈从了崇尚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面有部分原因就是没有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中吸取教训。从一般意义上说，这极度地轻视了意识形态的力量，从特殊意义上说，是低估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它没有真正找出并抓住支持美国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矛盾之处作为斗争的有利条件。在对消费主义的迁就之中，左派加强了意识形态中支持资本主义的那些方面并且使自己的许多目标无法达到，而没有把握作为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的政治行动的基本部分的那种反资本主义的（特指反消费主义的）价值体系的需求和必要的范围。这种批判对于美国以外的左派同样适用。不管怎样，如果我们能解释失败的原因，我们就可能转败为胜。这正是阿尔都塞在1969年的法国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获得的启示，同样，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扩展这一理论获得的启示。

（本文包含了共事多年的斯蒂芬•雷斯尼克提供的诸多观点，斯蒂芬•卡伦博格和戴维•汝斯奥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 阿尔都塞. 论再生产 [M]. 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5.

[2] 阿尔都塞. 自我批判 [M]. 洛克译. 伦敦：新左派书屋，1976.

[3] 雷斯尼克和沃尔夫. 知识与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M].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

[4] 阿尔都塞. 列宁与哲学 [M]. 布鲁斯特译. 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8.

[5] 阿尔都塞. 来日方长 [M]. 维齐译. 科普特，墨里埃•布当编辑. 纽约：新出版社，1993.

[6] 阿尔都塞. 矛盾与多元决定 [A]. 保卫马克思 [M]. 布鲁斯特译. 纽约：佳酿书屋，1970.

[7] 普兰查斯. 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 [M]. 冯巴赫编辑. 伦敦：维索出版社，1974.

[8] 杰索普. 资本主义国家 [M]. 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2.

[9] 希尔施. Der Sicherheitsstaat [M]. 法兰克福：EVA出版社，1980.

[10] 希斯特. 论法律和意识形态 [M]. 伦敦：马克米兰出版社，1979.

[11] 拉克劳. 马克思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 [M]. 伦敦：新左派书屋，1977.

[12] 拉克劳和墨菲. 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策略 [M]. 伦敦和纽约：维索出版社，1985.

[13] 瑟伯恩. 权力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权力 [M]. 伦敦：维索出版社，1980.

[14] 汤普森•E•P. 理论的贫困及其他 [M]. 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8.

[15] 卡利尼科斯. 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 [M]. 伦敦：布鲁特出版社，1976.

[16] 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M]. 伦敦：新左派书屋，1976.

[17] 霍尔. 文化研究批判对话 [M]. 莫里和陈编辑. 纽约：洛特里出版社，1996.

[18] 汤普森•J. 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M].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

[19] 洛克. 主体、质询和意识形态 [A]. 后现代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未来：论阿尔都塞传统 [C]. 卡拉里和汝斯奥编辑. 汉诺威：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1996.

[20] 雷斯尼克和沃尔夫. 阶级理论和历史：资本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 [M]. 纽约：洛特里出版社，2002.

[21] 雷斯尼克和沃尔夫. 剥削、消费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的独特性 [J]. 历史唯物主义，11（4）：209-226，2003.

[22] 豪格. 商品美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表象、欲望和广告 [M]. 波克编辑.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6.

[23] 弗雷德，雷斯尼克，沃尔夫. 把它全部带回家：美国家庭的阶级、性别和权力 [M]. 伦敦：布鲁特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罗 苹

消费主义背景下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历史透视

孙玉霞　张筱薏

[摘　要] 随着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从短缺走向丰裕，消费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短缺经济时代，“生产决定消费”；进入丰裕社会后，“消费引领生产”，同时隐匿于其中的深层逻辑则是“生产对消费的控制”。与短缺经济时代生产对消费的制约性支配不同，丰裕社会中生产对消费是一种引导性控制，即资本为了追逐利润而以文化控制的方式对消费进行操纵。为此，不能简单地用马克思关于生产的支配作用的观点来解释现代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但是马克思的深刻见解对我们今天把握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仍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消费主义　消费　生产　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 B032；F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50-05

当今社会，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消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潮流迅速蔓延。在个人生活中，消费至上的观念广泛流行；从社会整体看，消费的地位也一再被拔高，经济部门、公共政策以及社会舆论都愈来愈强调和重视消费。有人认为消费已经取代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有人认为消费就是生产力，有更多的人认为我们正在步入“消费社会”。那么，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是否发生了逆转？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关系的观点还能否对此作出解释？本文尝试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历史变迁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探讨。

一、丰裕社会的显性逻辑：消费引领生产

在前工业社会，小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人类的生产能力相当有限。由于产品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导致贫穷、暴政、愚昧等落后状况普遍存在，整个人类社会处于“短缺经济”状态。物质产品的极度匮乏（前资本主义时期）或相对短缺（资本主义初期），决定了市场长期是卖方市场；加之前工业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缓慢、消费习惯变化甚微，所以，消费仅作为生产的一个内在环节而存在，具有不言而喻、自然而然实现的特点，生产者几乎不需要过多考虑消费者的偏好。而生产作为提供消费对象的一方，则居于支配地位。这时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是：生产—消费—再生产—再消费……生产在前，消费在后，商品的销售顺畅无阻。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并不能依据自己的需要或意愿来消费，而是根据社会能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生产的多少来进行消费。可以说，这是“生产决定消费”，即生产决定消费者的什么需要能够得到满足。这样的社会可以称之为“生产社会”或“卖方社会”。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短缺依然是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

作者简介　孙玉霞，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广东　广州，530061）；张筱薏，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天津，300387）。

基于这样的背景，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生产对消费的支配地位，“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1](P31)在短缺经济中，社会生活的重心是生产，生活消费非但不重要，而且过多消费会抵消资本积累，所以常被贬抑。社会倡导人们过简朴、节制的生活，以省出更多的资本用来扩大生产，因此主张勤俭节制的新教伦理便成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到18世纪上半叶，尽管欧洲还没有摆脱短缺经济状态，但是随着市场上可供选择的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多，消费逐渐活跃起来，消费者的偏好开始日益被重视。一个消费者觉醒的时代悄悄来临，而生产不愁销路的时代则风光不再了。[2](P4)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已经初具规模，商品的大量出现使得欧美的消费浪潮到20世纪初已经初显端倪。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短暂停滞后，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一个生产供应充足、物质产品丰裕的时代，人称为“丰裕的社会”[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或“消费社会”[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在丰裕社会里，由于产品极大丰富，卖方市场、卖方社会转变为买方市场、买方社会。这意味着，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消费来决定，生产则逐渐演变为消费的一个环节，即先有了消费的需要，然后才进行生产。这样，一个完整的“消费过程”（抑或说“生产过程”）就是：消费（即对产品的需要）—生产—消费……在这里，消费者、客户是上帝。[3](P107)显然，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消费由生产的一个内在要素，转化为生产之外的一个令生产者不得不努力争取才能完成的环节。消费者的地位也被明显抬升，“顾客是上帝”的口号就反映出消费者拥有的选择权对生产者所造成的压力。此时，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现为“消费引领生产”。

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变化也集中体现在“消费者主权”的提出。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消费者主权”的概念。[4]20世纪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则提出“消费者主权”的理论。要点是：生产者听命于消费者，即生产者应该根据消费者的意愿和偏好来安排生产；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中，消费者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5](P179)在短缺经济时期，产品匮乏，消费需求受到限制，必然是生产决定消费。随着产品供应的充裕，买方市场逐渐形成，在买卖双方的势力对比中，生产者之间相互竞争激烈，往往需要在市场中努力争夺消费者、占据一定的销售份额才能生存下去。而消费者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以本人的意愿和偏好购买需要的商品，并把这种意愿和偏好通过市场环节传递给生产者（用货币对各种商品及其生产者“投票”）。生产者在获得这些信息后，就调整生产，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样，市场经济就赋予了消费者在消费中的主动权。20世纪初，市场营销理论在美国诞生，各种关于市场调查、营销以及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研究蓬勃展开，而福特主义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模式也转向针对“目标消费群体”的小规模、小批量生产的后福特主义模式，这些都见证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消费社会的转型和消费对生产的引领。

工业革命是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过渡、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型的阶段，也是消费的地位日益上升的时期。生活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看到了生产和消费互为手段、互为媒介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生产创造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另一方面，他强调，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

生产出来。”[1](P28-29) 马克思在此谈论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并没有能够亲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辉煌成就，但是通过对二者关系思辨式的阐释，他已经深刻预见到消费对于生产的重大意义。

正像马克思一度赞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极大推进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成就一样，从唯物史观的立场看，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变迁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性。消费从短缺经济时代对生产的附属地位上升为丰裕社会中对生产的引领和主导地位，首先当然是两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生产能力巨大释放的结果。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根本发展，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围绕人们的需要和偏好做怎样的努力。人的需要、个性和自由被尊重，不仅仅是启蒙所带来的观念的觉醒，更应该是生活世界中活生生的现实。消费者主权的出现，乃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胜利，是消费者从物质匮乏的捆绑中获得的解放。虽然在马克思看来，由于牟利的本性，资本从诞生以来就“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资本也一度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变迁走到“消费引领生产”的阶段，尽管并没有脱离资本逻辑的驱使，但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社会历史实现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物质的极大丰裕，让消费从短缺经济的制约中摆脱出来，使“消费者主权”成为一种可能。毕竟这是人向自由又迈出的一步。

二、丰裕社会的隐匿力量：生产对消费的控制

资本终究具有自我意志，资本的逻辑从来都没有停止脚步。在“丰裕社会”或“消费社会”中，消费的重要性也使资本家的注意力从对工人劳动的控制转向了对消费的控制。如果说19世纪资产阶级并没有注意对消费进行控制的话，那么20世纪，它则不再允许消费只是一种个人自我放任的活动，而是要确保人们积极参与到消费中去。于是，关于是否消费、消费什么及消费多少都被纳入控制的范围中。

一反“消费者主权”的主张，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提出，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切听命于大企业的“生产者主权”的状况：为了实现利润稳定增长的目标，生产者必须制订并执行计划，既控制商品价格又控制销售总量，并通过庞大的广告网、通讯网和推销组织来“劝说”消费者购买这些商品。[6](P209) 大型公司利用自己的生产能力、生产者垄断和生产者促销能力的优势，在消费者占有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投巨资于广告等现代促销手段以左右消费者的需求，操纵“消费者主权”。他认为，在贫困的世界，欲望或者需要对于消费者来说是真实的；而当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要已经得到广泛满足的情况下，消费者反而对自己需要什么无所适从，很容易接受广告和推销的宣传，人为地产生某些兴趣和偏好。而问题是，这样一些兴趣和偏好是“通过唤起人们最低级的本能、欲望和不安定感而蓄意制造的”。[7](P86)

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当人们认为是消费者的需要引领生产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消费者的需要是如何产生的。本来人的自然需要是无须被外界提醒的，但是在基本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人的需要就容易受社会、文化以及心理因素的影响。在物品大规模生产的社会里，如果人们仅仅限于满足基本需要，必然会导致过量生产的商品销售不出去，此时消费就不再是生产的一个自然实现的要素，而变成了一个需要生产者费尽心思琢磨的斯芬克斯之谜。但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不能只是被动地去迎合人们变动不居的口味和偏好，而是要从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出发，主动去培养和塑造消费者。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尤其是世纪之交（19与20世纪之交——引者注）的科学管理与‘福特主义’被广泛接受之后，建构新的市场、通过广告及其它媒介宣传来把大众培养成消费者，就成了极为必要的事情。”[8](P19) 而培养消费者就是要引导和操纵消费者的需求，让大众“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者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9](P6)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直接把这种诱导性需求称为“虚假需要”。在他看来，现代工业社会利用技术的进步和对人的需要的控制来达到使现存的制度和现状合法化的目的，因此这是一种“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告和“文化工业”[霍克海默（Max Horkhaimer）、阿多诺（Th. W. Adorno）]，这种对需求的引导和对消费的渲染演化为消费文化符号的制造和传播，特定的文化和社会涵义被强加于消费之上，使之具有了符号的内涵。于是，一定的消费活动成为人们进行身份确认和社会区分的标志，

而消费主义也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消费的对象不再是商品和劳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在一种文化中的符号象征价值——波德里亚深刻地揭示了当代消费文化的“符号消费”特征。这意味着，现代社会资本对消费的控制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控制，对消费者的控制则更是深入到了价值观念层面的操纵。至此，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隐匿着一个深层的逻辑：“生产对消费的控制”。虽然在微观层面，单个生产者不得不努力了解消费者偏好，调查市场需求，尊重“消费者主权”；但另一方面，大型垄断公司、厂商花费巨资，通过广告和大众传媒制造和传播消费文化符号，渲染消费主义文化，形成“生产者主权”。在“消费引领生产”背后，资本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文化控制的方式对消费进行操纵。如果说资本代表生产方的话，那么这显然是生产对消费的一种控制。

需要注意的是，丰裕社会中生产对消费的控制不再是短缺经济时代的制约性支配，而是一种引导性控制。这种控制主要是资本通过整合各种资源来主动引起和唤醒消费欲望——更多地使用文化手段，深入消费者的思想意识之中，影响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通过文化符号的生产和传播，向人们灌输一种消费享乐主义的观念，承诺一种物质丰裕的幸福生活，从而使人们倾心于在商品消费中去寻求满足。正因为现代社会对消费的控制已经渗透到人的精神世界，所以它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深入人的灵魂和骨髓，它使发达工业社会盛行着一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9](P3) 造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病态、压抑和苦闷，从而导致现代人的深度异化。

马克思并没有直接预见到资本通过文化手段对消费的控制，然而在生产和消费关系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如此精彩的论述：

> 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1](P29)
>
> 生产生产出消费，是由于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其次是由于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这第三项所说的这个最后的同一性，在经济学中常常是以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来说明的。[1](P31)
>
> 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结果……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1](P29)

马克思在这里表达了如下思想：首先，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人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消费，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其次，生产创造消费的动力和能力。因为生产创造出来的是消费的对象或者说是人所需求的对象，所以从产品可以诱发消费的动力和能力。第三，生产也创造出消费的主体。从唯物史观来看，在作为消费主体的人及其文化的发展演变中，经济因素居于决定性地位，消费方式的变化体现着消费主体的变化，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由此可见，代表生产者一方的资本之所以能左右消费，正是基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马克思已经看到，生产对消费能力和消费动力的创造乃是通过社会创造的需要实现的。他指出，“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那么，现代社会制造出各种文化符号来诱导消费者，实际上就是要创造和提醒人们“对消费对象的知觉”，从而产生对对象的需要感。可见，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深刻洞察已经触及到对消费进行控制的可能性。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历史演变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首先，要历史地看待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论述。马克思是在生产不足的社会背景下谈论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在马克思的时代，“短缺”是社会经济的基本状态，生产是社会生活的核心，所以他强

调的是生产的支配作用。马克思认为，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是生产相对过剩与消费相对不足的矛盾。受时代限制，马克思并没有设想生产绝对过剩的情况，但消费社会的到来，实际上表明绝对过剩的情况已经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种现实。在这种情形下，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与马克思的时代有了重大的区别。所以，不能教条地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的支配作用的观点来解释今天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特别是马克思在论述消费的时候，总体上还是把消费仅仅看作生产的内在要素。因此，并不能夸大马克思对消费的重视程度。但是，马克思的深刻见解对于我们今天把握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其次，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对人类社会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变迁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我们仍然生活在物质生产方式支配着我们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时代，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变迁正是由生产方式的演进所决定的。物质生产从短缺走向丰裕，从根本上决定了生产与消费关系变迁的基本面貌。在短缺经济时代，生产不足、物质匮乏直接制约着消费，社会生产什么则消费什么，因而“生产决定消费”。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物质产品的丰裕，消费越来越自由，选择余地不断增大，反过来形成对生产的种种要求和约束，表现出“消费引领生产”的态势；但与此同时，消费选择的自由本身又为“生产对消费的控制”埋下了伏笔，因为如果没有消费选择的自由，就无所谓对消费的控制。而资本的逻辑则作为一种深层逻辑驱使着生产和消费的地位转换。在短缺经济时代，资本追逐利润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生产不足，而不是销售问题。所以，生产居于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消费只是从属于生产的一个内在要素；也因此需要对消费进行节制，从而社会更多地倡导禁欲节俭的新教伦理。在丰裕社会，消费不足以成为制约资本增殖的主要因素，由此消费取代生产，成为社会生活的重心；相应地，倡导扩张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也取代了新教伦理，成为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的这种地位转换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资本主义文化的转变，正是资本的逻辑在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表现。

再次，消费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崛起，并不意味着消费者拥有了绝对的主权。恰恰相反，消费地位的不断上升，引起了资本对消费的引导和控制意识。资本运作的结果是，消费依然被纳入生产体系之中，但不是直接作为生产的一个内在要素，而是成为整个社会资本运转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所以，现代消费处于一种矛盾之中，看似个人的自我满足活动，其实已被纳入资本的文化控制之中。资本从20世纪之前对工人劳动的经济控制扩展到今天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进行文化控制，这代表了生产对消费的一种“新型”的支配。

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特定社会里往往会出现短缺与丰裕并存的现象。一方面，短缺在某些区域或某些人群中依然存在，但在另一些区域和阶层中，则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丰裕或过剩的特征。因此，同一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需要具体对待。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 约翰•史都瑞. 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 [M]．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2.

[3] 李文阁. 生活价值论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4] 高歌. 论哈耶克的市场机制理论 [J]．理论学刊，2005，(2).

[5] 厉以宁. 消费经济学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 吴奎罡等. 简明原意的西方经济学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7] [英] J.R.沙克尔顿等. 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8] [英] 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M]．刘精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9] [美]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M]．张峰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罗 苹

政 法 社会学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

——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任 一 周立群

[摘 要]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关键词] 商协会 治理 多元主义 合作主义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55-06

一、商协会参与治理的三个层次

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P23) 在日常生活中，各种交易或活动都要受到治理的协调，因此治理的作用领域和层次具有广泛性、多样性特征。商协会作为现代市场关系中的重要中介组织形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特殊地位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

1. 市场交易体系中的市场治理主体。

商协会组织是市场交易主体稳定彼此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提升其获取信息和抗风险能力、实施团体内有效规范和惩罚的组织载体。市场治理的核心是促进企业诚信行为，挖掘潜在获利机会。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中，完善的市场治理机制包括第一方治理（交易者自我执行的治理）、第二方治理（双边或多边声誉机制）和第三方治理（包括私人秩序与公共秩序的构建）。随着市场深化和交易域范围的逐步扩大，交易关系日益复杂，对虚假信息和欺骗者的识别也变得愈发困难，第一方治理和第二方治理惩罚机制的有效性随之受到限制，此时市场需要引入一个第三方来改变原有信息结构，使得诚实交易得以实施。

在法律诉讼成本相对高昂、欺骗所得大出诚实收益不多或者业内权威更具信息优势的场合，交易主体往往倾向于求助私人秩序；此外，如果一国法律体系不完备，也可能使得政府作为强制实施者的契约

* 本文为笔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市场治理研究与中介组织创新研究”（项目号：05JJD790086）的阶段性成果。笔者对商协会的研究先后调研了北京中关村民协、天津商会、天津台商会、温州商会等民间组织。

作者简介 任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周立群，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

保证失效，此时私人秩序的意义显得格外重要。商协会组织通过在成员间形成共同期望、有效披露或揭露欺骗者信息和实施内部惩罚，使得信守合约成为交易者自觉遵守的最优策略选择，进而实现对市场秩序的有效规范和治理。商协会组织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第三方私人治理主体，在规范行业过度竞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稳定交易契约、促成企业间合作和孕育诚实商业文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社会自治网络中的市场治理主体。

从市场治理的角度看，商协会组织是构建信任和互利的社会协调网络的组织载体。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公民对日常生活的自我管理和社会自组织能力的提升，它强调社会相对国家而言的独立性。即便在最专制的封建统治下，亲密的血缘关系集团也保有一些实际上的自治权利；在现代民主国家，自治权利被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社会自治水平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社会的利益分化体现为依行业和职业的不同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与传统“阶级”概念相比，处于同一行业或从事相同职业的人更容易找到共同利益，获得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在交往中形成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因此，在现代社会，商协会组织成为社会自组织网络中最主要的利益聚合载体，其在协调市场交易冲突、缓解社会利益矛盾、满足社会多元利益需求等方面发挥着治理主体的作用，为市场秩序的建立和社会自治能力提升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协会的发展和成熟是市场秩序完善和公民社会自组织能力提高的重要标志。

3. 国家公共决策中的国家治理主体。

从公共决策的角度看，商协会组织是社会实现利益表达并与政府共同决定国家公共事务的组织载体。国家治理的核心是国家重大公共事务决策由政府和社会团体依据一定的制度程序共同做出，它强调权力的双向运行和政府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随着政府作为发展代理者局限的暴露，社会团体参与公共决策的作用日渐凸显。20 世纪后期开始，各国掀起了一场由单中心“统治”向多中心“治理”民主转型的浪潮，各类非营利组织由此崛起并迅猛发展。在众多由血缘、语言、出生地、居住地、宗教、行业、职业等纽带组成的自治团体中，商协会组织凭借其在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人力、财力、物力上的资源优势，对政府决策施加着重要的影响。在美国，有实力的商协会组织通过院外活动竞争主导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在欧洲，以商协会、工会为主体的集中性全国谈判甚至在重大经济决策上取代了传统的正规议会。商协会组织在聚合社会分化利益、提高利益表达的概念化水平、增强社会团体内聚力量、提升与政府谈判能力等方面具备显著优势，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意识形态上，都成为公共决策控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国家治理主体。

二、国家治理层面的商协会体制特征

商协会参与国家治理在不同国度体现出巨大的体制差异。从发达国家的治理实践看，各国商协会体制模式大体可归结为两种：“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多元主义模式主张在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对权力进行多元配置，商协会组织通过政治市场上的多元竞争有效防止政府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合作主义模式主张对分化权力进行制度化的整合，强调通过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商协会的相互支持与合作达到社会相对均衡、有序和协调。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被德、法、日、韩等更多欧亚国家所采用。在两种体制模式下，商协会参与国家治理的依据、手段和表现形式都存在很大差异。以下笔者从几个方面对两种商协会体制模式的具体特征做一比较分析：

1. 法律地位与法律依据。

多元主义模式下，商协会组织的外部规范非常宽松，少有专门法律对其成立、组织形态、功能、运行和解散等加以明确规定。商协会完全是地位独立、行为自主、经费自理、自愿参加的组织。[2] 其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注册，不登记的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享受免税待遇，但仍然是受宪法结社权保护的自治性团体。

合作主义模式对商协会组织的法律规范比较严格。在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商协会有私法人和公法人之分。按行业组建的协会组织被赋予私法人地位，只要不违反法律，不受任何机构监督；按地区组建的地方工商会属于公法人，实行强制入会，并接受行政机关委托，享有间接行政管理权，手工业协会和农业协会由于地位特殊，也被归为公法人。在日本，有专门立法对商协会组织加以规范，地方商工会议所是依据《商工会议所法》成立的特别认可法人，各种进出口组合是按照国家保护性特别法组织起来的特殊法人。日本虽然在二战后改行自愿入会退会制度，但仍保留了一些强制的做法，如规定"特定工商业者"每年度到所在地商工会议所的"法定台账"上登记，并缴纳一定费用等。[3](P39)

2. 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

在内部组织体系和成员关系上，多元主义的商协会体系显得多而杂乱。组织只存在规模、名气和重要性等方面的差异，彼此之间地位平等，不具备严格上下级隶属关系。入会退会自由使得组织与会员的关系比较松散，活动随意，商协会协调成员内部利益分歧的能力有限，更热衷于钓鱼、高尔夫等浅层次的休闲联谊活动。合作主义模式下，商协会体制呈现明晰的塔层结构特征。为避免混乱和冲突，组织的总数往往受到限定，合法代表渠道只掌握在少数被批准的商协会组织手中，每个功能领域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联合会垄断该领域的代表地位，其它组织则按照所属行业或地区在以联合会为顶点的层级体系中找到合适位置。

在与政府关系上，多元主义集中体现为组织对政府的压力与对抗。商协会更多是作为正式体制外的院外集团向政府施加压力，对公共决策发挥影响的途径相对片面、分散和间接。其主要通过聘用院外活动分子向议员游说、公开制造舆论、威胁停止提供议会需要的合作等方式影响国会立法。通常他们与政府相互信赖，但当存在严重分歧时也会不遗余力地向政府施压以使政策满足自身需要。而合作主义的商协会组织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政府主动提供制度化、分层次和覆盖面广泛的沟通渠道，组织在立法、决策和执行中的地位和功能得到正式体制的认可，商协会代表往往在政府机构中占有常规的职位。政府直接赋予商协会组织在决策机构中的权威咨询权，政策出台之前必须征求商协会的意见，这种权利受到明确的法律保护。与此相应，组织在需求表达、领袖选择、制度支持等方面也受到政府的相对控制。[4](P71-72)

3. 成员利益与公共责任。

在多元主义看来，商协会组织的权力和合法性来源仅与其成员代表性有关，因此，组织只需关心其在成员中的代表地位，无需对公共利益承担责任。商协会的影响力主要靠在多元竞争中获得，与组织的社会包容性及行业代表性不直接相关。这使得商协会组织在行业或专业领域的代表性和覆盖面较低，联合会形式在各自领域的组织集中度也不高。对崇尚自愿性制度安排的多元主义而言，提供俱乐部物品[①]是商协会组织的首要目标，而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②]往往作为组织的副产品存在。

在合作主义模式下，商协会组织除代表成员利益之外，还被赋予了公共责任。商协会必须协调组织内部的意见分歧，更高层次的组织要对低层组织的利益进行整合，以保证最终利益表达能够实现成员中最广泛和迫切的利益需求。同时，商协会组织需要履行自我管制的义务，有责任限制其成员的过激行为。商协会对公共事务的协调和管制有正式法律授权作为支撑，其享有订立程序的地位，有权制定生产和安全标准，有权规定加入组织的成员资格。政府鼓励这种权力，以保证组织制定的标准在业内具有普遍效力。

4. 传统文化与价值观。

两种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差异，从根本上说是在实践与意识形态的交错运动中，历史长期演化的结

①指能够从技术上将消费限定在内部成员范围内的组织产品或服务。

②指能够使整个社会或组织所在行业、地区的非组织成员免费受益的集体行动。

果。在美国，独特的初始条件和历史演化进程使得对个人权利的极度尊重得以延续，在崇尚自由、包容冲突的意识形态下，国家没有走向分裂，反而实现了社会的高度自治与统一。政府中心理念虽然在特定时期被接受，但在整个历史中却是短暂和陪衬性的，在意识形态上从未获得高于社会的权威。极度的个人权利意识必然引致商协会组织应当反映成员合理愿望的坚定信念，进而，组织存在的合法性高度依赖于其与成员的一致，而不是反过来要求成员与它一致。反映在外部关系上，组织对政府的利益表达必然采取压力对抗的形式实现，任何可能形成组织垄断能力的政府活动都被认为是不正当的行为，因为人们相信，“机会均等”下的多元竞争才能导致公平的结果。

与美国相比，多数欧洲国家和亚洲后发展国家都不具备多元主义的有利起点，而只能在长期封建历史的基础上实现体制延续。在这些国家追求人权、民主的过程中，权力由政府向社会的松动是缓慢进行的，社会对政府权威中心的依赖已根深蒂固。不仅如此，对后发国家而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往往是实现赶超战略和强国之梦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这些国家，政府作为中立的权威力量被赋予整合社会分化利益的功能。与此相应的商协会体制安排，必然以组织间的谈判妥协和组织与政府间的协同合作为特征，它强调较少的组织数量、垄断性的组织代表地位以及较高的成员内聚程度。

三、“政—会”合作主义体制探索

作为两种社会与政府共同治理国家事务的制度框架，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各有利弊。前者的自愿性使得个体权利更被尊重，但组织的社会代表性较为欠缺；后者的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权利范围构成限制，但在组织对行业及社会整体的代表性上做得较好。两种模式在为后发转型国家提供借鉴的同时，也使其面临选择的难题。对后发转型国家而言，适当进行理性建构、缩短制度自发演化时间被历史证明是可取的，然而转型路径不能随意安排，必须限定在与历史演化逻辑相一致的范围内。我国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当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发展特点，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理性选择。

1. 确立“政—会合作主义”转型目标。

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表明，选择何种国家治理模式只能在特定国家的特殊情况和背景中得出。中国2000年的封建制度使得专制思想根深蒂固，公民社会几乎没有发育的土壤。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政体，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缺乏一个全国性的权威政权，曾使国家一度面临动乱与分裂。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动荡一样，历史再次证明，一个长期依赖中央集权维持发展和稳定的国度，在极度张扬个体权利的同时，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尊重他人权利的社会自治文化。残酷的现实重新唤起人们对权威的渴望和依赖，最终成就了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成为新中国唯一合法政权。然而，此后近30年的计划体制使政府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府权威必须以尊重个体基本权利为前提，否则只会重蹈专制主义的覆辙。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之后，中国人不再盲目地鼓吹绝对民主，也不再信奉绝对的政府权威，而是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由政府启动并主导的体制转轨和民主转型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也因此展现了良好的改革前景。

改革开放后民间组织虽然有了一定的发育空间，但仍极不成熟，公民的个人权利意识和民主、自治等制度架构都十分匮乏。历史文化传统和现行政治体制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商协会体制的走向。在现阶段中国，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的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来源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政—会）共同治理国家的理想模式（政—商共同治理）。

2. 政府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在合作主义模式下，政府可以培育甚至型塑公民社会。一方面，我国现阶段治理转型的特征体现为政府在体制变革的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社会权力的获得往往来自于政府的主动放权。这种结构变革路径使得政府在公共决策上的自主性和对社会团体的控制力较强。另一方面，共同治理的前提是相对成熟

的公民社会基础，其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治目标和活动上的自主性，而非仅仅是政府的附庸。因此，政府作为博弈的主要参与方和决策制定者，其自身定位直接影响着体制转轨的成效。在合作主义模式下，商协会组织并不完全独立于政府存在，也不是政府的内在组成部分，而是政府与分散个体之间的中间组织，其主要功能是对民间利益诉求加以集中、整合和传输，并承担协助政府政策下达和落实的职能。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依然保有一定的权威，否则难以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战略，但政府也不能代替商协会组织解决所有问题，否则仍是“统治”方式的延续。

政府和商协会组织都需要在转型中重新寻找自身的定位，在此过程中，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和社会自治权利回归、积极推进行政性行业协会的民间化改造、加大对民间商协会的培育和规范力度等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政府作用还体现在有意识地为转型目标服务，包括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构建稳定性、经常性和制度化沟通渠道，引导与合作主义相匹配的社团层级体系、支持合作治理模式的地区试点、在适当时机促进全面推广等。

3. 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法律法规的滞后，不仅制约着已有商协会组织功能的发挥，也阻碍了新兴组织的萌生和发育。尽快出台规范商协会活动的专门法律法规，对商协会的名称、性质、职能范围、权利和义务等加以明确规定，显得愈发迫切。立法过程应充分考虑商协会体制的目标模式，它关系到以什么样的法律体系与之配套。在合作主义模式下，商协会的法律规范大致有两种体系，一种是以德、法为代表的公法体系，另一种是以日、韩为代表的专门法体系。具有公法人地位的商会组织享有间接的行政管理权，从体制上看很像是政府机构的延伸。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商协会却能够维持独立运作，并代表企业一方利益向政府维权。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主体通常享有高度自治权，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和企业决策较少干预，这使得公法人制度在赋予商会行政管理职能的同时，不致使其服务宗旨脱离企业立场。而在日、韩等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强的国家，反而要以立法形式规定商协会的民间性质，以防止政府权力对组织独立性和亲企业性的侵蚀。我国商协会立法应更多借鉴日、韩的做法，在充分赋予商协会组织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通过制定专项法律法规明确组织的权利、义务与公共责任，使之更好地发挥“官民合作”的制度纽带作用。

在入退会自由的制度安排下，组织的成员吸引力和社会代表性主要依靠政策影响力来实现。法律必须保障商协会组织在公共决策中的权威咨询权。政策出台过程中应建立分层次的法定沟通渠道：政府在宏观层次同最高联合组织协商；在中观层次同行业或地方联合组织协商；在微观层次同基层商协会组织协商。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政策出台程序，应当依法追究责任。

4. 构建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制度化的沟通渠道。

合作主义的商协会组织体系以塔层结构为特征，以保证处于底端的意愿和声音能够逐层向上传递，同时为政策的下达和落实提供支撑。在我国，这样的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一方面，目前经贸等部委系统下的行业协会在接近政府体制和政治参与上有较为通畅的渠道，但它并不是真正的民间团体，不能独立代表工商业者和企业的需求；另一方面，民间自下而上组建的商协会能真正反映社会需求，却在政府认可和参政议政上存在障碍。对前者而言，首要任务是推进商协会组织民间化改革；对后者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类民间组织有序地纳入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

合作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作为支撑。在德国，政府机构中设有监督委员会，吸纳主要行业协会、工会的领导人参加，专门用来征询行业协会和工会代表的意见与建议；在日本，负责工业会登记的通产省为给政府与企业搭建沟通平台，成立了38个专门审议委员会，其中有1/3以上的成员为协会或企业领导人，委员会每月召开3-4次讨论会或论坛，共同探讨经济发展形势和对策。[5](P179) 这些经验的启示是，在政府部门中设立专门吸纳商协会意见的机构，并建立定期对话交流制度是必要的。笔者对北京中关村民协组织的调研发现政府与协会之间的良好互动合作是支撑该地区商协会

蓬勃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其中“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处”[①]的设立为中关村管委会培育园区商协会组织、吸纳商协会代表的意见搭建了制度平台，是政府主动提供与商协会之间稳定、经常性对话磋商机制的成功尝试。

5. 引导和鼓励“联合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

从克服“搭便车”的角度而言，规模越小的群体越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但就集体行动的成效而言，组织的谈判能力往往与成员数量成正比。因此，现实中的组织规模通常是在弱化搭便车行为和强化组织影响力之间权衡的结果。协会联合会形式正是为缓解这一矛盾创建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较小的单个组织规模有利于保证组织的成员凝聚力；另一方面，组织通过有机联合获得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从而提升其与外界谈判的能力。即便在多元主义体制下，各类商协会组织如果能够通过组建联合会而代表更广泛的公共利益，通常也会在参政议政中得到更多重视。在合作主义体制下，严格的塔层结构为商协会组织整合基层利益、参与政府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在北京中关村，协会联席会[②]的创立为政府与协会组织搭建了定期交流的平台。与传统联合会[③]相比，中关村联席会的发起单位均为市场型的商协会组织，其建立的基础完全是自愿和自发。这种自下而上的联合会形式在整合协会资源、扩大协会话语权、促进政会组织化沟通、建设性表达和协同性互动等方面作用显著，对全国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我国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充分吸收国内外成功经验，鼓励和引导区域性、行业性联合会的创建与发展，使之成为政府与分散商协会组织之间的制度连接纽带。

[参考文献]

[1] 全球治理委员会. 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 [M] .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2] 余晖. 行业组织管理体制的模式比较与选择 [N] . 中国经济时报，2005- 10- 11.

[3] 张德霖. 西方国家商会制度 [J] . 中国经贸导刊，2000，(7).

[4] 张静. 法团主义——及其与多元主义的主要分歧 [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 袁瑞军等. 美德日行业协会发展模式及其启示 [A] . 翟鸿祥主编. 行业协会发展理论与实践 [M]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雨 田

①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处简称服体处，2000 年成立，是北京市政府部门中独一无二的处室，专门负责培育和引导园区中介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参见任一等：《政府职能转换与“合作治理”新探索》、《协会在国家治理中的体制定闱与模式选择》，中关村协会组织发展联合调研组调研报告，2007 年 6 月版)

②中关村科技园区协会联席会，2003 年 9 月由 12 家协会发起成立，旨在增进各协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整合协会资源。现有成员 30 家，几乎园区内所有协会组织都已加入联席会。

③指原经贸委系统下的行政性行业协会联合会。该系统下的行业组织虽具备完备的层级体系，但能否实现利益向上传递，还取决于其民间化改革的成效。

马基雅维里喜剧《曼陀罗》的政治意蕴

谢惠媛

[摘 要] 马基雅维里以喜剧《曼陀罗》表达了原创性的政治构想。一方面，他刻画了理想君主明智审慎、精通谋术与善用宗教等形象；另一方面，他颠覆了传统政治伦理体系，揭露教会腐败恶行，并在此基础上传授其新理念。

[关键词] 马基雅维里 《曼陀罗》 君主 教会

〔中图分类号〕 D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61-04

马基雅维里与喜剧有着紧密关联，“马基雅维里是喜剧演员，喜剧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1](P32-57) 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罗马喜剧都与把戏或阴谋相关，而阴谋则成为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曼陀罗》① 曾被众多评论家称赞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好的喜剧之一。[1](P32-57) 这部剧作不仅为马基雅维里在艺术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而且也引起了人们对其政治意蕴的思考。《曼陀罗》是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艺术表现，其政治意蕴集中于两个方面：无武力的理想君主和佛罗伦萨的新秩序。

一、无武力的理想君主

在《曼陀罗》当中，马基雅维里展现了多种类型的君主国与君主形象。这既包括以尼西亚为暴君的暴政君主国，又包括以卡利马科为懦弱君主的世袭君主国。但这两种君主并非马基雅维里的理想君主。理想的潜在君主由李古缭来表现。李古缭并非喜剧的主人公，他只是一个善于“拉皮条”、“到处蹭饭”、“以被人耍弄为生”[2](P781) 且骗术极高的食客。然而，他与泰伦乌斯与普劳图斯等古罗马剧作家笔下爱耍小伎俩的普通食客不同，实质上，李古缭是马基雅维里推崇的非武装的先知与潜在的君主。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从平民跃升为君主有两种途径，一是依靠某种邪恶而卑鄙的方法，二是依靠同胞的帮助。[3](P39) 显然，李古缭主要利用第一种方法而获得君主之位。这种邪恶而卑鄙的方法在《曼陀罗》中集中体现为阴谋。简而言之，这个阴谋的目的是，让卡利马科在尼西亚的眼皮底下与卢克雷齐亚通奸。为了成功实施这一阴谋，李古缭让教士提莫窦（Frate Timoteo）与卢克雷齐亚之母说服卢克雷齐亚服药，并与陌生人同房一夜。可以说，这是一场王权与教权的合谋。与公开战争相比，阴谋对君主很危险，“为此而失去性命和国家的君主更多”。[4](P322) 遭遇身败名裂、甚或失去生命的阴谋者比比皆是，而获得成功的阴谋则寥寥无几。但是，《曼陀罗》的阴谋便是成功的一例，而它的成功则要归功于李古缭。

正是通过对阴谋的设计、施行及其后果的展现，李古缭的君主形象跃然纸上。马基雅维里认为，由于阴谋必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谋者来实施，因此，策划者必须具备卓越的能力与德行（virtù）——了解敌人、缜密筹划、正确挑选与指挥其他同谋者、勇于承受失败以及随机应变等。李古缭的幽默风趣

作者简介 谢惠媛，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北京，100084）。

①在这部戏剧中，“曼陀罗”（Mandragola）是指一种治疗不孕之症的药。

赢得了尼西亚的欢心，他是所有合谋者当中最熟悉其对手的人。故而，李古缭能抓住尼西亚求子心切的想法，让他自愿规劝妻子与陌生男子同房，并亲自上演了一幕“情君入瓮”——把卡利马科假扮的陌生男子送到妻子床上。与此同时，作为潜在君主的李古缭精通谋术，懂得如何选择“良臣”。李古缭挑选索斯塔拉塔（Sostrata）与教士提莫窦充当诱使卢克雷齐亚通奸的合谋者是因为：其一，身为卢克雷齐亚母亲的索斯塔拉塔可打着亲情的旗号来说服女儿，而且她是一个不知良心为何物的功利主义者；其二，卢克雷齐亚笃信上帝，由能被金钱诱惑而欺骗他人的宗教伪君子提莫窦来担任说客无疑也相当合适。而利用两者蔑视道德与求取私利的心态，李古缭拉拢他们，使之臣服于己，忠心耿耿地充当傀儡。

由于参与阴谋者人数众多，容易走漏风声，因此，“一个人能在众人中间长期保密，不啻是一项奇迹”。[4](P326) 在整个阴谋逐步推进的过程中，李古缭懂得选取恰当的时机向特定的执行者透露相关的计划。例如，当卡利马科心急如焚地追问那个比在澡堂偷见卢克雷齐亚更为绝妙的计谋时，李古缭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到时你就知道了”[2](P785) 来搪塞之。又如，在尼西亚向卡利马科讨教治疗不孕的药方的关键时刻，李古缭才说出了配制药方的计谋。更令人佩服的是，当李古缭并不确信王权与教权能否结为盟友时，他以极为巧妙的方式来考验提莫窦是否同意与他狼狈为奸：他先问提莫窦能否帮忙说服一位未婚先孕的少女喝药堕胎，以此试探教士会否为金钱而干违背神旨的坏事；当提莫窦表示能为他办妥任何事情以后，他才把通奸一计告诉教士。这些举措不仅减少了同谋者泄密与告密的可能性，而且使尼西亚、卡利马科与提莫窦等人信任他、依赖他与听命于他。至此，一个较为稳固的利益联盟已然建立。

而李古缭之所以把提莫窦纳入利益联盟是因为，他看清了教士伪善的本性，同时也认识到王权可利用教权达到夺取尼西亚“暴君”王位的目的。教权与王权之间存在张力，它们既是争夺世俗权力的对手，同时也能在适当的时候为各自的目的结成同盟。对神明的敬畏既有利于维持臣民的良善，又有助于君王整饬城邦、建功立业与平息骚乱。① 在《曼陀罗》中，李古缭把这一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与提莫窦的联合着实给尼西亚扣了一顶绿帽子，王权与教权的合谋把在位的“暴君”拉下了王位。

除了具备明智的德行与善于利用宗教以外，李古缭还体现了君主要远离女人的特征。一般而言，色性之徒都会垂涎于美丽温柔的卢克雷齐亚。但是，李古缭在剧中却是个例外。Sumberg 认为，这是李古缭博取卡利马科信任的重要因素，而且他在表面上也不是卡利马科的政治对手。这有一定道理。而如果把李古缭看作是潜在君主的话，那么，纵情色欲就犯了马基雅维里的忌讳。在政治著作里，马基雅维里时常告诫君主不要染指臣民的财产（包括女人）。这是一语三关：一是臣民嗜财如己；二是女人祸国；三是命运是女人，必须勇敢地制服她。在政治史中，女人常常用于影射政治腐败、迷惑对手、战胜敌人、缓和外交或表征胜方荣誉。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把女人排除在公民之外，如柏拉图视妇女为政治上攻击雅典腐败的标识，[5] 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妇女专横放肆，是毁掉君权的重要原因。[6](P166-167,200-201) 虽然马基雅维里没有突出传统意义上男女间的自然差别，但他承认，女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政治危险——她们造成共和国的公民产生内部冲突与政治分化，最后削弱公民之间的联盟。而老女人在政治上更具有威胁性，她们能控制女儿们与他人接触的方式，以此获得满足野心的权力。《曼陀罗》中的索斯塔拉塔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平民跃升为君主的前提条件是具备能力或运气，但是“最不依赖命运的人最能使自己的地位稳固”。[3](P24) 命运是垂青于年轻人的女子，但征服她需要勇气。在卡利马科一筹莫展、犹豫不决时，李古缭就让他鼓足勇气征服卢克雷齐亚，② 让他大胆地冲击她、压倒她、制服她。从李古缭的言行可以看出，他对女人的认识与马基雅维里的理想君主的形象相当吻合。

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Flaumenhaft、Sumberg 与 Cochrane 等评论家把卡利马科看作是“审慎的君

①参见《论李维》第 1 卷第 11、13、14、15 章。

②Behuniak-Long 认为，在马基雅维里的作品中，不同的女性分别代表了命运、野心、机遇、忘恩负义和佛罗伦萨。而他选取了所有女性角色中“最具魅力”的卢克雷齐亚作为阐释命运的隐喻。Susan Behuniak-Long, The Significance of Lucrezia in Machiavelli's "La Mandragola",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51,No.2 (Spring, 1989), 第 270-271 页。

主”，[①]而把李古缭看作是“士尉”的观点缺乏说服力。表面上，卡利马科具备了亚里士多德所要求的外在因素，如出身好、财富多、外表好、年轻且有激情、善于投资，而且他是戏剧的主角、最直接的获利者。但是，与李古缭相比，他是染指他人妻子、相信奇迹、重用雇佣军（李古缭），却对阴谋一窍不通、不具备内在政治德行的顺从者。他拥有的只是情欲，相信世事皆由命运和上帝安排与支配。即便他是某一类型的君主，其王位也不会持久稳固，这是因为，“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3](P119) 从他信任李古缭、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李古缭的那一刻起，他们之间的地位已被悄然置换。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李古缭这位手无寸铁的“潜在君主”掌握与支配着卡利马科的命运，同时不动一刀一枪便卸下了尼西亚的装甲。他不具备武力，却具备支配武力的能力。李古缭的德行战胜了武力，以至于当大家心领神会地庆祝阴谋得逞时，尼西亚这位时刻佩戴小刀的“暴君”仍然蒙在鼓里，而且主动把自己的王国拱手相让——把自家的钥匙交给卡利马科与李古缭。

表面上，李古缭“依靠金钱或他人惠赐而得到国家”，[3](P29) 但实际上，“他做国王，除需要有领土之外，本身无所不备”。[3](P28) 由于他具备了先知的能力与德行，因此，整个阴谋的每一步总与他所料想的丝毫不差。这个狮子的形象被弱化而狐狸的形象被凸现出来的君主是最根本的胜利者。

二、佛罗伦萨的新秩序

在李古缭成功施行阴谋的同时，马基雅维里也实现了撰写这部喜剧的目的。他不仅赢得了观众的笑声，也向世人宣扬了原创性的政治主张——佛罗伦萨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是通过对传统秩序的背离得以确立的，这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道德标准的颠覆，另一方面表现为对教士腐败行为的揭露。

在《曼陀罗》的结尾，马基雅维里并没有像传统戏剧那样扬善抑恶，相反，他笔下的合谋者皆大欢喜地围聚在教堂相互祝贺，这种新异的结局引导了那些明智的观众反思传统道德，并仔细领会他的新主张。奖励美善与惩治罪恶是传统喜剧的特征。传统喜剧往往通过恶者遭遇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掉入自己挖的坑，骗子受骗——来表明剧作家善的价值立场。但《曼陀罗》的真正骗子却没有上当受骗。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喜剧只是表现思想的形式，阴谋可以导人向善；同样，阴谋也可以导人向恶。同是被美色诱惑的阴谋者，卡利马科的结局与《克蕾齐娅》中尼各马可的下场却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曼陀罗》中，合谋者最终都获得了各自想要的。这种结局安排与马基雅维里对立法者的告诫截然相反。在《论李维》中，他提醒统治者，人是很容易腐化的，因此君主应当用心遏阻人的癖好，让他们断了作恶却不受罚的念头。[4](P156) 然而，这一想法似乎与《曼陀罗》的结局相矛盾。正是通过明显的自相矛盾，马基雅维里向人们发出暗示：要注意颠覆性结局所隐含的新构想。

亚里士多德认为，并非所有实践与感情都适宜用“中度”来衡量；有些行为或感情的错误并不取决于是否与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去做，而是因为行为或感情本身就是恶的。而通奸就是其中一项自身为恶的行为。[7](P148,158) 但马基雅维里笔下的卢克雷齐亚不仅经游说后同意通奸，而且以上帝的名义赋予这种行为以正当性。在利益权衡的唆使下，这个起初最具有基督教德行的虔诚教徒逐步接纳了马基雅维里式的德行。她已冲破了传统伦理的底线，却仍然维持着道貌岸然的外表。而其他合谋者更是明目张胆地僭越传统道德的界限。当卢克雷齐亚的母亲得悉通奸能使女儿怀孕时，她的本能反应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无法道德地怀孕，那么，选择这种行径也不会受到良心谴责。令尼西亚畏惧的同样不是良心的谴责，而是作奸犯科后受到法律的制裁；令卡利马科不安的是无法成功通奸，情欲以压倒性的力量战胜了良心。如果说，良心在尼西亚与卡利马科那里不堪一击，那么，在李古缭那里，良心根本不值一提。而提莫窦则把良心看作是欺骗与愚弄他者而获利的幌子。此外，他还谈到良心必须遵循的原则：当好处是确定的、而坏处不确定时，绝不应因为害怕恶而放弃善。此时，马基雅维里不仅消解

---

①参见 Flaumenhaft. Comic Remedy: Machiavelli's Mandragola; Sumberg. La Mandragola: An Interpretation; Eric W. Cochrane. Machiavelli: 1940- 1960.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33, No. 2. (Jun., 1961).

了古典哲学中绝对的恶，否定了纯粹的善，而且也模糊了善与恶的界线，把良心看作是从属于利益的工具。这种主张在政治上表现为，政治领域不预设形而上的绝对善理念，政治行为并不必然受传统道德维度的束缚，政治手段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只取决于政治目的本身。但是，这种新主张并没有否定道德对政治的影响，也没有赋予政治完全独立的自主性。由于传统道德观念仍然发挥其社会作用，而人却是忘恩负义、趋利避害的，因此，这种内在矛盾促成了欺骗与伪善。

对道德的蔑视、对良心的质疑、对阴谋合理性的确认、对合谋者的纵容，这些都让观众对教士的品行甚至基督教的神圣性产生了质疑。《曼陀罗》中的角色或者原本就不相信基督教，或者已由虔诚的基督徒蜕变为异教徒：卡利马科与李古缭几乎从不提及基督教；尼西亚已有十多年没作告解；提莫窦利用上帝名义谋求私利；卢克雷齐亚则由一开始坚称即便世上只剩她一个女人、人类要由她复兴，她都不愿意接受通奸行径的基督徒，而变为主动通奸的异教徒。教士的伪善与教徒的蜕变削弱了宗教的神圣性与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通过反映基督教导致社会腐化、人民懦弱的社会现状，马基雅维里试图建立一种有别于彼岸世界的现实信仰。在 1521 年 5 月 17、18 日写给圭奇阿迪尼的两封信中，马基雅维里写道，他一直努力要为佛罗伦萨构筑教士的新形象。这种新形象有别于佛罗伦萨公民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教士应该教导公民通向地狱之路，他比 Ponzo 更疯狂、比 Fra Girolamo 更狡猾、比 Frate Alberto 更虚伪。“我相信，真正通往天堂的路就是知道如何通往地狱，从而避免这条地狱之路。此外，我要让人们看到披着宗教外衣的人是如何掩饰自己的罪恶的。”[2](P972) 这种对教士新形象的构想早已在《曼陀罗》中成型。而这两封信的特别之处也在于，除了以“你忠实的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落款以外，还添加了“驻方济会大使”（17 日）与“佛罗伦萨驻方济会大使”（18 日）的名号。[2](P971-975) 可见，马基雅维里一直致力于揭露教会的真实面目，让人们在看清真相后从彼岸世界回到此岸世界，相信人的力量，关注尘世事务，追求世俗荣耀。如想获得世俗荣耀与改变佛罗伦萨女人气的状况，就要征服命运——“面对命运；摆脱困境，如果不能摆脱它，那就像男人一样打败他；别气馁；不要像女人那样成为缩头乌龟。”[2](P805)

通过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讽刺以及对教会教士腐败的揭露，马基雅维里引导观众反思自身遵循的基督教道德，并使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发生动摇。而《曼陀罗》的结局不仅消解了传统政治哲学绝对善的理念，模糊了善恶的界限，削弱了宗教的理想化与神圣性，而且诱导观众怀疑道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重新确立一种崇尚力量与自由、追逐现实荣耀、征服现世命运的精神，从而恢复古罗马的辉煌。

《曼陀罗》以轻佻戏谑的形式成功地表达了严肃凝重的原创性思想。正是通过喜剧的方式、配角的表现与独特的结局，马基雅维里刻画了无武力君主的形象，表达了与传统社会秩序相异的新秩序与新观念。而这种以诙谐轻飘的风格表现严肃凝重的政治思想的手法，不仅传播了影响深远的原创性思想，而且给后世留下了相当大的解读空间。

[参考文献]

[1] Hullium, Mark. Machiavelli's “Mandragola”: A Day and a Night in the Life of a Citizen [J] .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0, No. 1 (Jan. 1978).

[2] Gilbert, Allan. Machiavelli: 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Vol.2) [M]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5.

[3] [意] 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 君主论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 [意] 马基雅维里著，冯克利译. 论李维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 Saxonhouse, Arlene. Women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M] . New York: Praeger, 1985.

[6]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等译. 政治学 [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 尼各马可伦理学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责任编辑：观 澜

和谐社会视域中效率与公平的制度伦理分析

曾秀兰

[摘 要] 制度伦理，简单讲就是指制度的合理性，即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认识与评判。从制度伦理的维度分析，效率是和谐社会充满活力的制度安排所必需的合道德性要求，公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价值目标。

[关键词] 和谐社会 效率 公平 制度伦理

〔中图分类号〕 C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65-04

一部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历史。一部人类文化史，可以说是人类追求效率和公平的思想史。[1](P12) 多年来，效率与公平一直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重要论题。对效率和公平问题，可从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进行讨论。本文从制度伦理视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效率：和谐社会充满活力的制度安排所必需的合道德性要求

效率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一般来说，效率是指用多少活动实现多少目的的比例。效率既可指经济效率，也可指制度效率。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讲，就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资源使用得当、配置得当，有限的资源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这就是高效率；反之则是低效率。制度效率是制度经济学家诺思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提出的。诺思认为，“制度效率是指在一种约束机制下，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产出的增加，而无效率则指参与者的最大行为将不能导致产出的增长”。[2](P12) 本文中的效率侧重指制度效率。制度是通过权利与义务来规范主体行为和调整主体间关系的规则体系。[3](P10) 制度的构成从纵向来看，可分为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基本制度是根本性的制度，具体制度可称之为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可以说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化。[3](P12) 制度伦理，简单讲就是指制度的合理性，即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认识与评判。[3](P25) 制度伦理的一项重要功能和作用是：通过对制度的诘问来制约不合理的制度，优化制度的选择和安排，从而推动效率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类型的社会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本身就蕴含了其道德合理性。但这种制度是否比其他制度更优越，一个重要前提是看这种制度能否比其他制度带来更高的效率。判断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合法与否或好坏如何的第一标准是经济效率。如果一种制度或体制安排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即既无经济合理性，也无伦理正当性，因而它就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有害的。毛泽东曾指出，如果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那么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4](P296)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与否不能仅从理论

作者简介 曾秀兰，仲恺农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225）。

上推导，而要根据具体的实践来判定。优越的制度首先是一种高效率的制度，因而是合道德性的制度。一种低效率的制度是不道德的制度，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我国传统体制最大的缺陷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低下，可供社会分配的物质十分贫乏，造成物质生活的短缺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这是缺乏道德合理性的经济体制。正是基于对传统体制的反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 其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体现了效率原则。在邓小平看来，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6](P312) 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不是体现在制度形式本身，而是看这种制度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全体人民带来福利，能否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必须依赖于社会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效率才是社会主义制度道德合理性的首要基础。效率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性，这也是这一制度合道德性的必然要求。

和谐社会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7]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使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的高效率，效率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物质基础。只有建立在高效率的基础上，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社会的和谐。而和谐社会的活力和效率从何而来？这主要来自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即是说，一定社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要能带来高效率，这种制度效率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能够提供一组有关权利、责任、利益的规则，为人们制定一套行为的规范，为一切创造性活动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大的空间，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并让生产、交换和消费获得帕累托最优的效率。没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会使其失去合理性和道德性。可以说，效率是和谐社会充满活力的制度安排所必需的合道德性要求。

如何优化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加快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制度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在诺思看来，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向人们提供一个与日常生活相互作用的稳定结构，提供激励与约束，来减少因人的行为及环境复杂性引起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他认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当前主要通过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及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来推动社会发展。尤其是要深化市场化改革，为社会充满活力提供制度支撑。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深刻的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制度变迁或体制创新的过程。总之，通过优化制度安排，使社会更有活力和效率。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中建立能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社会制度规范，为激发社会活力，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新的体制保障。

二、公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

公平简单说就是公正、平等。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是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如果说判断社会制度和体制的合法与否或好坏如何的第一标准是制度效率，那么另一判断标准就是公平正义。"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倾刻之间土崩瓦解。"[8](P106) 在人类思想史上，"公平"、"正义"的话题备受关注。在柏拉图看来，正义是人的天性和行为，他认为正义是天性忠厚，天真单纯，并将正义作为构建理想国的准则，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就个人而言，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9](P32、154-155)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在本性上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是非曲直，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10](P7-9) 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把正义看作是德性之首，认为正义的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正义的也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罗尔斯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以正义作为其道德基础。他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1](P3) 即是说，正义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中轴和核心，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逾越正义的要求。罗尔斯在其《正义论》

和《政治自由主义》两部代表作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思想是，对于一个值得人们追求的现代民主社会来说，效率、公平和稳定（秩序）乃是三个既相关联，又具有同等意义的价值目标。

公平正义是人们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制度诉求。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既要体现效率，又要体现公平。甚至，公平原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还先于效率原则。“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正义原则是先于对效率的考虑的，因此，大致来说，代表正义的分配的内部点一般要比代表不正义分配的效率点更可取。”[11](P69) 如果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失去了公平正义，那么，这一制度就将减少甚至失去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过“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那就是：“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10](P210) 对社会主义的公平问题，邓小平一直认为要通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来解决，他强调即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效率问题较突出，以致一度将制度的公平性由人类宠爱的公主嬗变为经济的侍女，仅仅成为效率的手段，导致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公民权利与义务分配的不对称等各种公平失缺现象。导致这些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对权利义务分配曾一度缺乏其应有的公正性。实践证明，没有效率不会带来真正的公平，同样没有公平也无法维系持久的效率。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所以，必须把公平正义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维，而且“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12] 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需要在实践中切实把公平正义确立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

首先，要建立公民权利与义务公正分配的制度机制，对利益进行调整。通过利益调整，使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的“洋葱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转变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如果利益调整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即由一部分人利益的改善引起群体利益的改善，而且任何人的利益都没有受损，此时的社会将是平衡和谐的。因为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达成和谐稳定，要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对其赖以生活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等等的认同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存在，总应该尽可能地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这里，中产阶级就比任何其他阶级（部分）较适合于这种组成了——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能比较稳定——所以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10](P245) “橄榄型”结构是目前国际上最理想的社会结构，这个阶层结构能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并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其次，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公民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在制度伦理中，人不再有等级、身份之分，都是无可争辩的平等的主体，人的价值追求、人性需要的满足、人的自由而平等的发展，成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13] 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没有一个正义的制度设计。反思我们社会中的诸种矛盾，根源往往都在制度。制度公正是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一个社会，当它不仅被设计得旨在推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开的正义观管理时，它就是组织良好的社会。”[11](P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赖于公平这一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

三、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价值目标

效率和公平作为制度诉求的基本价值，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阿瑟•奥肯认为平等和效率都是重要的，在不同的领域中，两种价值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14](P86) 效率与公平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效率是公平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公平是效率的根本保证。从效率对公平的作用看，其一，效率是推动公平发展的动力。其二，效率为公平提供物质基础，使一定的公平形式得以维持。其三，效率是衡量公平的尺度。从公平对效率的反作用看，要达到持久的效率，就要建立公平的社会制度。因为效率的高低一方面是看物质资源能否得到有效配置，但它更取决于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否得到发挥。人的行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效率的源泉。人的积极性从何而来，就其合法性和持久性而言，只能来自于社会的公平机制。社会公平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一个公平的

社会应该按照贡献分配权利，按照权利承担义务。每个人的贡献与获得越相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就越高，从而促进社会总效率的提高。所以，没有公平的效率只能是超经济强制下的效率，这种效率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稳定支柱。任何不公平、不正当的效率都是不能长久维持的，也是一些合法政府所不允许的。要获得效率，惟一能达到持久效果的途径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绝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由此看来，效率和公平是制度安排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两个基本维度。

和谐社会既需要活力、效率，又需要公平正义。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问题。正如一辆行进中的机车，效率原则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发动机；公平原则是社会运行的平衡器。没有效率这一发动机，社会经济就难以快速发展。但如果一辆机车没有平衡器，没有变速和导向系统，动力系统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一旦制衡系统失灵，动力系统越完善，就越可能出现灾难。社会要快速、平稳、和谐发展，既要有效率这一发动机，又要有公平这一平衡器。由此，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价值目标，也是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应把握的基本原则。但是，不同时期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又有所侧重。究竟侧重哪一方，要从不同时期的现实社会矛盾出发。改革开放之初，平均主义严重，效率问题突出，所以我们集中力量解决效率问题，把“蛋糕”做大，主要办法是拉开收入差距，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而当今，利益差距较大，公平问题凸现，所以要集中力量解决公平问题，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合理地分切“蛋糕”。主要办法是改革税收制度、合理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等，使利益差距保持在合理并可以承受的限度内。因此，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效率与公平应该是在动态中实现平衡。

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它们之间既充满了张力，但又辩证统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效率与公平统一于人对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自由、平等、效率和公平都作为制度的基本价值，但效率和公平是制度的工具性价值，而自由和平等是属于制度的目的性价值，因为自由和平等是主体的人的存在和发展状态，它们是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主体自身在追求的价值，是主体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价值。[3](P155) 作为制度工具性价值的效率和公平是自由和平等实现的基础和保障，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自由和平等的相互关系。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理想价值，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目标。

[参考文献]

[1] 杨建文，权衡，胡晓鹏. 经济伦理新探索——分配伦理 [M]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2] 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M] .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

[3] 施惠玲. 制度伦理研究论纲 [M]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Z] . http://news.sina.com.cn/c/2006 - 10 - 18/125711271474.shtml.

[8] 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 道德情操论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9] 柏拉图. 理想国 [M] . 郭斌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M] .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1] 罗尔斯. 正义论 [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2]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N] . 人民日报，2007- 10- 15.

[13] 杨灿明，胡洪曙，施惠玲. 农民国民待遇与制度伦理分析 [J]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5).

[14] 阿瑟•奥肯. 平等与效率 [M]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杨向艳

转型期我国社会多元利益冲突与政府的角色定位

——以广州、珠海市城中村改造的实践为例 *

郭 臻

[摘 要] 本文以珠三角的广州市和珠海市的城中村改造实践为例，分析了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格局及利益关系的协调，认为城中村改造的关键问题是各方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政府在改造中必须切实履行好利益协调责任，并定位好自己的角色。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导向作用，通过有效的政策调动各种力量特别是村民、村集体和开发商参与改造的积极性。同时，政府应当确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利益协调定位，注重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利益协调渠道的构建，突出其利益协调者的角色。本文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协调转型时期的社会多元利益冲突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

[关键词] 城中村改造 利益协调 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 D6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69-05

伴随着城市治理的兴起，内涵式城市化被提到议事日程，对人居环境较差的城中村改造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一环。由于城中村长期积淀形成的多元利益结构刚性，改造势必会打破或重组政府、村民、集体和开发商间的利益格局。大量研究表明，城中村的形成，政府难咎其职，不少城市之所以城中村大量形成，与政府的管理失当不无关系。在当代中国仍处于政府控制型社会阶段的特定情势下，要改造好城中村，政府在协调好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及多元利益协调中的角色定位十分重要。

广州市和珠海市在珠三角城中村改造实践中颇具典型性。珠三角是中国较早开始伴随着农村工业化而快速农村城市化的地区。与长三角、环渤海城市群散见的低密度、低容积率、较少违法建设、较少集体资产的城中村不同，以广州市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星罗棋布的是高密度、大规模、高容积的建筑，绝大多数属违章建造且集体资产殷实的“超级城中村”。这决定了珠三角城中村的治理与改造，相比其他区域显得更为困难与复杂。广州市和珠海市两地城中村状况不尽相同，前者的城中村问题要比后者严重，改造的难度大。虽然两者都位于珠三角地区，同属广东省管辖，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城中村形成的历史渊源和历史时期大致相同，但政府在改造中运用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工具，改造的效果也不一样。政府在改造中的利益协调角色定位及其政策实施效果值得实证研究。

一、广州、珠海城中村的改造实践

广州市是广东省的中心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速度很快。由于城市规划跟不上城市的快速扩张等原因，大量城区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城市建设用地将其包围，城中村现象较为严重。据统计，全市共有 138 个城中村。“广州的城中村现象在一定的侧面上典型地反映、浓缩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城中村现象的内在联系”。[1](P2) 年轻的珠海市共有 26 个城中村需要改造，均位于香洲区。总占地面积约 340 万平方米，需动迁人口近 20 万。珠海市在珠三角地区率先以优惠的政策鼓励房地产开发商介入城中村改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规划的特别委托项目《广东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思路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03/04T02）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郭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广东 广州，510275）。

(一) 城中村改造的政策范例

广州市在城中村改造中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村镇建设步伐，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若干意见》(穗〔2000〕17号)、《广州市关于城中村改制工作的若干意见》(穗办〔2002〕17号)等政策性文件，并坚持以下改造原则：首先是不允许房地产开发商参与。政府认为开发商参与改造城中村，意味着要提高容积率，开发商把旧城区的多层旧房变成了高层新房，以致旧城区人口众多，交通拥挤。其次是一村一策，即由各村自行设计改造方案，然后提交相关职能部门逐个逐级审批。再次是政府有限度支持。本着"政府不给钱村民，也不挣村民的钱"的基本理念，通过优惠政策来进行支持。最后是村集体经济和村民个人出资为主。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广州市城中村改造的筹资方式主要是由区、镇、村和村民以及社会共同融资筹集。之所以采取这种筹资方式，政府认为，城中村改造后，主要受益者是村民本身。因此，村民对自己居住地的改造本身也应负有责任。而珠海市改造城中村则是通过出台《珠海市香洲区改造城中旧村建设文明社区配套政策实施办法》、《关于配合城中旧村改建盘活空置商品房的鼓励办法》等政策，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推动，市场运作"的理念，用政策妥善推动改造：一是制定统一的安置、搬迁补偿标准(如按1∶1.1或者1∶1.2补偿①)地价优惠(如"拆一减二免三"②)由政府监督开发商执行，保障被拆迁改造的村民的切身利益；二是规定可采取货币、住宅多种形式安置，由被拆迁户与开发商协商；三是鼓励被拆迁户和开发商租、购空置商品房进行安置，并给予适当奖励。其核心是依靠房地产商实行市场化运作，所有城中村改造项目，全部实行公开招标制。改造一直坚持六大原则："规划先行原则；一村一个拆迁方案，一区一个规划的原则；社区新建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政府决定，决策推动，市场运作原则；继承和发扬具有岭南特色的传统文化的原则。"

(二) 城中村改造的成效和困境

广州的绝大部分城中村改造至今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改造工程量大，改造需耗费大量资金，每个村需动用的改造资金都高达几十亿元，村集体、村民叫苦无法筹集如此庞大的改造资金，而政府又禁止外部市场资源的进入，加上政府本身扶持资源不足，改造资金无法落实，因而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城中村改造几乎陷入僵局。迄今为止，除了在撤村改制及新近推进的猎德村改造有起色外，其它137条城中村改造无法起动。而珠海市计划改造的城中村目前已经大部分完成，成为新城市社区。尽管珠海市的城中村改造政策能兼顾改造中的多方利益，但利益冲突的矛盾同样存在，主要集中在改造中的利益补偿谈判。改造中个别村民、村集体向开发商漫天要价或不履行协议，从而拖延了改造进度。开发商不得不求助于政府进行利益协调，但仍有不少个案协调不成，最终诉请法律途径仲裁或诉讼解决。这些反映了村民、村集体在城中村改造中"生存理性"和"发展理性"支配下的弱者反抗，在合法不合理与合理不合法中游刃有余，这成了珠海市政府始料未及的利益协调困境。

二、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关系格局分析

广州、珠海两市城中村改造实践表明，城中村改造存在着四方利益相关者主体：政府、村民、村集体和开发商。各利益主体间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其它各利益主体之间互为制衡的利益场域。一是政府与村民间的关系。政府以社会多元利益(包括社会公共利益、政府自身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代表的身份来推动城中村改造。解决改造前后房地产产权确认和补偿问题，是处理政府和村民之间关系的主要内容。通过政策工具防止出现改造烂尾及村民无法回迁等问题，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二是政府与村集体间的利益关系。城中村的村集体与一般的村委会不同，在行政的隶属关系上它是区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在经济上，又是一种"变异的新村社共同体"。[1](P6) 它有自己的经济利益渗透其中，有自己的村办公司和自身的大量物业，因而有自身利益的保护需求。但它又是政府的得力助手，包括改造的发动和村民的组织动员都离不开村集体的协作配合。三是政府与开发商间的关系。政府在确保城市发展规划要求的前提下，兼顾开发商的利益，确定合适的开发强度，分担合理的市政配套设施。同时还要考虑如何采取地价优惠或补贴的方式，给开发商适当让利。因此，让利幅度的大小就成为双方能否开展合作的前提。四是村民与村集体间的关系。虽然两者间总体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村族群关系复杂、综合素质不高等原因，村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掌握在他们的代言人——村集体手中，两者间往往村集体处于强势主导地位。村集体在改造中既要保护好村民的切身利益和自身利益，又

①珠海市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采取了保证村民利益的回迁补偿政策：拆迁面积和补偿面积视旧房建成年份按1∶1.1或1∶1.2计算，即村民如拥有100平方米旧房，拆迁后可获得110平方米或120平方米的新房；城中村村民的回迁房还可免收土地配套费、人防费、消防费等，并可立即进入市场流通。

②"拆一减二免三"，即根据具体项目和地点的不同，房地产商每拆一平方米的旧村，可免交两平方米或三平方米的地价，并在报建等方面给予优惠。珠海市政府为此减少40-50亿元的地价收入。

要配合好上级政府开展工作。村集体在改造中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五是村民与开发商间的关系。两者间主要是拆迁安置补偿问题，主要考虑开发商以何种方式、标准对村民进行安置补偿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在开发商与村民之间，开发商是强势力量，而村民相对弱势。所以政府会扶持村民，而限制开发商。另外一种情况下，政府也要考虑开发商利益，因为城中村改造需要开发商资金来推动。因此，政府在改造中的角色定位，将直接决定着开发商与村民的关系。六是村集体与开发商间的关系。开发商获得城中村改造权后，同样离不开村集体的支持和配合。由于村集体的特殊角色，开发商必须得到村集体的支持，这是开发商成功改造的重要保障。

由上分析可见，城中村改造的真正难点就是如何协调好改造中的多重利益关系。政府在政治理性约束下，追求的目标是多元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公共利益与维护村民、村集体的既得利益及开发商介入的社会平均收益，可依赖的资源是其掌控的公共权力和政策手段，采取组织化动员的策略来动员相关利益方参与改造。城中村的最终改造方案，实际上是政府、开发商、村集体和村民这四方利益平衡的合约安排。城中村改造的实质是通过解决产权、规划、地价及拆迁补偿安置四方面问题来平衡政府、村民、村集体与开发商四者间的利益关系。

三、两地改造实践的思考

珠海市改造城中村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发挥了政府“掌舵者”的功能，同时发挥各“划桨”主体的能动性，尤其是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器的作用，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推动和市场运作”，适时进行了政府管理创新和政策手段创新，实现了相关利益方的“多赢”。广州市不允许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一方面，开发商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建设主体力量之一，不准其介入，使广州市错过了城中村改造的最佳时机。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村民的补偿期望值越来越高，改造的难度也越大。而排斥开发商进入，等于失去了市场资金来源。另一方面，改造政策首先假设村民是城中村改造的受益者，而忽略了政府也是其中的得益者。村民和村集体在城中村转制和改造过程中预期收益不明朗，利益设障面临一定的风险，将村民、村集体定位为城中村改造中的“受益者”，不易得到村集体和村民的理解和认同。由此可见，以下几条利益协调原则是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需要认真把握的。

1. 历史理性和现实理性互为坚持。城中村的建设规模已经非常庞大，造成的问题非常广泛，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城市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牵涉的利益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如果说在城市化初期，城中村的搁置一边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城市扩张与城市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收益，那么，同样是这个城市中极不和谐的城乡结构日益暴露出的不利于社会和谐和城市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则是它的代价，这种代价导致当今城中村世界的各种利益冲突日积月累，成为城市化和谐推进的拦路虎。政府必须冷静承认历史，认清责任，直面现实，权衡利弊，创新思路，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政府政策工具推进的可行性和操作性，才能收到预期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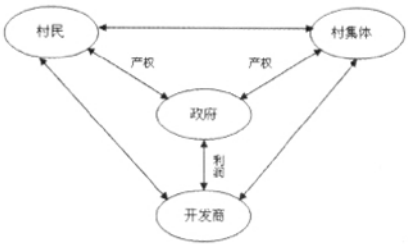


图 1　城中村改造中的政府、村集体、村民和开发商之间的关系

2. 扶持与改造有机统一。珠海市在城中村改造中，政府主动让出了巨大的利益，包括眼前的或潜在的，从而调动了多方面力量包括村民配合参与改造的积极性，而广州市政策扶持不足。这说明，城中村改造中政府必须进行适当让利扶持。这里的政府让利扶持，主要是指政府为鼓励加速城中村改造，在城中村改造中进行适当投入，包括直接和间接的投入，显性和隐性的投入，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等。目前珠三角城市政府对城中村改造的让利扶持主要包括拆迁改造中减免部分地价、收费减免、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造前期专项投入、给村民购买社保、帮助培训就业等。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扶持力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城中村改造的进程和质量。政府政策得当，扶持适度，改造的效率就高，能充分调动开发商、村民、村集体等政体力量的积极性，吸引社会多方力量参与合作。反之，改造就举步维艰，城中村改造迈不开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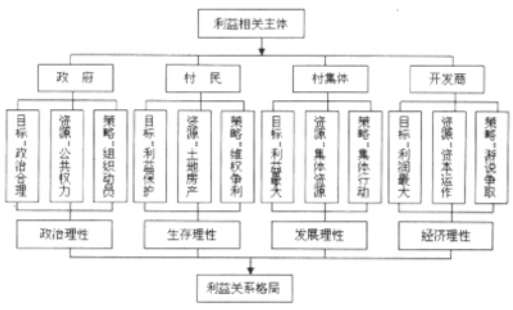


图 2　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关系格局

3. 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无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还是从

经济学中衍生出来的政府经济学理论研究无不表明，政府与市场都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或工具，两者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边界既相对独立又互为补充。但这两者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失灵的时候。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必须适当介入进行干预；反之，当政府失灵的时候，引入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弥补政府的缺陷，消除政府失灵。甚至于在特定情形下，即政府兼市场并行，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城中村改造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特殊产物，延续至当今社会转轨时期，已成为城市政府在城市治理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从表面上看，城中村改造是城市物质形态的改造，属于城市公共环境的治理范畴，但绝非一般的拆迁改造，而是牵涉到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大调整。这种利益关系经过诸多的历史沉淀，可谓盘根错节。因此，这种改造实质就是一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重新安排。

四、城中村改造利益协调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通过对上述两地城中村改造实践的反思分析，笔者认为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协调中应扮演好以下几种角色。

(一) 政府是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多元利益协调者

政治学、行政学的许多经典著作对政府的产生及其存在的理由作了大量阐释。其中社会契约论认为，为避免暴力社会的产生，个人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同意接受“公意的指导”以保证个人的人身和财富。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和集体的共同体。这种建立在社会契约上的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政府是主权的受托者，公意是国家的灵魂，它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委托—代理理论则认为，公民将权力委托给国家，再由国家委托给各级政府。社会中的每个个人会将各自享有的私权力一部分置于公共领域中，所有这部分置于公共领域中的私人权利，需要委托给一个机构或个人来实施并保证获利，这个机构或个人因而获得了所有广大民众委托的公共权力。一般而言，这个机构就是政府。因此，政府是公众为达成自身利益的选择性设计。

基于这一前提，一般认为，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所以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对个体财产的征用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各国法律都赋予国家机关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时征用或征收私人财产的权力。具体到城中村改造问题上，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由政府来主导改造，有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考量。城市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当在城中村改造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当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以出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为由而对私有财产或集体财产采取征收或征用措施时，其争议不在于为了公共利益应否对私有财产或集体财产实施征用，而在于这种征用行为是否确实为了社会公共利益？[2] 因为立法上的定义不明确，会为公共利益的滥用留下空间。产生这种争议的原因在于对公共利益的理解。事实上，公共利益不仅只是一个重要概念，它也是一种客观具体的存在。究竟是否存在着一个所谓的公共利益？当区域不同时，公共利益的体现也会各不相同。正如德国学者洛厚德提出的，公共利益是相关空间内大多数人的利益，应以地域基础作为界定的标准。一定地域内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就足以形成公共利益。阿罗提出，不可能通过个人利益的加总而达到一个所谓的公共利益。因此，即使我们明确了公共利益的代表区域，也不存在着集合所有个人利益而形成的公共利益。因此，公共利益十分难以准确界定，尽管理解起来不困难。更重要的是，尽管实现公共利益为城市政府推动城中村改造提供了一种合法性解释，但是作为国家权力的代理者——城市政府并不是一个超越了社会的社会利益代表者，也是一个嵌入社会之中的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不排除当个别城市政府拿公共利益来说事时，往往是他们自己主张的公共利益，难以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同。正如亨廷顿所言，传统处理公共利益有三种方式：把公共利益与抽象的、实际的、理想的价值以及诸如自然法则、正义或者正确的理性等准则等同起来；或者同某一特定人物(朕即国家)的、集团的、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或大多数人的具体利益等同起来；或同个人之间(古典自由主义)或集团之间竞争过程中得出的结果等同起来。[3](P12) 以上这些都是城市政府在改造中利益协调时应十分注意的，要真正在切实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统筹好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

(二) 政府是多元利益主体、利益诉求渠道的构建者

西方的城市政体理论(urban regime theory)[4] 指出，城市空间的变化是政体变迁的物质反映。谁是政体的成员，谁是政体的主导者，会引起城市空间结构的不同变化。城市权力是分散在城市政府和私人部门手中的，城市政体是一种合作性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安排，城市政府和私人部门能够形成管理城市的能力。城市政府拥有城市管治的资源：城市政府拥有立法和政策制定的权力，需要投资回报社会、创造就业机会、增加财政税收的资本。城市政体虽然是一个理论分析模型，但它能够使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城市发展的动力构成。城中村改造是相关利益主体诉求的结果。与城市政府各部门一样，地产开发商、金融机构、公众机构、政治家以及其它的促进增长组织组成的“动力集团”推动“发展机器”来实现城市资产的交换价值，获取资产的最大化收益或者财富。城中村改造的强烈呼声则正是反映了这一发展要求。城中村改造客观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元社会[5](P12) 时代条件下的多元利益冲突的微观场景。从这个意义上

来看，城中村改造实际上更要求城市政府找准自己的定位，根据本地方或本区域内的利益格局来确定自己的介入方式和程度，充分尊重改造中多元主体利益，构建好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渠道。

（三）政府是多元利益主体、利益诉求的仲裁者

在城中村改造中，参与改造的开发商、村集体和村民均应当是受益主体，政府则应是城中村改造中公平、公正和效率的维护者、监管者和仲裁者。政府作为权力机构，其行为可分为两种：纯粹的分利行为和生产性的分利行为。前者是指在创利未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分利的增加来自个人利益的减少，这必然是一种近乎掠夺性的侵权行为；后者是指政府作为市场秩序的一个内在参与者，在推动创利增加的同时，其利益也随之增加。因此，创利是分利的前提，创利者的寻利行为是基础性的和第一位的。然而，在城中村改造中，个别城市政府往往会因为自己为企业创造了赢利机会，而要求从中分一杯羹，从而损害了自己作为中立第三方的身份，政府既是裁判员，又充当了运动员，影响了原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割。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分配需要得到村民的配合和支持。因此，城市政府应积极地承担起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角色。正如有学者所言，“因为还需要政府从取向到评价标准的全面转变。也就是说，对政府和官员的评价标准，不应当仅仅看经济增长的多少，同时要看人民生活上是否得到了改善，社会与公平的秩序情况如何，社会治安状况如何。这要重视社会政策的独立指向作用。且这种独立指向就是社会公平、秩序和社会安全稳定”。[6](P12) 在城中村改造中，城市政府要妥善处理好补偿的公平性问题，即对于各村民的利益同等地予以照顾，而不能厚此薄彼，关键是要开辟一个利益表达渠道，建立起相应的利益协调机制，这是确保城中村和谐改造的重要环节。而开发商作为市场主体力量，其寻利行为是一种生产和创新行为。政府的城中村改造计划为开发商创造了这种利润空间。同样，如果没有开发商的创利行为，政府就无利可分。因此，在城中村改造中政府也不能一味地偏向村民，和谐社会不能只考虑村民的利益，而是要让各种利益主体都有其利益表达的渠道和途径，让各种利益都能得到妥善的统筹兼顾。同时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只有政府管理者的行为真正受到了社会的监督和法律的约束，其各种不规范行为才能受到有效制约，政府与个人、政府与市场才能建立起协调而有序的关系，形成相互合作和相互促进的局面。

五、结论

当代中国已进入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各种利益矛盾冲突愈发突显，需要政府出面来化解。本文研究的城市化进程下的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协调角色定位，对当代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协调转型时期的社会多元利益冲突也不无启发。首先，当代政府应主动适应当前急剧转型期的社会生态，适时更新施政理念，加强与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其次，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的多元利益纠葛纷争中，政府应主动承担起历史责任，积极担当起政府的主导角色，协调建构好政府、市场和民众多元利益关系。市场和政府作为解决人类事务的制度安排，各有其优劣。“市场制度在私益物品的供给上是高效率的，但在公益物品的供给方面却存在局限”。[7](P306) 而政府的独特优势在于，它“能够确定和实行所有权，费用低于自愿团体的费用；并且随着市场的扩大，这些收益会更为显著”。[8](P8) 最后，政府必须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工具的调节作用，当好社会利益冲突的协调者，确保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平衡。“在现代民主多元的社会状态下，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是一系列复合性政策的产物，即由代表不同利益要求、不同价值偏好的决策参与者通过反复的竞争、协商与合作的互动过程而最终达成的共识”。[9](P65)

[参考文献]

[1] 蓝宇蕴. 都市里的村庄 [M]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 孙南申. 公共利益究竟该如何界定 [N] . 社会科学报，2006-08-31.

[3] 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4] Mossberger, K., Stoker, G.. The evolution of urban regime theory : The challenge of comcept ualization [J] . Urban Affaires Review, 2001（6）：810-835.

[5] 孙立平. 断裂 [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 孙立平. 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 毛寿龙. 政治社会学 [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8] 道格拉斯•诺斯著. 西方世界的兴起 [M]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9] 王骚. 政策原理与政策分析 [M] .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黄振荣

经济学　管理学

先进制造业的三维理论模型及其特征

龚唯平　查伟伟　薛　白

[摘　要] 根据当代国际制造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从超微观、微观和中观三维视角进行综合概括，先进制造业是广泛应用先进制造技术、采用先进制造模式、拥有先进市场网络组织的工业生产系统。先进制造业本质上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发展先进制造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进步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发展问题，而是一场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关键词] 先进制造业　制造技术　制造模式　市场网络组织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6-0074-06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着重大变革。近十余年来，世界主要工业国纷纷制定各种发展计划，促进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转变。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发展的新潮流。本文根据当代国际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从超微观、微观和中观三维视角进行综合概括，建立起一个新的先进制造业理论模型。

一、关于先进制造业概念的讨论

“先进制造业”是国内学术界近年中提出的新概念，目前尚没有一个明确的、一致公认的定义。什么是先进制造业？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种。

（1）先进制造业主要指采用先进制造技术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最主要的特点是技术革新快，适应市场需求的多样化。[1]

（2）先进制造业是指能够不断吸收高新技术成果，并将先进制造技术和管理方式综合应用于研究、设计、制造、检测和服务等全程的制造业。具有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创新能力强、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服务功能全、就业比较多等特点。[2] 它不仅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也涵盖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的传统产业。

（3）先进制造业指制造业不断地吸收电子信息、计算机、机械、材料以及现代管理技术等方面的高新技术成果，并将这些先进制造技术综合应用于制造业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在线检测、营销、服务和管理的全过程，实现优质、高效、低耗、清洁、灵活生产，即实现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生态化生产，取得很好的经济、社会和市场效果的制造业的总称。[3]

上述三种解释都有合理之处，但又都不全面和准确。首先，先进制造业无疑离不开先进技术，但仅采用先进技术，或仅从先进技术来定义，不足以揭示先进制造业的内涵，也无法把先进制造业与以技术先进为标志界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分开来。实际上，传统制造业也是追求技术不断进步的。其次，先进制造业的确不仅仅局限于生产过程，还应该包括产前和产后全过程，但这也还不足以说明先进制造业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最

作者简介　龚唯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查伟伟，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薛白，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632）。

后，上述解释都把先进制造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忽视了现代网络化的营销系统和企业之间的广泛关联。

笔者认为，应该结合国际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和先进国家制造业的发展特征，可以从超微观、微观和中观的三维视角来对先进制造业进行理论概括。

从超微观即企业内部的角度看，先进制造业首先表现为技术的先进性，是一个能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先进技术体系。既能不断吸收当代高新技术成果来进行自主技术开发，又善于将先进技术应用于从研发、制造到营销、维修服务的全过程。先进技术是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对制造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正是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先进制造业才能够实现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和生态化生产。

从微观即企业整体的角度看，先进制造业表现为生产模式的先进性，是一种能够适应市场变化、不断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并能兼顾生态环境和社会利益的高效生产体系。诸如柔性制造系统（F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精益生产模式（LP）、清洁生产模式（CP）、高效快速重组生产系统、虚拟制造模式（VM）等，就是最为著名的先进制造模式。它决定着企业具体配置各种生产要素的方式和效率，体现着企业与市场之间密切的良性互动关系，也反映着企业与生态和社会环境的和谐相处。正是在生产模式这一点上，先进制造业与传统制造业迥然有别。

从中观即产业体系的角度看，先进制造业表现为营销网络组织的先进性，是一种以产业链为主干、集群化为依托的网络化市场组织。先进制造业是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发达的市场网络为支撑的。先进制造业内部各产业部门、各企业之间，在投入产出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需要通过价值链上的整合与协同、形成供应链联盟和产业集群，从而组成高效率的市场系统。

通过上述分析，概括起来，可以得出先进制造业的简明定义：先进制造业就是广泛应用先进制造技术、采用先进制造模式、拥有先进市场网络组织的工业生产系统。可用图 1 来清楚表示先进制造业的理论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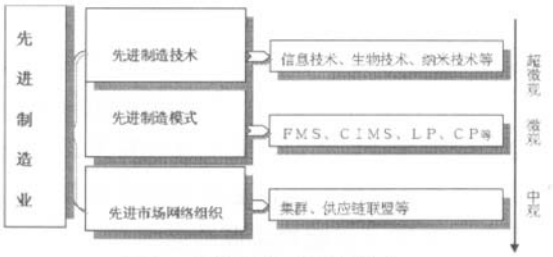


图 1　先进制造业理论模型

二、先进制造技术的内涵与发展

一般认为：先进制造技术是将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和自动化设备以及材料技术等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性技术，综合应用于产品的研究与开发、设计、生产、管理和市场开拓、售后服务，并取得经济社会效益的综合技术，它们被统称为先进制造技术。

先进制造技术一般分为四大类。(1) 现代设计技术，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反求工程技术的新产品开发、基于并行工程的产品设计、文件设计技术与质量功能配置、再生产工程、绿色产品设计等。(2) 先进的制造工艺技术，包括计算机辅助制造 (CAM)、少无切削制造技术、非机械加工制造技术、生长型加工和快速原型技术制造 (RPM)、虚拟制造技术（VMP）等。(3) 综合自动化技术，包括分布式数控技术 (DNC)、柔性制造技术 (FMT)、集成制造技术 (CIMT)、智能制造技术 (IMT) 等。(4) 现代系统管理技术，包括制造资源计划（MRPII）、准时制（JIT）及精益生产 (LP)、敏捷制造（AM）、全球化制造 (GM) 和信息管理系统 (IMS)、可持续发展技术和相关技术等。[4]

1994 年初，美国联邦科学、工程和技术协调委员会（FCCSET）下属的工业和技术委员会先进制造技术工作组，曾经对先进制造技术的内涵首次作系统的说明，认为先进制造技术主要包括三个技术群：主体技术群、支撑技术群和制造基础设施（制造技术环境）。这三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缺一不可，否则很难发挥预期的整体功能效益。

与传统制造技术相比，先进制造技术具有四大特征。(1) 它的基础是优质、高效、低耗、无污染或少污染工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优化及与新技术的结合，形成新的工艺与技术。(2) 传统制造

技术一般单指加工制造过程的工艺办法，而先进制造技术覆盖了从产品设计、加工制造到产品销售、使用、维修整个过程。(3) 传统制造技术一般只能驾驭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流和能量流，随着信息技术的列入，使先进制造技术成为能驾驭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系统工程。(4) 传统制造技术的学科、专业单一，界限分明，而先进制造技术的各专业、学科、技术之间的不断交叉、融合，形成了综合、集成的新技术。

目前在发达国家，先进制造技术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其一，以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和工业机器人为标志的柔性制造单元系统，以柔性制造单元和自动、半自动物料输送组合为标志的柔性制造系统，这两个阶段的先进制造技术已相当成熟。其二，以信息、工艺、物流、计算机集成为特点的集成技术已处于完善阶段。其三，以设计智能化、单元化加工过程智能化和系统整体管理智能化为特征的智能集成制造系统，仍然处在研究与开发过程中。[5] 具体来看，呈现出以下几大发展趋势。

(1) 数字化。它是制造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与管理技术的交叉、融和、发展与应用的结果，也是制造企业、制造系统与生产过程、生产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包含了三大部分：以设计为中心的数字制造，以控制为中心的数字制造和以管理为中心数字制造。

(2) 精密化。它一方面是指对产品、零件的精度要求越来越高，一方面是指对产品、零件的加工精度要求越来越高，如精密加工技术、细微加工技术、纳米加工等。

(3) 集成化。先进制造技术的集成化趋势本质就是知识的集成。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现代技术的集成；加工技术的集成和企业管理技术的集成。

(4) 网络化。利用网络，在产品设计、制造与生产管理等活动乃至企业整个业务流程中充分享用有关资源，即快速调集、有机整合与高效利用有关制造资源。制造技术的网络化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生产组织变革的需要，一是生产技术发展的可能。

(5) 虚拟化。虚拟技术是以计算机支持的仿真技术为前提，对设计、加工、装配等工序统一建模，形成虚拟的环境、虚拟的过程、虚拟的产品、虚拟的企业，主要包括虚拟环境技术、虚拟设计技术和虚拟制造技术。

(6) 智能化。制造系统正由原先的能量驱动型转变为信息驱动型，这就要求制造系统不但要具备柔性，而且还要表现出某种智能，以便应对大量复杂信息的处理、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和激烈竞争的复杂环境。

(7) 绿色化。环境保护与环境制约使先进制造技术逐渐向绿色化、可持续化发展。制造业的产品从构思开始，到设计阶段、制造阶段、销售阶段、使用与维修阶段，直到回收阶段、再制造各阶段，都必须充分考虑环境保护。

三、先进制造模式的内涵与发展

由于资源、环境、市场需求变化及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制造业市场变动能力、企业网络组织结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大批量生产模式（即福特制生产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从而催生和创新出了一系列先进制造模式。关于先进制造模式国内外有许多不同看法。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从制造科学和制造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制造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制造系统；另外一种观点从管理的角度出发，从比较广泛的范围来看，认为先进制造模式是一种在生产和制造领域中应用的新生产方式和方法，或是一种制造战略。

一般而言，制造模式具有典型的制造过程和运行机制，同时具备明确的功能、结构、通信和操作机制。它对于企业内部的信息流、物流和人流的管理具有明确的处理方法；对于企业外部的动态联盟（包括市场销售、供应链、资源、生产服务等）也具有相应的对策；最后对于上述问题的处理都具有相应的评价指标和方法。因此，制造模式是制造业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市场竞争力、生产规模和生产速度，以完成特定的生产任务而采取的一种有效的生产方式和一定的生产组织形式。现代先进制造生产模式是从传统的制造生产模式中发展、深化和逐步创新而来。

简单地说，所谓先进制造模式，就是围绕企业的价值增值链，依据不同的环境、通过有效地

组织各种要素形成的，可以在特定环境中达到良好效果的先进生产方式和运行管理机制。这种模式已经形成规范的概念、哲理和结构，可以供企业依据不同的环境条件，针对不同的制造目标来加以采用。

根据国际生产工程学会（CIRP）近10年的统计，发达国家所涌现的先进制造系统和先进制造生产模式多达33种。发达国家制造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和创新性中小企业已广泛采用一些新的制造模式，如：柔性制造系统（F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精益生产模式（LP）、清洁生产模式（CP）、高效快速重组生产系统、虚拟制造模式（VM）等。[6]目前，正在开发下一代制造和生产模式，如：并行工程和协同制造（HM）、生物制造（BM）、远程网络制造（RM）、全球制造（GM）和下一代制造系统（NGMS）等。以下择要简单介绍八种主要的先进制造模式：

（1）精益生产模式（LP）。精益生产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根据其IMVP的研究中对日本丰田生产方式的总结。精益生产的最终目标是要以具有最优质量和最低成本的产品，对市场需求做出最迅速的响应。它的基本原则是消灭一切浪费和不断改善。准时制作业、成组技术、弹性作业人数和尊重人性是精益生产的主要支柱。

（2）准时生产制（just- in- time）。又称无库存生产模式，其基本思想是订单驱动，仅当下道工序需求该零件时，才将其生产出来，任何前提生产都是浪费。追求目标是零库存、零废品和零设备故障。它适合于相对稳定的大批量流水线或重复生产作业。

（3）柔性制造系统（FMS）。柔性生产主要依靠有高度柔性的、以计算机数控机床生产为主的制造设备来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其优势是：增强制造企业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提高设备使用率和员工的劳动生产率以及改善生产模式从而大大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

（4）敏捷制造。又称灵捷制造，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于1988年提出的，1992年美国政府将其作为“21世纪制造企业的战略”。敏捷制造是新一代生产模式，是对已有生产模式的丰富和发展，它是柔性制造和精益生产发展的结果。敏捷制造包括产品制造机械系统的柔性、员工授权、制造商供应商关系、总体质量管理及企业重构。目前较权威的定义是：敏捷制造是一种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个公司都能开发自己的产品并实施自己的经营战略。构成这个结构的基石是三种基本资源：有创新精神的管理机构和组织，有技术、有知识的高素质人员和先进制造技术。敏捷源于这三种资源的有效集成。

（5）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是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新一代制造系统。它以计算机来辅助制造系统的集成，以充分的、及时的信息交流或信息共享将企业的设计、工艺、生产车间以及供销和管理部门集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他们相互协调的运作，以提高产品质量，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提高生产效率，确保企业的整体效益，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

（6）虚拟制造模式（VM）。是虚拟现实技术在制造中的应用。虚拟制造实际上是一种计算机科学技术，以信息技术、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为支柱，在产品设计或制造系统的物理实现之前，就能使人体感觉到未来产品的性能或者制造系统的状态，从而可以做出前瞻性的决策与优化实施方案。从本质上讲虚拟制造技术是对真实制造过程的动态模拟、仿真，是在计算机上制造数字产品，在虚拟制造环境中生产软产品替代传统的硬样品进行试验，对其性能和可制造性进行预测和评价，从而缩短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周期，降低产品的开发成本，提高系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7）清洁生产模式（CP）。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对清洁生产的定义为：清洁生产是一种新的创造性的思想，该思想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以增加生态效率和减少人类及环境的风险。对生产过程，要求节约原材料和能源，淘汰有毒原材料，减降所有废弃物的数量和毒性；对产品，要求减少从原材料提炼到产品最终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利影响；对服务，要求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和所提供的服务中。总之，清洁生产是将环境保护延伸到企业内部的方方面面。清洁生产追求的目标有二：一是追求资源和能源的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不可

再生资源和短缺资源的代用、废弃物的资源化和再生利用；二是追求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与环境的相容，如采用低废、无废的清洁生产工艺。

(8) 绿色制造 (green manufacturing) 是一个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代制造模式，其目标是使产品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的影响(负作用) 最小，资源效率最高，并使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优化。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 全球性——绿色制造的研究和应用将愈来愈体现全球化的特征和趋势。(2) 配套性——以绿色设计和制造技术为中心的配套系统 (绿色营销、绿色标志、绿色教育、绿色法规等相关配套的社会支撑系统) 是绿色制造工程的发展方向。(3) 集成性——将更加注重系统技术和集成技术的研究。例如，产品和工艺设计与材料选择系统的集成、用户需求与产品使用的集成、绿色制造的问题领域集成、绿色制造系统中的信息集成、绿色制造的过程集成等集成技术的研究将成为绿色制造的重要研究内容。(4) 智能性——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技术将在绿色制造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先进市场网络组织的内涵与发展

先进制造业是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发达的市场网络为支撑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快速多变的市场需求使制造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着提高产品质量、缩短产品的生产销售周期、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压力，这使得制造商、供应商、分销商、零售商和研究机构间的联系趋于紧密，并使其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如制造业服务业化），形成了新的市场网络组织结构，集群、供应链是其典型的表现形式。先进市场网络组织可以降低单个企业的经营风险，妥善地解决产品的设计、生产、供应、销售等一系列环节中的问题，并降低企业的外部效应和外部交易成本，提高了企业和整个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根据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每一个企业都是由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以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各种活动（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售后服务等）的集合。这些活动在公司的价值创造中相互联系，组成公司价值增值的链条，即为价值链。价值链并不是一些独立活动的集合，而是相互依存的活动构成的一个系统。并且，一个公司价值链与其他经济单位的价值链也是相连的，任何一个企业都存在于从供应商到消费者的价值链体系中，体系中各价值行为之间的联系对公司竞争优势的大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发展先进制造业需要对价值链上的活动进行整合与协同，以实现整条价值链的整体提升。

价值链上各环节的增值收益是不同的。通常可用微笑（价值链）曲线表示，在曲线左端（产业链上游）的知识产权开发企业，随着研发和设计的投入，产品增值收益逐渐上升；在曲线右端(产业链下游）的品牌销售企业，随着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产品增值收益也大幅上升；而弧底部分的成品装配和低端产品为主的制造业则“流汗多拿钱少”，技术含量低、产品增值少，而且市场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

由于制造工艺的标准化以及“模块化”技术的发展，产业内的各工序可以被调整与分割，通过把利润递减的制造环节外包转移出去，跨国公司的经营重点从产品制造向产业链的两端转移，向上游主要是从事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向下主要做销售、做渠道、做品牌和服务等，从而使价值链上知识密集型的环节利润递增，先进制造产业链两端的技术含量更高，附加价值也更高。

同时，先进制造业以发达的供应链网络为依托。供应链是由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或配送中心)、零售商及用户等实体组成的供需网络，是跨越企业中多个职能部门活动的集合，它包括从订单的发送和获取、原材料的获得、产品的制造，到产品分销给销售商及最终用户的整个过程。它是在给最终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不同的过程和活动中所涉及的上下游相互联系的组织网络。供应链是相互合作共同控制、管理和改进从供应商到用户的物流和信息流的多个相互联系和依赖的组织的网络。供应链是伴随先进制造业出现的一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具有单一核心企业的供应链；二是多核心企业的供应链。随着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先进的供应链管理理念，如绿色供应链管理、敏捷供应链管理、逆向供应链管理、闭环供应链管理以及供应链联盟等。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不断先进

化的同时，其市场支撑体系也在不断变革与创新。

五、先进制造业的基本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先进制造业的基本特征作一简要概括。首先，与传统制造业相比，先进制造业的“先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在生产方式方面，由单一产品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变为可根据社会需求，小批量、多品种生产，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生产关联方面，先进制造业更加突出了产业间的生产链动态关联和企业的全球生产配置；在生产理念方面，更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高经济效益、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在经济发展方面，着眼于未来，更注重信息化程度、无形资产的比重、技术创新的能力，更重视节约型、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先进制造业是一个动态演变的概念，它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先进制造业表现在不同的制造产业上。以三次产业革命为例，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先进制造业以纺织、煤炭、冶金等产业为代表；第二次产业革命时，先进制造业表现在电力、钢铁、石化等制造业上；在20世纪40年代爆发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电子通信、航空航天、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作为先进制造业在各国经济中得到较快的发展。[7] 在空间方面，先进制造业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表现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上，因此不同区域在选择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时需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产业选择。

再次，先进制造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开放性一是表现为制造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制造的生产环节，而是开放到了包括产前和产后的全过程；二是表现为通过网络化组织向社会经济领域的全面开放，尤其体现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为一体；三是表现为全球制造，即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形成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体系。

最后，先进制造业本质上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发展先进制造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进步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发展问题，而是一场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如果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曾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加工装配阶段、自主知识产权阶段，那么，先进制造业标志着制造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1] 陈宝森. 变革中的美国制造业 [J] .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2).

[2] 杨大庆，谭凤其. 世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经验及其借鉴 [J] . 北方经济，2006，(2).

[3] 秦世俊. 世界先进制造业发展态势 [Z] . 维普资讯 http://www. Cqvip.com .

[4] 李斌. 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与展望 [J] . 制造业信息化，2004，(3).

[5] 杨叔子，吴波. 先进制造技术及其发展趋势 [J] . 求是，2004，(4).

[6] 陈定方，尹念东. 先进制造业技术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J] . 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6，(3).

[7] 舒春等. 日本、美国、中国三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比较分析 [J] . 科技与管理，2004，(5).

责任编辑：黄振荣

•中国产业集群成长的根植性研究•

[编者按] 企业集群是当前社会经济的新现象，也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是如何形成的，它植根于何种文化和经济的土壤，又会朝何种方向演变，搞清楚这些问题将会对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意义的理论指导。鉴于此，我们组织了一批长期从事此方面研究的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希望能将这些问题引入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地缘关系与我国产业集群企业合作行为研究

李胜兰

[摘　要] 我国产业集群形成与西方的工业化过程相比，集群组织的构成既没有发生空间位置上的移动，也没有基本成员的重新组合，它是由具有各种先赋性关系的人群在自己原先生活的区域中建立起来的，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完全中国式的模式。因此在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得出了两个理论结论：一是地缘关系是集群企业形成初期大多实行家族化管理方式的基础。二是地缘关系提供了企业合作对象的信息的功能和集体惩罚的功能，这些都大大地降低了集群企业合作中的交易费用，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关键词] 地缘关系　集群企业　合作行为

〔中图分类号〕 F4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80-05

一、引言

地缘关系是人口的区位分布在社会关系上的表现。在一个传统社区中，除了亲属关系的联结，另外一个基本的社会纽带就是地域性纽带。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地缘作为血缘关系的投影，“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1](P78) 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血缘和地缘关系就成为人际关系与交往中的很重要的关系，并以此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们按照“以己为中心，像石头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愈推愈薄”[1](P78) 的规则来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

我国产业集群形成与西方的工业化过程相比，集群组织的构成既没有发生空间位置上的移动，也没有基本成员的重新组合，它是由具体各种先赋性关系的人群在自己原先生活的区域中建立起来的，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完全中国式的模式。

国内外许多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产业集群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企业竞争与企业合作两种行为

作者简介　李胜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共存。学者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同产业中的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群比单个企业更具竞争优势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之间普遍存在主动的、持续的合作行为。正是通过企业之间主动的合作行为，配合企业在同一地点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所产生的一种“集体效率”使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之间形成的整体竞争优势。[2](P52-56)

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群为什么会产生整体的竞争优势呢？除了地理空间上的集群会带来规模经济的优势外，还在于相同的本地文化传统、价值观所形成的如同学、校友、邻居、同事、上下级、朋友、本地熟人等地缘关系能够使企业之间形成合作关系，大大节省企业之间交易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经营的绩效。

笔者认为，地缘关系在产业集群企业合作形成中所表现出的一般规律及其特点是，较小规模集群内小企业联系与维系的纽带一般为亲缘和血缘关系，而较大规模集群内较大企业联系与维系的纽带一般为地缘关系。无论是基于亲缘和血缘关系形成的集群企业，都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有利于帮助从事同一行业的各个集群企业相互支持，产生协同效应，实现利益的内部化，降低协调成本。

二、地缘关系与提高产业集群企业合作效率——一个博弈模型

企业合作的形成需要克服合作过程中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这包括了搜寻潜在合作对象的信息费用以及抑制合作方机会主义行为的相应费用。在集群环境中，产业集群企业的合作对象限制在本地企业的范围中。人们往往只是和同居一地、有着相同社会关系的经济主体发生交往，人们的交往重复而频繁，而退出关系的成本极大。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地缘关系是一种低成本的信息搜寻方式，同时它还可以提供一种低成本惩罚机会主义行为的手段。因此，在假定合作收益一定的情况下，地缘关系可以从降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提高集群企业合作的效率。

第一，提供范围更广的潜在合作对手的信息。亲缘关系能为家族企业之间合作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信息。但是，因为信息在家族成员之间流传，企业所获得的信息量极为有限，而且多为同质量的信息，这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合作的范围及合作质量。当企业之间的合作是非家族的企业间的合作时，相比较家族企业来说，企业之间合作中获取信息的范围更广，超越了地缘关系，在沿着地缘关系的社会关系渠道传播，使得企业获取的信息量比家族关系获得的信息量大、质量高。在地缘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网中，人们的交往重复而频繁，信息通过人际交往传递的速度快，高密度的交流频率和快速的传播速度，使企业主可以从其社会关系网络中得到丰富的信息，这是一条低成本的信息获取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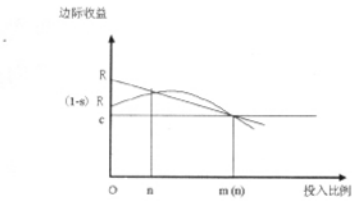


图1 不存在地缘关系的企业投入决策模型

对于地缘关系对提高产业集群企业合作效率的理论印证，我们通过边际成本收益方法的分析，比较集群企业无地缘关系投入与有地缘关系投入时的绩效的不同，以阐述地缘关系对企业合作的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假设某企业经营活动的边际收益为R（bi），成本为C，R (bi) - C>0，由于企业经营活动存在正外部性，即（1-s）R (bi) - C>0，正外部性影响了单个企业的积极性，使得企业的投入少于不存在外部性情况下的投入，即on<om（n），这种情况导致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创新投入严重不足。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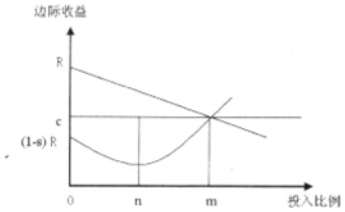


图2 引入地缘关系的集群企业投入决策模型

现在我们在集群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引入地缘关系的调节，即边际收益变为R (ki, bi)。由于地缘关

系的影响，使得企业获取资源的交易费用大大减少，导致创新投入恢复到帕累托最优配置，即由 on 增加到 om（n）。

第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企业合作成本。在集群形成阶段，就群体内信任而言，合作一方主要将合作对象的选择限于与自己具有血缘、亲缘的成员中，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完全是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的忠诚和信任为基础的。合作中出现的机会主义的治理是靠家族成员的集体惩罚来实施的，一般是靠终止家族成员合作，失去家族关系资源来实施的。这种靠家族小范围的惩罚来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其威慑力会很小，往往达不到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目的，原因一是参与惩罚的成员很少，仅限于家族成员，按照博弈论中博弈惩罚的规律看，参加惩罚的成员越少，威慑力就越小。二是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是最容忍错误的。[3](P35) 因此，如果集群企业合作的对象超越了亲缘关系，是由地缘关系的非家族企业之间的合作，又具有地缘关系的成员参与对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采取集体惩罚的手段，其威慑力由于参加的成员多、地缘关系不容忍错误等原因而远远高于家族成员的惩罚力度。

进一步分析，由地缘关系联系的产业集群内企业通过信任机制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对合作一方的违约行为施加一种集体惩罚来保证合作的正常进行。这种集体惩罚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直接终止合作关系。造成违约者的未来损失，增大私人的违约成本。因为在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之间存在专用性投资的条件下，终止合作关系意味着一种潜在的资产价值损失，合作者无法收回其专用性投资的全部价值。第二种形式是违约者因自己的市场声誉贬值而遭受的损失。合作一方的违约行为会破坏他在市场上的声誉，使他在今后合作中的困难增加，因其他人不愿同声誉不好的人进行交易，即使合作也会持有更谨慎的态度，并要求更苛刻的条件，这些都增加了该合作者未来做生意时的成本。正如波斯纳所说："那些已被识破的不能履行其应尽交易义务的人，将会发现将来无人愿意与之进行交换。这对那些利用契约另一方当事人的弱点和履行相继性的弱点而进行欺骗的人来讲，是一种成本很高的惩罚。"[4](P117) 还应指出，基于地缘关系的信任治理能够自发实施，其真正基础是集群内的企业之间在相同社会关系背景下的相互信任和利益上的相互依赖性。由于集群合作行为的中止和契约的解体一般会给各合作方造成利益上的损害，所以，威廉姆森认为，保护契约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扩大契约关系，尽可能在各交易方之间构造相互依赖性，使契约各方具有惩罚对方的手段。[3](P38)

笔者用一个博弈模型来分析在由地缘关系形成的集群企业合作中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集体惩罚和惩罚结果。其模型假设是：

1. 集群内企业合作体现无限重复博弈。由于群内企业处于相同的地域，产业集群具有紧密的社会网络，共同价值观，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企业之间的合作行为选择上，企业之间的合作不是一两次，而具有持续性，因而群内企业之间的合作并不是我占了你一次便宜就走的短视行为。这就决定了群内企业的合作过程体现的博弈是一个无限重复博弈过程。

2. 集群合作博弈为完全信息，并且各企业采取"冷酷战略"。因为集群地缘关系使企业间信息传递快，处于近似完全信息状态，所以群内各企业的声誉建立与破坏相对容易。当一个企业具有良好的声誉时，区域内其他企业都能知道并愿意同其合作；反之，当某个企业违约时，其他企业也能知道，并且很快不会同其进行合作活动，即"冷酷战略"是对违约企业的最佳战略，即：（1）开始与对方合作并履行契约；（2）选择与对方合作并履行契约直到对方选择违反契约，然后永远不与对方合作。所以该企业面临集群内其他企业严重的集体惩罚，且这种集体惩罚对被惩罚的企业来说损失巨大。因为一旦企业面临其他所有企业的集体惩罚不与之进行合作，该企业实际已不属于集群中的企业，企业面临巨大的"沉淀成本"。这样使得群内企业一般不敢轻易做出违背契约的行动，因而良好的合作得以进行，效率得到提高。

设集群内有 n 个企业。根据无限重复博弈的理论模型，假定 a_i^t 是代表性企业 i (i=1, 2……n) 在 t 期

的行为，在本模型中，企业在各个阶段只有两种行为，即合作和违约。令 $a^t=(a_1^t a_2^t \cdots\cdots a_n^t)^T$，则 $\pi_i^t(a^t)$ 是企业 i 在 t 期的利润，在本模型中，利润有三种取值，设各个企业都合作时每个企业的利润为 π_0，当一个企业违约、其它企业合作时该企业利润为 π_1，当其他企业对违约企业采取冷酷策略时该企业利润为 π_2，则有 $\pi_2<\pi_0<\pi_1$。企业 i 在 t 期要考虑以后所有期间盈利的现值 u_i^t，即

$$u_i^t=\sum_{m=t}^{\infty}\delta^m\pi_i^m(a^m) \qquad (1)$$

其中 δ 是贴现因子，$0<\delta<1$。事实上，由上式可以看出，每一个 t 阶段开始的博弈都是类似的无限重复博弈，我们可以简单地从第一阶段开始分析，即分析企业最大化利润 u_i 时的行为，其中

$$u_i=\sum_{t=1}^{\infty}\delta^t\pi_i(a^t) \qquad (2)$$

假设在第一阶段企业 i 违约，其他企业合作，则第一阶段企业 i 得到利润 π_1。但由于集群间信息的充分性，从第二阶段开始，除 i 以外的所有企业都不再与之合作，即采取“冷酷策略”，因此从第二阶段开始各阶段企业 i 只得到利润 π_2。因此利润为

$$u_i=\pi_1\delta+\pi_2\sum_{t=2}^{\infty}\delta^t \qquad (3)$$

即

$$u_i=\pi_1\delta+\pi_2\frac{\delta^2}{1-\delta} \qquad (4)$$

但是，若企业 i 选择合作，则所得利润为

$$u_i=\pi_0\frac{\delta}{1-\delta} \qquad (5)$$

只需比较（4）式和（5）式的大小即可知企业 i 的决策。这里要引进关于 $\delta\approx1$ 的假设，即局中人近似完全耐心，因而对盈利的时间性相对不关心。另外，由于违约时其他企业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以至于违约企业可能退出该集群，因而 $\pi_2<\pi_0<\pi_1$，并且由于前期投入的存在，π_2 可能为负。因此（5）式远远大于（4）式。即，只要企业在集群中相互之间交易的 δ 足够大，集群中任何一个企业都没有动力违背合约。因为集群的行为主体知道失信等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会很快在集群内部得到传播，从而使企业失去在集群内部的信誉、甚至被驱逐出社会网络关系之外。这种信誉的丧失对于企业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损失，从而理性的集群行为主体都会维护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随着行为主体在已有网络关系的基础上对不同合作者的选择与搜寻，不断形成新的社会网络关系，从而集群的社会网络得到强化和发展。集群的行为主体也随着社会网络的演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资源而得到成长。

产业集群的集体惩罚功能要成为威慑参与方机会主义的有效手段，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的满足，一是行动者退出地缘社会网络的成本很高。也就是说，在网络以外，行动者无法获得相应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断关系对于行动者的惩罚才足够大。相反，如果行动者从一个关系网中退出还可以在另一个关系网中找到也许更多更好的资源，那么，这个退出成本就大幅度降低了，原有关系和资源的丧失不足以制约其行为，他的投机行为空间就可能越大。二是具有一个通畅的信息传达渠道。因为如果机会主义行为者的背叛行为只被受害者所知晓，由受害者个人对其进行惩罚还是不够的；只有当信息快速充分在地缘关系网的所有人中得到传递，大家都拒绝今后与机会主义行为者继续交往合作，对失信者的惩罚才足够大以威慑行动者。

三、基本结论

笔者认为，一方面，地缘关系约束着产业集群企业之间的合作行为；另一方面，企业之间的合作行

为恰好体现了相应的集群的地缘关系的要求，在正式制度欠缺的情况下，集群的地缘关系在促进集群企业合作行为发挥主导作用，在企业之间建立了信任基础、形成企业之间的合作，成为集群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第一，作为产业集群的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因素的集群的地缘关系，与产业集群形成初期专业化分工导致的家族式企业的生产管理方式相适应，两者的耦合，为产业集群最初的形成提供了发展的动力。

第二，作为产业集群的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因素的集群的地缘关系是产业集群企业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在此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产生了企业之间的合作行为。由于地缘关系在集群形成时成为企业之间获取生产要素、资金、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惩罚集群企业之间合作中出现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手段，所以地缘关系与企业合作行为选择和合作结果不仅没有冲突，而且相互协调和匹配，并且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下，通过重复的博弈而得到加强。因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地缘关系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持续性和时滞性，而企业之间的合作愈加频繁，合作关系就愈加巩固，信任度就会越强，企业就越希望能在长期的合作中获取合作收益，对于企业相互之间的行为预期就愈加明确。因此，虽然在产业集群的最初形成缺乏规范的市场法律环境，但企业往往通过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的自律来维护自身的信用，并通过不断交往中产生的相互信任关系使集群企业之间的合作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第三，我国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转型初期，一方面重要制度缺失或相关的诸如法律制度在内的正式制度不完善，为包括地缘关系在内的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形成的特有的地域环境，使特定地域的一些非正式制度因素，如某一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等对产业集群形成影响很大，加以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小，所以两者的冲突也很小，而对集群企业行为决策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产业集群的地缘关系等这类非正式制度。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汪少华，王华敏. 浙江产业集群成长模式及其演进 [J] . 中国农村经济，2003，(5).

[3] Williamson, O.E. The Economics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n [M] .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4] [美] 波斯纳（Persina）. 法律的经济分析 [M]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雨 田

我国传统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孙洛平

[摘　要] 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一国之内的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一个缩小各自收入水平差距的自动平衡机制。可是在我国，一些传统产品的生产会在地理上高度集中，使得一种产品的生产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形成地理上的排他性，正是这种产业集聚现象打破了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区域经济发展的自动平衡机制，从而导致不同区域的收入水平差距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作者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分析了规模收益递增效应对企业集群形成过程的影响，提出了破除路径依赖性效应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

[关键词] 产业集群　区域经济　收入水平

〔中图分类号〕 F4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6-0085-03

一、问题的提出

导致区域收入差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具体地说，主要有三类形成机制：一是由外生禀赋条件不同导致的，代表性的理论是区位理论，这种区域差异是持久性的；二是由发展时间的先后不同引起的，代表性的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这种区域差异是暂时性的，它也是区域经济发展趋同论的基础；三是由区域的生产函数不同导致的，代表性的理论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种区域差异可能会不断扩大，它也是区域经济发展趋异论的基础。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是以美国的经验为基础的，由于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兴起，使得一些发达国家拥有与欠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生产函数。这些主要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兴产业不能通过简单的资本引进来转移产业，使得欠发达国家无法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致使一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

在我国，大多数区域都是以传统产业为基础的，人力和资本也是自由流动的，然而一些区域之间的收入差异却持续存在。[1] 显然，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方法来解释这一点是有困难的。本文说明，我国的一些传统产业的集聚机制对于区域收入的影响要比集聚产业的产值在区域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来得大，而且由此形成的区域收入差距也可以在一段时期内维持。也就是说，即使在传统产业领域，也存在导致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可能性。研究这种机制，对于如何缩小我国不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区域间贸易与区域收入的关系

区域之间的贸易对于区域收入水平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考虑一种简单的情形：假定一国只有两个有贸易关系的区域 A 和 B，不考虑产品的运输费用，达到贸易平衡时，区域 A 销往区域 B 的产品的销售额应该与区域 B 销往区域 A 的产品的销售额相等。由于使用同一种货币，贸易差额对于区域收入

作者简介　孙洛平，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水平的影响将通过货币数量的变化表现出来的。

假定区域A和区域B之间没有转移支付，依据费雪交易方程式，区域的名义收入（价格指数P与实际收入Y的乘积，或名义GDP）等于该区域内的货币存量M与货币循环速度V的乘积。货币循环速度通常是由经济系统的制度性因素决定的，我们假定它保持不变，那么一个区域的名义收入与其货币存量之间将对应成比例。显然，当区域之间有贸易差额存在时，它将改变区域的货币存量，进而改变（名义）收入水平。

贸易差额对于区域收入水平的影响可以是持续性的，我们用一种极端的情形来说明。假如区域A不需要区域B的产品，而区域B却需要从区域A购买产品，那么区域B的货币存量会不断地减少，收入水平也会不断地下降。而区域A的收入水平则因为货币存量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它与区域B的收入差距也将不断扩大。这种情形也可以看作是两个区域的生产函数不同，而且不能通过资本的流动来转移，这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预言。实际情况一般不会如此，原因是当两个区域因为贸易差额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时，收入水平降低的区域的产品会逐步获得生产成本竞争优势，而收入的下降也将使该区域对其他区域产品的需求减少，从而改变区域之间的贸易格局，使之朝着减少贸易差额的方向变化。

三、区域收入变化对可贸易产品竞争优势的影响

生产成本的高低是衡量区域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生产成本最终由投入生产的工资、利润和资源租金构成，由于区域的总收入等于全部工资、利润和资源租金收入的总和，可以认为，区域收入水平降低将导致生产成本相应降低。当然，区域的收入水平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比例关系，因为还要受到区域总的生产数量变化的影响。简化说明，我们假定生产的成本与收入水平是同方向变化的。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一个区域内的产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本区域特有的贸易产品；二是各个区域都能够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参与贸易，也可以不参与贸易；三是只在区域内生产和消费的产品。区域特有的贸易产品直接影响区域之间的贸易差额和收入水平。比方说，芯片只能在区域A生产，柑橘只能在区域B生产。两个区域都需要芯片和柑橘，在不考虑其他产品交易的情况下，区域收入达到贸易平衡的条件是区域A卖往区域B的芯片销售额恰好等于区域B卖往区域A的柑橘销售额。两个区域达到贸易平衡时的收入水平，取决于人们对于芯片和柑橘的偏好，以及这两种产品的生产和成本函数等。

对于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起到自动调节作用的是各个区域都能够生产的产品的贸易。例如，在芯片和柑橘之外，区域A和区域B都能够生产皮鞋。皮鞋可以用于本区域的消费，也可以销往对方区域，由此将改变区域之间的贸易格局。不论两个区域各自生产皮鞋使用的是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法，一个区域的收入降低就将导致其生产皮鞋的成本相对降低，并因此获得生产皮鞋的成本优势，从而使贸易差额朝着提高本区域收入水平的方向转化，直至区域之间的贸易达到新的平衡为止。

因此，只要不同的区域之间存在各自都可以生产的物品，或是生产可以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转移，区域的收入差距就不会过度拉大。不过，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产业集聚现象却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它可以打破区域收入差距的自动平衡机制，其结果是不同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缩小，也可能进一步扩大。

四、我国的传统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

产业在一个地方集中能够形成竞争优势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过，对于产业集中形成竞争优势的具体机制的描述却浩如烟海。代表性的观点有，马歇尔从本地熟练劳动力市场、辅助产业和技术外溢方面解释产业集中的优势；波特从企业经营环境的角度解释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2] 新经济地理学用人们的多样化偏好和生产的收益递增性，说明生产会集中于某一区域。[3]

我国的产业集聚一般都是发生在传统产业中的，这种产业集聚的机制更有其特点，它是建立在我国特色的产业集群生产模式基础上的。我国的产业集群生产模式在地理上是高度集中的，其 规模越大越

好”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随着产业集群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当产业集群的规模甚小时，它还不如大企业生产模式有效率，而当规模一旦超过一定的界限后，产业集群生产模式将远比大企业生产模式更具有成本竞争优势。[4]

为什么我国的产业集群具有很强的成本竞争优势？原因是我国传统产业的产业集群在提高分工水平的同时却大幅度地降低了协调分工的费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分工主要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这两种方式进行。如果一个区域有良好的市场规制条件，那么这个区域的生产者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提高分工水平。同样，如果一个区域有良好的企业制度条件，那么这个区域也可以通过企业内部来提高分工水平。然而，我国的产业集群却可以不依赖于完善的市场规制条件和良好的企业制度条件，未达到提高分工的水平的目的。具体地说，在产业集群内部，每一个生产单位在整个产业链中只占据一个或少数几个分工环节，而集群作为一个整体则由众多的生产单位构成高度专业化的分工网络体系。产业集群利用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代替大企业内部的分工，因此不依赖于企业制度条件。在产业集群的内部，每一个买者同时与多个卖者进行交易，而每一个卖者也同时与多个买者进行交易，充分的竞争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同时，交易者之间相互认识，并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和信息交流渠道。这种人际关系网能够有效地防止欺诈行为，使产业集群的生产模式还可以不依赖于是否具备完善的市场规制条件。

五、传统产业的集聚对于区域收入的影响

产业集聚现象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同一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排他性。比方说，一旦一种产品的生产集中于区域A，就会对在区域B生产同类产品形成一种排斥力。对于我国的传统产业来说，产业集聚的地理空间排他性主要来自于生产成本的竞争优势，它表现为一旦当相邻的区域都有同类产品的产业集群存在时，两个产业集群的规模变化是不稳定的。因为产业集群的规模越大，成本优势就越明显，类似经济学中的自然垄断性，很容易发生一个产业集群淘汰另一个产业集群的现象。产业集聚的地理空间排他性还表现为要在一个产业集群的附近建立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集群，必须有一个起步的门槛规模。也就是说，一旦在区域A中形成了产业集群，在区域B再发展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集群，要远比当初在区域A建立同类的产业集群更为困难。[4]

在我国，产业集聚主要发生在传统产业，而传统产业的产品一般是各个区域都能够生产的产品，所以产业集聚的空间排他性将使区域之间的贸易失去一个重要的自动平衡机制，给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从不利的方面看，当产业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区域集聚时，会因为收入水平较低的区域难以达到生产同类产品的起步门槛规模而锁定于不利的贸易地位，从而加大区域收入差异。从有利的方面看，由于产业集群生产模式可以不依赖于市场规制条件、企业制度优势等，它也为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提供了一个加快经济发展的可行的模式选择。

产业集聚的形成是一个时间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一旦形成不利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要改变被动的局面是很困难的。我国目前的状态正是如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往往也是众多产业集聚的地方。如何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形成产业集聚，或者如何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的产业集群扩散或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以协调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 蔡昉，都阳.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 [J] . 经济研究，2000，(9).

[2] Porter, M.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M] . Macmillan: Landon, 1990.

[3] 克鲁格曼. 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中译本）[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 孙洛平，孙海琳. 产业集聚的交易费用理论 [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雨 田

集群企业的效率来源及其文化寓意

朱富强

[摘 要] 影响集群盛衰的核心因素就是文化伦理，它是隐性协调的基础，作者认为集群企业的效率来源于规模节约经济和分工协调经济两个方面，因此，只有建立在基于信任的互动之上，企业之间才可以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从而不仅提高单个企业也可以提高集群乃至整个地区的效率，这正是集群竞争优势的根本所在，而企业间的信任互动则必须建立在文化伦理的寓意中。

[关键词] 集群 分工 协调 文化 规模

〔中图分类号〕F4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6-0088-05

一、引言：基于分工视角考察集群企业效率

自波特提出产业集群的概念后，集群研究在经济发展和企业增长领域的地位就如日中天，成为当前经济学界研究区域经济和企业经济乃至发展经济领域中的热点。一般来说，集群内企业的规模一般都是比较小的，甚至集群化程度越高，企业的规模也往往越小；正如斯蒂格勒指出的，“产业的区域化程度越高（产业的规模在某种意义上不变），则单个工厂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在美国地理集中的产业中，工厂规模通常相当小。”[1](P33) 既然集群内企业的规模一般来说都是较小的，从而无法享受规模经济的好处；那么，它的效率或竞争力又来自何处呢？较早关注集群的是马歇尔、A.韦伯以及斯蒂格勒等几乎都将集中在节约成本以及变相规模扩展这一层面上。但集中于成本节约层面并不能对产业集群正效应作出充分的解释，也没有解释为什么集群在促进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可能会面临的潜在隐患，以及集群是如何克服这种隐患而保持持续发展的。

譬如，按照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产业应集聚在资源禀赋丰富、交通便利和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但现实却表明，许多产业集群并不是以区域的资源禀赋为基础的。同样，根据生产要素流动和等价定理，资源禀赋优势会随着集群的企业数量增加而削弱，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会制约区域的集群程度；因此，无论区域的资源禀赋是如何丰富，集群的发展会使得资源越来越稀缺，从而导致要素价格上扬以及投入成本增加，最终又会导致集群的衰退。然而，现实状况似乎并非如此，集群往往会呈现出一种持续的生命力；特别是，很多产业集群并不依赖于当地的自然资源，但依然比较出强大的竞争力。那么，集群企业是如何取得高效率的呢？集群又是如何自我发展的？这就涉及到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问题。

其实，集群企业除了依赖于外在的生产要素外，更主要依赖于自我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这包括技术创新、组织资本、制度资本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资本，而所有这些生产要素本身都是分工深化的产物，因而正是有效的分工与合作不断提升集群企业的效率。关于这一点，杨格在《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一

作者简介 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博士、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文中作了先驱性的分析：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的规模产生的，而是源于专业化和分工的深化；分工使得复杂的程序拆分为一组连续的简单过程，因而分工的深化则主要意味着社会化生产迂回度的延长，从而导致中间产品或制造特殊产业的行业多样化。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分工促进了企业集群的出现，因为分工使得市场规模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张使得机器得以引入、技术得以进步，从而出现了新的相关产业；二是企业集群又深化了企业之间的分工，因为企业集群的存在可以将更多的程序独立出来，因而新兴产业和中间产品更容易在具有传统工业基础的地方出现。[2] 为此，本文主要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二、集群企业效率的两个主要方面

关于集群企业的效率，可从两个方面加以探索。一方面，由于大量小企业的合作，它们共享生产、销售以及技术等资源，从而产生了外源型的规模经济，这也正是马歇尔充分认识到的；实际上，企业集群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存在大量工序型企业和中间产品交易市场，同时最终产品又有较低的运输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企业集群内的最终产品出现产品差异化的潜力比较大，它们之间的分工和竞争增进了各类劳动之间的协调性，从而产生了内源型的分工收益；实际上，企业集群形成的另一个基本条件就是：集群产品存在技术的可分性，从而不同企业的产品之间存在差异化而能够形成互惠合作的劳动分工。

（一）就集群的规模节约经济而言

它主要是指：在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在地理接近的公司和其他的经济单位之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共享和互补，一个小企业不仅可以直接利用自身直接占有的资源，而且可以间接地利用更多的非自有资源；因此，这在一定意义上扩展了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边界，扩大了企业的实质规模，从而产生了产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即低成本的优势。事实上，集群内企业通过网络化联系而产生了明显的集聚效应，它们可以通过统一对外促销、规范品质标准、认同专项技术、推广共同商标、共享集群信誉等“集群效应”谋取单个中小企业很难具有的差异化优势；在某种意义上，传统上独立的中小企业通过集群这一桥梁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将相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的外部性内部化了，从而实质上扩大了企业边界。这具体表现为：产生资源共享效应；形成厚市场效应；培育人才集聚效应；促进技术创新效应；以及提升外部转移效应等方面。

（二）就集群内分工效益而言

它主要是指：在集群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集群内中小企业之间形成了互补合作的网络型关系，这种网络关系在竞争、合作、协作中产生一种结构竞争力；因此，网络型组织本身就成为一种资本，可以创造财富和价值，从而可以实现分工和协调收益，即差异化的优势。在现代社会中，仅仅凭借外部性，规模经济已经无法取得充足的竞争优势了，因为各类信息、资源、劳力已经具有较为充分的流动性；因此，企业的效率更多地来自市场的协调收益，这也是企业集聚之所以发展成为企业集群的原因。这具体体现在：集群内产品存在的产品差异化，集群内企业形成的某种核心能力，集群内企业存在的功能上的互补性，以及集群内企业之间存在着的多层次的协同效应等方面。

三、集群内的协调机制及其文化寓意

上面分析了集群企业效率的两大来源：节约经济和分工效益；其中，节约经济来源于资源的共享和成本的共担，分工效益则主要源自协调机制的增进。一般认为，节约经济是一个集群效率的外层，是马歇尔以及 A.韦伯所观察到了企业集聚中的现象，获取这种节约经济的集聚区企业也并不一定是相互关联的，从而并不一定就是现代意义的集群之核心特征。事实上，如果拉郎配式地不加区别地将不相关企业集中到一起往往缺少高水平的专业分工与协作，而进入的新企业就往往可能衍生出较高的风险和成本；因此，要探究集群企业的效率更重要的是要剖析其分工效益的来源，而这涉及到集群内部的协调机制问题。

(一) 集群内的协调机制

笔者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曾指出，企业发展根本源于劳动间协调增进带来的收益增长，而集群根本优势也正在于集群内企业之间存在较高水平的协调；[3][4][5] 一般而言，企业集群的核心能力就由外部协调能力、内部协调能力和企业自身核心能力构成，因而这里就集群的内外协调机制作一剖析如下。

1. 外部协调能力，主要用来解决企业集群的目标和行为与外部市场的目标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问题。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认为，任何经济组织的活动离不开社会系统并受其制约；集群作为新的经济组织，同样面对如何与政府、社区和其他产业群的关系问题。事实上，集群的外部协调能力是产业群营造适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的重要手段，外部协调能力强，产业群就能获得更有利于自身的外部环境并使之强化；显然，正如上面指出的，集群内各企业的联合一般要比单个企业的外部协调能力更强，这包括对外市场的开拓能力、对产品的营销能力、对原材料市场的谈判能力以及对政府的影响能力等。一方面，由于集群内企业之间的长期交往已经奠定了密切关系的基础，已经培育出了一定的品牌资本，而不必每件事都需要详细讨价和签订加工协议；因此，集群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上的独特优势，它能够提高群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国际市场中的应变能力，对于多品种、小批量、临时急需的订货，集群内可以用最快的方式通知各协作生产企业备料上线。另一方面，在集群内众多小企业与服务单位和政府机构群聚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机构完善、功能齐全的生产—销售—服务—信息网络；并且，由于地理邻近与相互信任，有关产品、技术、竞争等市场信息就可以在集群内企业间迅速集中和传播，且成本很低。

2. 内部协调能力，主要用来解决集群内企业的目标和行为与集群的目标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一般认为，社会环境能通过它所具有的搜寻、转移、选择、转换和对信息的控制等功能，降低不确定性，从这一点看，社会环境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取代市场和科层的有效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正是由于集群内企业之间在长期互动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套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成文或不成文规范的指导下，企业相互信任和交流，从而节省集群的交易成本。特别地，集群内部的分工体系极大地增进了这种协调：一方面，目标朝集群外的最终企业虽然不一定提供生产设备，但它们通过产品加工工艺把中间企业组织起来，因此被称为集群地的生产组织者，并承担着中间企业和市场之间协调者的角色；另一方面，那些生产中间产品的中小企业不直接与市场接触，但借助于最终企业的中介作用其技术进步也能跟上市场需求变化，并由于它不用采购原材料而可以将风险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3. 在集群内部还存在一系列服务中介，这些中介的存在也有助于提高集群的内外协调能力。事实上，在一个较为成熟的集群中，不仅有各种技术性中介结构，如在纺织集群中就有大量多种多样的纺织和服装设计所和设计咨询组织、专门销售图案的设计所和为生产企业提供图案设计咨询服务的机构等；而且，还有会计、法律、经营管理、市场调查、国际贸易、职工培训等服务机构。例如，在意大利的普拉特模式中，分散的小规模家庭企业之所以能够有机地集聚形成一种网络并实现有序的生产，关键就在于被当地称为茵巴瑙托的商业中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中小企业起协调作用的不仅有茵巴瑙托，时装设计商、咨询机构也充当着中小企业的组织者。因此，意大利中小企业集群是由一群承担专业分工的、起协调和组织作用的中介和中小企业相结合而构成的有机体，中介商和中小企业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共同组织了地域生产网络。

(二) 增进集群协调机制的文化寓意

笔者曾把组织的协调机制分解为两大基本类型：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其中，显性协调是指由专门人员对企业生产进行组织、计划、指挥和管理，而隐性协调则是指不需要借助专门人员的指挥活动而基于相同背景的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劳动间的默契。[6] 显然，由于集群内部缺乏明确的或法定的协调管理者，因而集群的协调主要体现在隐性协调方面，而这种协调的基础在于存在良性的社会伦理；事实上，正是丰富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使集群内部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社会嵌入性，集群参与主体的“诚

信”和它们所信奉的商业文化与竞争理念也是集群得以有序成长的基础，石忆邵（2001）甚至认为，以“业主之间的信任和承诺为主要内容的协作精神”是企业集群得以运作的前提条件。而且，在企业集群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是与行为人在这个群体中所处地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在适当的人文环境下，才能在集群内激发“价值链与技术传递链”的整合机制，造成企业间关系的高度合作与协同，实现企业集群内的资源禀赋提升、企业—产业组织提升和技术水平提升。[7]

究其原因在于，集群协调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行信息共享，这种信息共享依赖于相互信任，不仅要求在企业内部形成相互信任的伦理，而且也将这种信任关系扩展到上、下游的供应商与承包商；例如，日本的精益生产就要求把上、下游的供应商与承包商都纳入到生产网络中，要求供应商配合紧迫的进度。显然，要维护这样的供应商网络，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纯粹市场导向的装配—供应关系上，买方公司总是乐于见到各个供应商之间的削价竞争，从而在装配厂和供应商之间造成猜忌和隔阂；而供应商也不肯把价格和制成的资料透露给装配厂，以免对方今后利用这些情报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而且，即使在横向竞争的企业之间，也需要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与别人分享技术，这样才可以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福山就指出，正是由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产生的社会资本，使得硅谷在科技研发方面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而这是那些纵向结合的大公司是无法做到的。[8](P265) 也正因如此，企业集群主要诞生并盛行于那些具有丰富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地区，因为那里存在共同的文化传统、行为规则和价值观，使得集群内部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社会嵌入性：一方面，它有助于集群内部所形成的相互信赖关系，从而可以大大减少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它便于企业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沟通，从而也可以大大促进外部分工。

一方面，就自发内源型的集群而言，其所在地往往具有共同的历史习惯，或拥有某种共享文化传统，特别是伦理认同的传统。事实上，集群中的文化往往源于家庭伦理及其扩展，例如，第三意大利地区就是凭借延伸的家庭纽带创造了以合作为基础的经济联系，并有助于通过家庭网和朋友网寻找新雇员；显然，这种特征在浙江地区的集群中也表现得特别明显，因而浙江的集群往往都是自发内生的。例如，就以集群著称的温州而言，无论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还是交通地理上都不具有优势；但是，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哲学观的历史沉淀对温州人的商品经济意识的崛起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自1876年温州被辟为商埠后，西方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与永嘉学派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碰撞与融合，造就了温州人的以冒险、务实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温州精神”。同时，传统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又造就了温州人集体主义的精神，因此，一旦政策放开温州就很快恢复了传统的商业文化，并在家族伦理以及集体伦理的基础上壮大了企业集群。

另一方面，就移植外源型集群而言，集群要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就必须形成一套合作的文化，并与当地的其他制度规范相容，这也就是目前一些学者主要探讨的集群的根植性问题。就目前的移植型集群的形成而言，一般有两种类型：一是依靠政府创办的集群，这主要是指各地政府创办的各种开发区、高新产业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等；一是由于政策指引而形成外资投资集中的地区，并且这些投资的产业是高度关联的。在这些类型的集群所在地往往没有传统的集体文化，而集群的形成往往是政策或者地理位置的因素；但是，由于人口流动比较频繁而无法形成一个互信的文化伦理，这些地区的集群企业之间也就难以形成良性的合作和竞争关系，更难以形成健全的信息交流机制。正因如此，随着政策优惠不再以及地理位置优势的减弱，这些地区的集群就面临着严重的根植性危机；事实上，广东地区的集群大多是这种类型的集群，因而近年来一些集群已经处于衰退状态，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集群正向其他地方转移。

总而言之，运行良好的集群往往存在共同的文化传统、行为规则和价值观，正是这种社会文化环境氛围促使集群内部形成一种相互信赖关系，大大减少了交易费用，使企业家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容易进行，企业之间的深度劳动分工得以执行。显然，伦理的认同实际上也体现了某种集体主义的文化观念，

而集体主义文化则能够蕴育并适应社会共同治理模式；[9] 也正因如此，社会共同治理模式与集群更为切合：集群内部信息的沟通、流畅以及交易频率的较高，都促进了社会共同治理机制的发展。所以，笔者强调，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分工有序展开、集群对地区的根植性等都有赖于所有地区的伦理化。

四、简短结语

尽管集群的形成依赖于特定的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或者制度资源等），而且，一些小企业集聚在一起可以产生规模经济的效果；但是，集群一旦形成之后要保持其生命力，集群及其内部企业的效率就主要源于分工协调收益，而这依赖于企业之间良性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而要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则需要有这样几个条件：一是要形成产品的差异化，这是深化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二是要形成相互竞争的氛围，这是激励技术创新和提升人力资本的动力；三是形成社会共同治理机制，这是促进合作而防止机会主义的保障；四是要注重文化伦理的培养，这是提高隐性协调水平的关键。事实上，只有建立在基于信任的互动之上，企业之间才可以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从而不仅提高单个企业也可以提高集群乃至整个地区的效率，这正是集群竞争优势的根本所在。显然，这不同于主流经济基于均衡的分析，因为均衡分析往往把集群效率看成是小企业通过联合而实现规模经济的结果，甚至认为“规模经济越大，对集聚的支撑力越强”；[10](P45) 同样，集群往往在特定区域的出现也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由历史或偶然因素对多重均衡进行选择的结果，认为是“历史的一次偶然事件导致了某个地区建立了一个行业，在此之后，累积过程便开始发挥作用”。[10](P48) 巴斯夏强调，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只能是那些不仅看到直接结果，而且也能看到经济政治行为的后续结果的人；就集群而言，我们不是要基于所谓的累积循环效应来解释现在的存在，而是要从演化的角度，探究那些促使集群壮大和萎缩的特殊因素。在笔者看来，影响集群盛衰的核心因素就是文化伦理，它是隐性协调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斯蒂格勒. 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

[2] 杨格. 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 [J] .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2).

[3] 朱富强. 分工效率：演进主义的观点 [J] . 上海经济研究，2004，(1).

[4] 朱富强. 协调机制演进和企业组织的起源：一个演化经济学的分析 [J] . 学术月刊，2004，(11).

[5] 朱富强. 企业治理机制：从单向治理到社会共同治理 [J] . 学术月刊，2007，(12).

[6] 朱富强. 成熟市场下企业效率的比较研究及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启示 [J] . 中山大学学报，2004，(2).

[7] 石忆邵. 企业群落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J] . 工业经济，2001，(10).

[8] 福山.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9] Greif, 1994,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2, No. 5.

[10] 梁琦. 产业集聚论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责任编辑：雨 田

主导产业激励：区域产业集群形成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以广州汽车产业集群为例 *

方建国　谢小平

[摘　要] 本文从产业集群发展理论分析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行为，提出了“主导产业激励”是地方政府发展产业集群的动机的分析观点，并以此分析了广州汽车产业集群生长和根植性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 主导产业　产业集群　激励　地方政府行为

〔中图分类号〕F4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6-0093-04

一、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中的政府因素

关于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中的政府作用，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马歇尔认为产业集群现象来自规模经济，强调市场的作用。韦伯的区位理论认为，工业集聚的产生，是企业通过追求产业集聚的优势而自发形成的，也蕴含着市场作用的意义。

作为对比的是，增长极理论[1]认为，应该通过产业的集聚推动经济增长。而推动性产业的建立可以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来完成。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认为综合体的建设可由国家投资完成，这两个理论都认为政府在产业集群中应当起主导作用。[2]

波特（Porter，1990）对政府在产业集群中的作用论述比较综合。他认为，虽然产业集群一般都是自发形成的，而且产业集群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自组织系统”，但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并非是毫无作为的。政府政策以及其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成长也必然产生重要影响。从现有的案例来看，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产业集聚区，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集聚区，还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集聚区在形成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都相当突出。[3]

从上述产业集群文献研究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推论出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三种：成本导向机制、市场导向机制和政府推动机制。成本优势是企业选择进入产业集群的原因；市场吸引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政府行为则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无论是内生性的本地产业集群还是外生性的 FDI 产业集群，它们的发生和成长都受到这三种机制的交互作用。前两种机制对产业集群的作用是清晰的，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政府愿意有选择地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其背后的激励内因何在。

二、区域主导产业选择对企业集群形成的影响

1. 中国体制转型与地方政府治理转向。

作者简介　方建国，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广东　广州，510275）；谢小平，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275）。

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产业集群的成长，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用今天的发展环境和责任来考察城市政府的角色，地方政府似乎是“公共企业家①”。[4] Osborne和Gaeble（1992）认为，在全球竞争环境中，政府仅仅依靠公共服务和保障是不够的，必须是积极的“企业型政府”，采取“更加具有创新性和更加企业化的行动方式”（Harvey，1989）。在“新城市政策”中（Cox，Mair，1988；Kirlin，Marshall，1988），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地方福利和服务，而是积极地利用企业家精神改革公共管理部门，施行更加外向性的，用于培养和鼓励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策，地方政府力求在任期内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表现出原本属于企业的一些特征，② 即建立“企业家型的政府”。[5]

对于中国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倾向的原因，戴慕珍（Jean Oi，1992；1995；1998；1999）在对财政改革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经验描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法团主义”理论，将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推动乡村工业化的制度性因素归结为财政体制改革及农业的非集体化；Andrew Walder（1995）探讨了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在组织特征方面存在的差异，阐明了为什么地方政府与高层政府相比，具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行使作为所有者的权益，形成了“政府即厂商”的理论，并考察了不同层级政府在不同的财政激励及非财政激励下的行为。

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强烈需求使地方经济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地方经济增长与政府官员的政治利益也紧密关联。

2. 地方政府的目标利益驱动与主导产业选择。

（1）地方政府的目标利益驱动：背景及行为。

财政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也赋予地方相对独立的利益。因此，地方政府具备了公共行政主体与经济利益主体的双重身份，既追求地方政治利益最大化，也追求所在地区经济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具有多样性。

在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体制的空缺造成了寻租的空间。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控由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政府为了获取有效的行动能力而争取企业的支持；企业为了谋取地方保护和获得源自不完全竞争的垄断利润也希望与地方政府合作。因此，掌握着权力的地方政府和控制着资本的企业可能形成各种“增长联盟”。[6]

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在地方政府之间营造了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分权化使得地方政府失去了大量原本来自中央的直接投资；而市场化改革则使得地方政府失去了对许多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因而吸引外资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彰显政绩的一个重要载体。由于我国的基本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快速发展将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并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因此，地方政府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推动地方经济特别是主导产业快速发展是地方政府行为的集中表现。

（2）主导产业选择对经济增长的意义。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由于区域经济增长率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某些关键部门或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迅速增长而产生的结果，因而地方政府的有效选择是利用公共产品供给要素优势和优惠的财税政策，实行产业倾斜政策，重点发展具有创新能力、高速增长和扩散效应的主导产业，这对实现区域内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地区经济全面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来看，地方政府对主导产业的选择和鼓励政策将会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起到

①Lewis（1984）将“公共企业家”界定为：通过创新性行为，尽可能大幅度地改变公共组织对稀缺性公共资源既有配置方式的行为者，从而提升组织权威和影响力。

②这些特征包括：冒险、创新、促销和利益驱动，等等。

积极的作用。[7] 对比广东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后的 “十五” 期间 GDP 的增长率为13.2%，主导产业的完成增加值的增长率为 23.0%，[8] 说明主导产业选择对地方政府有正向的目标利益激励作用。通过政府行为扶植、推动具有带动效应主导产业的发展，从而支持区域经济持续增长，是地方政府普遍采取的行为模式。因此，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只有符合地方政府的主导产业选择方向，才有可能获得地方政府在城市公共品和其他政策供给方面的扶持和鼓励。

三、地方政府主导产业选择对集群形成的影响分析 ——以广州汽车产业集群为例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制造基地的国际转移是一个大趋势，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和巨大市场潜力是汽车产业转移的基础，而国际竞争又在某种程度上是产业集群的竞争，所以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不仅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国际分工、产业转移的需要。从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态势分析，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后期阶段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我国整体经济仍然处于工业化时期，广州的城市经济发展必须经过重化工业时期才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因此，在 2001- 2010 年广州的城市发展战略中，广州市政府选择了以扶持汽车、钢铁、石化和信息产业作为广州工业化中后期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为城市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提供了产业基础支持，也适应了我国居民大额消费品从家电级别（千元到万元级别）向汽车、房产级别（几十万到百万元级别）转变的要求。

随着日系本田、丰田、日产三大世界级汽车制造商云集广州，加上已落户的百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广州在市场选择和政府支持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 ‘汽车产业集群’，广州极有可能在未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汽车制造基地。而直接导致广州汽车工业巨大变化的广州汽车集团盈利能力、资产运作、偿债能力等多项经济效益指标在全国汽车企业中名列前茅。一个以广汽集团为核心的广州汽车产业集群的崛起，很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广州市政府的大力扶持。

1. 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与制度供给对广州汽车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

地方政府的扶持首先是在公共品的供给方面，广州市政府通过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本地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提供水、电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完备的工业园区，建立快速的交通和物流系统等给企业集聚和降低运输成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例如，广州地铁 3、4 号线以及广园东路快速路的建设，南沙黄阁镇的丰田汽车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广州汽车产业的竞争力，提高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汽车消费市场的消费水平和市场吸引力。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目前是中国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占全国市场量的 1/4。[9] 其次，地方政府的作用还体现在制定和吸引投资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和丰富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协调企业之间的共同行动等方面。第三，地方政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和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促进了产业升级。通过产业群体或主体的共同参与，树立本地区的良好形象，创造产业集群的地域品牌。近几年的实践证明，广东省、广州市政府正是广州汽车产业集群的积极推动者和扶持者（张房有，2003）。目前，广州市在花都、增城、南沙、罗岗等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区，大多以汽车产业作为区域内的主导产业，汽车产业给广州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增城市原来的主导产业有水泥和牛仔服装两大传统产业，通过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淘汰和引进新型的技术密集、人才密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调整了城市经济产业结构，使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现在增城市的工业体系有三大支柱：（1）汽车产业，2007 年上半年产值 70 亿元；（2）牛仔服装产业（传统产业），2007 年上半年产值 44 亿元，同比去年下降了 27%；（3）摩托车配件产业，2007 年上半年产值 30 亿元，比去年增长 39.43%。这三个产业 2006 年占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8.61%。

2. 地方政府政策支持对广州汽车产业集群根植性成长的引导。

过去的研究通常认为外生性的 FDI 产业集群比内生性产业集群的根植性差，容易发生迁移，从而使区域经济出现衰退现象。如何使广州的汽车产业集群从外生性产业集群发展成为具有根植性的产业集群是广州市政府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广州市政府和有关区级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方面的问题，通过出台了一些鼓励性的规定和措施，促进合资企业提高本地化的研发能力、自主创新和形成自主品牌，来解决根植性问题。并且，这些政策已经初见成效。2006 年 3 月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宣布，位于广州花都区新建的东风日产乘用车技术中心已经竣工。该技术中心总投资为 3.3 亿元，占地面积 20 万平方米，是目前华南地区最大规模的汽车研发基地，研发人员大多来自国内。2007 年 11 月广汽集团宣布总投资 68 亿元的汽车研发生产基地正式落户番禺化龙镇。这些研发基地的建设标志着广州汽车产业集群未来将向提高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和根植性的方向发展。

目前，广州市政府在发展汽车产业集群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6 年汽车产业总产值首次超过传统的石化产业，成为全市工业经济规模最大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2007 年规模以上汽车工业总产值超过了 1100 亿元。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广州已初步形成了华南地区最大的汽车生产、贸易和研发的产业基地，成为中国三大汽车产业集群之一。在国内中高档轿车市场上也出现了 “广州基准价”。由于上千家零配件企业组成的汽车产业集群的形成，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加速发展，促使广州产业结构成功实现适度重型化的转型。[10]

四、结论与启示

产业集群的文献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行为只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他如跨国公司全球产业转移、目标市场成长和运输成本最小化都是引发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因素。但是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在扶持产业集群发展方面还是有较大的行动空间。广州市政府通过主导产业升级引导政策选择了一条集约化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使得广州的经济规模和汽车产业集群发展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广州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给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研究提供了启示：1. 外生性的产业集群如何能够在本地区可持续地根植性成长；2. 地方政府在选择和扶持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如何达到既能引导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又能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目的；3. 主导产业激励对地方政府发挥其扶持产业集群生长政策有积极的意义；4. 地方政府对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扶持政策不仅包括提供一般公共品，而且还要在市场拓展和技术创新方面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构建发展平台；5.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有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需求的政策才能促进产业集群的持续成长。

[参考文献]

[1] 弗郎索瓦•佩鲁. 新发展观 [M]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 臧新. 政府在产业集群中的制约因素和可为空间 [J] . 生产力研究，2006，(10).

[3] 蒋东仁. 产业集群成长中政府功能定位与政府行为的内生性 [J] . 管理现代化，2006，(5).

[4] lewis, W.A., 1984. 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Theory [J]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4,no.1.

[5] 孙学玉. 企业型政府论 [M]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 Logan, J. R., and H. Molotch. 1987. Urban fortunes [M] .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7] 张锐，郭涛. 日本主导产业演进对我国主导产业选择的启示 [J] . 当代经济，2005，(11).

[8] 罗必良. 广东产业结构升级:进展、问题与选择 [J] . 广东社会科学，2007，(6).

[9] 张房有. 产业集群与广州汽车工业 [J] . 中国机电工业，2003，(24).

[10] 罗艾桦. 刮目相看广州汽车 [N] . 人民日报， 2008- 01- 14.

责任编辑：雨 田

历史学

共入临川梦中梦

——试论陈寅恪先生的《牡丹亭》之杜丽娘“至情”说

姜伯勤

[摘 要] 1998 年，多卷本《吴宓日记》发表。吴宓先生 1919 年 3 月日记，披露了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昆曲《牡丹亭》中杜丽娘之“至情”说。陈寅恪先生诗学中，强调“古典”为旧籍出处，“今典”为当时事实。《吴宓日记》之新资料，使寅恪先生《诗集》中若干与牡丹亭及汤显祖相关的“古典”豁然通解。对陈寅恪先生研究中这一新课题的探讨，增进了我们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1 年将“昆曲”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刻意义的认识。

[关键词] 陈寅恪 《牡丹亭》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97-05

一、“共入临川梦中梦”

陈寅恪（1890-1969 年）先生《诗集》中有 1957 年 5 月作《丁酉赣剧团来校演牡丹对药梁祝因缘戏题一诗》，诗云：

> 金楼玉茗了生涯，（年来颇喜小说戏曲，梁祝事始见于萧七符书也。）老去风情岁岁差。细雨竟鸣秦吉了，故园新放洛阳花。相逢南国能倾国，不信仙家果出家，共入临川梦中梦，闻歌一笑似京华。[1] (P126)

此“玉茗”即汤显祖（1550-1616 年），江西临川人，著有《玉茗堂文集》。“共入临川梦中梦”，当与汤显祖相涉。

陈寅恪先生强调中国诗学中有古典与今典，“古典”为旧籍之出处，今典为当时之事实。[2] (P7)

以“古典”言之，1550 年，江西临川诞生了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为同时代人。其剧作有“临川四梦”，即 1598 年完成的《还魂记》（《牡丹亭》）、1600 年完成的《南柯记》、1601 年写作的《邯郸记》和《紫钗记》。郑培凯先生在大著《汤显祖与晚明文化》一书中，第四章《汤显祖的文艺观与〈牡丹亭〉曲文的艺术成就》所论，从李贽的“童心”、“真心”、“本心”的“绝假纯真”，论及汤显祖所塑造之杜丽娘的“情至”与“情真”；第六章《解到多情情尽处——从汤显祖到曹雪芹》，亦分析了《牡丹亭》的情至情真。[3] (P218-232)

如后节所述，陈寅恪先生 1919 年即提出《牡丹亭》杜丽娘之“至情”说，这就是 20 世纪 50 年代所作“共入临川梦中梦”诗句的背景。

以“今典”言之，《陈寅恪编年事辑（增订本）》1957 年条云：“本年前后，先生喜听京剧、昆曲等[藉抒思古之幽怀，如遇京中名角来穗]，时驱车市内欣赏之。”如该年诗中有“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

作者简介 姜伯勤，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此一时期陪同陈寅恪先生听曲诸先生中，有一位戏剧史专家董每勘先生。1957 年 3 月 31 日，陈寅恪先生作对联 “古董先生谁似我，新花齐放此逢君”以赠广州京剧团。如《诗集》编者注指出，上联 “古董先生谁似我”一句出自 《桃花扇》词曲，下联 “新花齐放此逢君”中 “新花齐放”取百花齐放意。此联之今典，如 《诗集》编者注所教示：“古”作陈先生解； “董”指中大教授董每勘先生； “新”指新谷莺； “花”指华兰频。[1](P188)

此联表明 1957 年春反右运动前陈先生对传统戏曲的百花齐放是愉悦的。

此联也说明，由于寅恪先生深厚的诗学修养，对 《桃花扇》词曲烂熟于心，故能随时活用。

二、 “情之最上者”：陈寅恪先生诗学中的 “至情”说

“情之最上者”，这是陈先生 1919 年对 《牡丹亭》中之杜丽娘的评价。

《吴宓日记》1919 年 3 月 26 日：

> 陈君又论情之为物，以西洋所谓 sexology 之学，及欧洲之经历参证之，而断曰：(一) 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 《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 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 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 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 最下者，随处结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此与中国昔人之论有合也。 (有情者曰贞，无情者曰淫)。

“情”分为超越生死的 “至情”、纯情 “贞女”、终身相守的 “夫妇之情”等几个类别，吴宓先生则又区分为 “贞”与 “淫”的对立。[4](P21-22)

汤显祖在 《牡丹亭》 “作者题词”中说：

> 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5]

又说：“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万历戊戌秋清远道人题。”万历戊戌为 1598 年。

汤显祖本人在写作剧本时，又注意到 “意为情伤”。本事见于 《牡丹亭还魂记》卷上第一出：

> [汉宫春] 杜宝黄堂，生丽娘小姐，爱踏春阳。感梦书生折柳，意为情伤。写真留记，葬梅花道院凄凉。三年上，有梦梅柳子，于此赴高唐。果尔回生定配，赴临安取试，寇起淮阳。正把杜公围困，小姐惊惶。教柳郎行探，反遭疑，激恼平章。风流况，施行正苦，报中状元郎。[5](P1)

莱辛在 《拉奥孔》一书第二章指出：“美就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6](P11) 《牡丹亭》在表现鬼界判官时，虽其面貌为鬼，却表现了高度的美。道姑是一个丑旦，但她在呵护杜丽娘复生，呵护生命当中，却表现出了崇高的人性美。这是一种隐喻，在杜丽娘的 “至情”面前，法的力量、宗教的力量，都变成一种呵护美的存在。这种人间的至情，当然使陈寅恪先生心折。

寅恪先生晚年一直在 “颂红妆”，即研究陈端生 《再生缘》、柳如是等，目的就是 “说尽人间未了情”。1954 年所写之 《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传奇诗因亦赋答绝句五首近戏撰 〈论再生缘〉一文，故诗语牵连及之也》，其中有：

> 艳魄诗魂若可招，曲江波接浙江潮。玉环已远端生近，暝写南词破寂寥。
>
> 一抹红墙隔死生，皕年悲恨总难平。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
>
> 丰干饶舌笑从君，不似遵朱颂圣文。愿比麻姑长指爪，傥能搔着杜司勋。①

这是寅恪先生 1954 年的文学宣言和庄严生命的宣告。 “不似遵朱颂圣文”，不作那些教条主义的文字，而为 “艳魄诗魂”来招魂，不写杨贵妃了，专写陈端生，虽然一抹红墙阻隔着生死，但对几百年前这些

① 参见陈寅恪 《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 年，第 106 页，录自 《柳如是别传》第 5 章。

才女的悲恨，总是游动于心，虽然双目失明，仍要用惊人的毅力“悦尽人间未了情”。

我们把1919年陈先生对吴宓先生盛赞《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卓识和1954年“悦尽人间未了情”的宣告连起来看，寅恪先生不愧是20世纪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以毕生的人文关怀，来研究和抒发中华历史上美女子的至情。陈寅恪先生弘扬“至情”，体现了陈先生的中国诗学素养与诗教观念。

广义的中国诗学包括诗、词、歌、曲等，它是汉字文化派生的独特文化景观，与传统中国人语音及用韵有关。而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新近在海峡两岸及美国西海岸等地上演的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牡丹亭》演员唱念用韵，极具功力。

中国人极重视诗教，青春版《牡丹亭》第三出《闺塾》，在京戏及其他剧种中称作《春香闹学》，要背诵《诗经》中的《关关雎鸠》，老师陈最良对侍女春香说“你且背来”，春香说：“先生，烂熟了还要背？”陈最良说“自然要背”，即是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陈老师说：“一句都背不出，还说烂熟的了，回去重读。”[7](P141) 陈开讲，说“闺门内许多风雅”，“只这无邪，付与儿家”。对《关雎》等《诗经》中篇章的开讲与背诵，所反映的正是古代中国人的诗教。

1964年，寅恪先生写作《岁暮背诵桃花扇余韵中哀江南套以遣日聊赋一律》，诗云：

早年熟读兰成赋，晚岁高歌曲阜词。
东海西山无限感，南朝北里有情痴。
病余皮骨宁多日，看饱兴亡又一时。
却笑盲翁空负鼓，赵家庄里怕人知。[1](P161)

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第三章有言：“河东君（即柳如是）自两游嘉定，与程孟阳唐叔达李茂初辈往来以后，始知诗学别有意境，并间接得见（钱）牧斋论诗之文字，遂渐受钱程一派之薰染。”[2](P345) 由此得知陈先生“诗学别有意境”的论点。我们也可以说，由牡丹亭杜丽娘所见的“至情”，是寅恪先生诗学中之“别有意境”的所在。

三、寅恪先生对传统戏曲的文化守护精神

一个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存发扬，与学术大家的文化守护精神分不开。

著名散文家董桥先生在《董桥散文》论“中国情怀”时写道：

> 听说，鸣放运动期间，有人要陈寅恪出来讲话，陈先生只说了一句“孟小冬戏唱得较好，当今须生第一，应该找她回来唱戏，以广流传。”话虽浅白，含义深远，十足表现出文化人在文化传统变形时代里应有的情怀。[8](P318)

孟小冬（1908-1977年）扮演余（余叔岩）派老生。20世纪50年代移居香港，为弟子清唱说戏，[①] 1967年始定居台湾。陈先生说请孟小冬回来，是请她从香港回祖国大陆，这段话反映了陈先生对孟氏艺术的欣赏和热爱祖国、希望优秀人才回归的爱国情怀。

1956及1957年反右前，陈先生心情很好，其实陈先生那时还贴出过一幅有关的著名对联。1957年1月31日春节对联云：“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陈寅恪先生的诗学谓，了解古典易，了解今典难。这“新莺”是指广州京剧团旦角演员新谷莺。

一幅1959年与陈寅恪先生的合影中，即有新谷莺和端木正先生夫人姜凝老师。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9](P164-174) 1957年诗作有：《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丁酉春日听唱〈西厢记〉戏题一绝》、《丁酉首夏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对药梁祝因缘戏题一律》、《听刘映华张淑云演唱穆桂英剧戏题三绝》、《丁酉小雪后六日晓莹以微病未能偕往市区听新谷莺演王宝钏意有不乐赋此慰之》。1958年诗有：《戊戌六月廿九日听南昌市剧团李今芳演玉堂春戏题三绝句》、《戊戌

---

①天津余叔岩及孟小冬艺术学会等制作《孟小冬唱腔及为钱培荣说戏录音集粹》，天津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又见许锦文《梨园冬皇孟小冬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年中秋夕首创初愈入城重听新谷莺望江亭》。1959 年诗有：《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并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不同也，七律三首》、《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沈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一律》。1960 年诗有：《庚子春日听广州京剧团演新排〈西厢记〉悲剧，新谷莺饰莺莺，孙艳琴饰红娘戏作一律，寅恪昔年尝撰〈读莺莺传〉论文，故诗语及之》。1962 年诗有：《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夕广州京剧团新谷莺诸君来中山大学清唱追感六年前旧事仍赋七绝三首以纪之》。

从《陈寅恪集•诗集》中我们读到，《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并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不同也，七律三首》有云“关心曲艺休嫌晚，置酒园林尽足夸”。《庚子春张君秋来广州演状元媒新剧……》有云“今夕闻歌还一笑，岭南春好落花迟”。[1] (P131、134)

总上所见，在 1957 年春，1959、1960 年那些比较宽松的日子，寅恪先生的戏剧生活十分愉悦，而 1959 年设宴一诗所云“关心曲艺休嫌晚，置酒园林尽足夸”，表明寅恪先生的伟大人文关怀和对传统文化的崇高的守护精神。

这里，我们试从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学术独立”的呼唤，看白先勇先生青春版《牡丹亭》革新成就的世界性影响。

陈寅恪先生把“本国艺术史学”的建设，看作是达成“中国学术独立”[10] (P361-362) 的重要工作。寅恪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陈寅恪先生指出：“窃疑中国至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和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地位。”在文化上“不忘本民族之地位”，[11] (P284-285) 这是寅恪先生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

四、后论：《牡丹亭》与“非物质文化传承”——以《柳如是别传》为例

白先勇先生青春版《牡丹亭》在海峡两岸及美国西海岸的巨大成功，满城争说《牡丹亭》，带来了作为一种雅文化的昆曲代表作的复兴，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2003 年 9 至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表演艺术”、“礼仪”、“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而“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和振兴”。

郑培凯先生进一步申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宜译为“非物质文化传承”，其载体可分为三大类：(一)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二) 以文物古迹为载体的实物遗存。(三) 以口传心授为载体的非实物文化艺术传承。

昆曲在 2001 年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① 由此，促进了对昆曲历史的研究，也自然使我们想起陈寅恪先生这样一位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学者。

“非物质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学术独立”的不可或缺的途径。一个有深刻意味的例子是，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第三章指出，柳如是写作的金明池《咏寒柳》词，受到汤显祖《紫钗记》的影响。陈先生说：

> 寒柳词之“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及“纵饶有，绕堤画舸”等句，盖取自汤玉茗紫钗记第贰伍出“折柳阳关”之“解三醒”中“也不管鸳鸯隔南浦”，并“落照关西妾有夫，河桥路，见了些无情画舸，有恨香车”等句。河东君（按即柳如是）妙解音律，善歌此曲，遂用兹曲中成语，固无可疑，更检紫钗记第捌出《佳期议允》云……恨重簾，凝约何时见……兀自梅梢月在。[2] (P343-344)

---

①参见郑培凯主编《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现状与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导论第 4 页，文献：1-19 页。

陈先生又据汤显祖《紫钗记》第伍叁出《节镇宣恩》云："……幸好淡月梅花，拾取钗钿。"指出：

（柳如是）寒柳词之"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簾，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与玉茗（即汤显祖）之曲，其词语有关，尤为明显。[2](P344)

寅恪先生还写道，（柳如是《寒柳词》之）"约个梅魂，黄昏月淡"除用汤（显祖）曲外，原出朱淑真断肠词生查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典。[2](P345)

以昆曲之文化遗产在大学的传承而言，在陈寅恪先生文化守护精神的感召下，笔者自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以来，亲见师辈的高度文化教养。笔者于本科一年级，有缘在永嘉刘节先生府上攻读《周易》二阅月，课间刘节先生常引导欣赏宋代画册，又曾有缘听到刘节先生演奏笛子。笛子乃昆曲演唱之主要伴奏乐器。历史系周连宽先生的夫人郑兰师母，精于昆曲演唱。笔者1976年至1982年在国家文物局跟随唐长孺先生，于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忝陪末座。长孺先生是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外甥，精于昆曲，在同组马雍先生、朱雷先生的诚挚邀请下，长孺先生曾演唱昆曲，笔者亦有缘在整理组内聆听。返观今日我辈作为大学历史系教师，文化素养与师辈相去十万八千里，十分汗颜。

2006年12月1-3日，白先勇先生策划，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昆山市昆剧艺术团演出的青春版《牡丹亭》，在中山大学隆重上演。此剧上本为《梦中情》，中本为《人鬼情》，下本为《人间情》。三本连台好戏，厥为2004年自台北、新竹、香港、苏州大学演出以来之第97场。12月3日晚，中山大学梁銶锯堂之以青年为主的观众，起立欢呼，盛况空前，足证大学应该是传承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空间。

由是，亦回想起大学本科三年级时，1957年5月江西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对药的盛况，当年这类演出常由董每勘先生作幕前解说。此次演出寅恪先生亦出席听戏。笔者因家世因缘，自少年时代以来便流连戏场。入中山大学后，与同班戏迷黄宣民同学（江西人氏）等从不放过此类机会。今黄兄已作故人，思之不胜感怀！而对传统戏曲的爱好，帮助我们走过了艰难的学术人生。

回想1955年初入中山大学不久，黄兄等同班一群青年朋友，曾前往东山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杜国庠先生寓所造访。杜老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陈寅恪先生是爱国的大学问家，要好好向陈寅老学习。五十余年来，一直未忘此语。观摩青春版《牡丹亭》期间，又有缘购读《吴宓日记（1917-1924）》，因又读及寅恪先生当年的杜丽娘"至情"说。因缘巧合，故有此文之写作。《学术研究》是在杜老关心下成长的学术园地，也是笔者青年时赖以成长的学术家园。今日躬逢此一园地成立50周年之盛，不揣简陋，恭撰此文，籍以献出一片心香。并祝愿此一园地为我们带来一片"姹紫嫣红开遍"的学术盛世的景象。

（为纪念《学术研究》50周年而作）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 陈寅恪集·诗集 [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2] 陈寅恪. 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3] 郑培凯. 汤显祖与晚明文化 [M].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

[4] 吴宓. 吴宓日记Ⅱ（1917-1924）[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5] 汤显祖. 牡丹亭（作者题词）[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莱辛著，朱光潜译. 拉奥孔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7] 白先勇策划. 姹紫嫣红《牡丹亭》：四百年青春之梦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 董桥. 董桥散文 [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

[9] 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0] 陈寅恪.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 [A].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 [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11] 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R].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 [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责任编辑：郭秀文

论中晚唐国家礼书编撰的新动向对宋代的影响

——以《元和曲台新礼》、《中兴礼书》为中心

吴 羽

[摘 要] 王彦威在唐元和十三年（818 年）编撰《元和曲台新礼》，并得到朝廷认可，标志着国家礼书编撰者的职业化、国家礼书的案牍化正式拉开帷幕。这种国家礼书编撰的新动向，深刻影响了宋代的国家礼典编撰，《中兴礼书》为我们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关键词] 《元和曲台新礼》 《中兴礼书》 职业化 案牍化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6-0102-06

一、引言

《元和曲台新礼》（或云《曲台礼》，或称《曲台新礼》，以下简称《曲台礼》）与《续曲台礼》都是得到国家认可的礼书，皆王彦威所编，前者于元和十三年编就，[1](P6775) 后者在长庆中（821-824 年）"采元和以来王公士民昏祭丧葬之礼"集成，① 今已不存，尚有片段散见于唐宋文献。业师姜伯勤先生对其编撰特点有深入研究，指出这两部书"本来就是元和年间礼仪制度新旧交替的写照"。[2](P452)

南宋太常主簿叶宗鲁《中兴礼书续编序》曰："元和郅隆，礼官所续《曲台新礼》，自长庆以后莫不次第编录，是以朝仪国范，粲然复振。然则圣明继述，上以挥一代之典章，下以垂万世之法式，载之简策，倘或未备……臣列属礼官……谨用采摭，续成八十卷。"[3](P473) 这表明，叶宗鲁认为自己续《中兴礼书》是效法元和礼官续《曲台新礼》，把宋代的《中兴礼书》、《中兴礼书续编》看成唐代的《曲台新礼》（即王彦威《曲台礼》）、《续曲台礼》。

为什么南宋编修国家礼书之人不效法对宋代影响甚巨的《大唐开元礼》，也不效法奠定一代规制的《开宝通礼》，甚至连《太常因革礼》和较近的《政和五礼新仪》也不提及，而要效法中唐的《曲台礼》？为探究这些问题，我们将先考察王彦威其人以及《曲台礼》的编撰特点，再探究其对两宋礼书编撰，特别是对《中兴礼书》和《续中兴礼书》编撰的影响，希望借此凸显唐宋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

二、唐代国家礼书编撰者的职业化对宋代的影响

唐代所编国家礼书，遍载五礼的主要有贞观礼、显庆礼、《大唐开元礼》、《贞元新集开元后礼》、《礼阁新仪》、《曲台礼》、《续曲台礼》。

王彦威《曲新礼》和之前的国家礼书相比，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是编撰者身份不同。

修纂贞观礼的有长孙无忌（《旧唐书》卷 65 有传）、李百药（《旧唐书》卷 72 有传）、颜师古（《旧唐书》卷 73 有传）、令狐德棻（《旧唐书》卷 73 有传）、孔颖达（《旧唐书》卷 73 有传）、于志宁（《旧

作者简介 吴羽，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510631）。

①参见《新唐书》卷 11《礼乐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309 页；《直斋书录解题》卷 6《礼注类》，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176 页。

唐书》卷78有传)，尤其是孔颖达，起的作用更大。[4](P167) 这几人都是当时的高官显宦，出自世家大族，乃饱学之士。

和贞观礼情况类似，显庆礼的修纂者也同样是高官显宦、出身世家大族者、饱学之士的组合。据《唐会要》卷37《五礼篇目》，参与显庆礼编撰的有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旧唐书》卷70有传)、中书令李义府（《旧唐书》卷82有传)、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旧唐书》卷81有传)、黄门侍郎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旧唐书》卷82有传)、太常少卿韦琨、太学博士史道玄、符玺郎孔志约、太常博士萧楚材、太常博士孙自觉、太常博士贺纪等。[5](P670) 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许敬宗和李义府，《通典》卷41《礼序》称"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其所取舍，多依违希旨"，许敬宗、李义府、史道玄是武则天重用之人，其他则或是高官显宦，或出自世家大族，或为饱学之士。

至唐玄宗时修《大唐开元礼》，仍然是高官和儒学大家主持。该书的编撰由萧嵩领衔，实际主事者乃王仲丘，萧嵩时为集贤院学士，出自世家大族兰陵萧氏，《旧唐书》卷99有传；王仲丘时为起居舍人，其祖在高宗时有名当世，他本人也是当时的儒学大家，《新唐书》卷200有传。可见安史之乱前参加国家礼书编撰是一种崇高身份的象征。

安史之乱以后，据《唐会要》卷36、《旧唐书》卷13，贞元十七年（801年）太常卿韦渠牟编《贞元新集开元后礼》；元和十一年（816年）秘书郎修撰韦公肃又录开元以后礼文损益为《礼阁新仪》30卷。韦渠牟，《旧唐书》卷135有传；韦公肃，《新唐书》卷200有传。二人皆出自高门大族京兆杜陵韦氏。

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乱以后两部礼书的编撰者虽然出自世家大族，官职仍然不低，但是和前面礼书的编撰者相比，已经有所下降，而且韦渠牟当时是太常卿，本就主持和国家礼仪有关的事务，韦公肃时为"秘书郎修撰"，职在修书。这说明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礼书的编撰者开始有了职业化的倾向。

而王彦威编撰《曲台礼》和《续曲台礼》则标志着国家礼书编撰者的职业化正式形成。王彦威，《旧唐书》卷157有传。刘禹锡曾为王彦威之父王倰撰神道碑，载王倰十代祖乃苻秦王猛（北齐时王门甚盛，兄弟九人，时号王氏九龙[6](P417))，但是似乎在王倰之后，其家就已经开始衰落，王倰虽官至监察御史，[7](P593-594) 但是《旧唐书》王彦威本传称王彦威"少孤贫苦学，尤通三礼，无由自达。元和中游京师，求为太常散吏。卿知其书生，补充检讨官"。可见到王彦威时，其家已经败落。《旧唐书》本传云彦威"掇拾自隋已来朝廷沿革、吉凶五礼，以类区分，成三十卷献之，号曰《元和新礼》，由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太常博士本就不是高官，据《大唐六典》卷14，仅为从七品上，太常寺中太常博士之下就是谒者，根本没有官品。王彦威编成《曲台礼》之后，受到朝廷肯定，才"特授"太常博士，可见他编撰此书时在太常寺中根本就不是官，地位连谒者都比不上。因此，王彦威编《曲台礼》并得到国家的承认，表明参与编撰国家礼书不再是一种身份崇高的象征，仅仅是一份工作而已，这标志着国家礼书编撰者的职业化正式形成。

宋代国家遍载五礼的礼典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开宝通礼》、《政和五礼新仪》，旨在奠定规制，让后世遵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四库全书总目》卷81，前者由翰林学士卢多逊领衔编修，后者由知枢密院郑居中领衔编修。

第二类是《太常因革礼》及其历代的续编，首列《开宝通礼》内容，次记之后的沿革，附记新出礼仪与废而不行之礼，《太常因革礼》虽由欧阳修提议，实际上乃霸州文安县主簿苏洵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事见《宋史》卷443"苏洵传"，二人并非高官。

第三类是《礼阁新编》、《太常新礼》、《中兴礼书》、《中兴礼书续编》，系对已行之礼的编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同知礼院王皡编成《礼阁新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146，吴育景祐四年（1037年）倡导编撰《太常新礼》，当时官"同知礼院"，尽管庆历四年（1044年）修成时已经有不少高官参与其中，如提举参知政事贾昌朝等，但实际主事者

仍是太常礼院的一般官吏；据《中兴礼书•序》，其编撰者并非高官，虽然声称由太常寺的卿、少、博士、丞、簿一起编撰，实际上的执行者是太常寺的下级官员；据《中兴礼书续编•序》，《中兴礼书续编》由太常寺主簿叶宗鲁主持编集。

可见宋代第三类国家礼书的编撰者都不是高官显宦，尤其是《中兴礼书》及其续编的编撰者，都是供职于太常寺的一般职业官吏，这一点和《曲台礼》最为契合。也正因如此，南宋的叶宗鲁才把《曲台礼》、《续曲台礼》看成自己编书的楷模。

从这一系列史实，我们也看到了中晚唐开始形成的国家礼书编撰者的职业化，对两宋国家礼书编撰的深刻影响。

三、唐代国家礼书的案牍化对宋代的影响

安史之乱以后的《贞元新集开元后礼》、《礼阁新仪》、《曲台礼》、《续曲台礼》和安史之乱以前的礼书还有一个重大不同，即安史之乱以前的国家礼书都是对以前的礼仪进行整合，然后制定出标准的仪式，仅记载整合后的标准仪式；而安史之乱后，据《新唐书》卷 11、《唐会要》卷 36，国家礼书则是根据国家已行礼仪的有关案牍损益而成。《曲台礼》是集大成者，最有代表性。

据《唐会要》卷 37，王彦威所编《曲台礼》是“集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已后至元和十三年五礼裁制勅格”，并载他在献书之时的上疏，其中说道：

> 臣闻，礼之所始，及损益之文，布于前书，不敢悉数。开元中，命礼官大臣，改撰新礼，五礼之仪始备。又按，自开元二十一年已后，迄于圣朝，垂九十余年矣，法通沿革，礼有废兴，或后勅已更裁成，或当寺别禀诏命，贵从权变，以就便宜。又，国家每有礼仪大事，则命礼官博士，约旧为之损益，修撰仪注，以合时变，然后宣行，即臣今所集开元已后，至元和十三年，奏定仪制，不惟与古礼有异，与开元仪礼已自不同矣。又检修礼官故事，每详定仪制讫，则约文为之礼科，以移责于百司，又约之以供备，然后礼事毕举。礼科者，名数之总，与仪注相扶而行者也，阙一不可。臣今所集，备礼科之单复，具供给之司存，欲使谒者赞引之徒、官长辟除之吏，开卷尽在，按文易征。其它五礼之仪式，或旧仪所不载，而与新创不同者，莫不次第编录。窃以圣朝典礼，于元和中集录。又，曲台者，实礼之义疏，故名曰《元和曲台新礼》，并目录勒成三十卷。谨诣光顺门奉表以闻，伏乞裁下。

王彦威此处奏文突出了自己所编礼书的特色。从内容上看，一是集合“开元已后至元和十三年奏定仪制”；二是“礼科”，乃是“每详定仪制讫”的约文；三是“其它五礼之仪式，或旧仪所不载，而与新创不同者，莫不次第编录”。旧仪指的是从前的礼仪，新创应该是指《贞元新集开元后礼》、《礼阁新仪》中和《大唐开元礼》相比属于新创的内容。

所谓“集开元二十一年已后至元和十三年五礼裁制勅格”，或称“开元已后至元和十三年奏定仪制”，指的是礼官在修订仪注时，奏请朝廷同意，朝廷裁制这个过程中的公文书，其中的一些裁制被上升为格，故统称“裁制勅格”。“裁制勅格”的中心为“仪制”，牵涉面很广，包括“百司”在礼仪中的职责乃至各种官员应该遵循的礼仪规制。《群书考索》卷 29 云：“《续曲台礼》云，正（当为贞）元十九年（803 年）陈京议祫祭图，中宗睿宗俱列昭位，户部尚书王绍等五十六人同京议，始与礼合，诏从之。”按，《续曲台礼》所记乃元和十三年以后至长庆中礼仪，故此处云《续曲台礼》所载的内容，实乃《曲台礼》之文，很可能后来有人将二书合而为一，时人或不之察，因而时有误书。可以证明《曲台礼》确实注重记载制定仪注过程中的文书来往。

所谓礼科是详定仪制之后的“约文”，正是用这些礼科来“移责于百司，又约之以供备”。百司接到“礼科”之后，执行的时候若遇到问题，就会申请作变通，还会有公文书；可以执行，也有回复文书，王彦威将这些都详细记载。这就是所谓的“备礼科之单复，具供给之司存”。

所谓“五礼仪式”，其实是《大唐开元礼》以后所行礼仪，其中包括“旧仪所不载，而与新创不同

者”。前引《旧唐书》云“掇拾自隋已来朝廷沿革吉凶五礼”，指的是以开元之后礼仪为纲，次第编录隋以来礼仪沿革。当然，其中“旧仪所不载，而与新创不同者”的那一部分不可能有沿革。

由此可知，《曲台礼》与之前礼书的最大不同在于，从编撰体例上看，它详载了奏请裁定仪制过程中的公文书以及仪注决定之后的“礼科”；从内容上看，元和十年（815年）之后的新礼是他书所无，对隋以来的相关礼仪沿革进行梳理，也是一个特色。

而《续曲台礼》是《曲台礼》的续编，特点是“采元和以来王公士民昏祭丧葬之礼”。既然是“续”，内容自然不会重复，体例则一仍其旧。

通过这些考察，可以知道，王彦威编修《曲台礼》，其实是对与已行之礼有关的案牍的编类，这在唐代国家礼书编撰乃至学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礼书的案牍化正式形成，也标志着仪注之学和礼书编撰之学正式分途。

这对宋代礼书编撰有何影响，和《中兴礼书》、《中兴礼书续编》有何关系？

前述宋代第二类礼书，即《太常因革礼》及其续编，主要记载国家礼仪的沿革，这可以看成是《曲台礼》载沿革这一传统的延续。

前述宋代第三类礼书，即《礼阁新编》、《太常新礼》、《中兴礼书》、《中兴礼书续编》则是和已行礼仪相关的案牍的汇编，延续的是《曲台礼》的传统。现以《礼阁新编》、《中兴礼书》为例证明如下。

张文昌先生认为，“《礼阁新编》虽是以‘五礼’为体例而纂成，但是其文字乃直接剪裁诏敕或仪注而成，其编撰目的则是专为礼官参阅之用”。[8] (P135)《礼阁新编》中确实有诏敕，也有仪注，但仅仅说是“直接剪裁诏敕”，很容易让人理解成是直接剪裁朝廷从上而下颁降的诏敕。

《太常因革礼》卷12引《礼阁新编》：

> 开宝二年（969年）六月诏：“每岁常祀惟昊天上帝、皇地祇用犊一，其他大祀皆以羊豕代之，七月二十一日敕牛羊司，供昊天上帝岁四祭，用犊四……。”[9] (P395)

表明《礼阁新编》中确实载有诏令。

同时其中也载有反映讨论礼仪情况的文案。《太常因革礼》卷23引《礼阁新编》云：

> 淳化二年（991年）十月九日，礼院检讨翼善冠制度，及所用衣服申上者，“一按《开元礼》仪注皇帝服，凡衣服之制，三代已降，损益不同，今据《衣服令》及开元礼……一按《衣服令》……一按《开宝通礼义纂》云……至开元十七年废而不用。乾元元年十月，知司天台事韩颖奏：五品正，奉勅创制，其官职配五方，上稽五纬，臣请冠上加一星□（笔者按：据《唐会要》卷31，□当为珠），衣从本方正色，每至正冬朔望会及诸大礼即服以朝见，仍望永为定式。勅依。’今检仿古今制度，伏乞依禀施行。”诏可。

按，“今检仿古今制度，伏乞依禀施行”是礼院检讨之后的意见，“诏可”则是朝廷的批示。

《礼阁新编》不仅仅收录了仪注修订部门的公文书，《太常因革礼》卷25引《礼阁新编》云：

>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七月，知枢密院王钦若奏……臣欲乞下有司检定制度……永为定式。寻诏礼院详定闻奏者。礼官奏，检详礼例、《卤簿令》……。院司检详王公车辂制度如前，欲乞下太仆寺依此修制。诏可。

大臣首先上奏希望建立修改某些礼仪或礼仪制度，然后是朝廷将这一建议交给礼院讨论，经过讨论之后，礼院将这一事件的本末全部写好，然后上奏朝廷，“诏可”就是朝廷最后的批文。这一点和王彦威在《曲台礼》中详载“开元已后至元和十三年奏定仪制”如出一辙。

《礼阁新编》中也不仅仅是这种讨论礼仪的文案，还有大臣上奏请改革礼仪运行制度的文书和朝廷的批答。《太常因革礼》卷3引《礼阁新编》云：

> 淳化三年（992年）八月七日，殿中丞秘阁校理吴淑奏：“昊天上帝四祭、太庙五飨，旧例以宰臣摄太尉行事，其中小祠差诸司四品以下官，旧差监察御史一员充监祭。近来或遇阙官，以它官通

摄监祭事，是致在位之臣，动设违慢。今欲依旧差监察外，如有祭器礼料不循典礼，令御史台纠察不法，以惩懈慢。”诏可。

总之，讨论礼仪及其运行的各种重要案牍都被摘要收入了《礼阁新编》。这与《曲台礼》的编撰原则是非常类似的。

王彦威《曲台礼》另一个特点是详载“移责于百司，又约之以供备”的“礼科”。《礼阁新编》中也是如此。《太常因革礼》卷3引《礼阁新编》：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十月九日，礼院奏：“窃见冬至祀昊天上帝，季秋大飨明堂、四月雩祀、夏至祭皇地祇……神位甚多，献官员数稍升，少（“升，少”当为“少，升”）降既频，未尽恭恪，乞量添员数……所有献官祭服、赞引礼生绯衣节帻、陈设之类，亦令逐司计度申请。”诏可。

这是礼院在申请添加献官员数的同时，请求朝廷将相关需要跟进的内容分派到其他的相关部门。这样的例子还有，恕不一一列举。

王彦威《曲台礼》的第3个特点是将“旧仪所不载，而与新创不同者”的仪式编入。《礼阁新编》也是如此。例如，载有真宗幸亳朝谒上清宫并上老君册宝的仪式，《太常因革礼》卷75至卷76即引其文，《太常因革礼》该处明言其为新礼，即“无所沿者”，正与王彦威所云“旧仪所不载”不殊。

《中兴礼书》及其续编继承的也正是这种传统。《中兴礼书•序》淳熙八年太常寺主簿陈贾劄子对《中兴礼书》的编撰过程叙述非常清楚：

窃窥太上皇帝中兴复古，皇帝陛下揖逊受禅，粤自绍兴初载首行明堂，至今五十余年，其间大典礼、大制作，书传所记，亘古所未尝有者，悉举行之。总而为目者一百一十有四，分而为门者，不知其几，第而为卷帙者，又不知其几也。文案山积、败纸渝墨，皆涉典故，今先总录元案，然后删去繁冗，再誊净本，遍经寺官，次第去取，费用纸劄笔力为多，契勘本寺[①]人吏绝少，所谓胥吏则日有奉行文书之繁，赞者供官则日（有）[②]奔走祠祭之冗……欲望圣慈比类敕令所置[③]局行下临安府……仍量赐给降料，祠钱顾募笔吏修写。所有提领官既不差委大臣，欲乞令礼部长贰同共删修……取进止。

后来下旨“令礼部长贰兼修《中兴礼书》，内科次钱据每月合用实数申取朝廷指挥”。淳熙十一年（1184年）七月修成，尚书省十二日劄云“礼部申‘……将建炎以至淳熙所行……典礼及祭祀仪式、乐舞器服制度等总之为三百卷，而为六百八十门编类，并已成书，合申乞降指挥施行，伏乞朝廷特降指挥令太常寺收掌，以备讨论遵用施行，伏候指挥’。右劄付太常寺从所申事理施行，准此”。[④]

可见《中兴礼书》的取材是原来的各种“文案”，经过删繁就简，然后编类成书。这正好与《礼阁新编》相同，也就是与《曲台礼》相同。检《中兴礼书》，详载太常寺以及大臣讨论制定礼仪仪注及制度的文书及朝廷的批示，然后再记相关的仪注。可证这些奏文和劄子并非虚言。

嘉泰元年、二年（1201、1202年）间编撰的《中兴礼书续编》，也是以相关的案牍为原材料编类而成。嘉泰元年臣僚上言云：“契勘太常寺《中兴礼书》卷帙甚盛，无不备载，尚有孝宗一朝所行典礼至今未曾接续修入，可谓阙典，臣向者备数奉常末属，备见始末，按牍无一不存，窃虑以后散失，欲乞陛下因时制礼，下臣此章，令礼部太常寺日下编类旧牍，接续三百卷以后修纂成书。”嘉泰二年，讲到《中

①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蒋氏宝彝堂抄本此处“寺”误为遍，叶渭清先生《中兴礼书校记》卷1指出当为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旧抄本。

②叶渭清先生《中兴礼书校记》卷1指出此处，准上文，亦当有“有”字。

③《续修四库全书》影印蒋氏宝彝堂抄本此“置”为“遗”，叶渭清先生《中兴礼书校记》卷1指出“遗”字误，检浙江大学藏孙诒让玉海楼抄本为“置”，此据孙氏抄本改正。

④这里所引关于《中兴礼书》编撰的文献，具见《太常中兴礼书序》，《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兴礼书续编》的编撰情况时，也说：“九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圣旨，依礼寺除已编类旧牒，将孝宗皇帝一朝典礼接续修纂成《中兴礼书续编》八十卷，今已缮写行投进。”[3](P473) 可见《中兴礼书续编》也是将已行之礼相关的案牍编类成书，与《曲台礼》正同。

由此可见，之所以前引太常寺主簿叶宗鲁《中兴礼书续编序》将《中兴礼书续编》比作王彦威续《续曲台礼》、将《中兴礼书》比作《曲台礼》，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他们延续了王彦威编撰《曲台礼》以来的国家礼书案牍化的传统。

四、小结

唐代历史可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唐代礼书的编撰也可以安史之乱为界线。

安史之乱前，礼书是对以往礼书、礼仪仪注的整合和取舍，仪注之学、三礼之学和礼书编撰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编撰礼书是要确立规制，令后代遵行。世家大族在礼书编撰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进入中唐，不仅政治上难以维系大一统，在礼书的编撰上，人们已不再奢望能够修撰具有《大唐开元礼》那样的权威的礼书，而是开始以编集已行之礼为重点，《贞元新集开元后礼》、《礼阁新仪》就是如此。王彦威编修《曲台礼》标志着国家礼书编撰者的职业化、国家礼书的案牍化正式拉开序幕，成为唐宋国家礼书编撰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王彦威开创的传统被宋代《礼阁新编》、《中兴礼书》一类的礼书沿袭，影响直到南宋。而遵循这一传统的礼书，只有《中兴礼书》与《中兴礼书续编》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尽管《开宝通礼》、《太常因革礼》类礼书和《曲台礼》体例有别，但是《开宝通礼》也沿用了《曲台礼》中的一些“新礼”，《太常因革礼》也大量采用案牍文书，例如引用了不少《礼院例册》和仪注。这反映出中晚唐国家礼书编撰新动向对宋代的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宋社会变迁的某些轨迹，即经过中晚唐的丧乱和剧烈的社会动荡，学术和社会的中坚，已变成了科举出身的新兴社会阶层，晋唐时代由权贵豪门把持国家意识形态的时代一去不返。

（本文是在业师姜伯勤先生、向群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雷闻先生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1] 王钦若. 册府元龟（卷 546）[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姜伯勤. 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 叶宗鲁. 中兴礼书续编序 [M]. 续修四库全书（第 823 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 杨志刚. 中国礼仪制度研究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 王溥. 唐会要（卷 37）[M]. 北京：中华书局，1955.

[6] 李百药. 北齐书（卷 31）[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7] 刘禹锡. 刘禹锡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8] 张文昌. 唐宋礼书研究——从公礼到家礼 [A]. 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

[9] 欧阳修. 太常因革礼（卷 3）[M]. 续修四库全书（第 821 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郭秀文

•环境史•

能源帝国：化石燃料与 1580 年以来的地缘政治 *

约翰•R•麦克尼尔 [著]　格 非 [译]

[摘 要] 化石燃料对大国的兴衰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泥炭与荷兰、煤炭和英国以及石油和美国三个案例的分析，从横向上展示了能源与经济和军事发展以及领土扩张的复杂关系，从纵向上揭示了能源与霸权更替的关系。这为我们理解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分析中国在近代初期的落伍和现在的崛起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化石燃料　经济优势　军事革命　海外帝国　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6-0108-07

化石燃料对现代地缘政治史，尤其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或占主导地位的力量都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 17 世纪的荷兰、19 世纪的英国，还是 20 世纪的美国，它们在能源供应和消耗上的优势对其政治上的成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荷兰、英国和美国都拥有价格低廉的能源，这种能源优势转化成了经济优势，使之一方面能够建立起高效有竞争力的经济，另一方面有能力负担昂贵而先进的军事机器。就英国和美国而言，它们不但拥有丰富的煤炭和石油资源，而且这种低廉的能源优势还直接转化成了军事和地缘政治优势。

研究能源之于地缘政治的意义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在历史上、在当前和未来 50-100 年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宋朝，中国人创立了一种军事和工业复合体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按现代标准来衡量，这个复合体规模虽小，但却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这个复合体是建立在采煤和冶铁基础上的。煤采自中国西北。冶铁产量在 1080 年代达到年均 10 万吨以上，这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是非常高的，英国直到 18 世纪末发生了工业革命以后才超过它。煤铁的大量应用增强了宋朝的军力，对内有助于巩固统治，对外有能力安定北部边疆。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复兴，但制约中国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能源供应。这个问题如何演变，对中国将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赢得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至关重要。

一、泥炭和荷兰的黄金时代（1580-1680 年代）

泥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腐烂的植物变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苔藓，学名叫“泥炭藓”，有时也称为“沼泽藓”。如果这种植物埋在地下并经历数百万年高压之后，就会变成煤炭；但如果时间不够，就是泥炭。大部分的泥炭都是在过去 6000 年形成的，湿冷的气候是泥炭形成和保存的必要条件。因此，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泥炭都蕴藏在高纬度和高海拔的地区，如加拿大、斯堪底那维亚和西伯里亚。虽然泥炭在世界上分布很广，但大都

* 本文是作者 2006 年 4 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环境史系列讲座”上发表的演讲，英文记录稿经过了作者审定。

作者简介 约翰•R•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美国当代著名环境史学家，现任乔治敦大学历史系和外交学院双聘欣可•海马诺斯讲席教授；格非，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在不便接近的地方。不过，荷兰是个例外。

荷兰的泥炭资源虽然不像加拿大、俄国和瑞典那么储量丰富，但其供应地相当庞大。与世界其他地方如英国和斯堪底那维亚的泥炭通常都在海拔至少50-150米的地区不同，荷兰的泥炭绝大部分都处在海平面上下1-2米的位置。泥炭很重，除了水运之外，用其他方式运输费用极为昂贵。在这一方面，荷兰在全世界得天独厚。它的泥炭都是浅层的，挖出来后就可以装上小船或驳船，然后通过在乡间泥炭区挖出的运河，可以既方便又便宜地运到城里。泥炭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挖采和晾干泥炭都需要大量劳动力。挖泥炭需要修建排水渠以排干沼泽，这改变了整个荷兰农村的景观。荷兰曾经储有60亿立方米的泥炭，但现在已经被挖光了。在爱尔兰，泥炭生产也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但因为只能用马车来运输，所以比荷兰的要贵很多。

泥炭是化石能源，但从能量密度上来讲，比不上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从单位能量的产出来看，最高的是石油和天然气，其次是煤炭，最低的是泥炭。每公斤泥炭所释放的能量只有煤炭的1/6。泥炭燃烧不能提供冶金所需的高温，所以不能用泥炭来冶铁和炼钢。尽管如此，泥炭对荷兰经济的发展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酿酒业和石灰烧制业是荷兰享受低廉能源优势最突出的两个产业。在17世纪，石灰是最基本的建筑材料，烧石灰是能源密集型产业。同时，荷兰也以酿造优质啤酒而闻名于世，酿酒业也是能源密集型产业。荷兰成本低廉的泥炭为这两个行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17世纪，制糖业也是能源非常密集的产业。尽管荷兰不生产蔗糖，荷兰殖民地在1653年（葡萄牙人把荷兰人从重要的蔗糖产地、巴西的东北部赶了出去）后几乎不生产蔗糖，但世界制糖业的中心在阿姆斯特丹。玻璃制造业、烧砖业和制盐业也都是能源密集型的，一般情况下它们使用薪材或木炭。这意味着凡是存在这些产业的地方的森林就会被毁灭，因为人们要从森林中打柴或烧木炭，随之而来的工业就会滥伐所有的森林。不过，在荷兰，这种类型的工业可以在城市立足，因为它有丰富而便宜的泥炭。所以，从1560年代开始，荷兰在经济发展中持续利用了自己的能源优势，直到1680年代泥炭资源开始枯竭。

从某些方面来看，荷兰经济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在17-18世纪，荷兰因为有泥炭，肯定是世界上能源最密集的经济体，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经济。荷兰也可能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许日本在这方面和荷兰有一比。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有利于在荷兰创造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与其他社会有很大不同，它是一个有更多城市、人口更为集中、更强调买卖习惯的市场导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商业习惯根深蒂固，这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16-17世纪的荷兰社会的原因。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取决于如何定义“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对我们研究能源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它是否可靠并不重要。不管荷兰社会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荷兰发展了繁荣的工业经济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荷兰之所以需要工业经济是因为它遇到了严重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挑战。第一个挑战来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它从1560年代起就想控制低地国家（现在的比利时和荷兰）。哈布斯堡家族是统治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王朝，在16世纪获得了对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和菲律宾的统治权。荷兰人从1568年开始起而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直到1648年才获得成功。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获得独立后，荷兰又遭到了英国和法国的侵略。在1650年代初，荷兰人发起了持续三年的反对英国人的战争。在1670和1690年代，荷兰人两次反抗法国的占领。虽然荷兰人并没有完全赢得这些反抗的胜利，但是他们一直在设法维持1648年赢得的来之不易的独立。与此同时，他们也想方设法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在那个时代，打仗的费用越来越昂贵，因为世界军事正在发生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军事革命”的变革。

泥炭不能直接用于军事，不能用它来驱动任何轮船或车辆，没有实际的军事用途，也不能直接降低军事费用。战争费用的大幅度提高主要来自军事革命中的两个关键因素城堡和大炮的发展。例如荷兰的布雷达城堡，高达几百米，周长1-2公里。那时的军事工程结构复杂，军事技术也比

较精良。大炮和加农炮的口径很大，制造这些军事器械的花费自然会很大。如果一个国家修建了坚固的城堡，那么敌国一定会想方设法更胜一筹，制造出更厉害的大炮。这种竞争使战争的费用进一步得到提高。军事革命的另一部分是建立大规模的“常备军”。常备军就是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都保有的军队，因为军队必须坚持不断地训练。步兵战术要求士兵必须协调一致行动，士兵只有坚持常年操练才能形成习惯。一般情况下是几千士兵在一起操练。1700 年之前，一场战争动辄就得动用数千士兵，还要保证军队能够正常运转。这些都提高了战争的开销。开发新战船也是军事革命的一部分。从 16 世纪起，海军开始建造吨位更大的战船，装备威力更大的大炮。战船的建造和维修都需要很多财力。另外，战船上还需要大量水手，他们也需要训练，以使其动作能整齐划一。这也同样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所以，军事革命让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昂贵，这无论是在欧洲、奥斯曼帝国，还是在印度和中国都一样。当然，并非军事革命的每一个方面都在欧亚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例如奥斯曼帝国就没有采用建有大型炮台的战船。但是，从英国到日本的各个地区至少都发生了军事革命中的某几项变革。这些都抬高了备战和打仗的费用。军事变革实际上有利于荷兰，因为它有发达的经济，可以支撑不断提高的战争费用。战争毫无疑问是个巨大的负担，但比起其他国家，对荷兰只是一个小负担。因此，我认为，价格低廉的泥炭能源转化成了活跃的经济，繁荣的经济进一步转化成了有效的军事机器，这保障了荷兰能在比它大得多的国家的包围和侵略中生存下来。

泥炭还帮助荷兰人创建了自己的海外帝国。荷兰的殖民帝国面积并不大，但展现在地图上却是一个全球性帝国。在 17 世纪，荷兰这个西北欧的小国居然能在北美、南美、非洲和亚洲建立自己的殖民据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创建和维持这样一个殖民帝国也很昂贵。也许有人会认为后来是殖民帝国支撑着荷兰的经济，但我认为，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清楚地断言，帝国到底是产生利润的还是烧钱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没有繁荣的经济就不可能创建帝国，而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利用了低廉的能源供应。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荷兰的繁荣不仅仅是建立在泥炭的基础上的，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我无意夸大泥炭的重要性。根据荷兰历史学家的计算，在 17 世纪中期，泥炭只占荷兰经济所需的能源的一半。荷兰的繁荣也得益于处在莱茵河口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荷兰实行的共和体制。我还想强调的是，一些海外殖民地并不是荷兰国家的，而是荷兰公司的殖民地。这些公司也可以称为准国家公司，因为它们都是由私人和政府共同投资和控制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荷兰西印度公司。它们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贸易，也有自己的军事武装，而且都与政府合作。我还想指出的是，荷兰帝国并不是真正的 19 世纪英帝国意义上的世界帝国，它只是一些海外据点和小型殖民地的集合。即使是在荷兰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直到 19 世纪，荷兰的存在范围也主要局限在爪哇岛上的巴达维亚。荷兰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控制大片领土。所以，我无意夸大荷兰殖民帝国的重要性，也无意夸大泥炭对荷兰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我只是提请大家注意泥炭、经济繁荣和建立帝国之间的联系。

二、煤炭和英帝国

煤炭也是由植物演变而来的。在合适的条件下，埋在地下的植物经过数百万年的压力就会形成煤炭。不像泥炭和石油，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发现了煤炭。英国储有大量煤炭，虽然不像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那么多，但也不少。英国有四大煤炭产地，分别是苏格兰低地、纽卡斯尔周围地区、中部地区和南威尔斯。与泥炭的采集相比，煤炭开采是非常危险和艰苦的。在 1800 年左右，工人打一个“钟型井”下去采煤。此后采煤技术虽有改进，但井下的劳动强度依然很大。最为悲惨的是，从 18 到 20 世纪，英国的矿井中大量使用了童工。

在英国的许多地区，煤炭基地相当靠近海边，尤其是纽卡斯尔周围地区和南威尔斯。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意味着煤炭可以非常方便地从产地运往任何一个海路和轮船可以到达的地方。在这一

点上，英国和荷兰一样幸运。但中国就不同了，中国的煤炭产地远离海路，要把它运到大多数人口集中的地方费用高昂。在煤炭的地理分布上，中国是很不幸的。

煤炭对英国的冶铁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17 世纪，英国的铁主要来自进口，大部分来自瑞典，小部分来自波罗的海地区，包括俄国。英国自己生产的铁很少，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缺乏燃料。1650 年以前，英伦三岛只剩下很少的林地，残存的大部分林地离铁矿产地很远，不易接近。相反，瑞典和俄国仍有充足的森林（也有充足的铁矿石），因此它们在冶铁方面享有能源优势——假定木材和木炭仍是唯一适合冶铁的燃料的话。但是到 18 世纪末，英国变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铁生产国。从 1700 年到 1850 年，英国的铁生产增长了 20 多倍。英国在 1840 年代建立了世界上最高效的冶金业。到 1850 年，英国自己出产了世界上一半的铁。英国生产的钢铁比世界其他地区生产的都要便宜和优质。英国不过是个小国家，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关键的原因在于英国高效利用了自己的煤炭。

英国的工匠在 1709 年后摸索出了如何在冶铁业中使用煤的技术。在此之前，煤不能用于生产优质铁，因为煤的杂质会使炼出来的铁变脆。技术进步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给英国通过利用其巨大的煤炭资源来冶铁开辟了道路。在发明了实用的蒸汽机（1770- 1780 年代）后，煤炭也被用于其他生产目的。蒸汽机的应用使从地下深处的煤矿向外排水成为可能，这反过来大大扩展了可用煤的供应。到 1820 年代，蒸汽机被应用于轮船和机车，产生了蒸汽船和铁路。所有这些变化都依赖于煤所提供的能源。简言之，从 1780 年到 1880 年，英国利用自己的煤炭储备所提供的能源建立了世界上技术最先进、最有活力和最繁荣的经济。

像荷兰利用了泥炭一样，英国也因利用煤炭而发展起了更加繁荣的经济。但与荷兰的泥炭生产不同，英国的煤铁生产可以直接用于军事。煤炭这种低廉的能源优势以及与此相关的先进技术，让英国建立了强大的军事机器。从 1850 年代开始，英国建立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皇家海军。皇家海军是把英帝国粘合在一起的纽带。在帆船航行的时代，皇家海军很难建立起对敌国的海上优势，部分原因在于木材供应短缺。对英国来说，转向用煤驱动的铁船是非常幸运的发展，因为英国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矿。煤还有助于英国制造出更为廉价和优质的枪。在 19 世纪，英国发展出了自己的军事和工业复合体。在冶金方面的优势让英国能比它的敌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轻便的武器和大炮来武装军队。因此，能源替代促成了英国海军的强大，使之能更容易地扩大和防御它的世界帝国。

要保卫庞大而遥远的帝国，英国必须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建立稳定的煤炭供应基地。于是英国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加煤站”网络。这些加煤站遍布全世界所有皇家海军的船只需要加煤的地方。起初，大部分加煤站的煤是由英国本土生产，然后运到位于南非、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加煤站。后来，这些地区的煤炭生产迅速发展起来，产自孟加纳、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的煤炭提供的动力支撑起了英帝国。英帝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煤的基础上的，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创建加煤站，它也不得不扩大规模。煤和帝国之间是互惠的关系。

既然英国因为使用煤而迅速强大起来，那么为什么先前经济繁荣的荷兰不能迅速转向使用煤呢？其实，荷兰也转向了，但转得很慢而且没有效率。主要原因在于出现了“技术闭锁”。到 17 世纪末，荷兰发展起了高效的采掘、运输和燃烧泥炭的经济，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经济。但荷兰没有多少煤炭，这是妨碍荷兰转向使用煤的一个天然劣势。另一个劣势是荷兰已建立了完备的使用泥炭的制度和设施，它已经为此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要转向使用煤炭将是非常昂贵的。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荷兰更愿意继续使用旧能源，幻想旧能源依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当然，与荷兰一样，英国也不能长期独占这种优势。荷兰由于泥炭消耗殆尽和更加昂贵而丧失了自己的能源优势。对英国来说，它虽然并不短缺煤，但是仅仅几十年后，德国、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俄国都能利用煤这种动力优势，也相继启动了自己的工业化，并建立了自己的以煤

为动力的军事机器，其中以德国的发展最为快速高效，后来居上。所以，英国仅享有了大约50或70年的优势，到189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者。另外，虽然当时无人能够预言，但不久石油就替代了煤，成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最有用的化石燃料。这种变化损害了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霸权地位，并最终成全了美国。

三、石油和美国世纪

在美国于1890年代成为世界大国之前，石油对于美国经济而言并不重要。早在内战时期(1861-1865年)，美国就以煤电和水电为动力启动了它的工业化。到1900年，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所以，在石油成为重要的能源之前，美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也已在加勒比海地区和菲律宾建立了自己的海外帝国。但是，从大约1900年起，主要能源开始从煤炭变成了石油。1900年，煤炭占美国能源消耗的3/4，但石油的崛起迅速改变了这种状况。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发现了石油，但世界石油生产的绝大部分来自于15个大油田，尤其是超大的波斯湾油田，其次是西伯利亚油田。

20世纪初，美国实际上已经引领着世界的石油生产。从在世界石油生产中所占的份额来看，美国第一，俄国次之，委内瑞拉第三。从大约1900到1947年，美国主导着世界石油生产。在石油生产领域，美国开发了大多数相关的技术。这些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德克萨斯州，因为世界上最具生产能力的油田就在该州的东南部。就石油生产来说，俄克拉河马和加利福尼亚在美国历史上也非常重要。加利福尼亚过去也产油，但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从1970年代开始，阿拉斯加成为美国主要的石油产地。另外，无论是用油罐还是用管道，石油都很容易运输。于是，美国人就很容易地把石油从产地运到位于东北部和大湖区的工业核心地带。从地理位置上讲，美国并不特别幸运，因为其石油产地远离工业和人口中心。但这并不紧要，因为石油相对来说易于运输，也比较便宜，尤其是利用管道运输。

正是依靠石油，美国建设了自己的第二个全国运输体系。要想建立全国性的经济，就需要四通八达的运输基础设施。在19世纪初，美国建设了运河网，但它只覆盖了很小一部分国土。第一个全国性运输体系是铁路。但直到1920年代，它还是以木材和煤炭为动力的，此后不久就过渡到用柴油做燃料。第二个全国运输系统是公路以及小汽车和卡车。这个运输系统的建成无疑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美国建立以石油为核心的运输基础设施体系的时候，它同时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汽车为中心的经济。1912年，美国开始在装配线上大规模生产汽车，但真正成规模是在1920年代，因为只有在1920年代，汽车才便宜到一般家庭都可以拥有的程度。这对钢铁业、玻璃和橡胶业，以及一切与汽车和卡车有关的产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可以说，1920年代以后的美国工业化是建立在从德克萨斯到底特律的这条轴心线上的。大家知道，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的中心。所以，美国经济的轴心线是从石油工业的中心到汽车工业的中心。从1920年代到1960年代，这是美国经济成长的关键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成长显而易见是以廉价的石油为基础的。总之，美国经济在20世纪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石油以及围绕石油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和运输体系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的经济繁荣依靠的是石油提供的能源优势。

石油也可以直接应用于美国的军事发展，就像煤炭直接用于英国的军事一样。美国迅速利用了石油的潜在优势，创建了自己的新型军事机器。这种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打造以石油为动力的海军。对海军舰船来说，石油比煤拥有更多优势，因为单位重量的石油蕴藏的能量更多。它可以推动舰船在不用补给燃料的情况下扩大活动范围，同时还减少了船上必须携带的人员数量，因为石油可以用压力注入发动机，而煤需要人用铲子填进熔炉。实际上，虽然英国没有发现石油，但英国早在1912年就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皇家海军率先在舰艇上使用了石油。不过，美国很快就赶了上来。第二阶段是美国在1942年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和工业复合体。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美国的军事力量非常

弱小，只占世界第十位。但在1942年，美国建成了巨大的军事机器，其核心是在加利福尼亚、西雅图、弗吉尼亚以及底特律等地建立了海军造船厂。底特律还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卡车、坦克和飞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所有的汽车厂都摇身一变转产军事设备。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其核心是创建了一个完全以石油为燃料的军事机器和包括空中力量、海上力量和陆上的机动性等三方面内容的先进军事体系。显然，这是一个能源密集的军事体系，它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变得高效而强大。

日本和德国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都缺乏必不可少的石油。日本之所以选择在1941年袭击美国，一个原因是出于对1930年代的石油地缘政治的思考和判断。日本在中国陷入苦战的一个瓶颈就是，它没有足够的石油维持它的空军、坦克和海军的正常运转。其海军一部分是石油驱动，一部分是燃煤驱动，而空军则完全依赖石油燃料。日本的石油进口大部分来自加利福尼亚。所以，如果日本想实现在东亚建立帝国的梦想，就必须有稳定可靠的石油供应。日本在中国打仗越多，美国就反对得越厉害。为了反制日本的侵略，美国曾威胁要卡断日本的石油供应，而且在1940和1941年也确实采取了行动。日本受此刺激要大赌一把，袭击荷兰东印度，以满足其石油需求。日本也很明白，如果要征服和占领荷兰东印度，就一定会和美国开战。于是，日本就先发制人，偷袭了美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享有极大的优势，独享来自美国的源源不断的石油供应，而轴心国自己缺乏石油，不得不设法征服其他石油产地。抢夺能源是二战之所以以那样的态势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945年以后，石油仍然是工业化经济和现代军事发展的关键。美国仍然享有非常有利的地缘政治优势，因为它自己拥有强大的石油生产能力，也因为在1940年代后期美国与世界上最大的能源供应基地波斯湾的统治者达成了利用石油的共识。但是，这个优势是不能长久的。到了196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变成了石油净进口国，起初主要从委内瑞拉进口，后来主要从波斯湾进口。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对石油更加依赖，美国军事依然完全依赖石油。对美国来说，石油不再是一个优势，而是变成了脆弱性的表现。如果国际石油贸易中断了，美国的军事机器就会完全瘫痪，民用经济也会承受非常严重的损失。例如，如果没有汽油，美国农民使用的农用机械就不能运转，农民就不能收获自己的庄稼。用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话说，“美国人对使用石油已经上瘾了”。其实，这种倾向早在大约1965年就已经开始了。

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已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位置上，而这种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订。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在它的外交政策中小心翼翼地维持一种平衡的原因。美国不但竭力不去冒犯那些强大的石油生产商，而且还要进一步确保自己在强大的石油生产商中拥有可靠的支持者。1950年代初，为了把伊朗变成美国的盟国，美国在伊朗扶植了一个亲美国的统治者。但在1975年伊朗革命后，美国不得不转向其他国家。其实美国早已介入了沙特王国，尤其是在1979年后，美国介入得更深，因为它别无选择。美国在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确保科威特和沙特能继续向世界市场顺利供应石油。这不但对美国，也对它的欧洲盟国和日本都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这些国家愿意为战争提供人力和金钱支持。几年前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原因（并非唯一原因）是，美国感觉沙特似乎不再可靠。如果美国能在伊拉克扶植一个可靠的盟友，那么从中东获得石油将是非常安全的。这些事例说明，美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受制于它现在的石油供应的脆弱性。

与美国相比，为什么英国不能及时转向使用石油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在英国也存在着与荷兰同样的逻辑。英国有许多煤矿，但直到1970年代以前，英国还没有发现石油。除了海军之外，英国经济转向使用石油的进程非常缓慢。第一个原因是英国是个小国。它已经建立起令人满意的以铁路和沿海运输为代表的运输基础设施，可以把煤很便宜地从产地运到城市和工厂。这与美国或其他大国遇到的问题大不一样。在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能源的效率在经济上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长距离运输需要使用的燃料具有很高的能量密度。第二，英国在煤矿上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形成了技术闭锁。英国有几千个煤矿，它的钢铁业所使用的机械都是按照烧煤的方式设计的。到1890年代之前，英国已在基础设施上投入了数十亿英镑。如果要转向使用石油，就会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必须从其他国家弄来石油，二是必须改变它花费巨额资金建成的基础设施。所以，英国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经济上都闭锁在以煤为核心的体系中。第三，英国在社会领域也遭到闭锁。1900年，英国有100到200万的采煤工人，他们的工作和家庭收入都依赖煤矿和煤炭产业。他们不愿转向一个会让他们失业的新能源。从1900年或最晚从1920年代起，英国煤矿工人通过工会和工党在政治上变得很强大。于是，在英国从煤炭向石油转化过程中还存在一个社会和政治上的闭锁。直到1980年代初期，这个闭锁才被撒切尔夫人打破，因为她摧毁了英国社会存在的势力强大的工会。

在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发生问题的时候，美国为什么不能及时对能源进行更新换代呢？美国遇到了和英国同样的问题。美国对以石油为中心的经济投入很多，在石油基础设施上出现了技术闭锁，这就让美国很难转向下一个新的能源体（Energy Regime）。美国虽然没剩下多少石油资源，但直到现在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石油技术，美国仍有动力要求把石油作为世界主要燃料来使用。现在美国确实需要转向使用新能源，需要改变把资金投向石油工业的模式，但是如果谁在这时提出这个建议，他不但在政治上得不到承认，还会丢掉政权。因此，这种转向现在肯定不会在美国发生。但从长远来看，如果美国追求的是自己的战略经济利益，就必须把投资从旧能源迅速转向新能源。

四、结语：展望未来

在未来的20或40年里，世界能源图谱将发生变化，化石燃料发挥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小。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将会发生，或许是新技术，或许是新的燃料资源，或许是其他什么。不管下一个主要能源的形式是什么，它都会对地缘政治产生极大影响。尽管我们不能确切地预见新能源和新技术将会是什么，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预测：世界能源将会更加多样化，将会有许多种不同的燃料。任何国家如果想像荷兰、英国和美国那样在一个时期独享廉价的能源优势，那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假定有个国家梦想成真，那么它很可能不是因为在能源供应上占有优势，而是在创建新的能源体的技术上取得了优势。控制新技术将比控制燃料本身更为重要。未来的燃料可能是阳光和风力。没有人能够控制风和阳光，但有人能够首先发明新技术，能够用新技术把这些共有的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所以，能源对地缘政治不仅在过去很重要，在未来依然重要，但会表现为新的形式。

中国应该像美国转向石油和英国转向煤炭那样迅速转向新能源体，因为谁先转向就意味着谁将赢得经济和战略优势。中国应该区分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就短期策略而言，中国经济如果还想像过去20年那样高速增长的话，就必须增加石油进口。国际石油市场是一个自由市场，如果中国能按世界石油价格付出，就能买到需要的石油。美国可能会对此颇有微词，但也毫无办法，因为它已不能控制今天的世界石油供应。中国的煤炭资源虽然丰富但含硫量高，易造成污染，所以中国应该从国外购买高质量的煤炭。但从长远战略来看，中国不应该像过去那样仍然投资石油，而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努力：一是在新能源或替代性能源和新技术上加大投入。现在国际上对新能源技术投资最多的是日本、欧洲和加拿大，中国应该后来居上。二是建设一个非能源密集型经济，其关键在于把经济结构和财富基础从能源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我确信这个进程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另外还可以通过战略投资、在科技和教育方面的投资来加快推进知识或信息经济的发展。这不仅是中国必须走的道路，也是任何一个关注未来的国家都不得不走的道路。

责任编辑：郭秀文

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开拓

包茂红

[摘　要] 海洋亚洲环境史无论是从海洋史还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都是一个急待开拓的新领域。本文梳理了海洋亚洲研究的学术谱系，提出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从纵向看，可以分为 1500 年以前、1500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以及独立后三个时期；从横向看，需要研究历史上海洋环境的变迁、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史、海洋环境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系史以及历史上海洋环境文化的演变等四方面内容。最后，在初步总结海洋亚洲环境史的阶段性特点的基础上，指出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及推进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具体设想。

[关键词] 海洋亚洲　川胜平太　海洋环境史　海洋亚洲环境合作

〔中图分类号〕 K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15-10

海洋亚洲 (Maritime Asia) 是在国际历史学界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概念，日本学者尤其喜欢使用。在这一概念背后，蕴涵着不同的历史认识观。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存在着由川胜平太和滨下武志等提出的不同的海洋亚洲概念。本文大体上同意滨下先生的概念，并试图为海洋亚洲研究领域增添一个新的、环境史的维度。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希望倡导和帮助建立海洋亚洲的环境史研究新领域，而不是要描述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准确面貌。不过，通过转换思考的视角和提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大体研究线索，可以为思考海洋亚洲的未来提供一些独特的启示。

一、中国和日本的海洋亚洲研究

传统的历史学大多只注重研究陆地上人类的活动。环境史兴起后，历史学研究被推进到了陆地上人与环境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尽管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海洋仍然游离在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有远见的学者相继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历史学研究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

中国研究环太平洋历史发展和海洋史的代表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教授领导的亚太区域史项目和厦门大学历史系杨国桢教授领导的中国海洋史课题组。何教授在 1985 年突破以陆地上的民族国家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的束缚，开始研究亚太区域史，相继出版了《崛起的太平洋》和《太平洋贸易网 500 年》等著作。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定这种转向是否受到了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研究和查杜利关于印度洋研究的影响，[①] 但他的研究确实与前面两位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注重对海上交通和贸易及其对当地文明影响的研究。1990 年代初，杨国桢教授开始带领他的博士生探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

作者简介　包茂红，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 1949 年出版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其中文版在 199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N. K.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希冀形成中国的海洋史学，相继出版了《海洋与中国》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两套系列丛书。按照杨教授的设想，第一套丛书（8本）主要探讨了中国海洋观、海港城市、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海上市场、海外移民的演变发展等。第二套丛书（12本）除了继续深化前面的研究领域之外，还相继开拓出海洋社会史、海洋灾害史、海洋文化史、航海技术史等研究领域，把中国海洋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

日本学者在海洋史研究方面也进行了相当深入和颇具理论意义的探索。因为，第一，日本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群岛国家的特性使之特别重视对海洋史的研究，但这个研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从"岛国"到"海洋国家"这样的认识转变过程。较早反映这一转变的是高坂正尧出版的《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一书。1998年，日本政府的智囊机构"日本国际论坛"启动了为期4年的项目——"海洋国家日本：其文明和战略"研讨会。其中，1999年度共举行了4次研讨，其成果汇编成论文集《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第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直存在着国家归属感的问题。日本到底是亚洲国家还是欧洲国家？它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在认识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东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殖民主义和西方现代性主导的年代，东亚被西方人认为是被动的"他者"，东亚学者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亚的崛起，特别是日本的第二次腾飞，东亚学者开始尝试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开创多元化的世界历史认识和编撰的新局面。日本人类学家梅棹忠夫提出了最具影响力的"文明的生态史观"。[1] 梅棹认为，日本和西欧一样具有良好的生态条件，在欧亚大陆发展农业文明以及出现农业与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冲突的时候，日本的森林生态基础得以保护。但当大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历史出现大转折的时候，日本与西欧则平行发展，因此，日本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文明传播的结果，也与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关系，是在江户时代的锁国条件下自己孕育出来的。梅棹1957年发表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被《中央公论》在1964年列为"创造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而重新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单行本出版后，多次再版。"文明的生态史观"被誉为是"给予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理论以冲击的崭新的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2] 该理论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对后辈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

川胜平太在承认梅棹从环境角度对日本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行解释的合理性的同时，认为他的理论仍然是陆地历史观，需要从全球史的视角进行调整。川胜认为，原有的世界史是以陆地为基础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但自从宇航员登月成功以后，我们可以形成从月球观察地球的全球史。转换观察视角后，就会发现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70%的表面被水覆盖，其余30%的陆地充其量只能被看成是汪洋中的一些群岛。现代文明并不是在西方内部自发兴起的，而是东洋文化通过海洋亚洲的海路传到西方促成了现代文明的产生。因此，海洋亚洲是现代文明产生的温床。在日本现代文明建立的过程中，海洋亚洲比西方发挥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总之，在西方和日本发生的现代文明都是在应对海洋亚洲的影响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是"文明的海洋史观"。① 川胜并没有就此止步，作为小渊惠三内阁的高级顾问，他进一步提出了"海洋连邦论"，勾画出了"21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3][4] 这一理论虽然在日本有很大市场，但也引起了周边国家学者的口诛笔伐，因为这个理论和构想透露出来的是"日本文明优越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气息。

与川胜平太的提法一样，滨下武志也使用海洋亚洲的概念，但是，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学术路径以及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与川胜大不相同。滨下出于对"冲击与回应"理论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传统历史解释模式的怀疑，提出了要从亚洲区域内部的国际秩序和地域经济圈来理解亚洲近代史的新理论。这一理论对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亚洲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的"从亚

① 2003年11月17-18日，川胜平太先生在北京大学"解读日本"系列讲座上以"全球经济史与近代日本文明"为题，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近代文明孕育于海洋亚洲的观点。参看川胜平太：《文明的海洋史观》，中公丛书，1997年。

洲进行的思考”是东亚自主意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在世界历史学界独树一帜。[5]贡德·弗兰克就是在滨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世界如何进入近代的新解释。[6]滨下在研究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近代经济圈的时候，很自然也要涉及东亚贸易网络的问题。研究贸易网络有两种思路，一是把它看成是以大陆为中心的贸易关系的附庸或延伸，另一种是从海洋来看亚洲。滨下采用了后一种思路，提出了自己的海洋亚洲的概念。这不仅有利于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的束缚，而且为我们从整体上完整认识亚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海洋亚洲指沿欧亚大陆东海岸、从鄂霍次克海到塔斯曼海的广大地区。把它连成一个整体的主要纽带是建立在海洋通道上的贸易网络。[7](P20-60)与川胜把中国看成是与海洋亚洲对立的大陆亚洲的代表不同，滨下的海洋亚洲不但包括日本等海洋国家，也包括中国等滨海国家。在滨下的思想体系中，中国和日本都在作为整体的海洋亚洲中各得其所。虽然滨下并没有指出他的理论对于认识东亚的现实和未来有何意义，但是，我们从他的历史智慧中可以获得一种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感觉，可以对东亚的复兴和亚洲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进行理性的分析和预测。

中日两国富有远见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视野转向海洋，这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他们要寻找新的研究领域的学术冲动所致，战后东亚经济的崛起是促使这个转变发生的最主要动力。而东亚经济主要是通过海洋来发展的，即使是传统上被简单化地认为是大陆国家的中国，它的经济起飞也是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但是，海洋是个与陆地大不相同的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频繁的人类活动必然引起海洋生态的巨大变化。研究海洋亚洲就不能不研究它的环境史。但是，中日学者却都尚未进行深入探讨。海洋只是被当成人类文明发生的另一个舞台或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来对待，人并没有被看成是海洋生态系统、甚至更大的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原因大概在于学者们的知识结构缺陷。接受传统历史学训练的学者无力解读环境资料，更难改变业已形成的传统历史思维。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三年前，滨下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召开的“延续与断裂：从古希腊到现代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在研究历史时，不但要有国家视野和全球视野，还要有区域视野。区域史研究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束缚，要发现新的课题，尤其是海洋问题和环境问题。何芳川教授不但意识到了海洋环境史的重要性，还在更广的范围、从基本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发表了《环境保护与人文关怀》一文。[①]杨国桢先生在推进中国海洋史研究的时候，也呼吁要研究海洋环境，并做出了非常可贵的初步尝试，出版了《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不过，对海洋环境的初步研究仍然局限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范围内，海洋环境史还没有被作为主体来认识。

不过，原来的环境史研究也不注重对海洋环境的研究，只是到了最近，海洋才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促使环境史学家关注海洋的是海洋生态学家，他们在研究海洋生态变化时发现和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但和保护生物学家一样，海洋生态学家也不能对占其中99%以上的、可以上溯到1500年的资料进行历史分析，因此他们呼吁要建立一个得到广泛支持的海洋环境史学科。[8]率先对此做出回应并进行海洋环境史探索的当数北欧的环境史学家，其代表人物是丹麦历史学家Peter Holm。他曾任欧洲环境史学会的主席，主要研究自中世纪以来的、北海和波罗的海环境变迁以及丹麦的渔业发展。但是，由于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用丹麦语发表，加之他注重实证研究，所以并没有发展出海洋环境史的新范式，或者说没有能够推动海洋环境史的迅速发展。1999年秋天，丹麦、英国和美国的大学相互合作，设立了“海洋动物数量变化史研究项目”，旨在“通过使用把历史学和生态学融为一炉的方法来改进我们对生态系统长时段演进的理解，尤其要关注人的影响，进而建立起培养海洋环境史学家和海洋历史生态学家的制度框架”。[②]随着该项目的顺利推进，海洋环境史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随着海洋环境危机的加深，可以预见，海洋环境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是，与对大西洋、地中海、波罗的

①可参见《何芳川教授史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该项目已经出版的中期成果是：David J. Starkey, Poul Holm and Michaela Barnard, eds., Oceans Past: Management Insights from the History of Marine Animal Populations, Earthscan Research Editions, 2007.

海等海域的环境史研究相比，东亚海域的环境史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海洋亚洲环境史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海洋亚洲环境史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反，关于这一范围的不同部分的研究为我们建构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基础。

海洋亚洲研究和环境史研究都是新兴的研究领域，要找出把海洋亚洲环境史连成一个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因素，需要采用历史学分期和分类研究的方法。从纵向来看，海洋亚洲环境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500年以前。海洋亚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海洋环境的利用和海洋环境文化的交流在郑和远航时达到了高峰。第二阶段是15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在这一时期的前期，亚洲以外的力量主导了海洋环境的利用；但在后期，日本的崛起给海洋亚洲环境打上了深刻的日本烙印。第三阶段是独立之后。海洋亚洲的崛起对海洋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海洋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启动。从横向扩展来看，海洋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上海洋环境的变迁；二是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史；三是海洋环境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系史；四是历史上海洋环境文化的演变。

要谈1500年以前的海洋亚洲的环境变迁，就不得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地质年代。在四大冰川和间冰期，太平洋水位发生超过100米的升降，中国沿海地区沧海变桑田。这不但有利于人类的进化，也有利于人类的迁徙。在距今1.8万年前后，海平面下降150米，黄海完全干涸成陆地。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干枯，把日本列岛和大陆连接起来。大量陆生动物和中华先民的细石器文化传到了日本。但在距今6000年前后，气候转暖，发生“黄骅海侵”，尽管中日之间不再有陆桥相连，但先民已经发明了航海技术。[9](P18-19) 海洋亚洲处于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汇之地，地质状况极不稳定，多火山和地震。板块漂移和火山活动在这里形成了许多岛屿和群岛。星罗棋布的岛屿为古人航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火山灰和来自欧亚大陆主要河流的冲积物给这一海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进而形成了许多大渔场，这是古代近海渔业发展的基础。造山运动的巨大压力也改变了物质的化学构造，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丰富的矿藏，为近代采矿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0] 另一个地质活动是厄尔尼诺或南方涛动现象。周期性出现但又难以预测其强度的、活动在赤道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气候现象会造成大陆地区和海岛地区截然不同的气候异动。

环境禀赋对海洋亚洲古代的经济政治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东亚大陆地区，尤其是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以锄耕和犁耕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黄河流域是粟作农业，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中国海洋民族充分利用了海洋提供的营养源。在分布广泛的贝丘文化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蚶、牡蛎、蛤蜊等20多种海洋软体动物，海贝不但成为先民喜爱的饰品，还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硬通货”之一。相反，在海岛地区，直到殖民主义东来之前，很多地方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的生产力发展阶段，难以形成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11] 不过，海洋地质环境并不仅仅制造差异，它还给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海通大道。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就形成了滨海民族夷和越。距今5000年以前，莱夷人就制造了独木舟。在距今4000年前，他们就会制造大木船，利用洋流远航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给他们带去了龙山文化的成果。同北方的夷一样，南方的越人在河姆渡时期就会造船。到春秋战国之交，越人已能建造大型戈船和楼船，不但可以北上日本，还可以经过台湾深入南洋，把中华文化传播到菲律宾、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12] 此后，这些地区的航船不仅会劈刺往来游弋，还会航行至中国。这些民族在进行捕渔等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开始进行海上贸易。中国国内的华夷秩序也随着海上联系的增多而逐渐扩展到整个海洋亚洲地区。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耕作技术、制度文化等经海路向朝鲜、日本和南洋诸国传播，同时朝鲜的金、银、铜等金属，牛黄、人参等药品，马、狗、海豹皮等物，以及日本的折扇、水晶制品、香盒等精美手工艺品也输入中国。明朝建国不久，倭寇开始横行，严重影响了中国与日本和朝鲜的朝贡贸易。但是，中国

和南洋的贸易因郑和航海而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1500 年左右发生的世界三大航海活动改变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内容。这一区域不再是和平之海，而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夺、剥削的平台。原来形成的华夷秩序逐渐被条约体系所取代，在一定限度内利用海洋资源的经济逐渐被过度向海洋索取的经济所取代。日本崛起以后，为了形成自己的霸权，企图独霸整个海洋亚洲，进而控制整个太平洋，成为世界的霸主。而在前一时期主导海洋亚洲秩序的中国却沦为了任人宰割的鱼肉。

尽管季风洋流依旧，但大风帆、蒸汽机等装备的现代舰船和现代航海知识武装的海军在原有的海洋亚洲贸易网络基础上，用资本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国的沿海港口都变成了殖民主义国家输出商品和掠取原料的集散地。为了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中国沿海地区出现过度种植和过量开垦的情况，生态遭受严重破坏。[13] 东南亚地区香料、稻米的大量种植，不但没有满足当地人的生活需要，而且过度的单一种植损坏了当地业已形成的生态平衡。[14] [15]

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海洋亚洲出现了大规模的物种和病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物种和疾病经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传入海洋亚洲。梅毒最早出现于 1494 年的意大利战争期间，1498 年由达•伽马的水手带到印度，1505 年传到中国和日本。腺鼠疫随着殖民扩张传入中国的香港和云南之后，迅速向北方和南方传播。厦门和福州于 1894 年和 1901 年分别被传染，并经水路进入内地，1899 年流传到满州通商口岸牛庄。霍乱也在英缅战争中被英军带到缅甸，然后从曼谷到广州，进入中国内地，或传至宁波，进入清帝国内陆，1821 年传到北京；进而越过长城，横扫蒙古，最后达到莫斯科。从 1820- 1932 年，中国共经历了 46 次霍乱。外来流行病肆虐，使中国、日本的人口发展在 17、18 世纪几乎停滞。[16] 与此同时，外来物种的到来不但改变了海洋亚洲的景观，还改变了亚洲人的饮食结构。玉米的故乡是墨西哥和秘鲁。哥伦布从古巴带回欧洲，后传至东南亚，16 世纪中期经缅甸传入云南，经南洋群岛传入福建等沿海地区。到清朝乾嘉年间，玉米开始大面积在中国播种。甘薯原产南美热带地区，明万历二十年 (1592 年) 从吕宋 (菲律宾) 引种福建，万历八年从安南 (越南) 引入广东，然后从这些地区向内地推广。这两种作物的引进改变了中国的粮食生产布局和食物结构，半干旱地区粮食产量增加，绝大多数劳动者北以玉米为主，南以番薯为生。花生和辣椒的传入促进了中国的烹调发展。烟草来自美洲，哥伦布 1492 年从古巴带回欧洲，明万历年间 (1573- 1620 年) 从吕宋、越南传入闽广；明崇祯十年 (1637 年) 从日本经朝鲜传入中国东北。[17] 不过，疾病和物种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来自中国的柳橙及柑橘属水果引入欧洲，可以帮助治疗航海中的坏血病。19 世纪末，蒸汽铁甲船广泛应用于海洋亚洲航线，压仓水的使用也就意味着各港口之间会进行频繁的海洋生物交流，形成了所谓“港口生物区系”。它有时会破坏渔业，有时还会引发赤潮。

在资本主义时代，海洋资源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对象。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远洋捕鱼能力大大增强，加之近海渔业资源逐渐减少，于是在 1920 年代闯入中国黄海和东海海域，尤其是在舟山渔场捕鱼，引起中日 1924- 1932 年的捕鱼之争。中国政府援引国际海洋法，在保护国民捕鱼权的同时宣示自己的海洋国土主权。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引发了严重的渔场退化，三英里限制严重妨碍了中国渔民的捕鱼权。更何况由于技术先进，日本捕鱼船在舟山渔场退化后已经转向了南海。[18] 这说明，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权时代，有限的国际海洋法并不能保证弱国的海洋主权和经济安全。对渔业资源的争夺不但是经济扩张主义的表现，同时也是对领土主权的侵犯。

对矿产资源的开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这方面的典型是日本的足尾铜矿污染。足尾铜矿位于群马县境内，从 1600 年开始开发，1871 年民营后，产量大增，1884 年达 2886 吨，占全国铜产量的 26%。随着产量的增加，环境污染和破坏也大幅增加。足尾铜矿石大约含有 30- 40%的硫黄，精炼时产生大量二氧化硫和重金属粉尘。其中的微量元素砷、镉、锌、铅等会对人和其他生物产生各种危害。二氧化硫会造成矿山周围树叶漂白，树木枯死。加上炼铜需燃料，乱砍滥伐导致森林消失，水土难以保

持，岩石裸露，河水混浊，鱼类大批死亡。即使1973年足尾铜矿被关闭，但污染的影响仍在继续。[19]类似事件在海洋亚洲的其他国家也都有发生。

在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时候，它从中国、朝鲜半岛和南洋各国获取了大量物资，但送给他们的是“三光政策”和细菌战。日本侵入朝鲜后，首先进行土地、森林、矿产资源的调查，然后颁布和实施《朝鲜矿业令》、《朝鲜渔业令》、《森林法》以及《大米增产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掠夺朝鲜的资源，支撑日本的畸形工业化，特别是军需工业。[20](P104-155)在中国，日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保障军需资源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资源。除了重点开发日本缺乏的煤、铁、油页岩、菱镁矿等矿产外，还运走了大量大豆、高粱、面粉等粮食，棉线、丝绸等纺织品和建筑材料。[21]在东南亚，日本感兴趣的仅仅是石油、镍、锡、矾土等矿产物资。由于海洋亚洲的经济被日本纳入了战时经济的轨道，致使当地生产完全是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发生了多起饥荒，天花、霍乱、腺鼠疫、鼠疫也重新开始流行。[22](P920-935)

和古代相比，近代的海洋亚洲环境史呈现出不同特点。一是海洋资源被当成商品和财富大量开发利用，尤其是渔业和矿业资源。二是为了争夺资源不惜进行战争。三是外海洋亚洲的力量和物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地区的景观和资源构成。海洋亚洲的环境被前所未有地改变了。

二战以后，海洋亚洲的环境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海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洋对经济的贡献急剧增加，海洋资源的纠纷日益严重，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更显重要。

在海洋亚洲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海洋环境的贡献越来越大。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一是海洋自然资源开发的实物产量占同类产品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二是海洋开发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三是海洋开发的就业人数及其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四是对外经济联系对海洋的依赖程度。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比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的海岛国家，以日本为典型；另一类是海陆并举的国家，以中国为典型。日本全国人口和产业的50%以上分布在海岸带地区的小平原上。日本人饮食中一个主要动物蛋白质来源是海产品。日本的贸易主要靠它最现代化的远洋船队来完成，还建立了世界性的运输网络。日本经济对海上贸易的依存度超过90%。日本陆地资源贫乏，经济建设所需资源主要靠进口和从海洋获得。早在1980年，海洋产值就占到日本国民总产值的2.8%，如果加上原料和产品1/2以上靠海洋运输的临海产业的产值，海洋产值就占到国民总产值的10.6%以上，海洋开发对劳动就业的贡献为9.8%。[23](P145-165)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约1.8万公里的海岸线，6500多个500平方米以上的大小岛屿和大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根据《2006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20958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0.01%，比2005年增长13.97%，高出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3.3个百分点。全国涉海就业人员达2960.3万人，比上年增加180万个就业岗位。海洋还是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进口的主要通道。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8512亿美元，占GDP的60%，原油进口高达9112万吨，占总消费量的36%，其中的90%以上依赖海上运输。这充分说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海洋在中国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海洋亚洲国家对海上资源越来越重视，自然也存在许多争议，影响比较大的有中日东海油气资源争议和南中国海油气之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海南部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中日双方在东海海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日渐突出。日本主张适用等距离中间线以及距离标准；中方则主张适用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随着中国在东海开采油气田的成功，中日间围绕东海能源开发和划界问题的争端骤然升温。2004年，日本舆论惊呼中国正在开采的“春晓”天然油气田群会像吸管一样，把原属日本的油气资源吸走挖空。于是，中日双方自2004年10月25日开始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进行谈判。到今年，经过7轮司长级磋商，中日双方都认为，最好的选择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两国在如何界定可能进行的共同开发的海域方面分歧依旧，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之争更为复杂。在南沙群岛的南部区域，马来西亚从1970年代开始就深入中国断续国

界线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在南沙群岛的东部，菲律宾也深入中国海域进行大规模油气开采。在南沙群岛西部，越南划分了上百个油气招标区进行合作开发。目前，南沙海域已经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周边国家都在南海开采石油，已经钻井1000多口，年采石油量超过5000万吨，其中马来西亚的开采量最多。越南近几年来还不断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签订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的合同，大有使南沙问题国际化的趋势。①

海洋亚洲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海洋领土争端。从北到南相继有：日本和俄国的北方四岛问题；日本和韩国的独岛（竹岛）之争以及“日本海”正名之争；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南海的领土之争；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在泰国湾的争端；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阿拉弗拉海的争端等。② 这些争端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不但涉及主权，还隐含着巨大的资源利益之争。但是，南海各方鉴于共同的利益，在2002年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根据这些原则，中国和越南之间成功地划定了北部湾的边界，并签署了渔业协定。北部湾划界是中越双方适应新的海洋法秩序，公平解决海洋划界的成功实践。

在海洋开发越来越深入的同时，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越来越严重。来自陆地的废水等造成近海的富营养化，形成赤潮。1993年，中国近海发生了19次赤潮，2006年增加到93次。从河流带入海洋的淤积物威胁着海洋生物的安全。频繁的海上运输和大规模的海上养殖也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物种，破坏着亚洲海洋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更为可怕的是海上石油泄露。据说，东亚海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海洋运输和近海石油开发引起的石油污染。而油膜覆盖最厚的除了石油运输沿线之外，就是泰国湾和南中国海的越南一侧。另外，围海造田和从海滩、海底采沙也大大强化了对海底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海岸的侵蚀，导致部分海滨浴场、海港、养殖设施遭到破坏，沿岸农田和居民区受到威胁。

海洋亚洲的环境问题不但引起本区域内各国的重视，也引起了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重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1974年建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建设地区性的国际海洋保护合作体系，仅涉及海洋亚洲海域的就有“东亚海行动计划”、“南太平洋行动计划”、“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等。“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保护的海域是日本海和黄海，参加的国家有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自1994年设立该计划以来，先后召开了多次政府间会议和专家研讨会，希望能建成共同的海洋环境数据库，交流各国海洋法研究成果，设立海洋环境监测计划。1981年，东盟五国启动了“东亚海洋和沿海地区保护和开发行动计划”，并颁布了“东盟环境马尼拉宣言”，开始进行海洋环境评价（包括资料收集、技术人员培训、海洋环境退化原因分析等）和管理（包括管理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环保执法、环境友好型管理等）。随着政治外交形势的好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这个计划中又接纳了韩国、中国、澳大利亚、柬埔寨和越南，并推出了1994年版的东亚海行动计划，把关注重点从先前的石油污染转向了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生态系统状况，强调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对海洋环境进行综合管理，进而促成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00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东亚海行动计划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和全球环境基

---

①请参看下列著作：Dalchoong Kim, Choon-ho Park (eds.), Exploring maritime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Possibility and Prospects, Institute of East and West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1993. Choon-ho Park, East Asia and the law of the Sea,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3. Sam Bateman & Stephen Bates (eds.), Calming the waters: Initiatives for Asia-Pacific maritime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d defense studies centre, Canberra, 1996. Sam Bateman (ed.), Maritime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99.

②请参看下列著作：张耀光《中国海洋政治地理学：海洋地缘政治与海疆地理格局的时空演变》，科学出版社，2004年。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海洋中国：文明重心东移与国家利益空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George Kent and Mark J. Valencia (eds.), Marine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Robert L. Friedheim, Haruhiro Fukui (eds.), Japan and the new Ocean regime, Westview Press, 1984.

金合作共同推出了“南中国海计划”。该计划是多边政府间合作项目，旨在改变南中国海环境退化的趋势，希望保护海草、红树林、珊瑚礁、湿地和鱼类，防止来自陆地的各种污染。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参与国扩大到14国，开始实施建立“东亚海域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重点探索跨行政管理边界的海洋区域环境的综合管理方法，并于2003年12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一次东亚海大会和部长论坛上通过并签署了《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24] 2006年12月12日，第二次东亚海大会及部长会议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举行，签署了《实施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宣言》(即《海口伙伴关系宣言》)。如同这次大会的主题“共同的海洋，共同的人类，共同的愿景”所昭示的，海洋亚洲环境问题作为本地区共同的问题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

从当代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发展可以看出，海洋亚洲国家对海洋国土资源前所未有地重视，产生了许多争议和冲突，但是都能在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前提下把冲突控制在可以进行和平谈判的范围内，这就为共同利用和最终和平解决打下了基础。另外，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海洋亚洲环境呈现出全方位退化的趋势，要达到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就必须进行合作，就必须形成开放的区域主义，这才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人们应该追求的共同愿景。

三、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启示

尽管前述内容只是对海洋亚洲环境史勾画出了一个基本轮廓，但是因为转换了观察海洋亚洲的视角，我们大致上从中可以得出一些新的启示。

第一，环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为地把亚洲分为大陆亚洲和海洋亚洲是不合适的。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思维不同于自启蒙运动以来主宰历史学的现代思维。历史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理性、进步、二元论、还原论、机械论，认为历史总是在人的理性的作用下不断向高级发展的，对立的因素通过机械的作用促成历史事件的发生，前面的变化总是成为之后发生变化的原因和动力。这种因果关系看似相当严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纷繁复杂的历史真相。川胜平太的研究就是这种历史思维的结果。他从日本后来独特的发展追溯到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与地球上的海陆分布结合，提出海洋国家和海洋亚洲的观点；再利用二分法把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对立起来，进而提出建立海洋亚洲连邦，以孤立和排斥中国。滨下先生的海洋亚洲概念是从整体出发提出来的，与从环境史角度来看亚洲特别是东亚有许多共通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从他的海洋亚洲概念出发，他自然会提出研究海洋亚洲环境的设想。环境是由不同生境组成的，各生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机械联系，而是有机联系，其相互作用会产生“蝴蝶效应”。另外，环境质量的好坏也不是由最好的生境或各生境的平均值来决定，而是由最差的那一部分决定，这就是“木桶效应”。① 就海洋环境而言，它的质量不光取决于人类在海洋活动造成的损害，还取决于陆地的人类活动和陆源的污染。即使是海洋经济活动也完全是与大陆经济活动整合在一起的。把海洋与大陆截然分开，从环境整体性来看是错误的。

传统的历史思维认为中国是大陆国家，是面向内陆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如前所述，中华先民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在海边和海上活动，发展出自己的海洋文化，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后来，随着对海洋认识的加深，中华民族以海为田，从事海外贸易，甚至移民海外。当然，这些地域性的海洋意识由于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并没有成为主流或官方意识，[25](P89-104) 但据此就否定中国的海洋特性肯定是不对的。建立在这种历史思维之上的政策建言也是大有疑问的。川胜的“海洋连邦论”对日本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与“大陆亚洲”对抗不仅不利于日本的长远发展，也影响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只有把所谓“大陆亚洲”与海洋亚洲整合起来思考，才能有效解决现在出现的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海底资源争端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只有陆海和合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第二，在目前政治历史纠纷严重的情况下，海洋环境合作是最容易突破的领域。中日之间虽然存在

①参看《环境史与历史新思维：包茂宏教授访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着历史认识问题、政冷经热现象、日本军事化和国家关系正常化等复杂问题，但是，环境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中性的，又是带有整体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例如，东亚海域的污染因为大气环流和洋流的作用，会对处在这个海域的所有国家产生影响，民族国家的海上疆域并不能阻止污染的跨界移动。另外，陆上的污染也会越过海洋传到海上国家。从中亚起源的沙尘在中国境内加强后会飘向日本。海上的污染也会通过食物链传到陆上，给食用者造成危害。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大多不是政治直接作用的结果，是不易政治化的、比较纯粹的、但直接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问题，因此，解决起来不但快速而且相对比较容易。① 不过，环境问题又不是绝对的技术问题，它的解决也会产生连锁效应。因为环境治理不但需要政府付出努力，也需要公众广泛有效的参与；不但需要行政积极干预，也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不但需要所在国付出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给予积极帮助和协作。因此，率先解决海洋环境问题必然会造成海洋亚洲的共同进步，为其他问题，如最为敏感的领土之争的解决创造良好条件；反过来，敏感问题的解决一定会加快区域海洋环境问题的改善。

第三，推动有效的海洋环境合作一定会促成海洋亚洲各方的共赢。尽管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之后，部分海域具有了民族国家国土和主权的性质，但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海洋是人类共同的海洋，它的未来也是人类共同的愿景。既然海洋具有公共财富的性质，如果沿海各国仅仅从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发加以利用，必然会重演“公地的悲剧”并产生“零和效应”，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惟有各方从共同利益出发，综合考虑，采取彼此互相照应的措施，才能保持海洋环境的健康稳定。为争夺环境资源进行战争更是不可取的，海洋亚洲环境史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但是，保护并不意味着不利用海洋资源。海洋亚洲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力度也在不断提升，海洋资源争端不但数量增多，强度也在危险地升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从海洋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就能破除在思考亚洲未来时只注重某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忽视区域和全球环境系统整体利益的狭隘性，进而有利于形成既兼顾国家、区域和全球利益，又兼顾人的需求和生态系统平衡的负责任的国家战略。只有这样，有争议的海域才能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但是，共同开发并不意味着竭泽而渔，开发必须保持在可持续和最适宜的限度 (Sustainable yield, Optimum yield) 之内，而不是不顾海洋环境的承载力竞相追求产量的最大化 (Maximum economic yield)。[26] 只有这样，海洋亚洲才能在连续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和谐共赢，创造出既能保护海洋亚洲环境又能实现亚洲复兴的可持续的新型文明。这种东亚文明一定能在世界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率先提供新的范式，东亚的复兴也就因此而具有了新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②

第四，海洋亚洲的和谐是这一区域所有国家和学者共同的愿望，实现这一构想需要学术界做出更多的努力。海洋环境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但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它的开拓和发展需要所有国家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共同努力，需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形成合力。在这一方面，东北亚国家的学者已经开始行动了。在日本学术振兴会亚洲研究教育事业事务局资助下，日本的学习院大学联合韩国的庆北大学和中国的复旦大学共同研究“东亚海文明的历史与环境”。三国学者综合历史、考古、地理资料和卫星图像处理、海洋科学、气象学等的资料和方法，共同研究历史上东亚海文明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尤其是长江和黄河的变迁对东亚海文明的影响。③ 这个项目的持续时间是 2005 到 2010 年。该项目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规模和影响比较有限。应该说，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各有优势，也都各有自己的局限。如果海洋亚洲各国的相关学者能够团结起来，共同组建一个区域性的研究学会，就可以动员国际学术力量，整合国际学术资源，全面推进海洋亚洲环境史的研究，在环境史向海洋拓展中迎头

---

①参看包茂宏：《东北亚区域环境问题与环境合作》，《环日本海研究年报》(日本) 2003 年第 10 号。

②参看包茂宏：《东北亚环境文化的交流与建设》，《亚太研究论丛》第四辑，2007 年。

③参看该研究项目的网站：http://www- cc.gakushuin.ac.jp/~asia- off/aisatsu/aisatsu_cn.html.

赶上，并为海洋亚洲在国际环境史研究中赢得一席之地。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持续推进，不但可以帮助化解海洋亚洲遇到的资源领土争端，还必然为建设和谐繁荣的海洋亚洲提供新的动力。环境史的批判和警世功能也会在促进海洋亚洲的持续发展中得到发挥。

[参考文献]

[1] 梅棹忠夫. 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 [J] . 中央公论，二月号，1957. 梅棹忠夫. 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 [M] . 东京：中公丛书，1967.

[2] 谷泰. 对世界史理论的挑战 [J] . 梅棹忠夫著作集（第 5 卷）[M] . 东京：中央公论社，1990.

[3] 川胜平太. 海洋连邦论 [M] . PHP 研究所，2001.

[4] 川胜平太. 文明的海洋史观 [M] . 东京：中公丛书，1997.

[5] 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 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M]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7] 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主编. 马援译. 东亚的复兴：以 500 年、150 年和 50 年为视角 [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8] W. Jeffrey Bolster. Opportunities in Marine Environmental History [J] .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1, No.3, July 2006.

[9] 李惠生. 中国海洋文化传统与东亚文明 [A] . 载曲金良主编.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 4- 5 合卷）[M] .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10] J. R. McNeill 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Pacific World [M] . Ashgate，2001.

[11] Anthony Reid. Human and Forests in Pre- Colonial South Asia [J] .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1, No.1，1995.

[12] 何芳川主编. 太平洋贸易网 500 年 [M]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13] Robert B. Marks. Commercialization without capitalism: Processe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550- 1850 [J] .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 No.1, 1996.

[14] Peter Boomgaard, David Henley, Manon Osseweijer eds.. Muddied water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nagement of forests and fisheries [M] . 2005.

[15] Peter Boomgaard, Freek Colombijn, David Henley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ndonesia [M] . 1997.

[16]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 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 [M] . 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

[17] 黄邦和等主编. 通向现代世界的 500 年：哥伦布以来东西两半球汇合的世界影响 [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8] Micah Mascolino. Sino- Japanese fishing dispute, 1924- 1932: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 .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Conference, Beijing, June 18- 20，2004.

[19] 宇井纯. 公害原论 [M] . 东京：亚纪书房，1988.

[20] 姜万吉. 韩国现代史 [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21] 居之芬、张利民. 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 [M] .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22] D. G. E. 霍尔. 东南亚史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3] 杨金森、高之国编著. 亚太地区的海洋政策 [M] . 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24] Sulan Chen. Instrumental and induced cooperati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2005.

[25] 周振鹤. 以农为本与以海为田的矛盾：中国古代主流大陆意识与非主流海洋意识的冲突 [A] . 载苏纪兰主编. 郑和下西洋的回顾与思考 [M]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6] Arthur F. McEvoy. Towards an interactive theory of Nature and culture: Ecology, production, and cognition in the California fishing industry [J] . Environmental Review, Vol.15, No.2，1987.

责任编辑：郭秀文

岛屿太平洋环境史研究概述*

王 玉

[摘 要] 岛屿太平洋环境史尚处于初创阶段。相关研究主要从西方"他者研究"、殖民扩张需求及二战后本土学者对西方"发展战略"反思的知识与现实基础上产生。20 世纪 90 年代后，西方学者逐渐摆脱"他者研究"倾向。随着二战后太平洋研究机构的建立，本土学者异军突起，在发觉自身历史独特性的同时，深刻反思西方"进步观念"、"发展战略"等，并为岛屿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然而，初创中的研究仍存在"零散混乱"、欠缺对现实社会环境的关注等问题。未来的岛屿太平洋环境史有必要向中观综合区域性研究发展。

[关键词] 岛屿太平洋 波利尼西亚 环境史学史 区域研究 本土研究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25-07

一、岛屿环境史研究的兴起

著名环境史学家麦克尼尔在 2001 年出版的《太平洋世界环境史》论文集中曾用"正在形成中的领域"来形容当前的太平洋环境史研究，他指出："当前，太平洋区域环境史其实并没有真正形成。"[1](P8) 尽管其所谓"太平洋区域"是指包含东亚、澳洲、北美等更为广阔的区域，但仅就小范围的岛屿太平洋区域来说，能将环境史研究与日益勃兴的太平洋区域研究相结合的岛屿太平洋环境史尚在草创之中。

尽管相关研究尚未完全形成，但近现代相关考古学、博物学、历史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却成就辉煌，这为岛屿太平洋环境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早在 16 世纪中期，伴随着太平洋航海探险的进行，欧洲人急需了解神秘瑰丽的太平洋岛屿区域。于是，早期的船长日记、探险家游记便成了西方人有关岛屿太平洋历史的最早记载。18 世纪，卢梭所谓的"高尚的野蛮"（noble savage），[2](P5) 直接影响了西方人对热带岛屿的认识，并逐渐演化为《东方学》中所揭示的：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欧洲对太平洋岛屿进行统治和改造的"殖民话语"。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欧洲在太平洋地区为帝国主义霸权与商品市场展开激烈争夺，殖民帝国纷纷在太平洋岛屿上建立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并推广单一种植园等生产方式。同时，西方学者亦大多从"他者"角度认识和编撰岛屿太平洋的历史。二战后，相关研究有了新进展。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伴随着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岛屿太平洋历史研究出现了反话语霸权、反权力的后殖民、后现代倾向。一方面，西方著名环境史学家们，通过环境史研究视角考察当地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关系；更加尊重岛屿环境因素影响下文化和历史发展的特性；尽可能还原当地历史演变过程的连续性，并将"岛屿区域"放在全球范围内考察其间的复杂联

---

*在此使用"岛屿太平洋"（Island Pacific）这一概念，主要希望强调区域联系性。由于本文主要探讨太平洋区域中波利尼西亚群岛，包括海洋（Pacific Ocean）与岛屿（Pacific islands）间联系相关的环境史研究，故此借用著名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在《老鼠与人——岛屿太平洋环境史概要》中提出的"岛屿太平洋"环境史的说法。

作者简介 王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北京，100871）。

系。另一方面，本土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夏威夷、斐济等地纷纷建立起“波利尼西亚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太平洋学术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本土学者纷纷成长起来，对欧洲殖民统治之下的历史认识、“进步观念”和“发展战略”进行深刻反思；并以原著民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上岛民与岛屿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认识到岛屿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在塑造岛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艰辛努力，本土学者们的研究既发出了岛国历史“自己的声音”，又从更加整体、有机的角度，将西方传统上的“他者”研究，扩展为复杂联系的岛屿太平洋环境史。

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 70-80 年代，仍被西方人看作“人间天堂”、“世外桃园”的岛屿区域，并没有出现与西方相似的大规模环保运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岛屿环境史研究对发展战略反思有待深入，相关研究对社会“环境不公正”等现象关注不够充分等问题。

二、岛屿环境史研究的相关成果

(一)“他者研究”的转变

20 世纪 90 年代后，殖民主义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日渐衰微，历史学自身也出现了新转向。与之相应，岛屿太平洋环境史研究显示出了较强的“后殖民”和“后现代”以及反权力的倾向。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不再带有浓厚的“他者研究”倾向，而尽可能客观分析岛屿当地人、地之间的历史关系。转变后的西方环境史学家们主要关注中观综合研究，当地著民、殖民者与自然环境之间三维互动的关系，其研究主题大致包含：欧洲殖民的生态影响、“生态旅行箱”与物种灭绝、太平洋战争与核武器试验等。

1. 中观综合研究。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的论文，应该是相关研究中最为成熟和重要的著作之一。2001 年，约翰•麦克尼尔编辑了《太平洋世界环境史——太平洋世界土地、人与太平洋历史 1500-1900》论文集，[1] 其中麦克尼尔自己撰写的《老鼠与人——岛屿太平洋环境史概要》[1](P69) 应算是有关太平洋岛屿环境史开创性的中观区域综合研究成果。该文探讨了从史前时代至今，岛屿太平洋地区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关系。作者将太平洋岛屿环境史分为 4 个时期，而分期标准已不再是重要的政治事件，而是将人与环境互动的历史关系发生重要转折的时刻作为分期节点。文章从中观角度对岛屿太平洋区域以及“大历史”(包括人类史前时代) 环境史进行鸟瞰式的研究视角，以及独具匠心的分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分析框架。该文应算是既有岛屿太平洋环境史研究中里程碑式的文章。

除此之外，西方学者关于岛屿太平洋环境史的综合性研究亦多见于综合性世界环境史研究著作中。由于岛屿太平洋环境史研究是以“区域”为单位的历史研究，其“中观区域性研究视角”势必有别于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历史研究。而星罗密布的岛屿好似“珍珠”，将太平洋区域乃至整个世界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强调了区域间的联系性，诸如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唐纳德•休斯的《世界环境史：人类在生命共同体中不断变化的角色》等。[3](P93-97) 克莱夫•庞廷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则开篇就借用孤悬在太平洋偏远的复活节岛生态崩裂作为微缩的生态文明，使人们认识到资源环境有限的承载力与人类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描述了波利尼西亚人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散居历史。理查德•格罗夫的《绿色帝国主义》第七章“全球环保主义的开端：专业科学、大洋洲岛屿与东印度公司，1768-1838 年”，探讨了伴随着欧洲的殖民主义带到太平洋岛国的不同环境认识，以及专业科学带动下所谓的环保主义思想在岛屿太平洋地区的形成。① [4](P309-375) 尽管上述著作涉及到岛屿太平洋部分各有千秋，但相关研究往往不是研究重点所在。因此，这些研究大都浅尝辄止，并没能有效展现岛屿间的联系或是将岛屿环境史整合入区域或全球范围环境史研究当中。

---

①参见 [英] 克莱夫•庞廷著，王毅、张学广译：《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9、193-195 页；[美]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年，第 373-396 页。

2. 欧洲殖民的生态影响。1760 年代欧洲殖民者来到太平洋诸岛，就像 1490 年代他们到达大西洋美洲一样。[1](P312) 欧洲殖民者所带来的牲畜、细菌、杂草的“生态旅行箱”以及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等，都对岛屿当地的生态系统产生了深刻影响。

杰勒德•沃德的《太平洋岛屿中的人——太平洋岛屿地理变迁评论》(1972 年)[5](P303-305)是由独立后本土学者进行有关殖民时代（1521 年后）岛屿区域人地关系的研究，展现了与世隔绝的岛屿著民在资本主义全球贸易市场影响下的劳动力流动、殖民者在岛屿上建立种植园和矿业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太平洋岛屿城市化问题。约翰•弗兰雷的《法属波利尼西亚塔西提岛 Vaihiria 湖流域环境史》[6](P431-447) 是一篇发表在生物地理学杂志上命名为“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的学术文章，作者通过大量湖水淤泥中的花粉与硅藻的记录，分析了近五六百年间该湖泊流域的人、地关系变化，印证了 18 世纪晚期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塔西提沿海地区定居人口的下降。然而，不足之处在于文章除结论外几乎全是数据运算与图表分析，给非专业读者的阅读造成一定的障碍，也使文章缺乏历史学基本的“叙述”特质。

3. “生态旅行箱”与物种灭绝。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曾在其《哥伦布的交换》、《生态扩张主义》中提到欧洲殖民者在拓殖时携带的“生态旅行箱”，即人口、动植物及细菌微生物对新欧洲地区的入侵与替代。有关欧洲殖民者给岛屿当地带来的土壤侵蚀、森林滥伐、物种灭绝乃至由此带来的岛屿生态文明的消亡，在前文提及的世界环境史的有关章节中都做了充分而又生动的论述。但岛屿环境史研究却据此得出了不同认识。《早期波利尼西亚人的定居对亨德森岛屿陆地蜗牛的影响》[7](P347-368) 一文，以及米伯格与汤米的《灭真的鸟类与高尚的野蛮：人类造成的岛屿鸟类史前灭绝回顾》，[8](P229-250) 解释了前殖民时期岛屿原住民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方式导致的生态破坏和物种灭绝；而这种岛屿生物圈的破坏反之也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使大量岛屿不再适合人类的生存。这些研究促使我们认识到物种灭绝与生物替代早在波利尼西亚人“生宰”的“前殖民时期”就已发生。

4. 太平洋战争与核武器试验。太平洋岛屿地区不可避免地成为太平洋战争的“核心舞台”，而二战则极大地促进了孤立岛屿间的联系与往来，曾处于世界“边缘”的太平洋岛屿成了战争重要的中转地和军需产品的生产地。J.A.班尼特对太平洋战争背景下岛屿人地关系的历史变化及战争给岛屿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战争、危急事件与环境：斐济 1939-1946 年》[9] 中他指出，在战争的危机状态下，斐济成了美军以及新西兰军队重要的军需补给地，而驻扎外来人口的迅猛增长，给岛屿有限的自然资源带来了沉重压力。尽管斐济为代表的太平洋岛屿并没有直接经受战火的涂炭，但是它们并没有逃脱战争带来的景观变迁、森林滥伐与环境退化。

二战后，岛屿太平洋为美国、英国和法国提供了适宜的核试验场所。1963 年，法国将它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的核试验基地转移到其太平洋海外省。一夜间，塔西提和帕皮提人放弃渔业及传统耕作生产方式，并在萌芽中的核试验工业中成为薪酬劳动力。[10](P95) 然而，相关研究大都集中在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政治关系上，未能从环境史视角进行深入探讨。[11](P954) 本•德雷斯与玛丽•德雷斯合著的《穆鲁罗亚：我们的殖民炸弹——法属殖民地的核武器殖民史》[12] 是一部法语著作，该书描述了 1956 年法国在其太平洋海外省进行核试验至今的历史。作者指出，在 1966-1974 年八年中核武器实验给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使得拥有大量法国移民的塔西提岛成了该区域最后的“环境难民营”。

（二）“本土研究”的崛起

与西方学者的转向相比，更令人振奋的是本土研究逐渐成为太平洋岛屿研究的“生力军”。其研究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学者关注殖民拓殖之前的“史前时代”，从而揭示出环境在塑造波利尼西亚历史文化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及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另一部分研究主要关注二战后岛屿的“发展问题”。

1. 展现岛屿历史的连续性。20 世纪 90 年代后本土研究异军突起，挣脱西方话语霸权反思西方学者对岛屿地区的历史认识，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切入揭示岛屿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其中，帕特里克•克里克和特里•亨特编辑的《太平洋岛屿历史生态学》应算是探讨前殖民时期太平洋岛屿人地关系较早也较重

要的论文集。编者继承了布罗代尔“长时段”的视角，特别关注“人类在岛屿生态系统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13](P164-285) 该论文集很好地展示了有关太平洋岛屿人与自然“能动性”概念的理解与认识，缺憾是过分依赖人类学实地考察的资料，忽略了其他学科可供研究的资料以及跨学科的合作。

除此之外，本土学者的研究主题还包括：气候变迁与人类社会发展、波利尼西亚人的移民定居、原著民的环境观念，以及欧洲人到来之前的农业集约化等。

气候变迁。南太平洋大学地理系教授帕特里克•努恩是本土学者中的杰出代表。早在1990年，努恩就已发表《太平洋群岛近来的环境变迁》[14]一文，讨论了地理学的全新世，以及历史学距今150年间的太平洋岛屿地区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1999年，他又出版了《太平洋盆地的环境变迁》一书，应该算是本土学者中研究太平洋区域环境史较早也较为成熟的著作。全书叙述了从前寒武纪到全新世“长时段”间，该区域中气候变化、海平面升降、周期性的干旱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作者认为应该把人类因素与自然因素的互动关系还原到“长时段”的历史中去加以认识。最后，作者亦指出该领域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主题。[15](P308-310)

2001年，努恩发表了《公元1300年前后太平洋岛屿人类与自然关系》[16](P3-22)一文，利用地理学的资料展现了不同时期内高低岛屿、沿海低地岛屿与泄湖暗礁三种不同自然环境下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2003年，努恩发表的《太平洋岛屿的自然—社会互动》[17]一文，将前殖民时期的“1300年事件”作为分界点，展现了气候变化在塑造岛屿社会历史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人类在岛屿环境史中并没能发挥改造自然的“能动作用”，反而常常成为极端自然灾害或是环境变迁的受害者，移民者给自然带来一种“岛屿生态系统的边缘割裂”。文末指出：“人类在太平洋岛屿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能动控制作用的说法只是一种自大的发展话语而已。”而岛屿发展中国家往往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代价。

移民定居。霍金斯•赫尔曼的《南太平洋岛屿共同体定居模式的环境与文化影响》[18]一文，主要探讨了“大波利尼西亚”文化圈内：新西兰南部岛屿、复活节岛以及皮特克恩岛群岛是如何在资源耗竭下出现了人口衰退甚至是灭绝的悲惨命运的。文章指出：人类文明由环境产生，但不当的文明发展方向又会造成环境破坏，从而限制文明的持续发展。因此，未来的决策者应该在政治决策和文化宣传中充分考虑环境破坏所扮演的角色。阿斯勒•安德森在《偏远大洋洲的动物界崩溃、景观变迁与定居历史》[19]中指出，史前时代波利尼西亚人的散居定居模式与南太平洋东、西两侧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相结合，导致了太平洋“东部”地区如物种灭绝、森林滥伐、土壤侵蚀等“人类中心”的环境危机。杰里弗•欧文在《太平洋地区史前开发与定居》[20]一书中，详细叙述和分析了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该区域内史前定居开发状况，展现了当时的岛屿原著民是如何在没有地图和相关技术设备下，利用帆船和季风、洋流在太平洋岛屿区域内自东向西开发太平洋岛屿的。

原著民的环境观念。努恩的《黏在神话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太平洋岛屿中的事例》[21](P125-138)一文，分别通过对太平洋岛屿“洪水传说”、“火山爆发”以及“早期移民散居方式”的考察，指出“环境骤变事件”是如何在口头传说中留下深深印记，甚至塑造了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作者希望历史学家和科学家能够重视对当地口头传说与神话的应用，在太平洋岛屿环境史的编撰过程中找到神话与现实的交汇点。《自然观念与新卡列多尼亚环境退化的回应》[22](P237-250)考察了原著民的自然观念和其思想的多元性。作者通过在当地17个月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人坚信其文化特性是由部族定居的地区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先人的灵魂通过托梦将他们的意识甚至是环境思想传给后代。原著民通常反对导致环境破坏的过度开采。而当今的年轻人则更加注重保护本土文化的特性，他们反对欧洲殖民者的经济活动对当地文化的破坏，并希望通过保护自然环境来保存岛屿文化的独立性。

农业集约化。农业生产是反映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极好的切入点。帕特里克•克里克的《湿润与干旱：波利尼西亚的灌溉与农业集约化》一书，抓住波利尼西亚岛国环境中“干旱”与“湿润”两大截然对立的主题，通过两者比较，指出干旱/湿润两大对立因素不仅是当地自然气候重要的特征，也在漫长的历

史过程中塑造了岛屿王国对立的文化。[23](P11) 其中核心问题是农业技术与劳动力的集约化问题，以及集约化生产方式给王国社会政治发展带来的影响。

2. 反思“进步观念”与“发展战略”。本土学者通过研究，除了认识到岛屿历史的连续性之外，还通过对二战后政治导向的移民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地关系的考察，对西方统治在太平洋岛屿推行的发展战略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波利尼西亚群岛陆地面积极为狭小，其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大多无法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但首府帕皮提（Papeete）所在地，面积最大的塔西提岛却拥有与大陆城市相似的发展环境。从 1829 年起，殖民者开始在帕皮提兴建城市。罗伯特•斯密特的《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城市化》[24](P71-75) 一文，指出二战后当地完全模仿西方的城市功能进行的城市化过程。维多利亚•洛克武德的《法属波利尼西亚农村发展与再移民》[25](P347-371) 一文指出，二战后向乡下地区的再移民，实际上是殖民政府的一种“发展策略”。而这种“发展导向”的移民给当地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力带来了极大挑战，因此并不是适宜长期推广的发展策略。除此之外，大卫•祖里克的《保存天堂》[26](P157-172) 一文指出，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社会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资源匮乏、空气、水污染与自然灾害，而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岛屿区域在面对环境变迁时的脆弱性。作者指出保护物种多样性与开展生态旅游是岛屿地区有效的环保政策与发展战略。杰勒德•沃德的《南太平洋群岛的未来：天堂、繁荣或是贫困》[27](P1-21) 一文，分析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南太平洋岛屿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未来发展方向。

三、研究特点与不足

岛屿环境史与其他大陆国家区域环境史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地理上的狭小孤立使相关历史研究天然具有“环境史倾向”。太平洋岛屿最大特点应是文化隔绝与生态脆弱，而正是这一特点使太平洋岛屿人与自然的互动联系比陆地区要紧密和强烈得多。相比政治制度、外交、军事等传统历史中的核心主题来说，气候变迁、自然灾害，显然从古到今都是岛屿历史发展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因此，环境特性决定其历史研究天生就易于环境史视角的展开。如果撰写一部中国历史可以只谈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的话，却很难有任何一部书写岛屿历史的专著能够忽略布罗代尔长时段中的气候、地理、环境因素的作用。

第二，相关环境史研究揭示了岛屿历史发展的连续而非割裂性。传统的历史认识过分强调了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对岛屿地区“突变式”的影响。实际上，通过环境史视角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物种灭绝、农业集约化与气候对岛屿社会文化的塑造都是岛屿历史中一以贯之的因素，欧洲的殖民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巨大。而岛屿太平洋的历史显然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延续至今，而非在 16 世纪后被欧洲殖民者突然打断的。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只是使得原著民与自然环境的二维互动，增加了一个“殖民者”维度而已。

第三，岛屿环境史研究揭示了殖民主义影响的有限性，即岛屿太平洋地区其实并不是“新欧洲”。克罗斯比在《生态扩张主义》中分析了大西洋区域中的“幸运诸岛”，[28](P66,291) 但在岛屿太平洋区域却只重点分析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南太平洋中面积“巨大”的岛屿（甚至是陆地），而没有涉及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等太平洋岛屿区域。但是，该文中所涉及的有关物种交换与生物替代的研究则补充了克罗斯比有关物种交换和生态帝国主义的分析。与克罗斯比论述有所出入的是，欧洲殖民主义在岛屿太平洋地区，即便是一些温带岛屿地区也只造成了非常有限的生态影响。物种灭绝、森林滥伐、土壤退化等问题早在波利尼西亚人生活的史前时代就已经产生并延续至今。欧洲殖民者并未给岛屿太平洋带来世人想像中的“断裂性”或是“替代性”影响。可见，温带岛屿太平洋地区并不能被算做是克罗斯比笔下所谓的“新欧洲”。

当然，草创阶段的岛屿太平洋环境史仍有很多不成熟之处。在此，笔者提出几点设想。

第一，岛屿太平洋的“光荣孤立”有待中观综合。尽管岛屿分散孤立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相关研究

更易向多元案例研究发展，但没有一个岛屿能够挣脱太平洋区域而存在，也就是说研究太平洋岛屿绝不能忽略区域中乃至区域和全球间的联系。岛屿太平洋区域由于其前殖民经历及宗主国文化传统的差异较大，因此其前宗主国即英国、美国和法国本土的学术研究，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岛屿地区的研究方向与发展程度。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造成诸如美国不易开展对法国海外省（波利尼西亚）的环境史研究等问题。于是，相关研究明显存在“碎化”和凌乱的现象。受到殖民统治的影响，岛屿间原本紧密的网络联系，反而转化为前宗主国或是托管国之间相对“疏远”的关联。可见，在岛屿太平洋环境史研究过程中，不但应鼓励跨学科研究，更需要加强英、美、法等学术强国在跨国、跨文化上的真诚合作。

第二，岛屿环境史研究应立足海洋，强调“区域联系”。海洋生态系统已在无形中将太平洋上这些散落的群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有环境史研究大多将陆地作为研究中心，而忽略了海洋生态系统。但是岛屿区域环境史恰恰弥补了这点，并有效地将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整合起来。而海洋区域联系是优越于传统的大陆环境史研究的。可见岛屿太平洋区域环境史研究，呼吁更多立足“海洋”网络联系而非“岛屿”立锥之地的中观综合性研究。

第三，岛屿环境史研究缺乏对现实环境问题及社会公正等问题的关照。包茂宏教授在《南非环境史研究综述》[29](P23)中指出，南非环境史从一开始就紧扣住环境变迁与种族关系的主题，把环境问题与经济利益、阶级关系和政治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然而，既有研究中显然缺乏这种关照。其实，城市化进程、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太平洋战争、1950 年代后在该区域进行的核武器试验，显然都给当地带来了严峻的环境权力不公正问题，因此从社会环境史的角度对岛屿太平洋环境史进行充分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当今，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更使得岛屿太平洋地区受到全世界学者前所未有的关注。因此，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必将是岛屿环境史未来研究的热点之一。

综上所述，岛屿太平洋的环境史研究尚处于开创阶段。但不可否认岛屿太平洋环境史研究具有史学本身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在史学发展中，岛屿环境史通过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视角展现了太平洋岛屿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将殖民主义还原到应有的历史位置上，有助于原著民书写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在现实生活中，岛屿原著民日益认识到自身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反思西方所谓的发展战略，努力找寻适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岛屿环境史研究也有助于著民争取自身应有的环境权力。岛屿区域其实也是全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缩影，通过岛屿区域的环境史研究，可以促使学者们认识到区域乃至全球联系在历史编撰中的重要性。笔者相信，随着世界环境史以及太平洋区域研究的日益勃兴，岛屿太平洋区域环境史研究将会拥有更为光明的未来，而岛屿环境史的发展也势必为人类的历史认识做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McNeill, J.R.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Pacific World [M] . Ash gate Publishing, 2001.

[2] Alexander, H.Bolyanatz. Pacific Romanticism: Tahiti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M] . Westport Connecticut Press, London, 2004.

[3] Hughes, J. Donal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M] . Rout 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1.

[4] Grove, Richard H. Green Environment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1600- 1860 [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Lawton, Graham H. "Man in the Pacific Islands: Essays on Geographical Chang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J] . Geographical Review, 1974, (4).

[6] Parkes, Annette., Teller, James T.Flenley, John R.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Lake Vaihiria Drainage Basin,Tahiti, French Polynesia" [J] .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1992, (7).

[7] Preece, RC. "Impact of Early Polynesian Occupation on the Land Snail Fauna of Henderson Island" [J] .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Biological Science, 1998, (3).

[8] Per Miberg,Tommy Tyrberg. "Naïve Birds and noble savages- a review of man- caused Prehistoric Extinctions of Island Birds" [J] . Ecography, Copenhagen, 1993.

[9] Bennett,Judith A. "War, Emergency and the Environment: Fiji, 1939- 1946" [J] .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2001, (7).

[10] Craig,Robert D, King,Frank P. 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Oceania [M] . Greenwood Press, 1981.

[11] Shepard, Krench III., McNeill, J R., Merchant. Encyclopedia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M] . New York, 2004.

[12] Bengt et Marie - Thérèse Danielsson.Moruroa. Notre Bombe Coloniale: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Nucléaire de la Polynésie Française [M] . L'Harmattan, 1993.

[13] Kirch, Patrick. Hunt, Terry. Historical Ecolog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M] .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ty Press, 1997.

[14] Nunn, Patrick D. "Recent Environmental Changes on Pacific Islands" [J] .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99, (6).

[15] Nunn, Patrick 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e Pacific Basin [M] . John&Sons Ltd, Wiley, 1999.

[16] Nunn, Patrick D. "Human-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around A.D.1300" [J] .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2001, (7).

[17] Nunn, Patrick D. "Nature- Society Interaction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J] . Geografiska Annaler, 2003.

[18] Herman, R.Hawkins.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e Consequences of settlement patterns in South Pacific Island Communities" [J] . Focus Anthology, 2004.

[19] Anderson, Atholl. "Faunal Collapse, Landscape change and Settlement History in Remote Oceania" [J] . World Archaeology, Vol.33, No.3, Ancient Ecodisasters, 2002, (2).

[20] Irwin, Geoffrey. The Prehistoric Exploration and Colonization of the Pacific [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1] Nunn, Patrick D. "On the Convergence of Myth and Reality: Examples from the Pacific Islands" [J] .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01, (6).

[22] Leah Sophie Horowitz. "Perceptions of Nature and Responses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New Caledonia" [J] . Ethnology, 2001.

[23] Kirch, Patrick. The Wet and Dry: Irrigation and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in Polynesia [M]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don, 1994.

[24] Robert, C.Schmitt. "Urbanization in French Polynesia" [J] . Land Economics, 1962, (2).

[25] Victoria, S.Lockwood. "Development and return migration to rural French Polynesia" [J]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9, (12).

[26] Zurick, N. David. "Preserving Paradise" [J] .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1995.

[27] Ward, R.Gerard. "South Pacific Island Futures: Paradise, Prosperity, or Pauperism?" [J] .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1993.

[28]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著, 许友民、许学征译. 生态扩张主义 欧洲 900- 1900 年的生态扩张 [M]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29] 包茂宏. 南非环境史研究综述 [J] . 西亚非洲, 2002, (4).

责任编辑: 郭秀文

瑙鲁资源环境危机成因再探讨

费 晟

[摘 要] 瑙鲁是世界上最大的磷酸盐出口国之一，但近年来在储量告竭的同时，全国亦遭遇了严重的环境与社会危机。学界在探究危机成因时或强调殖民主义的破坏，或指摘瑙鲁人自身的“衰败”，都有失偏颇。本文通过一种历史性的分析，认为危机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二战后瑙鲁环境的巨变引起了瑙鲁人生活的变化，促使全球市场文化渗入当地文化，形成一种不利于环保的混合文化。其后瑙鲁在独立及国家建设过程中又无视环境破坏，最终酿成了资源环境危机。通过对瑙鲁资源环境危机成因的分析，本文也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文化与地方性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其过程与结果都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瑙鲁 磷酸盐（矿） 环境破坏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中图分类号〕 K6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32-06

在全球频发的环境危机中，南太平洋岛国瑙鲁格外突出。这个 22 平方公里的珊瑚岛仅存 20%的地区尚能住人，因为占陆地面积 80%的磷酸盐矿区已经没有土壤覆盖。矿区凹面镜般的地表导致岛屿上空太阳热能聚集不散，妨碍积雨云的形成，造成当地气候异常干燥。如果想让森林在自然状态下恢复，那么即便只恢复到中等规模，也需要好几个世纪。[1](P1454) 瑙鲁自然环境恶化如斯，社会也面临崩溃：尽管自独立以来瑙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极高，但他们逐渐变成全球最短命的人群，其中 1979 至 1981 年男性人均寿命仅为 49 岁，至 2000 年也不过 58 岁；[2](P150-152) 自 1950 年代中期至今，瑙鲁所有的消费品都依赖进口。但近年来因磷酸盐储量耗竭，瑙鲁出口逆差激增，导致社会保障体系岌岌可危，政权频繁更迭。一叶文明之舟将因环境问题而倾覆，这不能因为它与我们相隔遥远而被忽视。

一、与瑙鲁资源环境问题相关的叙事

瑙鲁的环境破坏与开发磷酸盐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并非最近才为人所注意。1921 年，美国《国家地理》报道说：“开采完的矿场一派凄凉而苍白的景象，破碎的珊瑚、废弃的矿车、装矿石的篮子，还有那锈迹斑斑的美国煤油桶都胡乱丢弃在矿坑里。然而，即便在这样的荒废场景中，植被仍然开始生长，新生的露兜树和椰子树撑开了叶片。”[3](P572) 此文主要是想激发欧美人对太平洋海岛浪漫风情的憧憬，所以即便注意到欧美文明对太平洋地区环境的破坏，也还把它当作浪漫风景的组成部分来看待。出现这种叙事笔调与当时欧美人将南太平洋海岛普遍想象成异域乐土有关。①

这种浪漫主义的叙事在 1930 年代中期发生了逆转。当时磷酸盐产业亟待扩大，欧美人对瑙鲁进行了全面普查。1936 年起，有关瑙鲁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连续出版。② 这些报告指出现瑙鲁土著生活原

作者简介 费晟，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北京，100871）。

①比如当时的画家塞尚就以描绘南太平洋风景而闻名，小说家罗伯特·史蒂文森也以此地为素材创作了著名探险小说《金银岛》。

②即 Camilla H. Wedgwood, Report on Research Work on Nauru Isl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ia (1936a); Oceania 7 (1936b); Stephen, Ernest.Notes on Nauru, Oceania 7 (1936).

来并不浪漫，反倒显得原始、落后。与此同时，瑙鲁磷酸盐矿的发现者埃利斯也开始著书，强调磷酸盐产业将把瑙鲁领入现代文明社会。[①]著名的《国际事务》杂志为该书鼓吹说："太平洋海岛往往被想象成一个天堂——过分浪漫，成为不满社会现实者幻想的对象。而这本书告诉大家，瑙鲁是一个与世隔绝、落后的部落社会。作者发现这个岛蕴藏着磷酸盐的故事才是真正浪漫传奇的。"[4](P152) 这突出反映了当时白人的优越感与使命感——磷酸盐开采意味着工业化和进步，至于它对本土环境的破坏，无需多虑。

埃利斯的影响深远，他奠定了今后几十年中对瑙鲁环境破坏问题的叙事立场：或许这是不应该的，却是不可避免的。1968 年 1 月 31 日瑙鲁独立后，内希•维维安妮出版了总结瑙鲁独立运动的著作，为研究这一地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详尽的个案分析。[②]它反映了当时新兴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种理念：要实现经济发展必须首先不惜代价争取民族独立。该书的意义重大，它肯定了新兴国家要求掌握本国资源、谋求经济增长的合法性，从学理上批判了"殖民有功论"的叙事。但是，由于现代环境运动尚未兴起，这本书几乎没有关注磷酸盐开采的环境后果。

独立后瑙鲁社会的景象似乎印证了当年埃利斯的预言和维维安妮的判断，磷酸盐产业把瑙鲁引入文明与富足。时隔 55 年后，《国家地理》重新造访瑙鲁，报道说每个瑙鲁人都不用交税，政府免费为他们提供一切或只收取极低的费用。然而就在这类令人陶醉的叙述不断涌现时，自然科学家们却为环境问题敲响了警钟。植物学家萨曼等人组成的调查小组从 1970 年代末便开始对瑙鲁植物生态进行实地考察，并连续出版研究报告。这些报告揭示了严峻的现实：瑙鲁人未曾停歇地开采磷酸盐，却几乎没有试图恢复损失的植被与土壤。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专家理查德•泰勒等人则分析了瑙鲁社群日益恶化的健康问题。[③]在现实与这些文章的刺激下，社会科学界开始关注瑙鲁资源环境危机的成因，并分为外因论与内因论两派。前者以澳大利亚法学家魏拉曼垂为代表，认为瑙鲁从 1907 年至 1967 年间遭受的殖民统治(主要是委任及托管统治) 是导致环境恶化的关键。[④]这派观点承袭了维维安妮的反殖民主义立场，进一步指出殖民主义的罪恶还应包括破坏殖民地的环境。但这些强调外因的分析存在漏洞，因为瑙鲁环境急剧恶化发生在独立之后，且瑙鲁社会爆发的所谓"富贵病"，也难说是殖民主义之过。由是出现了内因论，美国《读者文摘》杂志特约撰稿人描述说，"独立后的瑙鲁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社会福利国家。……瑙鲁的衰败是'人性'贪婪所致，当刺激人们劳作的动力消失后，这种衰败就发生了。"[5](P88) 这一分析把瑙鲁环境的恶化判定为内源性的，认为关键问题在于瑙鲁人的生活方式。

进入 21 世纪，出现了一种从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角度分析危机的观点，强调瑙鲁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文化。发生危机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忽视可持续发展，而且大众消费文化扼杀了瑙鲁传统文化。[⑤]本文在相当程度上认可这一观点。不过，这种分析并没有清晰展现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实际的互动结果，也没有彰显环境因素对文化变迁的影响。瑙鲁资源环境问题的急剧恶化在它独立之后才发生，也值得学界对其建国历程及发展政策加以分析。

二、二战前瑙鲁的殖民地经历与瑙鲁卷入世界市场

瑙鲁孤悬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与马绍尔群岛之间空旷的海面上，是海鸟跨赤道迁徙的主要歇脚点。日积月累，占岛面 80%的中央高地堆积起全世界品位最高的矿化海鸟粪，即磷酸盐矿石。磷酸盐矿上生

①即 Albert Fuller. Ellis, Ocean Island and Nauru: their Story.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Ltd, 1935.

②即 Nacy Viviani, Nauru: Phosphate and Political Progres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③具有代表性的是 R. R. Thaman, and D. C. Hassall, Plant Succession after Phosphate Mining on Nauru. Australia Geographer 17 (1985). 以及 Taylor, Richard. Mortality Patterns in the Modernized Pacific Island Nation of Nauru. Am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 75, No.2, (1985).

④1989 年，瑙鲁在国际法院起诉澳大利亚，要求后者赔偿环境损失，该书是应此而著。Christopher Weeramantry, Nauru: Environmental Damage under 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⑤代表作是 Carl N. McDaniel, and John M. Gowdy, Paradise for Sale: A Parable of N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0.

长起森林，但岛民很少涉足其中。岛屿气候受到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的交替影响，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岛上会持续数年的干旱，反之则雨水充盈。这种大自然造成的周期性灾荒使岛屿人口增长非常缓慢。[6](P19) 瑙鲁本土社会至1930年代还处于母系氏族状态，这使得瑙鲁人的财富分配较为平均。瑙鲁人的居住地普遍种植着椰树，椰肉干和海鱼是岛民的主要食品。和许多热带原住民一样，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休闲娱乐，并形成一种“快乐生活”的文化。

1798年底，美国捕鲸船才“发现”了瑙鲁。由于岛上没有当时殖民者渴求的檀香木等物资，结果迟至1880年代它才变成德国的殖民地。而德国也是因为插足太平洋太晚，只能占有老牌帝国不感兴趣的岛屿。不过德国政府无力出面统治，只能委派一个贸易公司代管。为了维持生存，这家公司“开了家很小的杂货店，用烟草、啤酒、阿拉斯加罐装马哈鱼、糖、大米以及饼干以换取椰肉干。”[3](P563-565) 椰肉干成为瑙鲁人卷入世界市场的最初纽带。不过，瑙鲁人工作积极性不高，因为他们不愿意将生产椰肉干变成商业行为。总之整个岛屿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文化，都因德国统治乏力而完好保存。

直至1907年英国开始的磷酸盐开采活动才打破了原有的自然环境。1896年，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英国太平洋岛屿公司（总部设在悉尼）发现瑙鲁的中央高地蕴藏着大量高品位磷酸盐，它有心开采却苦于瑙鲁非己管辖。德国人对这一情况却了解不详，而且德政府与商团也无力支持瑙鲁资源开发，遂让英方如愿。但由于岛屿主权归属德国，英国公司不便征发瑙鲁人参与采掘工作。于是矿工基本从中国和太平洋其他岛屿引入，并要向德国及瑙鲁人支付特许补偿金。矿区的的补给全部从海外直接输入，矿工们也不与当地人发生联系。所以尽管自然环境开始遭受有组织的毁坏，可瑙鲁人还是蜷居在自己的沿海社区里，基本维持着固有的文化和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未曾波及瑙鲁，但战后德国被迫放弃了包括瑙鲁在内的全部海外领土。国联只允许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按照有关殖民地决议的“C”款对瑙鲁进行“委任统治”。① 实际出面统治的是澳大利亚，它自诩其最大特点是“年轻与活力四射，愿意全权担负促进本地人民利益的使命”。[7](P19) 这当属统治者为自己脸上贴金，但其在瑙鲁的统治的确不同于一般的老牌殖民国家：它派驻瑙鲁的统治机构从属行政官员极少，执政官一人集权，几乎不干预当地人的生活。[8](P289-291)

“委任统治”的重点在于榨取瑙鲁的磷酸盐，磷酸盐公司对此掌握全权。1919年，英、澳、新就磷酸盐开发问题达成协议：磷酸盐公司直接承担瑙鲁统治当局的开销，继续向瑙鲁人支付补偿金；三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三国按配额以成本价购买磷酸盐，其他事宜承袭公司既有制度。这样，磷酸盐产业从管理到采掘，依旧都是外国人的事业。直到1930年代，500多名瑙鲁男性成年人中也只有不到50人为挣工资而劳动。[6](P142) 不过，公司开采磷酸盐的方式是砍伐森林后挖去覆土进行露天采掘，采掘完后却不恢复景观，从而造成了《国家地理》杂志所描绘的环境破坏逐步蔓延的现象。

可以说，在二战之前，瑙鲁人先通过椰肉干，后来又通过磷酸盐产业与世界市场发生了联系。但瑙鲁人并没有就此深深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瑙鲁的自然地理秉赋使它遭受了一种不甚严苛的殖民统治。然而好景不长，突如其来的太平洋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三、二战后瑙鲁的文化变迁与民族独立运动的特点

对瑙鲁人而言，卷入太平洋战争是一件意外且无力抗拒的事情。1942年日军占领瑙鲁，为了将这里建造成一个军事堡垒，他们沿海岸线修建防御工事，造成珊瑚礁与鱼群迅速消失。1943年，日军又在居民区建起飞机场，招致盟军对瑙鲁进行地毯式轰炸，瑙鲁人赖以生存的椰林几乎全部化为灰烬。太平洋战争改变了瑙鲁人社区的生存环境，并促使瑙鲁人战后的生活大为改观。最根本性的变化是，由于靠椰林与鱼群都不足以为生，瑙鲁人的生活物资变得完全依赖进口，罐头鱼之类的商品成为瑙鲁人的生

①此款对统治国有颇多限制：不能在统治地驻军、修建军事基地；不准运输、储存超过当地警察所需的军火以及弹药；国联成员国公民可以自由进出统治地。

活必需品。此外，受战争影响，磷酸盐产业一度停顿，瑙鲁人不再收到补偿金，迫使他们不得不到矿区挣钱来购买商品。1948 年，16 岁以上男性中竟有 88%已沦为雇佣工人。是年，继续“托管”瑙鲁的澳大利亚当局指出：“尽管瑙鲁人以前生活安逸，但现在他们已经被训练得适应环境变化了。”[9] (P690) 后来磷酸盐补偿金逐步恢复，瑙鲁人也适应了用补偿金购物，更不愿恢复传统劳作了。一份描绘 1953 年瑙鲁社会的记录说：“他们越来越不愿意经营农业（采集椰果、捕鱼）。”[10] (P541-543) 尽管鱼群重新增多，但多数瑙鲁人还是爱吃罐头鱼。

虽然战后瑙鲁人变得直接依赖于世界市场，但其社会还是保留了许多习俗，其中之一是均财富的观念。瑙鲁人一出生就要到管理机构登记注册，归入母亲谱系，否则就不能成为瑙鲁人及享受福利。① 母系氏族的分配方式决定了瑙鲁人一旦从磷酸盐中获得巨额收入，每个人都有能力维持当前已经养成的消费习惯。瑙鲁人的人生观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瑙鲁人以全新的语言诠释了自己的“快乐文化”：“明天会自己照看好自己！”正是二战导致的环境巨变，才促使瑙鲁人形成了一种依赖于世界市场的消费文化与固有的“快乐文化”相混合的新文化。

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瑙鲁人把磷酸盐仅仅看成一种经济财富。从瑙鲁内部社会看，战后物质生活水平的起伏让瑙鲁人感受到磷酸盐补偿金的重大意义。战后初期瑙鲁人直接参与磷酸盐生产活动，对磷酸盐作为一种经济财富也有了直观的认识。1948 年，瑙鲁正式向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申诉，要求对自己岛屿的财政掌握一定的控制权。从国际社会看，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也促使瑙鲁人认识到磷酸盐产业是其经济主权的一部分。从 1950 年开始，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历届会议都竭力敦促澳大利亚推进瑙鲁人的“进步事业”。在理事会引导下，1955 年瑙鲁全民公投后成立了代议自治机构“地方政府委员会”。1953 年，托管理事会要求磷酸盐公司公布收益，以便确定如何提升对瑙鲁人的补偿。1954 年开始连续两年中，公司都表示愿意增加赔偿金，但拒绝公布收益详单。于是从 1956 年开始，理事会勒令澳大利亚代表回去向瑙鲁人传达：“开采磷酸盐给瑙鲁带来了繁荣，但是瑙鲁人应该从中获得最大收益。”[11](P181) 二战前，瑙鲁人几乎从未主动要求增加补偿金，可到 1960 年代，磷酸盐已完全被定义为一笔民族的财富。自 1962 年开始，联合国邀请大酋长德罗伯特作为本土代表参加会议。他在 1966 年托管理事会上明确宣布：“托管当局在不经过瑙鲁人民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开采磷酸盐。他们得到补偿是理所应当的，而不是特许优待。”“来自于开采瑙鲁人民自然资源的收益，理应累积到瑙鲁人民身上。”[12] (P158)

作为战后亚非拉地区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瑙鲁人对收回资源主权的要求是无可厚非的，联合国的推动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们单纯强调磷酸盐资源的经济价值却是不尊重现实的。因为一方面磷酸盐不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另一方面磷酸盐产业也不仅仅带来经济后果。

四、瑙鲁独立建国及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代价

托管理事会在 1950 年就已经发现，磷酸盐会在不到 70 年的时间里将会耗竭，届时瑙鲁人将何以为生？理事会起先建议瑙鲁人在未来可以重新生产椰肉干，发展商业捕鱼，学习农耕，但瑙鲁人对农业生产态度冷淡。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当局提出，移民别处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印度代表认为，托管一个地方就是要促进当地人的福利，最终要人民背井离乡，违背了托管的意义。而要能留守，就得考虑恢复环境。后来，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代表都指出瑙鲁人不应移民。1957 年，苏联代表正式提出，独立国家必须要有领土，瑙鲁人要独立，就不该移民，自然环境必须恢复。[13] (P142)

尽管如此，移民与恢复环境仍旧成为交替讨论的议题，瑙鲁本身对此态度反复。经过近十年的考察，瑙鲁唯一可以接受的移民目的地是柯蒂斯岛。但澳大利亚表示因为该岛离澳大利亚本土就像曼哈顿离布鲁克林那么近，故只愿给瑙鲁人澳国公民权而不能让其独立，移民选项就此罢弃。苏联代表再次提出要恢复土壤，减缓采矿力度，澳大利亚代表则回答：“前者和后者在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14] (P702) 澳大

①可参见“Cultural of Nauru”，http://www.everyculture.com/Ma- Ni/Nauru.html.

利亚的强硬态度引起瑙鲁代表的愤慨。1966 年底，在瑙鲁独立之前最后一次托管理事会大会上，德罗伯特被问到如果不可能通过回填土壤来恢复瑙鲁环境，瑙鲁人是否考虑移民的问题，他立刻回答说："委员会最好发现回填是可能的，即便成本很高。"[15](P161) 虽然瑙鲁方面态度坚决，但最终结果是 1968 年 1 月瑙鲁独立宣言中未有只言片字提及岛屿自然环境恢复事宜。这看似与瑙鲁代表的态度有矛盾，其实并不意外。1966 年瑙鲁就已决心必须在 1968 年 1 月 31 日之前独立。由于最大的问题在于磷酸盐公司的归属问题，故整个 1967 年，瑙鲁方面的精力全部集中在有关接管磷酸盐产业的谈判中。为了尽早接管磷酸盐公司这棵"摇钱树"，瑙鲁方面不惜牺牲讨论了十余年的恢复环境问题。

事实上，"直到 1968 年，2/3 的顶层地区的自然条件仍处于采矿以前水平。90%的当地物种仍然存在，而这些生物本来可能恢复那 1/3 被破坏了的地区。运走矿石的船可以带回等量的土壤。"[6](P160) 但瑙鲁为了尽快独立，舍弃了恢复环境的最佳时机。独立后瑙鲁的国家发展政策与独立时经济利益优先的理念一脉相承，瑙鲁领导人奉行了一种所谓"弱可持续性（Weak Sustainability）"的发展政策。这一理论派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涌现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接受其基本预设，特别是相信所有物品都可以互相替换，而市场体系将保证物品按比较价格的变化而流通。"只要自然资源卖到足够高的价钱，一个国家的环境哪怕近乎彻底毁灭，也还是符合新古典主义对经济可持续性的定义。"[16](P333)

在这一理论下，瑙鲁开始掠夺性地开采磷酸盐。在收回磷酸盐产业的第一年，开采量就超过了德国殖民地时期产量的总和。独立初就成立的所谓"瑙鲁环境恢复基金"，在 1970 年代已累积到 2.14 亿美元，却几乎没有一分钱投入环境恢复。相反，瑙鲁却在澳大利亚、夏威夷大量投资修建豪华宾馆和高尔夫球场。这是因为，"在瑙鲁，似乎没有哪种具有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行为（带来的好处）能与创造并收取这么大一笔钱的利息相比。"[16](P335-336) 当年坚决要求恢复环境的德罗伯特总统，"忙于运作一个雄心勃勃的投资项目。……他忙于出国进行投资谈判，以至把飞机当成大轿车来使用。"[17](P344)

而磷酸盐的开采沿袭旧法，每一点产出，都伴随着一连串的环境破坏。因为"开采程序包括移除植被、表层土壤以及被污染了的磷酸盐，以便让纯磷酸盐便于开采。树木和其他的植物废弃物被运到一个堆存处，然后焚毁，表层土壤与被污染的磷酸盐由矿业公司贮存，便于未来使用。可在采矿结束后，表层土壤与被污染的磷酸盐并没有被回填。"[1](P1456-1457) 所以仅仅 20 多年后，而不是联合国设想的 70 年后，磷酸盐就几乎被采空，中央高地的环境也被破坏殆尽。由于采矿带来了巨额收入，瑙鲁人二战后形成的混合文化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瑙鲁的分配制度保证了绝大多数岛民都具有强劲的消费能力。1970 年代，每个瑙鲁家庭至少拥有两辆汽车。1980 年，7000 瑙鲁人中只有 2156 人参加工作。由于一切物资都可以由世界市场提供，岛上人口迅速增长，很快就超过了本岛生态承载力。尽管岛上设立了垃圾处理场，可许多"荒废地"还是堆满了生活垃圾。与此相应，住宅区里残存的椰子树却无人料理。

从 1990 年代开始，世界金融市场危机不断，瑙鲁的投资遭遇重大挫折，加之磷酸盐供给力渐不支，瑙鲁的社会生活出现了文章开头所说的混乱局面。这实际上意味着瑙鲁"弱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破产。怎奈为时已晚，瑙鲁相对和谐的环境再也回不来了。

五、资本主义市场文化、新兴国家的发展与瑙鲁环境破坏问题

瑙鲁只用了 100 余年便给世人展示了一个社会从与自然友好相处，到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最终遭遇灭顶之灾的完整过程，这似乎为庞廷的《绿色世界史》追加了一个注脚，① 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通过考察该地区的环境史，能更充分地展现某些历史问题的复杂性：瑙鲁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禀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特殊的殖民地经历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运作下的命运。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市场文化的扩张对本土生活具有巨大的改造力。不过它对地方性文化产生影响的过程未必是直接而迅速的，而其结果也可能不是简单的替代，它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瑙鲁人的社会分配模式、"快乐生活"

①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该书描述了许多因环境危机而灭亡的古老文明。

的文化传统具有很强的能动性与自我维持力。而在植入了资本主义大众消费文化之后，特别是在瑙鲁人掌握了充足的消费资金后，它才成为环境破坏的推动力。这种混合，正是在太平洋战争后瑙鲁环境巨变的现实中生成的，具有很大的不可逆性。瑙鲁环境破坏问题，与整个亚太区域近现代的命运有关，是一个累积的、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其次，瑙鲁独立之后爆发的环境危机，主要是因为它在民族国家建设事业中牺牲了环境。瑙鲁民族主义运动在兴起过程中，排他性地追求独立，牺牲环境恢复议题，而在独立后新国家所奉行的经济增长至上理念，更是注定了瑙鲁环境的崩溃。“民族主义提供了一套新的伦理理念和社会观念，赋予经济增长以正面价值并将自然分散的社会能量集中于经济增长。”[18](P29) 瑙鲁人不是没有注意到资源开发带来的消极环境后果，但还是仅仅满足于它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无视其对环境的影响。瑙鲁个案一方面证明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行不通，另一方面也催人反省新兴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理念。

最后，瑙鲁发展过程中缺乏环境意识不能仅仅由它自己负责。在殖民体系崩溃时，正是“宗主国”的威逼利诱使瑙鲁无暇顾及环境问题。联合国在瑙鲁追求政治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也促使瑙鲁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单纯强调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此外，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当时主流的发展理念输入瑙鲁。结果，无论是从瑙鲁独立后经济发展的政策，还是从社会生产生活的模式来看，它效仿的都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国。伴随殖民主义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把欧美历史中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散播到新兴国家。从这个角度看，瑙鲁遭遇资源环境危机也是很无奈的。

[参考文献]

[1] Manner, Harley I., Thaman, Randolph R. and Hassall, David C. Phosphate Mining Induced Vegetation Changes on Nauru Island [J] . Ecology, Vol. 65, No. 5. (Oct., 1984).

[2] Taylor, Richard. Mortality Patterns in the Modernized Pacific Island Nation of Nauru [J] . Am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 75, No.2, (1985).

[3] Rhone, Rosamond Dobson. Nauru, the Richest Island in the South Seas [J] . National Geographic, Vol.40, No. 6, (1921).

[4]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6, No. 1. (Jan.- Feb., 1937).

[5] Van Atta, P. A. Paradise Squandered [N] . Reader's Digest (May 1997).

[6] McDaniel, Carl N. and Gowdy, John M. Paradise for Sale: A Parable of Nature [M]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0.

[7] Currey,C. H. The Aims and Aspirations of Australia [J] . News Bulleti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Sep., 1927).

[8] Ilsley, Lucretia L.The Administration of Mandates by the British Dominions [J] .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8, No. 2. (Apr. 1934).

[9] Trusteeship Council Document [Z]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 No. 4. (Nov., 1949).

[10] Trusteeship Council Document [Z]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8, No. 4. (Nov., 1954).

[11] Trusteeship Council Document [Z]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0, No. 1. (Feb., 1956).

[12] Trusteeship Council Document [Z]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0, No. 1. (Winter, 1966).

[13] Trusteeship Council Document [Z]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1, No. 1. (Winter, 1957).

[14] Trusteeship Council Document [Z]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5, No. 4. (Autumn, 1961).

[15] Trusteeship Council Document [Z]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0, No. 1. (Winter, 1966).

[16] Gowdy, John M. and McDaniel, Carl N. The Physical Destruction of Nauru: An Example of Weak Sustainability [J] . Land Economics, Vol. 75, No. 2. (May, 1999).

[17] Holmes, Mike. This Is the World's Richest Nation——All of It [J] . National Geographic, (Sept., 1976).

[18] 格林菲尔德. 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郭秀文

文 学 语言学

戏说与仿真：百年史剧观念之反省

邓齐平 宋剑华

[摘 要] 历史剧追求目的无外乎诗或史。历史剧追求诗意是正当的。史剧用戏说的方式去复述历史，符合史剧历史戏剧化的艺术规律，是历史剧追求审美价值的必由之路。百年史剧观念，戏说与仿真争执不断。但是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逐渐解放，艺术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被加以严格区分，史剧创作的戏说因素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认同。

[关键词] 史剧 戏说 仿真 历史 诗意

〔中图分类号〕 I207.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38-04

在百年中国话剧史上，史剧创作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然而，艺术界关于史剧创作中真与假、史与剧的思想分歧，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们论争的核心焦点，无非是“仿真”与“戏说”之间的孰是孰非。长期以来，“以曲为史”的文化传统，使史剧仿真说成为了主导性话语，而对戏说则是采取完全排斥的否定态度。但从史剧创作的具体实践过程来看，戏说不仅存在，还是主流。这种二律背反的奇怪现象，使我们有必要去对史剧艺术的基本概念，重新进行符合科学理性的学理界说。

所谓历史是指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它存在着客观与主观两种不同形态。原生态历史是客观发生过的，它具有一次性及不可还原性的时间特点。史书上所记载、反映的原生态历史文本（包括文字的、图像的、文物的等等），都是由人而为的符号记录，这就决定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历史都无法避免它自身所存在的主观性因素。正是由于原生态的历史无法复活与亲历，也就为后人对于历史真伪的理解与判定，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所以头脑清醒的思想家，他们不可能轻易地相信历史的所谓真实性。历史剧作为历史书写的一种形式，黑格尔就曾说过无非有三种方式：一是“把古代灰烬中的纯然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都很详尽而精确地摹仿过来”的“纯粹客观”描写的方式；二是“把过去时代的客观形态完全抛开，换上现时代的特色”的“现代化”的主观描写的方式；三是“真正客观性”的历史叙事，它的主要特点是“徘徊于真实与虚构之间”。[1](P337-343) 要想达到“徘徊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书写要求，就必须充分强调阐释主体的核心地位，反对“既不管内容及其实体性的意义，又不管现代文化和思想感情的意蕴，”而“止于纯然形式的历史的精确和忠实”[1](P343) 的“现代化”和仿真性书写方式。

落实到史剧创作所追求的意义与目的无外乎两种：诗或史。史剧追求诗意是它的正当权利，故戏说也就成为了一种艺术创作的合理方式。因为戏是艺术，用艺术去阐释历史，它要达到的自然是强烈的戏剧效果，而不是去对历史人物、事件、环境进行原生态的模拟还原，如此一来，戏说本身正是在遵循文艺美学的自身规则，完全突出其历史叙事的艺术真实性，也就是作家自己思想意识的主观真实性，我们大可不必去对史剧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性问题（没有绝对的参照标准），向作家发出种种不切实际的责难。

作者简介 邓齐平，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宋剑华，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632）。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那些史剧作品，基本上都属于仿真一类。仿真是利用戏剧手段去传达作家个人的历史观，它运用戏剧历史化的思维方式，以历史题材与主观虚幻的还原原生态历史为终极目标，进而追求从艺术的角度去实现历史题材的当代价值。我们十分遗憾地看到，在百年史剧创作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文学艺术领域的高度意识形态化，机械教条的政治功利主义严重制约着仿真史剧的思维定势。创作主体被动而僵化地复制历史与屈从历史，或者是公式化地解读历史与消解历史，照抄、照搬现存历史结论，缺乏历史批判理性精神。而认可默许一切陈旧或封建的历史观念，使史剧创作明显带有如高尔基所批判的那种“宗教的欺骗性”。[2] 相对而言，戏剧历史化的思维方式是线性展开的，单一的与纪实的；而历史戏剧化的思维方式则是立体交叉的、多元的与诗性的。戏说史剧强调创作主体的主体意识，要求在创作中弘扬主体精神和现代意识，对历史题材进行符合主体精神与现代意识，当然也必须符合历史背景的戏剧化处理。戏说虽然也缘自于史书记载，但它却往往能够大胆地超越历史与创造历史，进而给观众以全新的思想启迪。只要是由创作主体去进行历史解读，史剧文本也就只能是历史戏剧化的艺术创作。马丁·艾思林在谈到戏剧真实性原理时曾说：“一切虚构，甚至最自然主义的最精确的纪实剧，都可以看作而且实质上也是它的作者的幻想和空想。”[3](P101) 比如，陈白尘的《宋景诗》，自然是经过广泛的史料调查研究后才撰写的，但作家所受的时代影响和自身思想的情感表露，在作品叙事中几乎随处可见。

历史戏剧化的关键因素在于主体，主体是沟通历史和现实的连接桥梁。在历史剧的创作过程中，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关系，需要创作主体将二者巧妙地融合为一体。主体的作用不是去诠释历史，而是要从历史中去酝酿诗意，这种主体的思想悟性才是历史戏剧化的真正灵魂。历史戏剧化就是将历史诗意化，史剧家当然不可能像史学家那样细致地去辨别史实的真伪性，他需要的是依据现代人的情感体验，去感悟历史所应该包涵的真实性。为此，泰戈尔提出了一个“历史情味”的特殊概念。他认为在艺术创作中对历史题材进行加工改造，其根本目的并非是复述历史本身，而是要从历史题材中去寻找“历史情味”。“在所有未确定的情味里可以提出一个‘历史情味’，这个情味就是史诗的生命。”因此，“不管作家保留还是分割历史，只有复制历史情味，他的创作活动才能获得成功。”[4](P11) “对历史的真正的情味的享受”，使读者从世俗、混乱、没有意义的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通过观照历史来开阔视野、汲取营养、丰富自己。史剧戏说的独特意义，不在于获取历史的真实或达到某种古为今用的功利目的，而是在于能使观众通过戏说的历史去分享“历史情味”，最终获得艺术之美的思想熏陶。

不可否认，历史题材在史剧家采用之前，都已被史学家按照某种思维模式进行了组合安排，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决定着历史叙述的逻辑程序，这不一定会符合戏剧思想的诗意要求。虽然历史叙事或多或少为史剧创作提供了一些人物或故事，但主客观统一体的戏剧不可能完全借用于历史所给定的人物或故事，剧作家必须对历史叙事进行戏剧化的加工改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戏说历史。这种加工改造有时是相当艰难的，弗莱塔克在《论戏剧情节》中指出：“在叙事诗的杰出成品和戏剧艺术之间存在着一个深刻的矛盾，因为叙事诗描写事件和人物，总是互相并列的，而戏剧艺术表现情节和性格则是相互交织的，这个矛盾不是作者轻而易举就能克服的。……希腊戏剧处理那些取自史诗的材料，同样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搏斗，就像我们当代的史剧诗人把历史思想变成戏剧思想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搏斗一样。”[5](P8-9) “把历史思想变成戏剧思想的过程”，也就是黑格尔所强调的史诗客观性原则和抒情诗主体性原则的调解转化过程，[6](P242) 即史剧创作的历史戏剧化问题。从这一意义来讲，戏说是对仿真的大胆超越。因为历史不经过戏说，就只能停留在仿真的层面上；而仿真对于戏剧审美而言，只是艺术上的半成品。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历史学家描写已发生之事，诗人则描写某种可能发生之事，所以，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性与深刻意涵，因为诗的陈述本质是普遍性，历史则是个别性的。”[7](P28-30) 在百年史剧创作中，真正优秀的史剧作品大多采用的是历史戏剧化的戏说方式，如郭沫若的《屈原》和《虎符》、杨村彬的《晴宫外史》、魏于潜的《钗头凤》、姚克《楚霸王》、孔另境《春秋怨》、田汉的《关汉卿》、郭启宏的《李白》、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姚远的《商鞅》等等。当然，戏说历史要受到现实和历史诸多因素的重重制约，并

非是毫无限制的天马行空。戏说历史的前提条件，不能超越人类认识和理解历史的人文底线和实践基础，这需要创作主体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行与道德修养；那些反人类、反科学的戏说历史，不仅没有任何存在价值，更不可能成为艺术精品。

对历史的戏说或仿真，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史剧创作的争论焦点。中国古典史剧既承认戏说，也强调仿真，曾经出现过“三实七虚”、“七实三虚”、“虚则虚到底，实则实到底”等提法。到了近代，梁启超在研究孔尚任的《桃花扇》时，就意识到“点燃穿插”和“剧场搬演”的必要性，也特别强调了史学意义上的“实人实事”和“公理公例”。[8](P5690-5697) 可是到了“五四”以后，现代史剧却真正实现了由仿真到戏说的根本性转变。“五四”新文学的史剧创作完全不拘于历史，戏说之张扬程度达到了空前绝后的自由状态。如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与《貂蝉》、熊佛西的《卧薪尝胆》、顾一樵的《荆轲》与《项羽》、李伯颜的《宋江》、林语堂的《子见子南》等大量史剧作品，历史只是他们传达现代文明意识的一种借助题材，重新阐释历史的当代性意义才是他们进行社会启蒙的思想目的，戏说几乎成为当时史剧创作的最主要手段。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阶级分析方法的传播与盛行，夏衍的《赛金花》和宋之的《武则天》因戏说历史，还曾引起过“左”翼文学阵营内两次关于历史剧的大讨论。茅盾批评夏衍的《赛金花》“研究‘赛金花’而不是‘义和团’和‘庚子前后’”，所以剧作主题缺少中心，动作不统一，“乞灵于零碎的‘警句’式的‘讽喻’”，其结果是顾此失彼、“捉襟露肘”；[9] 批评宋之《武则天》的致命伤是作者“主观的目的”与作品“客观的效果”严重背离。[10] 茅盾明确指出两剧的创作意图不是营造观众审美的历史感，而是刻意去追求现代生活中的“低级趣味”。像《赛金花》中“秀才摇头摆尾背文章和俘官磕响头”，《武则天》中“掌颊、拔须、搽粉”等，都在观众的笑声中“完全变了质”。当然，这两部剧作的戏说历史方式，尽管受到“左”翼批评家的强烈责难，但剧作本身所获得的轰动效果，却生动地表明了戏说作为艺术本体论的存在意义。

20世纪40年代后，史剧创作更为兴盛发达。郭沫若、欧阳予倩、周贻白、舒湮等人，对于历史剧戏剧化的思想认识也渐趋成熟，并由此推动了现代历史剧的快速发展。但在理论上，关于戏说的合法地位却一直存有争议；相反，仿真则逐渐成为了一种时代的主流话语。面对民族危机，史剧创作被提升到了与民族生存密切相关的崇高地步，所以史剧的历史价值便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主题。1942年7月，田汉以《戏剧春秋》杂志社的名义，在桂林召集柳亚子、欧阳予倩、茅盾、胡风、于伶等12人，专门召开了一次“历史剧问题座谈会”。田汉认为在当时差不多同时出现的两个历史剧当中，两个洪宣娇形象差异很大，这是很不正常的。他说：“两个洪宣娇必有一个错。甚或两个都错也论不定。”蔡楚生认为“真理只有一个”，对历史人物的估价就不应该相去太远，否则就是对历史人物的歪曲。茅盾也赞同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应该要有一致的、至少是差不多的标准”。不过，欧阳予倩等却认为：“历史剧和历史本身是有距离的”，创作历史剧是要“加进一些酱油醋的”，“只要把要点抓住了，其余的大可不必拘泥。”欧阳予倩所说的“要点”，在胡风看来“是‘真实’而不必是‘真事’”，“是真实性，并不完全是真事实。”[11] 这就为戏说史剧留下了相对自由的艺术空间。

在40年代的史剧创作中，明显存在着的仿真和戏说的激烈对抗。比如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戏说史剧和以陈白尘为代表的仿真史剧，戏说史剧的演出效果要好得多。陈白尘在创作之余，总结自己“五四”以来的历史剧，认为从“翻案法”到“借尸还魂”、“指桑骂槐”、再到“作古正今”，都带有明显的戏说成分，而他最后的结论却是必须规规矩矩去写历史：“写出人物的真实，便是写出人物的批判！”“写出人物的批判，也就是写出历史的教训！”[12] 这是典型的仿真史剧创作模式。而郭沫若采取的是戏说史剧的创作方式。他认为“历史并非绝对真实”，只要有充分的理由，翻案也不是不可。他斥责邵荃麟所说的“写历史剧就老老实实的写历史，不要去创造历史，不要随自己的意欲去支使古人”，是“根本的外行话，最好是少施教训为妙。”他极富激情地诘问：“史剧家在创造剧本，并没有创造‘历史’，谁要你把它当成历史呢？”[13] 郭沫若强调历史剧的翻案处理，主要是追求戏剧结构的完整性以及人物、事件等艺术虚

构的完整性。他那句“失事求似”，也成为了戏说历史的至理名言。

20世纪50-60年代，戏说和仿真之间因政治原因，丧失了它们原有的平衡界限。古为今用和历史主义的创作原则，使仿真被蒙上了绝对真实的庄严谎言，实际上却成了典型的古为今用的主观戏说。承续着延安戏曲改革的传统，杨绍萱等的《跃河配》、曹禺等的《胆剑篇》、田汉的《文成公主》、郭沫若的《武则天》、吴晗的《海瑞罢官》等大量的历史剧，利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合法身份，大胆地戏说了历史一把。这种戏说当然是被冠之以逼真或仿真的堂皇名目，不过由于它们大多违背了艺术自身的规律性，以所谓的历史思想去代替戏剧思想，造成了很浓的公式化与概念化政治色彩，不仅远离了历史真实，还导致了戏说误入歧途。

新时期以后，郭启宏、郑怀兴、罗怀臻等人不断探索史剧的“剧”的本体性，他们运用历史戏剧化的创作方式，突破了原先史剧理论的思想束缚，给戏说史剧以极大的自由空间，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郭启宏认真辨析了剧与史的辨证关系，他明确指出：“历史剧是‘剧’，是文艺作品，不是‘史’（史学）。”[14]他提出“传神史剧”的全新观念，认为：“传神史剧的要旨，一是内容上熔铸剧作家的现代意识和主体意识，一是形式上求得‘剧’的彻底解放。”[14]传神史剧强调以剧的神似传史的神韵，而在这剧的神似与史的神韵中，既包含有历史的本质真实和历史人物的内心真实，又包含有与历史积淀相沟通的作者的主体意识，甚至于还包含有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当代意识。郭启宏认同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对所谓的绝对理念的“历史使命感”表示了极大怀疑。他认为“历史是另一种形态的现实人生”，历史是“有生命的实体”，[15]是一种“永远发展着的存在”，史剧家在具象上只能抓住历史的某一瞬间，把握历史的某一局部或细部的神韵，但史剧家却能从历史的一鳞半爪中窥探出历史全貌，感悟到历史人物的人性或人生复杂的哲理内蕴，发掘出历史深厚的现实意义，在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上，使历史之神与现实之韵融会贯通。

传神史剧及其理论是对仿真史剧的彻底怀疑和否定，它为尊重历史戏剧化规律的戏说史剧创作，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在传神史剧中，历史与现实搓捏揉合，历史真实已完全消融在创作主体的艺术世界之中，历史、现实和创作主体达到了高度融汇。仿真的神话被消解，戏说的地位由此得到确立。这无疑是对几十年来戏说与仿真之间的无休止争论，划上一个圆满的总结符号。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 美学（第1卷）[M]. 朱光潜译. 商务印书馆，1981.

[2] 引自胡风. 自然主义倾向的一理解 [C]. 胡风全集（第2卷）.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3] 马丁•艾思林. 戏剧剖析 [M]. 罗婉华译.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4] 泰戈尔. 历史小说 [C]. 倪培耕译. 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 吕六同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5] 古斯塔夫•弗莱塔克. 论戏剧情节 [M]. 张玉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6] 黑格尔. 美学（第3卷下册）[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 亚里士多德. 诗学 [M]. 罗念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 梁启超. 桃花扇注 [C]. 梁启超全集•戏剧小说集（第19卷）.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9] 茅盾. 读《赛金花》[J]. 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36-12-30.

[10] 茅盾. 关于《武则天》[J]. 中流半月刊（第2卷第9期），1937-07-20.

[11] 田汉等. 历史剧问题座谈 [J]. 戏剧春秋（第2卷第4期），1942-10.

[12] 陈白尘. 历史与现实——《大渡河》代序 [J]. 戏剧月刊（第1卷第4期），1943-04.

[13] 郭沫若. 历史•史剧•现实 [J]. 戏剧春秋（第2卷第4期），1942-08；邵荃麟. 两点意见——答戏剧春秋社 [J]. 戏剧月刊（第1卷第4期），1943-04.

[14] 郭启宏. 于今意趣在“传神”[J]. 戏曲研究（第23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987.

[15] 郭启宏. 传神史剧论 [J]. 剧本，1988，（1）.

责任编辑：原 石

论香港社会剧的艺术探索与创造*

胡星亮

[摘 要] 社会剧代表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香港话剧创作的主要成就。在对于香港现实关注与思考的本土意识、戏剧叙事写实基础上的拓展与开放、探进人的个性与心灵和形象塑造等方面，社会剧的探索促进了香港话剧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 香港社会剧 本土意识 艺术拓展

〔中图分类号〕 I207.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6-0142-06

社会剧是指更多以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反映社会人生的话剧作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香港社会剧，主要有 《断海》(袁立勋、曾柱昭)、 《红界》(曾柱昭)、 《我系香港人》(杜国威、蔡锡昌)、 《人间有情》(杜国威)、 《命运交响曲》(袁立勋、林大庆)、 《花近高楼》(陈尹莹)、 《最佳编剧》(吴家禧)、 《人到无求品自高》(张棪祥)、 《大屋》(陈敢权) 等创作，以及陈尹莹的 《谁系故园心》、袁立勋的 《天远夕阳多》、张棪祥与蔡锡昌的 《香港梦》、吴家禧的 《花情化不开》、陈敢权的 《白兰呼唤》等剧。其他创作，例如杜国威的 《聊斋新志》与 《南海十三郎》、陈尹莹的 《如此长江》等，虽然是写历史题材，但是，其中所包含的 "现实"情结仍然是非常浓烈的。

一、对香港历史现实的思考

香港社会剧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 "九七"而勃发的。1984 年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回归祖国进入倒计时。香港人似乎是在突然之间意识到，他们以及他们所生存的这块土地，正在面临着重要的历史转折。因而，原先更多是为了生活打拼、发展经济而远离社会政治的香港人，此时也被推涌到历史的大潮中，开始了对自己的身份、对香港的现实、对香港与中国的命运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被卷入这股历史大潮的香港戏剧家，同样也在关注香港的现实，思考香港的过去与未来。

社会剧对香港现实的关注与思考，首先是要建立香港的身份认同。香港这座国际大都市是从小渔港发展而来的，香港的先人也有些是山村的农民，因此，社会剧建立香港的身份认同，又大都是走向渔港和山村去挖掘香港的历史和过去。力图全面反映香港历史变迁的 《我系香港人》，就从 1841 年英军侵占香港， "太公"、 "太婆"在这个渔港落地生根开始写起，描写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在香港人的辛劳、苦难和血汗中逐渐繁荣，同时批判了殖民者巧取豪夺、虚伪欺诈的殖民之风，并写某些香港人拼命挣钱而不问政治，或是宁愿做二等公民而移居国外等心态，表明香港人对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应该有归属感和责任感。 《花近高楼》、《红界》等剧则进一步深入香港的渔村和山村去探寻香港的 "根"。 《红界》是描

* 此文为教育部 "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项目和国家 "十·五"社科基金项目 (02BZW045) 《当代中外比较戏剧史》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 胡星亮，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 南京，210093)。

写清初香港新界沥源堡的农民反抗朝廷“迁界避贼”的斗争，而在戏剧的深层，更是表现了作者对于香港这片乡土的热爱之情。就像剧中主人公李霖所说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靠这块田地过活，我们披荆斩棘，刀耕火种，才能将这个荒野变为桑田。……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已经落地生根。这里就是我们要终老的家。”《花近高楼》是以港岛东区海边的某处为背景，展示香港从20世纪50年代的贫困渔港，到70年代大展宏图，到80年代成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历程。剧中，江子留劝说欲移民的年轻人丁宝恒留下来为香港的发展尽心尽力——“无论香港将来变成怎样，至少你可以对自己说，对你的先人说，对你的儿女说，在她的重要关头，你曾经为她尽过力”，语重心长，也表达了大多数香港人的心声。《人间有情》、《断海》等剧，也都是回到历史发展中去探寻香港的身份认同的。

建立香港的身份认同，也就是对香港人身份的探寻。在《迁界》、《花近高楼》、《人间有情》、《断海》中，那些为香港的发展披荆斩棘、流血流汗的，都是热爱这片土地的香港人。香港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香港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面对“九七”，这让香港人感到困惑。上述建立香港身份认同的戏剧大都涉及这个问题，而予以直接描写的是《我系香港人》。该剧开场就以考试做多项选择题的形式，提出了这个尖锐问题：应该用怎样的语气读“我是香港人”这句话？平淡地说？消极、忧愁地说？充满疑惑地说？还是信心十足地、大声地说？剧中的香港人形象，从早先爬在英军脚下乞怜，到用自己的血汗建设香港的繁荣，最后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并善意地嘲弄“鬼佬”，显示着作为香港人的自豪和骄傲；然而在政治身份的认同上，香港人有困惑。第12场写“仔子”在美国以香港人身份参加“国际学生晚会”，当其他国家的学生都穿着民族服装唱自己国家的国歌时，“仔子”不知道该唱什么好。情急之中，他唱起了中国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何所指？香港人的归属又在何方？剧中“仔子”的困惑也反映了香港民众的困惑。

香港回归中国是历史命题，因而面对“九七”，思考香港与中国的命运，也就成为社会剧关注香港现实的重要主题。《命运交响曲》其剧名就有这层寓意。该剧描写凌家四代人半个世纪的人生遭遇，也借以思考香港及中国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祖父、祖母分居香港、广州两地，跟随祖父的父亲母亲和跟随祖母的叔父婶母，因为当初的去留而结下恩怨，长孙凌子才则是童年回到祖母身边长大而后回到香港接受教育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上辈的恩怨逐渐消解，但令人深思的是，当初坚决不去香港的叔父，现在却要把女儿送去香港，而凌子才的妻子也正带着儿子在美国欲申请移民，凌家的下一辈又为去留在做痛苦的选择。难道上辈的命运将在下一辈重复？难道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运？《南海十三郎》的构思与《命运交响曲》有些相似。十三郎生在广州死于香港，而他一生的兴衰荣辱，又与现代中国的政治与命运密切联系，在其疯言疯语中也包含着作者对现代中国的沉重思索。《谁系故园心》、《大屋》、《香港梦》等剧，也都是描写这种香港—中国、香港人—中国人的复杂情感；《如此长江》、《白兰呼唤》、《聊斋新志》等剧，尽管没有直接切入这个主题，但同样包含着戏剧家对香港和中国命运的认真思索。

长期的殖民统治使香港与祖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膜；面临“九七”，香港人在兴奋中也显出某些困惑。《断海》就典型地反映了“九七”前香港人对未来前景的这种焦虑心态。剧作描写出生在港岛某渔村的海生，因为目睹渔民生活的艰辛、大海吞噬母亲的苦难，以及女友的婚姻悲剧，他与父亲决裂而去大港闯世界；但是大港的世界也极为艰难险恶，海生只得做水客和武打替身挣血汗钱。在这个既不属于渔村又不属于大港，其前途困惑、迷惘的海生身上，包含着戏剧家的现实思考。《人到无求品自高》、《最佳编剧》等剧所写部分香港人的移民心态，也是这种困惑、迷惘的流露。可贵的是，戏剧家既真实地描写了香港人面对“九七”的迷惘与困惑，也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在迷惑中的思考与抉择。香港人“应该对香港负上一份责任，一份归属感”（《我系香港人》），凌子才不愿加入“犀牛（移民）”群而“要保留本来面目”（《命运交响曲》），江子留和丁宝恒在香港发展的重要关头“留下来为它尽力”（《花近高楼》），等等，都体现了在历史大潮面前香港普通百姓的严肃思考。《戏情化不开》中的舅父也是个全家移民的“太空人”，妻与子在澳洲，自己在香港打拼，闹得身心疲惫，还引起夫妻、父子之间的诸多矛

盾。而正是如此移民情形，让舅父开始思索自己的“根”，所以，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将条根移返去原来嘅地方”——“我将佢哋接番哂返嚟呀，我哋唔移民喇！”

80年代崛起的香港社会剧创作，标志着香港话剧的本土意识和主体意识的最终形成，话剧终于成为香港文艺反映现实的一种形式，成为戏剧家表达现实体验、生命感悟的一种形式。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了此前香港话剧的创作，而正是肯定了香港话剧本土意识的发展过程。30-40年代香港本地话剧少有创作，大都是上演内地的剧作和西方戏剧；50-60年代虽然有少量创作剧，但大都是写历史，与香港的现实人生较少发生联系。在话剧创作与香港现实的关系上具有重要突破的是70年代的校园戏剧。校园戏剧直面现实，使香港话剧开始更多地关注香港的现实人生，思考香港的社会问题，并出现了与殖民政策相对抗的声音。这是香港话剧本土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萌发，尽管校园戏剧的格局较小，它主要关注的是与青年学生相关的学校、教育等问题。“九七”社会剧就在这方面有较好的拓展与深化。虽然社会剧创作是受到现实政治的冲击而引发的，但是，它确实使香港戏剧家前所未有地关注自己所生存的这片土地，思考香港的过去与现在，思考香港的命运与未来，其创作也就具有了强烈的本土性与主体性。

香港社会剧体现了写实戏剧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批判精神。这些戏剧把现实中的香港人及其生存处境搬上舞台，让人在戏剧中看到了自己，认识了现实；更重要的是，这些戏剧真实地描写了历史转折时期香港人的生活与心态，展现了他们的人生困境、精神苦闷与艰难抉择。它们不回避问题，不掩饰矛盾；它们探讨人生的真谛，思考现实的未来。尽管有些剧作还缺乏深入的挖掘，但是它们写出了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写出了戏剧家情感的真实与现实体验的真实，并且少有一般写实戏剧的训谕色彩。

二、社会剧的叙事原则

香港社会剧坚持写实戏剧的基本叙事原则。杜国威《编剧的话》谈其《人间有情》创作，“是想借那个风风雨雨、内忧外患的大时代，带出一些忧戚相关、悲欢离合的小市民的生活琐事”，写“他们的喜与哀，他们的抉择，他们的无奈”。[1] 可以看出社会剧的写实叙事，仍然把反映现实放在首位，强调生活描写的真实性，注重细节的真实和现实的呈现。有些剧作如《花近高楼》等，还有较多的传统写实戏剧的特征，力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再现现实。

当然，80年代兴起的香港社会剧不可能是纯粹写实的，在20世纪，现代主义各文艺流派向写实主义的渗透是事实。香港社会剧的创作也是如此。它在60-70年代的《陋巷》、《六分一》、《牛》等香港写实戏剧的艺术拓展基础上，又借鉴了反写实的现代主义戏剧流派，改造和发展了传统写实戏剧的叙事模式，从而将社会剧的写实叙事引向开放。从社会剧的剧本创作来看，它主要是借鉴了史诗剧、剧场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戏剧流派；而相应地，布莱希特、怀尔德、契诃夫这些拓展了写实主义戏剧，使写实主义戏剧融合了现代主义方式，对香港社会剧的写实叙事产生了深刻影响。

布莱希特史诗剧的叙述手法对香港社会剧的影响几乎是全面的。香港社会剧的引入叙述着重针对两点。第一，所写事件漫长，剧情只能表现主要的戏剧场面，而用叙述交代幕后发生的一般事件。比如《南海十三郎》，十三郎从生到死将近一个世纪的现实遭遇，在剧中以戏剧性场面表现出来的并不多，其人生变故的大部分情形，都是通过“讲古五人组”叙述出来的。《人间有情》等剧亦是如此。第二，所写事件重大，剧情只能表现大的场面和片段，许多细微处就以叙述交代出来。比如《红界》描写几百年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剧作就以史诗剧手法大笔勾勒，着重展现当年这场斗争的重要历史场景，而一般历史事件，则让瞽师用弹唱历史故事的形式叙述出来。《如此长江》也与此有些类似，虽然该剧没有明确的“叙述者”角色，但是，记者的提问与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叙述的功能。

如同布莱希特史诗剧，香港社会剧的叙述，至少在叙事的广泛性和叙事的批判性两方面有新的创造。叙事的广泛性，例如《我系香港人》、《人间有情》等，力求反映近代以来香港社会的历史变迁，而其剧情又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予以展现，因而，结合传统的戏剧性戏剧与史诗剧的叙述性因素，以戏剧性戏剧表现重要的情节场面，以叙述性因素交代幕后发生的事件，既突出重要的戏剧性场面而使人获得艺

术感染，又使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和人物生活的周围世界能广泛地呈现，并使剧情能连贯地发展。叙事的批判性，就是布莱希特史诗剧的“间离”，其目的是使人们对于戏剧所描写的事件采取分析和批判的立场。《迁界》中瞽师的弹唱，《人间有情》中梁昌华的叙述，《南海十三郎》中讲古五人组的旁白，《我系香港人》中讲故事者或发言人的叙述，等等，或揭示题旨，或感慨抒情，或分析评判，都使人们跳出剧情并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使日常熟悉的生活陌生化而启发人们思考，从而达到对现实的新认识。

借鉴叙述的戏剧叙事自然会走向推倒“第四堵墙”，在传统写实戏剧“这是生活”的基础上结合“这是戏剧”的戏剧叙事。不过，香港社会剧在这方面所受的影响，更多的还是来自美国的怀尔德。怀尔德也是写实戏剧家，但他强调“戏剧要求扮演”：“戏剧不断地努力告诉人们这个概括出的真理，而正是做戏的成分加强了这一点。正是在扮演和做戏的过程中，戏剧表现了比小说所能达到的更令人信服的真实”。[2](P130) 怀尔德的这种戏剧观念被称为“剧场主义”。因此，与传统写实戏剧的强调客观写实不同，社会剧的写实叙事，现实与梦幻、虚与实有较多的结合。比如《逝海》写海生对多年前自己离家出走、母亲溺海遇难等情形的回想，金娣对其夭折的畸形儿的梦幻般的思念，比如《南海十三郎》写体貌矮小的十三郎爱上漂亮女孩 Lily，他幻想自己是个英俊高大的青年而与 Lily 谈情说爱等情节，就不是用对话，而是以戏剧场面直接表现出来的。如此戏剧叙事，就不仅把人的外在行为，而且将人的内心世界也搬上了舞台。社会剧的写实叙事还具有“扮演”意识。如《我系香港人》，一个演员饰演多个角色，演员的表演时而进入角色，时而以演员身份向观众说话；或如《如此长江》，演员在舞台的角落里看着自己的回忆在台上慢慢展现，然后又改装成当年的自己并进入台上所展现的剧情中；或如《人到无求品自高》，无实物的虚拟表演，演员面对不同虚拟对象有不同的表演，等等，这些也并非导演处理，而是剧本中的情节叙事。如此“这是生活”与“这是戏剧”的叙事结合，既能使观众感受到“这是生活”的现实性，又能使观众在“这是戏剧”中，感受到戏剧所特有的“更令人信服的真实”。

香港社会剧的写实叙事还受到了象征主义戏剧的影响。高尔基曾赞叹契诃夫剧作“是新的戏剧艺术，在这里，现实主义提高到了激动人心和深思熟虑的象征”，[3](P228) 在多次演出过《海鸥》、《三姊妹》等契诃夫戏剧的香港剧坛，对此也是熟悉、激赏的，并在创作中予以借鉴。例如《大屋》，剧中那幢坐落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华市的大屋，它既是现实中的一幢普通住房，是剧中那些中国留学生合租的居所，它又象征着中国这个大家庭，因为这里居住着来自香港、大陆、台湾的中国留学生，“大屋”也就有了象征意涵。该剧表层故事是写留美中国学生的爱情、亲情、学业、居留等人生，其深层内涵，则是通过这些中国人的留学遭遇，写他们对自己、家庭、香港以至中国的认识。其中比较尖锐的是对中国“大屋”的描写。香港学生对故乡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大陆学生蓝迁来此借住的被歧视与被拒绝，这些学生续约大屋的不齐心，和房东对中国留学生一盘散沙的痛骂等，就是作者对“大屋”象征意涵的反思与批判。《逝海》的写实叙事也是象征的：渔村是香港的起源，海生出生在渔村而去大港闯世界也就是香港人的历史，而海生现在既不属于渔村又不属于大港的茫然，又象征着香港人面对“九七”的困惑。《命运交响曲》、《我系香港人》、《如此长江》等剧的某些情节也有这种写实基础上的象征性，戏剧家通过那些看得见的事物的描写去展示隐藏在其背后的现实内涵，将人引入更深层的艺术感受。

香港社会剧的写实叙事受到了史诗剧、剧场主义、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戏剧的深刻影响，同时又有较多的民族风采和本土特色。究其缘由，这不仅是因为其借鉴对象本身就与中国文化传统比较接近，例如布莱希特的史诗剧、怀尔德的剧场主义都曾受到中国戏曲的影响，契诃夫的戏剧也更多东方艺术的韵味；更重要的是，在香港社会剧创作中，民族的、本土的东西已经渗透到剧作的题材和内涵中去，其艺术表现又自觉地融合了民族戏曲和本土文化的特征。比如《逝海》、《迁界》等剧挖掘香港的历史和过去，描写传统的渔民和农民，这就自然带出了“渔歌对唱”、“跳大傩舞”等乡风民俗，和“上头”、“脱壳”、“祈雨”等民间仪式，并且，这些仪式或习俗又与他们的生活、性格与命运相联系着。再比如《南海十三郎》、《虎度门》等剧写粤剧艺人的生活，不仅在岭南文化的背景中揭示了香港与中国的历史命运，而

且话剧的写实叙事与戏曲的写意抒情相融合，或是把戏曲表演放到话剧里而使其有虚实相生的叙事效果，其艺术表现也就别具风味。香港社会剧又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粤剧等民族戏曲的影响，多场次的戏剧结构、同一舞台表现不同的戏剧场景、灵活自如的时空转换等等，都是借鉴戏曲的艺术表现。

由此，香港社会剧的写实叙事较之传统有了新的拓展。它从传统写实戏剧的客观性转向"泛客观性"，相应地也就从前者的剧作家的"消失"转向后者的剧作家的"我看"，从前者的再现转向后者的再现与表现结合，从而使其戏剧叙事更灵活自由，戏剧表现更丰富多彩，也使写实叙事既能贴近现实而又能超越现实。香港社会剧的叙事当然还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故事性叙事，戏剧叙事就为讲述某个事件，缺乏对生活的诗意提炼，和剧作家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刻体验与感悟；二是喜闹性叙事，戏剧叙事注重有趣的、尤其是喜闹的情节，并在喜闹剧情的表层轻轻滑过，没能深刻挖掘表层情节背后的现实人生的深层内涵。这些，都影响到社会剧的叙事深度。

三、社会剧的人物塑造

香港社会剧的叙事并不缺乏形式的创新，但是，大部分作品中戏剧叙事的形式创新主要并不是由内在需要所决定的，因而，也较少能戏剧地表现作者对于现实人生的内在冲动和体验。别林斯基曾将戏剧与叙事诗加以比较，指出："在叙事诗中，占优势的是事件，在戏剧中，占优势的是人。叙事诗的主人公是变故，戏剧的主人公是人的个性。"[4](P316) 这就是说，戏剧叙事的艺术创造主要是写人，通过叙事以展示人的命运和人性的复杂。这是戏剧叙事的根本，写实戏剧也必须如此。而正是在戏剧叙事的这个最重要的方面，无论是故事性叙事着重讲述某个事件，还是喜闹性叙事注重有趣的情节，大多数香港社会剧都忽视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人物命运的揭示。正是由于忽视了戏剧叙事首先是通过人物描写，去表现戏剧家对于现实人生的感悟与体验，相当多的香港社会剧才着重在戏剧事件或戏剧情节的表层去找"戏"，而没能深入戏剧事件或情节的更深层的现实内涵。

这样说并不是完全否定了香港社会剧的艺术创造。在戏剧创造的"写人"这方面，社会剧比较此前的香港话剧创作还是有了新发展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刻画出了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二是性格描写的向内转使人物心灵世界外化。尽管在这两方面，社会剧成功或较为成功的作品都还不多。

香港社会剧在刻画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这方面，比较有自觉意识的是杜国威。杜国威说："我只追求感觉——我对笔下人物的感觉和笔下人物与人物间的感觉。写不出剧中人的情怀，人物便没有灵魂，故事就没法再写下去了。"[5] 强调戏剧创作必须始终对"人"保持敏锐的感觉，对"人物与人物间"的关系保持敏锐的感觉，要在叙事中写出人的"灵魂"和"情怀"，应该说，杜国威把握住了戏剧创作的真谛。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人间有情》、《聊斋新志》、《霸海十三郎》等剧作，既有戏可看而雅俗共赏，又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刻画而引人深思。以《霸海十三郎》为例。该剧表层有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而其深层内涵则是描写一个坚持自我、坚守真理的剧作家在世俗打击下的悲惨遭遇。十三郎虽放浪形骸但对爱情严肃执著，虽恃才傲物但对真正的才华惺惺相惜，虽任性倔强但讲义气、有同情心，虽举止乖僻但为人真诚、有正义感，虽穷愁潦倒但不愿为金钱扭曲自我，看似落拓不羁、放浪形骸，骨子里却在坚守着作为一个人、一个艺术家的极为宝贵的东西。然而，正如他对 Lily 的执著追求得到的是世俗的嘲弄，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也一次次被世俗击得粉碎，他的坚持真理、愤世嫉俗，甚至被认为是神经不正常而挨骂遭打，乃至被关进精神病院。因而，在十三郎言行举止的某些滑稽色彩背后，又突现了沉重的现实悲剧。剧作在十三郎亦喜亦悲的人生遭遇中，写出了一个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揭示出了人性深层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其他社会剧，例如《逝海》中的海生、《花近高楼》中的江子留、《命运交响曲》中的凌子才等，其人物形象也有较好的刻画。

香港话剧发展数十年，在剧本创作方面的成就始终不尽如人意，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在戏剧长廊里很少创造出典型的戏剧人物形象。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历史剧大都注重历史故事的讲述，70 年代校园戏剧的直面现实大都注重揭示社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都是注重叙事而忽视了写人。对于强调创造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写实戏剧来说，这个问题更是严重地困扰着戏剧的发展。80年代兴起的香港社会剧，尽管其中成功或比较成功的戏剧人物形象刻画还不多，但是它在探索、拓展中有新的创造。

香港社会剧的人物形象刻画的向内转，主要是从两个层面切入的：一是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某些手法；二是借鉴民族的和民间的某些艺术形式或仪式。写实戏剧借鉴现代主义戏剧以深入人物心灵，香港社会剧又主要是借鉴了表现主义戏剧和荒诞派戏剧。前者，香港戏剧家比较熟悉的是威廉斯和米勒，即如钟景辉所说：“Tennessee Williams的《玻璃动物园》，它也有表现主义的回忆的部分；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之死》，也是融合了其他的因素，当中也有很多回忆的场面，可是整体内容还是写实的”。[①] 写实戏剧借鉴表现主义的人物心理外化，它打破了传统写实的客观呈现，从而使观众能在舞台上看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当十三郎（《南海十三郎》）面对Lily时，剧本指示：“灯光打出如幻如真的朦胧的感觉”，然后，十三郎幻化成高大英俊的男子与Lily谈情说爱，这就是剧作家借鉴表现主义手法，将十三郎此时的潜意识呈现出来。根（《讹情化不开》）在梦中对于童年、故乡和亲情的忆念，文玉（《白兰呼唤》）与想像中的海瑞关于“正义”等问题的对话，以及海生回想母亲溺海和金娣梦幻般地看见夭折的儿子（《逝海》），等等，都是借鉴表现主义手法，而将人物内心的思念、矛盾、痛苦等情感具象地展现出来。荒诞派对写实戏剧的渗透，而使其某些情节的荒诞色彩能映衬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命运交响曲》中有所尝试。该剧中的犀牛形象很明显是荒诞的，它来自剧中人物所排演的戏剧《犀牛》，而它在剧中是意指那些移民国外的香港人。犀牛形象不时地闯进剧情中，或者是闯进剧中主人公凌子才的脑海里，将他面对“九七”移民潮的复杂而孤寂的内心情感以荒诞的形象和情节呈现出来。

社会剧借鉴民族的和民间的艺术形式或仪式去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最主要的是借鉴戏曲的艺术形式和香港本土的某些民间仪式。社会剧的写实叙事借鉴布莱希特史诗剧的叙述手法，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戏曲艺术的叙述手法的汲取。叙述在这里既是叙事又是写人。当然，这种方法还只能以旁白或歌队的形式去叙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能在舞台上具象地展现出来。香港社会剧成功地借鉴传统形式以具象地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有《逝海》对“上头”、“脱壳”等香港民间结婚仪式的运用。《逝海》写海生这次回渔村要用卖命钱了结过去的金钱债和感情债，青梅竹马的金娣眼看想让海生留下来不大可能，就要海生和她再玩一次小时候的结婚游戏：女的“上头”，男的“脱壳”。在这个游戏中，海生从开始有些不耐烦到后来神情逐渐严肃凝重，其内心世界翻起了剧烈的情感冲突。他对金娣说：“我要除下过去的包袱！我要脱去这一身旧壳，我要脱胎换骨。我要摆脱以前的我，我要掌握新的生命，我要闯出一条新的道路！”海生一边说这段话，一边以香港民间传统的结婚仪式在“大虾脱壳”。但海生最终“脱壳”未成，金娣“疑惑、惶恐”，而海生的“目光又回复茫然和恐怖”。这段极富乡土味的“脱壳”仪式，是剧情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更重要的是它形象而生动地展现了人物的心灵世界。

香港社会剧创作其性格描写的向内转，是为了揭示人物心灵的真实，是为了创造主观的真实以挖掘人物的深层心理和内在自我。如果说刻画生动丰满的戏剧人物形象是写实戏剧创作自传统以来就有的基本要求，那么，戏剧性格描写的向内转，则是写实戏剧发展到20世纪的重要特征。这些手法的借鉴与创造，尽管成功或比较成功的还不多，但是，正是这种执著的探索推进着香港话剧的艺术发展。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佛琳. 现实人生的真善美 [J]. 表演艺术（第76期），1998-04.

[2] [美] 桑顿•怀尔德. 关于戏剧创作的一些随想 [C]. 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 引自柳鸣九主编. 二十世纪现实主义 [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 [俄] 别林斯基. 诗歌的分类与分科 [C]. 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5] 杜国威. 编剧的话 [Z]. 人间有情（场刊），1986.

责任编辑：原 石

① 钟景辉语，见《香港话剧访谈录》，香港戏剧工程2000年版，第54页。

刘长卿事迹新证*

胡可先

[摘 要] 新出土墓志中，有三方涉及中唐著名诗人刘长卿。以墓志与史籍参证，可以进一步探讨刘长卿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一，为陈留浚仪县尉问题；二，登进士第时间；三，为监察御史时间；四，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

[关键词] 新出土墓志 刘长卿 生平事迹 唐代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48-04

刘长卿是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经历过安史之乱的著名诗人。他的生平事迹，甚为复杂，有很多地方，至今还没有弄清楚。最近见到新出土的拓本刘长卿所撰的《王廉墓志》与刘长卿所书的《魏系墓志》，以及郑深所撰的《郑洵墓志》，为我们研究刘长卿的生平事迹提供了新的线索。

《魏系墓志》原题为《唐故伊阙县令钜鹿魏府君墓志铭并序》，题署："前乡贡进士张莒撰，睦州司马刘长卿书。"墓主以大历十三年（778）十一月十八日葬。这方墓志为刘长卿任睦州司马提供了新的证据。刘长卿任睦州司马，当代学者考证甚为详明，其时间与本墓志所载基本一致，故不需要再进一步展开讨论。惟此志是刘长卿所书，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刘长卿文学成就以外的书法艺术成就提供了新的材料。该志的情况，《河洛墓志拾零》云："首题：'唐故伊阙县令钜鹿魏府君墓志铭并序'。共25行，满行26字，590×590×105。志盖篆书：'唐伊阙令魏府君墓志铭'，3行，行3字，445×450。大历十三年（778）九月十日卒，十一月十八日葬。张莒撰，刘长卿书。2003年秋，河南省洛阳偃师市出土，旋归洛阳张氏。"[1](447) 笔者所见到的拓本《唐故朝议郎行上党郡大都督府黎城县令上柱国太原王公墓志铭并序》，题署："通直郎行陈留郡浚仪县尉刘长卿撰上。"志云："公讳廉，字廉，太原晋阳人也。……以天宝二载七月十日寝疾于官舍，春秋六十有九。……复以天宝十一载二月廿四日卜远于颍川郡西南界颍水之阳平原，礼也。……长卿不佞，承命为文，存遇清埃，浚惊玄化，陵谷是虑，刻石为钧。"① 由新出土的几方墓志与史籍参证，可以进一步探讨刘长卿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一，为陈留浚仪县尉问题；二，登进士第时间；三，为监察御史时间；四，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

一、为陈留浚仪县尉问题

据《王廉墓志》题款，知刘长卿于天宝十一载（752）二月在陈留浚仪县尉任上。而学术界对刘长卿的研究，迄今为止，尚未涉及刘长卿尉浚仪事，只是把陈留的踪迹定为天宝时长卿东游经历的一部分。按，浚仪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七《河南道》三《许州》："浚仪县，望。郭下。理西界。本汉旧县，属陈留郡。故大梁也，魏惠王自安邑徙此，因浚水为名。"[2](P177) 刘长卿有《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得西字》诗，有"散吏方见狎，真僧幸相携"句，[3](P32)"散吏"应即自指，当是任陈留浚仪县尉时，与同官在真福寺茶会之作。《别陈留诸官》诗云："恋此东道主，能令西上迟。徘徊暮郊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项目编号：05BZW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可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杭州，310028）。

① 按刘长卿撰《王廉墓志》拓片，见于雅昌艺术网《兴业堂主藏碑拓选》，墓志长宽为46.5×46.5厘米。兴业堂是洛阳收藏与经营金石碑志拓片等文物的民间收藏机构，创办于光绪十五年（1889）。据称《王廉墓志》志石2006年出土于洛阳，现藏洛阳关林博物馆。

别，惆怅秋风时。上国邈千里，夷门难再期。行人望落日，归马嘶空陂。不愧宝刀赠，惟怀琼树枝。音尘倘未接，梦寐徒相思。”[3](P31) 这首诗就是刘长卿罢浚仪县尉赴京师时所作，故言“上国邈千里，夷门难再期”。“不愧宝刀赠”，用《晋书•王祥传》典：“初，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谓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固辞，强之乃受。”[4](P991) 亦以此典表现对陈留诸官送别之感谢，更流露出自己将入京为官，以身许国的志向。故将有关刘长卿陈留诸诗归为东游之作，是不确切的。“夷门难再期”之夷门亦在浚仪县境内，《元和郡县图志》卷七《河南道》三《汴州》：“浚仪县，……夷门，《史记》大梁城有十二门，东门隐士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夷门监者，魏公子无忌厚遗之，不肯受。”[2](P177) 又言“惆怅秋风时”，知其罢浚仪县尉的时间是在秋天。

有关刘长卿事迹的文献记载，极为简略，最早见到的是《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集部别集类：“《刘长卿集》十卷，字文房。至德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奏，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为辨之者，除睦州司马。终随州刺史。”[5](1604) 并没有记载他任浚仪尉之事。其后辛文房《唐才子传》，以及近年有关刘长卿的考订文章或年谱，如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杨世明《刘长卿年谱》、储仲君《刘长卿简表》等，都没有涉及刘长卿任浚仪县尉之事。其为浚仪县尉一事，长期被湮没而不为人知。

二、登进士第时间

刘长卿登进士第的时间，最早见于姚合《极玄集》卷下：“刘长卿，……字文房，宣城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历监察御史，终随州刺史。”[6](P559)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刘随州集》十卷。……长卿，开元二十一年进士。”[7](P473)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刘长卿传》亦云：“开元二十一年徐征榜进士。”[8](P313)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云：“《刘长卿集》十卷，右唐刘长卿字文房。开元末中进士第。至德中，监察御史。”① 清徐松《登科记考》卷八据《极玄集》著录刘长卿登进士第亦在开元二十一年（733）。[9](P265)

然而，记载刘长卿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之说是错误的，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有较为详细的考证，以为“所谓刘长卿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之说不能成立，天宝中登第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具体在天宝那一年，就不可考知了。”[10](P364) 按，傅先生的考证是可信的。陈尚君则进一步推测曰：“按敦煌遗书斯五五五五有樊铸《及第后读书院咏物十首上礼部李侍郎》，今存八首并残诗一首。铸另有天宝三载作《徼曲江水伯文》，见《唐文粹》卷三三。《刘随州集》卷四有《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虽所咏之物与樊铸不同，但可肯定为一时之作。据此可知长卿为‘礼部李侍郎’知举年及第。检《登科记考》卷八至卷九，自开元二十四年改由礼部试进士后，李姓知贡举者有：天宝六载至八载，礼部侍郎李岩；九载，礼部侍郎李暐；十载，兵部侍郎李麟；十一载，礼部侍郎李麟。长卿及第，应在此数年中，为李岩所取的可能性似更大些。”② 陈先生的推测为我们进一步考证刘长卿的及第时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考刘长卿有《小鸟篇上裴尹》诗云：“藩篱小鸟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飞。只缘六翮不自致，长似孤云无所依。西城黯黯斜晖落，众鸟纷纷皆有托。独立虽轻燕雀群，孤飞还惧鹰鹯搏。自怜天上青云路，吊影徘徊独愁暮，衔花纵有报恩时，择木谁容托身处。岁月蹉跎飞不进，羽毛憔悴何人问。绕树空随乌鹊惊，巢林只有鹪鹩分。主人庭中荫乔木，爱此清阴欲栖宿。少年挟弹遥相猜，遂使惊飞往复回。不辞奋翼向君去，唯怕金丸随后来。”[3](P14) 细味诗意，应是刘长卿及第后以请求裴尹援引为官时作。按，唐开元时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置府，设尹一人。据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天宝中裴姓为京兆尹惟天宝十一载（752）裴士淹；又同书卷四九，天宝中裴姓为河南尹者为天宝三载（744）裴敦复、天宝九载（750）至十四载（755）裴迥。长卿为洛阳人，故其诗所上裴尹以河南尹更有可能。参以《任廉墓志》天宝十一载（752）刘长卿已在浚仪县尉任上，则上裴尹即当在天宝九载（750）或十载（751）。而刘长卿又有《落第赠杨侍御兼拜员外仍充安大夫判官赴范阳》诗，安大夫即安禄山，据《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三载，代裴宽为范阳节度。……六载，加大夫。”[11](P5368) 又《金石萃编》卷八八《北岳恒山安天王铭》：“骠骑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范阳郡长史、柳城郡太守、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两蕃四府、河北海运、兼范阳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采访

---

①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43 页。孙猛校证云：“袁本作‘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卫云本、《经籍考》作‘开元末第进士’。按长卿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事见《极玄集》卷下、《书录解题》、《唐才子传》卷二。”

②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补正》，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58 页。按，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李侍郎，李希言。《册府元龟》卷七七一：‘李希言为礼部侍郎，子纾代宗大历中亦历礼侍郎。’……李希言以礼部侍郎知贡举，见《登科记考》卷一〇。”（辽海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4 页）按，《登科记考》卷一〇，李希言知江东举在至德二载（757）。其时刘长卿早已为官，故不取李希言说。

处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柳城县开国伯、常乐安公曰禄山，国之英也。……天宝七载岁在戊子五月庚午廿五日甲午建。”[12](P2) 故知至少是天宝六载（747），刘长卿是应举落第的。因此，刘长卿及进士第可以锁定在天宝七载（748）或八载（749）。①

三、为监察御史时间

《新唐书·艺文志》称刘长卿“至德监察御史”，后人大都以为这一记载是错误的。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云：“未知何据。或监察御史系长卿任长洲尉、海盐令时所带之宪衔。”[8](P315-316) 陈尚君《补正》曰：“笺考至德中刘长卿为长洲尉等，甚是，《新志》有误。然令、尉无带宪衔者。刘乾《刘长卿三题》谓‘至德’乃‘广德’之讹，不为无见。”[8](P59) 按，刘乾《刘长卿三题》，其一为“刘长卿何时任监察御史”，认为：“新志的‘至德’，是‘广德’之误，刘长卿是唐代宗广元、二年间回长安并任监察御史的。”[13](P296)

今按，傅璇琮以刘长卿未任监察御史实职，刘乾以刘长卿为监察御史在广德中，都是根据刘长卿相关诗文等材料加以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今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刘长卿为监察御史是在出为转运判官，知淮西、岳鄂留后之前。他为岳鄂留后以后，又被吴仲孺所诬而贬为南巴尉。其受诬的时间在至德三年（758），大致无可怀疑。② 按照《新唐书·艺文志》的叙述顺序，刘长卿任监察御史不容在广德中。刘乾在《刘长卿三题》中，运用较大的篇幅考证广德中刘长卿在长安，故而认定此时为监察御史。今考刘长卿有《祭萧相公文》云：“维年月日，殿中侍御史刘长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江州刺史相国萧公之灵。”[3](P573) 萧相公即萧华，诗为刘长卿广德元年（763）春出使鄂州时作。杨世明注云：“据《金石萃编》，萧华在宝应元年（762）到任不久即死去。今按此文直书辅国之恶，应在辅国被刺之后，即宝应元年十月之后。文作于江上，应在广德元年春。时文房奉使鄂渚，正逢萧华旅榇北归，因得吊祭。”[3](P573) 是广德中，刘长卿为殿中侍御史，而不是监察御史。

据上文所考，刘长卿天宝十一载（752）以后在浚仪县尉任上，罢任后就赴京为官，据其诗虽难以确定其所任京官到底是何职，然参证《新唐书·艺文志》“至德监察御史”，则知其罢浚仪县尉任后，就赴京任监察御史之职。不久即逢安史之乱，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又改元至德元载，其后不久刘长卿南奔并为长洲尉。由此推定，刘长卿任监察御史仅是至德元载较短的时间，但这与《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是相吻合的，因而《新唐书·艺文志》关于刘长卿至德中为监察御史的记载，不应该轻易否定。

四、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

刘长卿有《巡去岳阳，却归鄂州使院，留别郑洵侍御，侍御谪居此州》诗云：“何事长沙谪，相逢楚水秋。暮帆归夏口，寒雨对巴丘。帝子椒浆奠，骚人木叶愁。惟怜万里外，离别洞庭头。”[3](P383) 按，这首诗与刘长卿为鄂岳转运判官的时间直接相关。其为鄂岳转运判官及转运留后，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以为“当大历五六年间，刘长卿已为转运判官、转运留后等职”，[10](P356) 而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则云：“诗当作于大历七年（772）或八年巡行岳州时。”[14](P376) 其《刘长卿简表》大历五年云：“移使鄂州，擢鄂岳转运留后，检校祠部员外郎。”[14](P584) 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注此诗则云：“大历八年（773）或前后鄂岳任上作。”[3](P383) 今考拓本郑深撰《唐故监察御史贬岳州沅江县尉荥阳郑府君墓志铭并序》：“唐大历四年三月廿七日，前监察御史、贬岳州沅江县尉荥阳郑府君讳洵，春秋五十三，卒于巴陵之官舍。……拜监察御史，兼总以军储之务，将骄而难可其欲，公一以贯之，遂为奸人所忌，因有沅江之责。”③ 又拓本柳识撰《唐故朝议郎行监察御史上柱国郑府君墓志铭并序》：“府君讳洵，字洵，荥阳人也。……诏授监察御史。又别敕除盩厔县令。……未经考，王师西备犬戎，军储是切。诏授太子舍人兼监察御史，充京西军粮使。无何，监察正名，使务仍旧。

---

① 刘长卿及进士第时间尚有以下两说。一是天宝十四载说，杨世明《刘长卿年谱》：“据《登科记考》，天宝十二载七月诏天下举人不得充乡试，皆须补国子学生及郡县学生，然后听举。李肇《国史补》谓刘长卿天宝中为朋头，是时重东府西监。而长卿诗文均可证其乱起即渡江任长洲尉。综上各端，似长卿得第在十四年春。”（《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631页）其说又见杨世明《刘长卿行年考述》，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一是至德二载说，储仲君《刘长卿简表》：“至德二载，约三十二岁，应江东进士举，礼部侍郎李希言下进士及第。由崔涣铨选入仕，释褐苏州长洲县尉。”（《刘长卿诗编年笺注》，第580页）按，刘长卿天宝十一载（752）已在浚仪县尉任，故天宝十四载（755）、至德二载（757）登进士第之说均误。

②可参阅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第353页；杨世明《刘长卿年谱》，载《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632页；储仲君《刘长卿简表》，载《刘长卿诗编年笺注》，第581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页。按，《郑洵墓志》及《郑洵与夫人合祔墓志》，最早刊载于洛阳考古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2期，第13页。

居数月，以直道为谗巧所嫉，贬岳州沅江县尉。……以大历四年三月既望，寝疾终于岳州官舍，是年五十六。”[15](P302) 这两方墓志，前者为郑洵志，后者为郑洵夫妇合祔志。刘长卿《巡去岳阳，却归鄂州使院，留别郑洵侍御，侍御谪居此州》诗有“何事长沙谪，相逢楚水秋”语，足证作于大历三年（768）之前。唐监察御史可称“侍御”，唐赵璘《因话录》卷五：“御史台三院，一曰台院，其僚曰侍御史，众呼为端公。……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众呼为侍御。……三曰察院，僚曰监察御史，众呼亦曰侍御。”[16](P101-102) 由《郑洵墓志》可知，刘长卿为为鄂岳转运留后，必在大历三年或之前，这首诗也当为大历三年秋作。陶敏对郑洵墓志的价值及刘长卿诗的作年曾作这样的论定：“这首诗中述及郑洵为侍御，谪岳州的情况，正可与郑洵墓志相发明。过去读此诗，仅自独孤及文知郑洵天宝末为华阴参军，至其大历中因何事谪来岳阳则一无所知。现在郑洵墓志出土，疑团遂涣然冰释。而且，郑洵志大有裨于对刘长卿事迹的了解。……郑洵墓志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史料。郑洵既于大历四年三月卒于岳州，那刘长卿巡岳州并作诗留别郑洵就不应晚于大历四年三月。而且，刘诗云‘相逢楚水秋’，作于秋日，那二人岳州之会就不应晚于大历三年秋。换句话说，早大历三年，刘长卿就已在鄂州使院了。”[17](P49) 因此，由新出土《郑洵墓志》，可以订正学术界将刘长卿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系于大历五年、七年或八年的成说，而大致确定为大历三年或稍前。

[参考文献]

[1] 赵君平、赵文成. 河洛墓刻拾零 [Z].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2]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杨世明. 刘长卿集编年校注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 房玄龄. 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傅璇琮. 唐人选唐诗新编 [Z].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7]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 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 [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9] 徐松. 登科记考 [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 傅璇琮. 刘长卿事迹考辨 [J]. 中华文史论丛（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 刘昫. 旧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 王昶. 金石萃编 [Z]. 北京：中国书店，1985.

[13] 刘乾. 刘长卿三题 [J]. 唐代文学论丛，1982，(1).

[14] 储仲君. 刘长卿诗编年笺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杏园唐墓 [Z].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6] 赵璘. 因话录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7] 陶敏. 唐郑洵墓志考释 [J]. 咸宁师专学报，1999，(2).

责任编辑：王法敏

黄节集外佚诗七首考略

程中山

[摘 要] 黄节《蒹葭楼诗》是民国以来一本重要诗集，由于自订严格，很多作品被删于集外。近数十年，学者对黄节集外诗多有辑录，后被编入《黄节诗集》，《黄节诗集》因此成为目前收诗颇全的版本。然而黄节佚诗仍有可补辑者。本文辑黄节集外诗七首，并分别进行考述。

[关键词] 黄节 蒹葭楼诗 黄节诗集 佚诗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6-0152-03

黄节 (1873-1935)，字晦闻，斋号蒹葭楼，广东顺德人，著名史学家、诗人、学者、书法家，著有《蒹葭楼诗》、《汉魏乐府风笺》等。清末，黄节以诗鸣世，与陈洵词合称“黄诗陈词”，备受推许。民国时期，黄节远赴北京，与同光体诗派诸公往来，诗名愈大，陈三立引用杜诗“一洗万古凡马空”誉之，张尔田推其诗与清初屈大均、顾炎武并称，前后辉映，成就特大。[1](卷首) 黄节《蒹葭楼诗》乃经其严格删订，1935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成为民国以来一本重要的诗集。在近数十年来古典诗词创作日渐式微的环境下，黄节《蒹葭楼诗》仍是近现代少数能成为后起的诗词爱好者所推重与学习的对象，对现当代古典诗坛影响很大，尤其是广东地区摹其诗者，大有人在，蔚成风气。又如著名学人吴宓生平极推许及学习黄节诗，钱仲联认为程千帆《闲堂诗存》“于并世作者，风规于蒹葭楼主人为近”等，[2](P4) 均可见一斑。

黄节生平严格自订《蒹葭楼诗》，有很多作品被删于集外。近数十年，学者积极辑录黄节集外诗，如 1936 年王蘧《黄节遗作：甲戌之蒹葭楼诗》，[3](P22-23) 1972 年木易《黄节及其蒹葭楼集外诗》，[4](P207-211) 1983 年马以君《蒹葭楼集外佚诗》，[5] 1986 年程千帆《蒹葭楼集外佚诗补》等。[6](P314-316) 1989 年，马以君以《蒹葭楼诗》刊本为底本，把历年所辑佚诗 186 首，予以编年，分插底本各诗之间，编成《黄节诗集》，成为目前黄节诗歌一个颇全的版本。后来，1992 年杨玉峰《黄节佚诗三首》、[7](P63) 1993 年郭长海《黄节集外诗文拾遗》，[8](P126-127) 陆续补辑佚作。笔者近年亦辑得黄节集外诗七首，今考述如下，以补诸家之不足。

一、《奉题沤尹先生“校词图”》

校字殷勤过海虞，古人真意重踟蹰。先生别有沧桑感，难写伤心入画图。[9](P8782)

此七绝载于龙沐勋整理的《疆村丛书·“校词图”题咏》之内，属常见之作，却为学者忽略。“沤尹”即著名词人朱孝臧 (号疆村)，与黄节友善。朱氏曾刻陈洵《海绡词》，专请黄节为之序；黄节亦曾请朱氏为其《曹子建诗注》题端，《蒹葭楼诗》内也有《题“霜腴图”为朱疆村先生寿》一诗，可知两人关系良好。据龙沐勋所记，此诗载于顾麟士所画的“校词图卷”上，而卷上有三篇图序，分别为乙卯

作者简介 程中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导师、博士。

年 (1915) 沈修序、丙辰年 (1916) 孙德谦序及无年份的张尔田序；以及有 1916 年郑孝胥、1917 年胡嗣瑗、1918 年罗惇曧、吴庆坻、1924 年李宣龚诗，及无年份的陈衍、瞿鸿禨、陈三立、杨锺羲、夏敬观、缪荃荪、李传元、吴士鉴、金蓉镜、喻长霖及黄节诗。因此，此诗大约写在 20 年代初。

二、《总理奉安挽诗》

龙虎江南气，寰区战伐声。碧云回法驾，磾石起佳城。风雨云旗集，河山草木生。地原宽禁御，神亦听和平。永绝人相斫，犹哀国有争。山丘华屋叹，松柏北邙行。望治人皆恸，遗刍泪不轻。灵来应共飨，信立可无兵。祝国占形胜，题诗太上清。绵绵思岭表，如海是乡情。[10]

此诗载于 1935 年 2 月 19 日《香港工商日报》(《黄晦闻先生追悼专号·上》)。诗为排律，是目前仅见的黄节排律。奉安指即 1929 年孙中山之灵柩由北京运回南京进行国葬一事，故此诗当作于 1929 年。此诗平淡浑朴，不像一般挽诗那样极度哀恸，与黄节集外《孙中山先生挽诗》及挽联的情感分别很大。① 黄节原为同盟会会员，清末孙文已有意罗致黄节为助手，而未能成功。直至 1922 年孙文才成功邀请黄节南返出任大元帅府秘书长，然黄节到广州后，发觉南方形势混乱不堪，不足一个月便北返。故此诗之辑录，对了解黄节与孙文之交往也有价值。

三、《留别南武同人》

棰棘歌谣恐未休，独哀行国作长游。潜龙事业羞同辈，逐鹿山河到异洲。此去欲寻黄蘗寺，不才应敝黑貂裘。等闲头白看如许，笑我空谈大九州。[11]

此七律载于 1906 年 9 月 21 日的《东方报》上，署名“晦”之作。《东方报》是黄节友人黄汉莼、陈树人等所创办。《东方报》1906 年 9 月 22 日又载了署名“莼”的黄汉莼《饮韵晦公留别二章》，② 是佚诗之和作。南武即指南武公学堂，1905 年黄节曾与杨鸿达、黄汉莼、欧阳日瑚、黄培初等人成立“南武公学会”，后又创办“南武公学堂”。此诗可能是黄节前往上海继续发行《国粹学报》(或是前往日本) 而留别粤中友朋的作品，写作时间亦当在 1906 或 1907 年左右。黄节集外有诗与黄汉莼等人，如 1907 年《六月十三日之沪江濒行，汉莼、培初送予登舟，诗以留别》，[12] (P33) 可与此诗并读。

四、《花埭访菊》

云水天光一蔚蓝，天风吹我渡鹅潭。河山尺幅秋花影，不见题诗郑所南。[11]

此七绝载于 1906 年 9 月 21 日的《东方报》上，署名“晦”之作。与此诗同载的还有《东渡濒行，谢英伯出示杜莲女史“杏花画幅”属题卒成一绝》、《结习未除，华鬘堕劫，秋声撼梦，起读〈维摩〉，时丙午八月十九夜漏将尽客上海》二诗，此二诗已见辑于马以君《黄节诗集》内，并系于 1906 年，[12] (P24、P26) 由是可知“晦”肯定指的是黄节。花埭及鹅潭 (名白鹅潭)，均为广州地名；“郑所南”即南宋郑思肖，是黄节生平颇推崇的一位气节人物，黄节早年曾校理其《冰槎集》，亦有多首诗咏及。故此诗应是黄节早年在粤的作品，写作时间亦当在 1906 年左右。

五、《和答颖公并乞赐教》

昌黎诗好论身世，后有柯山又不然。二子能毋怀抱恶，古人难免性情偏。每为长句公尤健，始叹奇才世已传。忧患如山吾辈在，莫将闲恨遽呼天。[13] (P44a)

此七律载关赓麟《梯园诗集第一种·小园集》内。关赓麟，黄节友人，著有《中国铁路史讲义》、《梯

---

① 《孙中山先生挽诗》：“烝荡乾坤气，平成物类心。大功皇汉祚，哀响太山吟。国瘁天诚毒，民残水益深。万方完草昧，举世失悬沈。报答贲园意，摧藏入海心。岂惟私恸彻，流涕满苍黔。”见《黄节诗集》，第 190- 191 页。《挽孙中山联》：“民国史六总统，历数袁黎冯徐曹，孰若先生？真知有民，真知有国。共和本五大族，试问汉满蒙回藏，谁为后起？永保其共，永保其和。”见马以君编《南社研究》，第 4 册，第 130- 131 页。

②诗曰：“绿槐江畔雨初休，远别那堪旧钓游。去国放歌伤楚泽，吟坛缺次黯沧洲。心惊白首酣膻酪，恼杀青年衔马裘。断发东行悟解脱，莫忘余痛说扬州。”“混混龙蛇战未休，海天何地日遨游。笔靖风雨凌三岛，眼底湖山小五洲。探险君应驱象罔，偷闲吾欲兔老裘。东溟岂息鹍鹏处，黄蘗追寻更别州。”见 1906 年 9 月 22 日《东方报》。(显微资料，广州：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1992 年)

园诗集》。关氏在京组“寒山社”，聚集一时诗人及诗钟活动，黄节来京后亦加入寒山社，因此两人往还频密。佚诗是黄节和关氏1915年的《海闻见读近诗颇以悬悬于讼事为嫌因答》之诗，[①]后关氏又写《重答晦闻》以酬答之。[②]

六、《题关颖人〈饴乡集〉》(按：诗题为笔者所拟)

一轮月照双人面，风雅能追静御堂。得句最惟惊独客，泛湖闻已过泉塘。云鬟香雾休言别，椎髻山妻未足量。徙倚明河望今夕，羡仙宁不似鸳鸯。[14](卷首)

此七律载关赓麟《梯园诗集第四种·饴乡集》“题词”内。《饴乡集》为关氏辑其与夫人张纤云于1918年至1919年间所写诗作，并附友人和作。观卷首有吴士鉴戊午(1918)孟秋之序，及卷末关氏己未(1919)二月之识语，故黄节题诗的写作年份大约在1918年底左右。黄节集内涉及关氏诗有《宿潭柘寺与同游诸子拈韵分得佳字》、《九月二十五日京师蝗》、《雪朝》等三首。不过，黄节晚年自订诗稿时，曾删去一些与关赓麟有关的诗作，此诗也可能因此被删除。

七、《伯任先生属题“春还堂图”》(按：诗题为笔者所拟)

去官尚作三年住，独为梅花惜别颜。留得旧时堂畔月，有人相识道春还。[15](P87)

此为七绝题画诗，稿载吴瑾《潘龄皋：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伯任，为陈越字，广东南海人。时陈氏任广东四会县长，在任职间曾访得前清四会知县闽人黄任的“静镜堂”故址，并重修名曰“春还堂”，更请黄节友人潘龄皋作“春还堂图”。后陈氏请黄节题卷首“春还堂图”四字及上述题诗一首。下款曰“乙丑十月”、“伯任先生属题”。乙丑，即民国十四年(1925)，时黄节在北京。“去官尚作三年住，独为梅花惜别颜”，即黄节追述1923年2月应孙文邀请南下任元帅府秘书长而不一月辞职北返之往事，时距题诗约三年。1930年，黄节有《为陈伯任题“沙亭谒墓图”》，亦为陈越题画，可备参考。

[参考文献]

[1] 黄节. 蒹葭楼诗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 钱仲联. 闲堂诗存序 [A]. 程千帆. 程千帆全集·闲堂诗文合抄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 王蘧. 蒹葭楼遗诗记 [A]. 逸经（第8期）[C]. 上海：人间书屋，1936.

[4] 木易. 黄节及其蒹葭楼集外诗 [A]. 香港商务印书馆编. 艺林丛录（第3编）[C]. 香港：商务印书馆，1961.

[5] 马以君辑. 蒹葭楼集外佚诗 [M]. 顺德：手抄油印本，1983.

[6] 程千帆辑. 蒹葭楼集外佚诗补 [A]. 钱仲联主编. 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第一辑）[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 杨玉峰. 黄节轶诗三首 [A]. 国际南社学会丛刊 [C]. 香港：国际南社学会，1992.

[8] 郭长海. 黄节集外诗文拾遗 [A]. 马以君主编. 南社研究（第4辑）[C].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9] 朱孝臧辑校，龙沐勋整理. 彊村丛书·《校词图》题咏（第10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 香港工商日报，1935-02-19.（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8年）

[11] 东方报，1906-09-21.（显微资料，广州：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1992年）

[12] 马以君编. 黄节诗集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3] 关赓麟. 梯园诗集第一种·小园集 [M]. 南京：中国仿古印书局铅印本，1935.

[14] 关赓麟. 梯园诗集第四种·饴乡集 [M]. 南京：中国仿古印书局铅印本，1934.

[15] 吴瑾. 潘龄皋：传统文化的守护者 [J]. 收藏·拍卖，广州：《收藏·拍卖》杂志社，2006，(8).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关赓麟《海闻见读近诗颇以悬悬于讼事为嫌因答》：“自辑新诗当写真，流传已媿一微尘。相逢如梦何嫌呓，定痛犹思讵免呻。托醉恨无千日酒，怀归尚靳五湖莼。病余匝月吟哦懒，寂寂春风倘笑人。”见关赓麟《梯园诗集第一种·小园集》，第44a页。

②关赓麟《重答晦闻》：“举世酣嬉蒦食忧，咨嗟良不为身谋。任为鬼笑穷何害，岂待人言始欲愁。岁月尚求排遣计，文章宁假姓名留。卅年道著应难必，此事输君出一头。”见关赓麟《梯园诗集第一种·小园集》，第44b页。

汉语二语习得与一语习得的共性表现探析

陈凡凡

[摘　要] 本文考察汉语二语习得与一语习得过程，发现这两类不同的习得过程存在明显的语言特征相似性和习得顺序相似性，并从普遍语法、人类认知角度解释这些习得共性的原因。

[关键词] 二语习得　一语习得　共性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55-04

二语与一语的习得过程是否相同，这至今颇具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二语习得者受母语知识背景、认知成熟度等影响，必定与一语习得呈现不同的习得过程。但越来越多研究表明，二者实多相似之处。

Brown[1] 和 Villiers[2] 分别从横向和纵向研究英语词素的儿童一语习得，Dulay and Burt，Larsen-freeman，Krasen 等[3](P88-92) 则研究不同母语英语二语者的词素习得。结果发现，两者的词素习得都遵循大体一致的顺序：进行时态-ing、名词复数-s、系词 be→助动词、冠词 the→不规则动词过去式→规则动词过去式、第三人称单数 s/es、所有格's。Klima 和 Bellugi [3](P93-96) 对英语母语者的考察发现，儿童习得英语否定句通常经历三个阶段：1）句外否定（No doggie bite.）；2）句内动词前否定（Doggie no bite.）；3）助动词+否定词+动词阶段（Doggie doesn't bite.）。Schumann[3](P93-96) 对英语二语否定句习得过程的研究发现，二语的否定句习得同样遵循以上顺序。Cazden [4] 研究的母语英语疑问句的习得顺序是：单词+语调的疑问句（Chair?）→语调问句（You sad?）→语调问句复杂化及不倒装 WH-问句（What that?）→主—动倒装是非问句（Are you a nurse?）→主—动倒装 WH-问句（Where my spoon goed?）→嵌入问句的发展（Why won't you let me go?）。Harvard Project[3](P93) 考察的二语英语习得阶段也与此相似。

那么，汉语的二语与一语习得是否也呈现颇为一致的过程呢？我们通过对汉语二语习得者和一语习得者的考察，以及相关研究的对比，发现二者不仅有相似的习得顺序，而且呈现出相似的语言特征。

一、语言特征的相似性

在词语习得和句式习得过程中，汉语二语习得者与一语习得者的语言都表现出相似特征。

（一）词语习得的相似性

汉语具有连接功能的既有连词，又有连接副词。连词放在后分句句首；副词要放在后分句的主谓之间。在中山大学中介语语料库① 中，初级留学生常将连接副词当连词用。如"就"和"才"的使用：

（1）*他一放下书包，就老师走进来。（韩国，初级一）

（2）*除非学校同意给奖学金，才我们能来中国学习汉语。（越南，初级二）

作者简介　陈凡凡，中山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275）。

① 中山大学中介语语料库为该校国际交流学院语言进修生的作文语料，可分为初级一（第 1 学期）、初级二（第 2 学期）、中级一（第 3 学期）、中级二（第 4 学期）、高级（第 5 学期）五个习得水平组。

另外，我们对20名中国儿童看图说话的调查发现，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一语习得过程中。如：

(3) * 它们顶了一个头就两人打架了。（大班）　(4) * 我听话了，才妈妈让我玩。（中班）

二语习得的这一现象可能源于母语迁移。多数语言中，连接分句的连接词均位于后一分句句首，如日语、韩语、英语等。但在中介语语料库中，和汉语相同的越南语母语者也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如例(2)。因此，此类现象应不只是母语影响的结果。连接副词“就、才”都出现在主语前，主要还是与连接副词在句中位置的自然度有关。Hatch [5] 认为，目的语中某个特征对学习者是否凸显是该特征自然度高低的表现之一；越凸显，自然度越高，认知难度越低。从连接分句的角度看，连接副词位于后一分句句首的位置最凸显、最合理，自然度高，认知难度低；位于主谓之间的位置既不凸显也不合理，自然度低，认知难度高。[5] 因此，两种学习者都习惯把“就、才”放在位置凸显、自然度高的后分句句首。

二语与一语词语习得的相似性还表现在对个体量词的习得上。在中山大学中介语语料库中，初级阶段的习得者常出现量词“个”、“只”的泛化，或干脆将量词遗漏。如：

(5) * 房间有一个床。（阿拉伯，初级一）　(6) * 好大一只鱼啊！（越南，初级二）

(7) * 一裤子多少钱？（印尼，初级一）

我们对20名汉族儿童的调查（看图说话、讲故事）同样发现了此类句子，如：

(8) * 两个贴画贴在墙上。（中班）　(9) * 书柜上有一台灯。（小班）

(10) * 它要过桥，过了一只桥就打架了，它掉在水里。（大班）

个体量词习得二者呈现的这两个相似特征主要决定因素是词语的标记性。在Chomsky [6] 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理论中，语言包括“原则”（principle）和“参数”（parameter）。“原则”反映人类语言普遍性，“原则”中固有的语法规则是核心语法规则，是无标记项；参数值（value）的语法规则属外围语法规则，是有标记项。无标记项受普遍语法制约，容易习得，一般先习得。而有标记项不受普遍语法制约，比较难习得，一般后习得。汉语数词一般不直接修饰名词，需加个体量词构成“数+量+名”结构。根据Chomsky的理论，个体量词的使用需根据后面名词进行参数值设置，属外围语法规则，是有标记项。因此在二语和一语习得过程初期都倾向于使用核心语法规则（不使用量词）。

（二）句式习得的相似性

陈重瑜 [7] 认为，“在图书馆看书”的深层结构是“在图书馆在看书”；因表处所的“在1”和表进行的“在2”同形，二者合并为一（“在1+2 图书馆看书”），表进行的“在2”在表层结构中看不出来了。深层结构的句子在汉语二语习得中存在。我们对5个阶段留学生进行过“合并句子”的测试。要求学生将两个结构部分相同、分别含有介引处所的“在1”和表动作进行的“在2”的句子合并为一个。如：

(11) 我看见一群男孩子在操场。我看见一群男孩子在踢足球。→我看见一群男孩子在操场踢足球。

在二语者输出的语料中，共有45个句子误加了“在2”，且大部分出自初级习得者，如：

(12) * 我看见一群男孩子在操场在踢球。（日本，初级二）

(13) * 那个新来的同学在教室的前在大声地介绍自己。（韩国，初级一）

(14) * 他很忙，他在公司在讨论事情。（泰国，初级二）

我们还通过看图说话考察了30名南北方小班到大班的儿童，发现上述句式在一语习得中也存在。如：

(15) * 他在门口里面在敲门。（大班）

(16) * 爸爸在喝水，在桌子上在喝水。（中班）

可见，这不仅是二语习得初期普遍存在于各母语背景习得者中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于一语习得初期。

一语、二语习得的这种一致特征，是普遍语法的核心规则在习得初期的显现。一语者和二语者分别用“在1”和“在2”标示处所和行为进行，体现了语言深层结构中的相似原则要求，“语言结构的成分要跟经验结构的成分数目一致，也就是要符合‘一个语言形式代表一个意义’的原则”，[8](P7) 是核心规则。汉语将“在1”和“在2”合二为一，其实是一个参数重设的变换过程，属外围语法。在习得初期，

习得者都倾向使用核心规则。从人类的普遍认知讲，不同的概念用不同的词标示，自然度高，认知难度低。一语学习者和二语学习者用两个“在”分开表处所和行为进行，实际上是人对事物认知的外化。

二、习得顺序的相似性

汉语二语习得过程和一语习得过程通常遵循同样的习得顺序，体现为阶段性和顺序性。阶段性是指同一语言项的习得遵循一定的次序（order），如汉语四个声调的习得、是非问句的习得；顺序性是指不同语法项的习得遵循一定的顺序（sequence），如主动句与被动句的习得。

（一）汉语声调的习得次序

余蔼芹分析了二语学习的声调难度顺序：第1声最容易，其次是第4声和第2声，第3声最难。[9] 王韫佳对6个学过半年汉语的美国学生声调的考察，证明阴平和去声的掌握度远高于阳平和上声。[10] Li & Thompson 对台湾17个汉族儿童进行为期7个月的纵向调查，也发现第2声比第1声和第4声要难习得；直到发两、三个词时才能分辨第二声和第四声。H. Clumeck 对汉族儿童声调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12] 可见，汉语二语和一语习得声调的顺序均为：第1、第4、第2、第3声。决定习得顺序的主要因素是自然度，即发音器官对音高升降变化的把握难度。以上排序体现发音器官对音高升降变化的把握难度依次递增（自然度递减）。发第1声，声带松紧度无变化，最易把握；发第4声，声带由紧到松，较难；发第2声，声带由松到紧，更难；发第3声，声带由紧到松再由松到紧，最难习得。[12](P 54)

（二）是非问句的习得次序

赵果对[13] 15名一年级美国留学生为期4个月的4次调查发现，“吗”字是非问在第一次调查中便出现；在4次调查中数量都最多，分别占问句总数的42.8%、31.5%、38.3%、45.9%。可见，“吗”字是非问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疑问形式。“吧”字是非问到第四次调查才出现，且仅出现一例。丁雪欢[14] 考察了初中级不同母语的留学生对话体书面语料，得出相同的习得次序。李宇明、陈前端[15] 对儿童问句系统调查表明，无论是理解时间还是发生时间，“吗”字是非问都早于“吧”字是非问。如下表：

语言项	理解时间	发生时间
“吗”字是非问	1：4（“1：4”表示1岁零4个月。）	2：0
“吧”字是非问	1：5	2：1

由此可见，无论是一语习得还是二语习得，他们都是先习得“吗”字是非问，再习得“吧”字是非问。这一相同的习得顺序主要由问句本身疑问度及语言项的自然度/认知难度决定。

根据疑问程度的不同，疑问句可分为高疑问句、低疑问句和无疑问句。“吗”字是非问可以表达上述三种不同程度的疑问，但以高疑问句为主，具有疑问句最显著的特征；认知难度低，自然度高。“吧”字是非问不能表达高疑问，只能表达低疑问，疑问的程度较弱，疑问句特征不是特别明显，认知难度高，自然度低。因此，“吗”字是非问较“吧”字是非问早习得。

（三）主动句与被动句的习得顺序

许多研究发现，二语者最先掌握的是主动句，继而才是被动句。吴门吉[16] 通过实验考察发现在某些必须用被动句表达的情景中，二语学习者还是习惯用主动句。如根据图画（图画内容：小王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在路上，被一辆出租汽车撞倒了）续写句子“小王骑着自行车上班，……”，结果71%的二语学习者都回避使用被动句，而以主动句替代：“小王骑着自行车上班，一辆出租车撞倒了（韩语）”，即使是母语有被动句的习得者（如韩语母语者）也不例外。

儿童的习得同样遵循着先主动句后被动句的习得顺序。朱曼殊发现儿童被动句的习得要远远晚于主动句；儿童总是把从主动句概括出来的一条词序规则“名词-动词-名词=动作者-动作-动作对象”作为理解被动句的策略。[17] 周国光、王葆华的研究结果同样支持朱曼殊的观点。他们对1.5岁和2岁年龄段儿童语言进行考察，发现汉族儿童1.5岁开始使用主动句（包括施事不出现和不含动作对象两种情况），

2岁年龄段才开始出现被动句，主要有“名受+动”和“名受+被（给）+（名施）+动”两种句式。[12]

先习得主动句后习得被动句，语言项的标记性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主动句存在于各语言中，体现了语言最基本的结构，是语言的核心规则，属无标记项。沈家煊也指出，“生动语态相对于被动语态是无标记项，主动语态几乎可用于任何动词作谓语的句子，被动语态的谓语动词则要受限制”。[8] 根据无标记项先习得，有标记项后习得的规律，二语习得者和一语习得者都先习得主动句，后习得被动句。

三、二语与一语习得共性解释

以上分析显示，汉语二语习得与一语习得相似性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人与生俱有的普遍语法，一是人类认知的普遍性，即语言的自然度。Chomsky [6] 认为，每个人的语言机能都有一个先天、内在的初始状态，即普遍语法。它是人具有的语言潜能与倾向。在习得过程中，普遍语法通过语言习得机制的作用产生效应，经过外部环境的激发进行具体语言的参数设置，从而习得一种语言。普遍语法反映在人类语言习得上有相同的倾向性和策略。二语习得与一语习得受相同原则引导，语法完全由普遍语法控制。[18](P211-239) 因此他们关于语言形式的假设一定与普遍语法对自然语言的制约相吻合。表现在实际的习得过程中，便是都先习得核心规则，后习得外围规则；先习得无标记项，再习得有标记项。

此外，Peter Strevenson 指出，受人类认知普遍性影响，人类在习得语言的模式上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19] 具体体现在二语与一语习得上，便是语言特征及习得顺序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实质上反映了人类认知的普遍性，反映了人类相同的认知操作策略。

[参考文献]

[1] Brown, R.First Language: The Early Stage [M]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 de Villiers, J. and P. de Villiers.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of the Acquisition of Grammatical Morphemes in Child Speech [J] .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1973, (2).

[3] Freeman, D. & Long, M.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M] . London: Longman, 1991.

[4] Cazden, C. Child Language and Education [M] . NewYork: Holt Rinehart&Winston, 1972.

[5] Hatch, E. Psycholinguistics: a Second Language Perspective [M] .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83.

[6] Chomsky, N.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Syntactic Theory [A] . N. Hornstein and D. Lightfoot, Explanation in Linguistics: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C] . London: Longman, 1981.

[7] Chen Chung- yu. Aspectual Features of the Verb and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the Locatives [J] . JCL (《中国语言学报》), 1978, (6).

[8] 沈家煊. 类型学中的标记模式 [J] .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7, (1).

[9] 余蔼芹. 声调教法的商榷 [A] . 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8.

[10] 王韫佳. 也谈美国人学习汉语声调 [J] .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5, (3).

[11] 周国光, 王葆华. 儿童句式发展研究和语言习得理论 [M] .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1.

[12] 周小兵, 李海鸥主编. 对外汉语教学入门 [M]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13] 赵果. 初级阶段美国留学生“吗”字是非问的习得 [J] . 世界汉语教学, 2003, (1).

[14] 丁雪欢. 初中级留学生是非问的分布特征与发展过程 [J] . 世界汉语教学, 2006, (3).

[15] 李宇明, 陈前瑞. 语言的理解与发生 [M]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16] 吴门吉, 周小兵. 意义被动句与“被”字句习得难度比较 [J] . 汉语学习, 2005, (1).

[17] 朱曼殊主编. 心理语言学 [M]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18] Thomas, M. Universal grammar &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flexives in a Second Language [J] . Language, 1991, (2).

[19] Strevenson, P. New Orientations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责任编辑：原 石

Main Abstracts

On Otherwise-minded Literature: an Investigation on Three Paradoxes about Literature

Luan Dong 5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tur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thoughts of simultaneous literature and non-literature which means literature is literature and non-literature at the same time. Such a proposition consists of the paradox reasoning included simultaneous literature and non-literature, literature against literature itself, and resolution of literature through literature. These three paradoxes reveal a series of crisis-ridden topics: tillering of literature, qualitative change of literature and withering of literature in which a kind of brand-new literature notion is given birth to, such as the displacement of literature, the opening and closure of literature and the subtle change of literatur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explica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ture from three aspects. They are the paradoxical reasoning of literature thought, the paradoxical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tself, as well as the existence and disappearance of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fields.

What's the Question Vexing Marx in the Period of 'Rheinische Zeitung'

Duan Zhongqiao 32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doubts that assailed Marx in the period of 'Rheinische Zeitung' do not only mean that the discussion on material interests he held made him to doubt his belief in Hegel's theory of state and right at that time, but also imply the place and role of relations of material life in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economic questions; the solution of the doubts was not after he got the first result that legal relations as well as forms of state … have their roots in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life, but also he arrived the general result, the mode of productive material life conditions as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process.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Consumerism, and U.S. Capitalism: Lessons for the Left

Written by Richard D. Wolff and (translated by) Wu Xinwei 42

Althusser's pioneering concept of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 extended to the unique role of consumerism as a particular ideology enabling supporting U.S. capitalism. It is argued that the rising levels of worker's consumption have functioned effectively to compensate the workers for (and thereby allow) rising the rates of exploitation and their negative social effects. For such compensation to succeed, it requires that the workers embrace an ideology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consumption, namely consumerism. It is argued that the weakness of the U.S. left in labor unions, parties, and movements stems in part from having endorsed this consumerism rather than undermining i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n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On the Source of Efficiency in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Its Implication of Culture

Zhu Fuqiang 88

There are two sources for th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clusters: cost economization from scale and coordination benefit from labor-division. The latter is primary. So, it depends on the level of labor-division and the mecha-

nism of coordination in order to keep industrial clusters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However, it needs four conditions as the following. 1. There is diversity between goods in industrial clusters,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labor-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2. There is atmosphere of competition, which is the impetus to spur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3. There is a mechanism of social multi- governance, which is the guarantee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avoid opportunism. 4. The cultivation of culture and ethics should be paid much importance, which is the key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tacit coordination. In fact, only on the foundation of trust, an effective labor- divisio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can be formed, and the efficiency of corporation as well as clusters and reformation can be boosted, which is the essential advantag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centive for Leading Industry: the Local Governmental Behavior in the Form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luster

Fang Jianguo and Xie Xiaoping 93

Making use of the theory of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we analyze the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paper presents a view that incentive for leading industry drives local government to develop industrial cluster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viewpoint, we analyze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industrial cluster growth and cluster embedded in the Guangzhou automobile industry.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we derive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A Reflection on the Opera Concepts of China in the Last Century

Deng Qiping and Song Junhua 138

Opera of History pursues nothing but to be a kind of poetry or a kind of history. It is reasonable for history opera to pursue the poetic implication. The history opera makes use of the method of play interpretation to repeat the history, which goes well with the artistic law of operatizing the history in history opera and is the definite rout for the history opera to pursue its aesthetic value. In the concepts of history opera in the last century, there was a quarrel happened continuously between 'play interpretation' and 'play imitation'. However, as people opened their mind step by step, the artistic history and the imitational history have been divided seriously, and the way of play interpretation in history opera creation has been accepted by the mass spectators already.

Some New Proofs about Mr. Liu Changqing's Life Story

Hu Kexian 148

In the newly excavated epitaphs, there are three concerned Liu Changqing, a famous poet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Depending on the epitaphs and other presented documents, we can further discuss several problems about Liu Changqing's life story. First, he was the chief military officer in Junyi county, Chenliu prefecture. Secondly, the date of his success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determined with the new proofs. Thirdly, the time when he was the imperial supervisor can be determined now. Fourthly the time when he became the Zhuanyun judge of E- yue is cleared.

《学术研究》读者评议表

尊敬的读者：您好！

《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您的支持和帮助，为使我们的刊物能够更好地满足您的要求，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您对我们刊物的评价和建议。请将以下问卷填妥后寄至：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学术研究》杂志社（邮政编码：510050），或（Fax）020-83846177。联系电话：020-83846307、020-83846163，电子邮箱：bjb@gdskl.cn

我们将不定期邀请热心读者召开座谈会，对刊物的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的读者，我们将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您所提供的个人资料，本刊将予以保密。

姓名：_____ 单位全称：_____

地址：_____ 邮政编码：_____

电话（请务必填写）：_____ 手机：_____

传真：_____ 电子邮箱：_____

1.在本刊所有学科中，您最关注的学科是：_____

2.在本期您所关注的学科中，您最喜欢的文章是：_____

3.在您所关注的学科的文章中，您在其选题意义、文章内容、学术价值、研究的创新程度上的评价是：

指标	评价
选题意义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文章质量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学术价值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创新性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4.您认为本期 《学术研究》在栏目设置、校对水平、版式设计和印刷质量方面做得如何？

指标	评价
栏目设置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校对水平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版式设计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印刷质量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5.您认为今后 《学术研究》还应该增加哪些栏目和内容，或是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_____

_____

6.您认为 《学术研究》的特色主要应表现在哪些方面或今后应该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_____

_____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请继续关注 《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编辑部

2008年6月

岭南人文图说之五十四 ——

梁启超故居和饮冰室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新民子等。广东新会茶坑村人。少年即颖异过人，勤奋好学。光绪十年（1884）应院试，补博士弟子员。光绪十三年（1887）起，肄业于广州学海堂。光绪十五年（1889），中式广东乡试第八名举人。光绪十六年（1890 年从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受学，接触经世致用之学，决然舍去旧学，思想为之一变。光绪二十一年三月（1895 年 4 月），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 1300 多人发动“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主讲湖南时务学堂，任中学总教习。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京，参与百日维新，办京师大学堂及译书局等。政变发生后，9 月流亡日本。1912 年 9 月回国，组织进步党支持袁世凯，并任司法总长。1916 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策动蔡锷起兵于云南，参加“护国战争”。1917 年 7 月，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内阁成立，任财政总长。同月，通电全国，反对张勋复辟。11 月辞职。从此离开政坛，致力著述。

1918 年底赴欧洲游历，1920 年春回国。此后定居天津，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讲学，全力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作。1925 年受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导师”，著述颇多。1927 年 6 月脱离清华研究院。1929 年 1 月 19 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学问广博，著述甚丰，著作版本众多，然均非全集，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36 年出版）为其最佳者。夏晓虹编成《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可补以往之失。

梁启超故居有二处：一在新会，一在天津。新会故居位于会城近郊茶坑村，又有梁氏读书处“怡堂书室”，另有 1600 平方米的梁启超纪念馆，地近凌云塔。天津故居位于河北区民族路（原意租界四马路），建于 1914 年，为两层意式楼房，面积 1374 余平方米；左侧即梁氏书斋“饮冰室”，亦为两层意式楼房，由意大利著名建筑师白罗欧尼设计建造，面积 1117 余平方米。2001 年，将二者辟为“梁启超纪念馆”。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左鹏军供稿）



▶ 梁启超使用过的办公桌（新会梁启超纪念馆）



▲ 新会梁启超故居（远景）



▲ 梁启超书斋——饮冰室（天津）



Academic Research



晴雨塔希堤　陈蔼 作

ISSN 1000-7326

定价：8.00元

刊物名称：《学术研究》
出版单位：学术研究杂志社
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管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编：叶金宝
地址：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邮编：510050 电话：020-83846163
出版日期：2008年6月20日
装帧设计：明镜
广告经营许可证：粤工商广字010349
印刷：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期刊基本参数：CN44-1070/c*1958*m* 大16*160*zh* P* ￥8.00*3200*29*2008-06

网址：www.gdskl.com.cn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内总发行：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发代号：46-64
国外代号：M268（北京399信箱）
刊号：ISSN1000-7326
CN44-1070